《中国体育通史》
总主编　崔乐泉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体育通史

ZHONG GUO TI YU TONG SHI

第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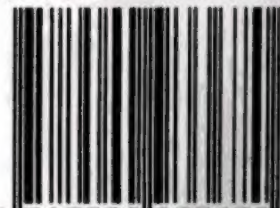
主编　郝　勤

人民体育出版社

中国体育通史

第六卷

ISBN 978-7-5009-3367-0



责任编辑 丛明礼
封面设计 刘 泉

定价:35.00元

《中国体育通史》
总主编　崔乐泉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体育通史

ZHONG GUO TI YU TONG SHI

第六卷（1980–1992年）

主　　编　郝　勤

编写人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田　标

史国生

邱凌云

郝　勤

唐永干

崔　莉

韩志芳

傅砚农

潘　华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体育通史. 第六卷，1980—1992年 / 郝勤主编.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ISBN 978-7-5009-3367-0

Ⅰ. 中… Ⅱ. 郝… Ⅲ. 体育运动史-中国-1980—1992
Ⅳ. G8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8452 号

*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

880×1230 32开本 10.5印张 281千字 插页6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

ISBN 978-7-5009-3367-0
本册定价：35.00元 全套定价：280.00元

社址：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8号（天坛公园东门）
电话：67151482（发行部） 邮编：100061
传真：67151483 邮购：67143708

1979年9月，国家体委主任王猛为全国体育先进工作者、先进集体颁奖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会议，一致通过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图为国际奥委会执委及各国朋友向中国代表祝贺



1980年，中国运动员参加了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图为开幕时中国代表团走进会场



1981年第3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上，中国队不但获得冠军，而且还获得了最佳教练员、最佳攻球手、最佳二传手和最佳运动员4座奖杯

1981年在第3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队首次获得全部7项冠军





1983年9月，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向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颁发奥林匹克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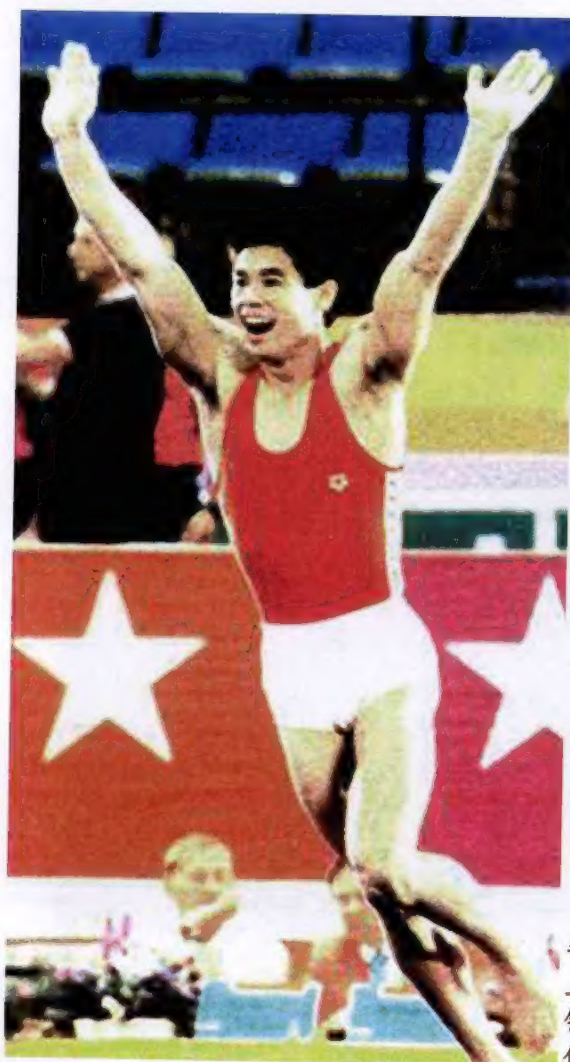


1979年第33届世界举重锦标赛上，吴数德成功地抓起110公斤，获得52公斤级抓举冠军，成为我国第一个举重世界冠军。1984年，在第23届奥运会上，他又以总成绩267.5公斤夺得56公斤级的金牌



1983年9月22日下午，上海选手朱建华在第5届全国运动会跳高比赛中，以2.38米的成绩打破男子跳高世界纪录

1958年9月1日，新中国第一张体育报纸《体育报》正式创刊。1988年7月1日，更名为《中国体育报》，邓小平题写了新报名



李宁在第23届奥运会上共获得3枚金牌、3枚银牌、1枚铜牌，在自由体操比赛中获得满分



许海峰获第23届奥运会男子自选手枪射击冠军，成为我国的第一个奥运会冠军



栾菊杰在第23届奥运会上获得女子花剑个人第一名，成为60年来第一位登上奥运会击剑冠军宝座的东方姑娘



1986年4月28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向国务院副总理万里颁发奥林匹克金质勋章，以表彰他为奥林匹克运动和中国体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1987年11月21日，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左三）和中国举重协会主席陈镜开（右五）接受萨马兰奇主席颁发的奥林匹克勋章。图为授勋后与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合影



庄泳夺得第24届奥运会女子100米自由泳银牌，成为中国泳坛夺得第一枚奥运会奖牌的运动员



1988年，在北京举行的首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开幕式



1988年，中国足球队第一次实现了冲出亚洲的愿望。图为在第24届奥运会上，中国队与突尼斯队比赛的情景

1990年8月22日，国家主席江泽民亲手点燃了在北京举行的第11届亚洲运动会的火炬



多次获得世界冠军、荣获"世纪最佳运动员"称号的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



先后参加过6次世界"三大赛"，共获得跳板跳水8枚金牌和团体3个冠军，被誉为"跳水皇后"的高敏

前 言

体育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体育思想与实践的真实记录。体育史和体育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发现并揭示体育发展的规律，探索体育发展过程中各种问题的解决途径和方法，从而促进体育更加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其为人类的发展服务的目的。

中国体育史是世界体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体育史的研究，是随着西方体育的传入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步的。在此之前，尽管中国已有数千年注重修史的优良传统，但由于体育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因而也未能成为传统史学研究的对象。20世纪初期，清政府实行“新政”以后，各级各类普通学堂按照新的学堂章程相继设置了“体操”科目，一些专门培养体育人才的学堂设置了“体育史”课程。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国第一部体育史专著——《中国体育史》，就是郭希汾（绍虞）先生为爱国女学体育科和东亚体育学校开课准备的。此后，相关的研究成果亦有不少问世，体育史的论著和译著也逐渐增多，如1931年章辑五的《世界体育史略》、1945年程登科的《世界体育史纲要》等等。不过，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体育在内，都处于落后的状态，因而对中国体育史的研究也处于较低的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体育史研究有了较大发展。通过体育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先后出版了许多有关中国体育历史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随着近年来大批文献资料的积累、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以及相关考古资料的不断披露，使得中国体育历史的研

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国运盛，体育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中国当代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悠久的中国体育历史文化开始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而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应用通史的形式，整理和传播具体的体育历史文化知识，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一项时代的重要工程，也是体育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基于上述考虑，2002 年我们提出了编撰《中国体育通史》的计划，通过论证准备，这一计划先后被批准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国家体育总局重点课题。

《中国体育通史》各卷分别对不同时代中国体育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研究和梳理。总体上，整个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大致划分为中国古代体育、中国近代体育、中国当代体育 3 个大的历史阶段。

1. 中国古代体育（史前—1840 年）

中国古代体育，历经史前社会（—前 2070 年）、夏（前 2070—前 1600 年）、商（前 1600—前 1046 年）、西周（前 1046—前 771 年）、东周（前 770—前 256 年）、秦（前 221—前 207 年）、汉（前 206—220 年）、三国（220—280 年）、两晋南北朝（256—589 年）、隋（581—618 年）、唐（618—907 年）、五代（907—960 年）、宋（960—1279 年）、辽（907—1125 年）、金（1115—1234 年）、元（1206—1368 年）、明（1368—1644 年）和清前期（1616—1840 年），为中国体育产生、发展和演变的重要历史时期。

历史的发展表明，人类的祖先大约在距今 300 万年前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了。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仅史前社会所跨越的时间就占去了 99%。就其组织形式而言，这一社会形态先后经历了血缘家族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 3 个社会发展时期；从经济发展与生产力水平来看，则先后经历了以采集、狩猎经济

为主的旧石器时代和以农业、畜牧业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在史前社会，原始形态的体育是随着劳动等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主要的表现就是在生产劳动、部落战争、日常生活中，逐渐产生了走、跑、射箭、攀登、搏斗、跳跃、舞蹈、导引等运动形式。这些原始形态的运动形式，为文明时代体育形态的出现揭开了序幕。

从公元前2070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的建立，直到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历史上先后延续了夏、商、西周和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4个历史时期。这是我国文明社会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经济上，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为我国文明时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治上，华夏大地各部落相互融合，形成了华夏族，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壮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作为华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体育，随着频繁的战争、学校的兴起和各种宗教祭礼仪式的出现，也日益发展和丰富起来。尤其是战国时期思想文化上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促使各家学说中的体育思想崭露头角。这些变化，对古代体育的初步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射箭、技击、赛车、游泳、奔跑、摔跤、技巧、导引、球戏、棋类活动以及各种体育思想在这个时期已初步形成。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为华夏民族体育的初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国古代体育的雏形开始形成了。

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后，经过长期的发展，中国历史上先后经历了秦、西汉、东汉、三国和两晋南北朝几个时期。在这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城市的初步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而体育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形成了后世体育发展的基本格局。特别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各民族融合过程中，物质、文化的相互交流，推动了各民族体育的发展和交流，也为

体育活动增添了新的内容和色彩。

经过两晋南北朝将近四百年的长期封建割据战争之后，历史进入封建社会繁荣的隋唐五代时期。较为完备的封建体制、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为体育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对军事训练的重视和武举制的实施，在推动武艺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马球、蹴鞠等体育活动的风行；城市的繁荣和宫廷娱乐的发展，推动了各种传统体育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并吸引了妇女阶层的积极参与；而与周边国家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既促进和丰富了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的发展，也使体育文化的交流更为广泛，成为我国古代体育史上的黄金时代。

唐朝以后，中国境内先是出现了北宋、辽、西夏并存，后为南宋、金和西夏鼎立的局面，但随着元王朝的建立，中华大地又归于统一。这一时期，体育发展是多方面的。在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军事武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各民族体育活动的开展也各具特点。而市民阶层的壮大，为城镇健身娱乐体育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蹴鞠、马球、角抵、游泳、龙舟竞渡、蒙古象棋、围棋和象棋等成了市民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在养生体育方面，注重对前人导引养生资料的汇辑与整理，出现了大量的著名的养生家和导引养生著述，文人儒士、佛道教徒对导引养生术的研习等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中外体育文化的交流日趋频繁和广泛。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鼎盛的时期，相对稳定的社会形势，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作为中国古代体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体育活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民间社会的宗教组织与秘密结社的盛行，促进了民间武术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体系。在养生体育方面，编辑整理了古人的精华之作，进行了分类和评述，导引养生体育逐步完善和系统化。随着传统的蹴鞠、击球、捶丸这些体育活动因竞技性减弱而走向衰弱，角抵、龙舟竞渡、棋类、秋千、风筝、举重、踢毽子、跳百索等体育活动在民间得到了普及。少数民族开展的体育活动各有

特点，百花齐放。在中外体育交流中，西方近代体育开始引起国人的注意。

从整个中国古代体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是经过不同时期的流传融汇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除了华夏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外，中国古代体育还包括了在历史长河中由许多其他民族传入并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展的体育活动。中国古代体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原始的朴素和谐的理想、中和融通的宽和精神，决定了其竞技性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那种带有强烈对抗性的形式，更加注重礼仪和实用性。与此同时，体育与文娱活动融为一体又使中国古代体育的娱乐性、游戏性和趣味性殊为明显。而华夏民族长期形成的清静淡泊、顺乎自然的性格，天人合一、和谐共处、融合化一、贯通一体的理想及注重个人修身养性的务实精神，还导致了养生保健术的产生，使其成为中国古代体育活动的重要形式，形成了东方体育文化的典型代表。

2. 中国近代体育（1840—1949年）

中国近代体育，是指1840年到1949年这段时期在中国流行和实践的体育。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本身固有的由古代延续下来的传统体育；二是由西方传入的近代体育。其中涉及到了晚清时期的体育、民国初年和北京政府时期的体育、抗战前南京政府时期的体育、抗战后南京政府时期的体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带有新民主主义色彩的革命根据地的体育。古代中国体育经历了高度繁荣和发达的阶段，但到了清代，它和它所处的社会，都已远远落后于欧洲。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接触到西方近代体育，从而开始了其缓慢的体育近代化的过程。

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从此，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入侵所导致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加剧，促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学说和

文化教育。而西方近代体育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传入中国，并逐步居于近代中国体育的主导地位的。可以说，它是在古老的封建帝国逐渐解体的背景下，作为中国人寻求救国图强的世界先进科学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被引进、吸引并传入中国的。从主观上看，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教会等向中国传输文化、体育，是其文化侵略中国的手段之一，但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加快了中国与世界先进文化、体育接轨和融合的步伐。洋务派“新军”和“新学”中的“体操”，开近代体育之先河；清末民主主义者则利用体育与军事相联系的特点，以体育作为培训革命军事力量的重要途径；而清末日益增多的西方教会的文化教育活动，亦成为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重要渠道。在近代西方体育大量被引进的同时，中国传统的、丰富多彩的体育仍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并继续得到流传与发展。这也是中国近代体育初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色。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埋葬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思想，促进了人民的觉醒。特别是 1915 年后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给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在它们的推动下，中国近代体育也经历了重大的演变：在学校体育中，以体操为主要内容的体育课，发展为以球类、田径等多种生动活泼的体育项目为内容；培训体育师资的工作已在较大范围内开始；在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方面，由于远东运动会的影响，全国、大区、省市等不同级别的体育竞赛已初步形成制度；体育竞赛的组织和裁判方面，逐渐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了主权。

1927 年后，国民党逐步在全国建立起统治。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近代中国体育也处于一个发展较快的时期，中央政府在教育部下设立了“体育组”等专门管理体育的组织，诞生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和其他许多体育方面的法律法规；体育运动竞赛在这个时期空前地发展了起来，不仅举办了 3 次“全国运动会”，举办了一些地区、省市的运

动会，还开始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体育理论界，随着西方一些体育思想的传入和影响，不同的体育思想学说在中国得以展现；学校体育在发展过程中，并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了制度；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如武术等取得了新的发展。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以苏区体育和工农红军中的体育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体育已初步形成并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使近代体育普及到了穷乡僻壤，取得了显著成效，显示出了新民主主义体育的特性。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由于出现了社会性质不同的3大区域，即日本统治下的沦陷区、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使发展中的近代体育也呈现出3种类型，即沦陷区的殖民地体育、国统区的战时体育和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体育。在战时状态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体育，由于它突出为革命战争服务，注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性，因而成为一种全新的体育运动。尤其是在3年解放战争中，随着军事训练的开展，在军队和人民群众中，体育活动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解放区体育运动的开展，创造和积累了发展人民体育事业的经验，为新中国社会主义体育运动的建设与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近代体育只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尽管这个时期社会动乱，人民饱经沧桑，但却是中国体育内涵和面貌发生较大变化的一个阶段。在这一时期，西方体育开始传入中国，并逐渐地得到普及与发展。同时，中国传统体育也在不安定的环境中艰难地奋进。正是在这两大不同体育体系的相互排斥与相互吸收中，中国体育走完了它的近代化历程。

3. 中国当代体育（1949—2005年）

《中国体育通史》所记录的中国当代体育，是1949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05年这56年间中国体育的发展历程。而这一时期中国体育的发展，也是一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的历史。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成立，更意味着一幅撼人心魄的历史巨变画卷在当代中国展开。而批判改造旧体育，建立新体育，成为当时体育界的主要任务。

新中国成立前，新民主主义文化、体育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体育中得到体现。新中国的成立，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在全国的贯彻实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体育成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及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要“提倡国民体育”。同年10月，朱德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全国体总筹备会上的讲话中，将体育确定为“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卫生保健的一部分”。他指出：“过去的体育，是和广大人民群众脱离的。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1] 冯文彬则进一步提出新民主主义体育的方针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要把体育活动和一般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结合起来，反对为体育而体育，脱离人民的思想办法。……为人民的健康、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和人民的国防而发展体育。”[2] 1952年，毛泽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明确地界定了新中国体育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从1953年起，随着陆续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毛泽东“要学习苏联”的号召下，全国体育界掀起了一个相当长时间学习苏联的热潮。其时，通过大量翻译介绍苏联体育模式，并聘请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尤其是聘请他们指导了新中国的一批体育理论研

[1] 朱德副主席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上的讲话．新体育，1950（1）.

[2] 冯文彬．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新体育，1950（1）.

究生，使苏联体育模式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和推广。但与此同时，体育界也出现了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和急功近利思潮。如1958年提出的体育运动10年发展纲要，要求在10年内全国有4000万人通过劳卫制，800万人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出现5000个运动健将等等。在这一阶段，整个体育事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变化，既出现了发展高峰期，也因为“左”倾思想的影响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出现了短暂的冒进和收缩所形成的回落期，呈现出马鞍形曲折发展的境况。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体育事业遭受了一场浩劫。文化专制，形而上学猖獗，体育思想也被极度扭曲，出现极左的体育观，把体育为政治服务绝对化、庸俗化。竞技体育、学校体育急剧衰落。但在“文革”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由于夹杂着极左思潮支配的形式主义，因而在一定层面和时间段里，群众体育还显现出了畸形的兴盛状况。当然，这种恢复和畸形兴盛在没有平稳的政治局势和良好的经济状况背景下，是不可能长久的。“文革”后期，体育又整个滑向了低谷。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中国当代体育发展的过程中，它以改革开放为背景，在反思中不断冲破旧的思想束缚，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发展最快的时期。体育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发展体育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思想上解除了精神枷锁，恢复和健全了体育组织管理机构，恢复了正确的规章制度，提出了攀登体育高峰的目标，为当代中国体育事业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中国当代体育发展史上，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年代。第一，从这一时期开始，在党的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中国体育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第二，中国体育在这一时期全面走向世界，在国际赛场上创下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成就，奠定了中国体育在国际体坛的地位和影响；第三，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中国体育还在适合中国国情的体育发展道路方面进行了初

步探索与实践。此外，在制订新时期我国体育发展战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推动体育体制的改革、促进体育文化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

1992年以后，随着邓小平一系列重要谈话的发表，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开始形成，同时也为我国体育的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从此我国体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主要标志是体育的发展呈现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趋势。1995年《体育产业发展纲要》《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的制定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体育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在中国当代体育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随着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成功，实现中国人近百年的奥运梦想成为中国当代体育发展的又一个目标。虽然1993年北京市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中以两票之差失利，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的长足进步、国际政治地位的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大，北京市又以崭新的面貌开始了新一轮奥运会主办城市的申办工作，并最终成功地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

进入新的世纪，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了《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为中国当代体育在新世纪的发展描绘了新的蓝图。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为新时期中国体育的发展确定了路线和方针政策。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体育的发展是中国体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由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历史原因，港澳台地区的古代体育发展颇具特色，近代体育受西方近代体育的影响较为突出，当代体育全面发展，成效显著，是《中国体育通史》中独具特点的历史画卷。

随着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北京市的筹办，新的中国体育发展高潮正在到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和全国人民的支

持下，当代中国体育必将得到全面进步与发展，取得更大的成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体育通史》由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同一课题负责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员崔乐泉博士担任总主编，共分为8卷：第一卷（即古代体育史第一卷），史前—960年，由崔乐泉主编；第二卷（即古代体育史第二卷），960—1840年，由南开大学体育部教授杨向东主编；第三卷（即近代体育史第一卷），1840—1926年，由苏州大学体育学院教授罗时铭主编；第四卷（即近代体育史第二卷），1927—1949年，由罗时铭与厦门东南职业学院教授赵戗华主编；第五卷（即当代体育史第一卷），1949—1979年，由鲁东大学体育学院教授傅砚农主编；第六卷（即当代体育史第二卷），1980—1992年，由成都体育学院教授郝勤主编；第七卷（即当代体育史第三卷），1993—2005年，由杭州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教授曹守和主编；第八卷，即香港、澳门、台湾体育史，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副编审马宣建主编。各卷分之可独立成书，合之为一有机整体。参加撰写的学者近50位，其中大多为国内各院校的体育史科研人员，同时我们还邀请了国内有关科研机构的专家，参与了本书的部分编写工作。作为一个集体性的项目，本书涉及了中国体育上下数千年发展的历史，以及体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交融与影响，因此我们力求在现有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在撰写中要突出历史性、科学性、全面性和客观性，同时更要有创新性。鉴于《中国体育通史》，尤其是其中当代中国体育史编写的复杂性和难度，我们自2000年起，先后邀请体育界的张彩珍、谢琼桓、王鼎华、毕世明、陈荫生、熊斗寅、张天白、谷世权、徐永昌等领导和专家进行座谈，从提纲的拟定到编写的具体原则广泛地征求意见和建议，并先后召开了数次由各卷主编人员和具体编写人员参与的研讨会，以求保证本书的编写质量。尽管如此，对于这样一部由几十人参与，又涉及时代如此之长久、地域如此之

广阔、内容如此之广泛、问题如此之复杂的庞大著作，其中的不足和缺陷在所难免，我们诚挚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中国体育通史》在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的有关领导、专家的关心、鼓励和悉心的指导；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体育文化发展中心、成都体育学院以及全国各地的相关院校、体育科研机构均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和大力的支持。

作为国内最高档次的体育专业出版机构，人民体育出版社承担了《中国体育通史》编写与编辑出版的主要组织工作。在史勇总编辑的领导下，丛明礼、孙静敏编审和吴永芳、谢建平等各位编辑人员，以认真负责的精神和热情投入的态度，审读书稿、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和相关的事务。正是他们的辛勤努力使得作品能够顺利出版。就在即将完成全部编辑工作之时，经人民体育出版社申报，《中国体育通史》被列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实现了体育类读物列入国家级重点出版规划的“零”的突破。

在《中国体育通史》付梓之际，我们向所有关心、指导、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同志们，向全国各相关单位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7年12月

目 录

绪 论

本卷是《中国体育通史》第六卷，时间是1980年至1992年。内容主要反映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体育的发展过程与概况。

在中国现代体育发展史上，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年代。第一，从这一时期开始，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中国体育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第二，中国体育在这一时期全面地走向世界，在国际赛场创下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成就，奠定了中国体育在国际体坛的地位及其产生的影响；第三，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与环境，中国体育还在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与实践，在制订新时期我国体育发展战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推动体育体制的改革、促进体育文化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

20世纪80年代中国体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当时发生在中国这个古老大国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例如其中主要的几点：

第一，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在苏联体育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自己的体育体制。在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得到较大发展的同时，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体制开始形成。其基本结构为：以国家体委为中心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以全运会为中心的竞赛体制；以国家集训队、各省级专业运动队和各县级业余体校为“一条龙”的训练体制。虽然1958年中国退出了国际奥委会和大多数国际单项运动协会，但这个后来被称为“举国体制”的国内竞技体育体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竞技体育快速崛

起和腾飞的基础，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体育能在国际赛场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关键性因素。

第二，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革”时期，中国正在发展的体育事业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但在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乒乓外交”首次凸显了体育在国际政治和对外关系活动中的重要功能。这使中国人首次认识到了体育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背景下所具有的重要政治功能与影响。这一点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体育确立以提高竞技运动水平和参加奥运会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背景而言，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人民走出了十年“文革”阴影，迅速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事业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不仅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体育事业提供了快速发展的经济基础和制度环境，而且为这一时期中国体育事业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从而保证了中国体育事业在这一时期的健康快速发展。

第四，20世纪80年代中国体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另外一个大背景，就是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过了著名的“名古屋决议”，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这一划时代事件，不仅标志着中国全面回到了国际体育大家庭，而且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体育发展目标、制订政策、工作重心、手段措施以及体育管理体制、竞赛体制、训练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围绕参加莫斯科奥运会、洛杉矶奥运会、汉城奥运会和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体育在20世纪80年代把主攻点放在了提高竞技运动水平上，确立了以“奥运战略”为中心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使中国竞技体育迅速实现了腾飞。

第五，20世纪80年代中国体育之所以能在当时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重大影响，也和当时的社会心理需求有关。在经历了

十年“文革”浩劫之后，民心思变，百废待兴。全国人民对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上取得优异成绩有着极高的心理期待。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中国运动员在国际重要赛事中取得的每一次胜利，都能在全国人民中引起巨大的反响，使民心为之一振，激发起全国民众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潮。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体育成为了这一时期鼓舞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号角和旗帜。

很显然，如果不将这一时期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置于上述广阔而复杂的时代背景中去，不置于20世纪80年代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去，我们就无法真实地去把握这一时期中国体育发展的脉络和意义。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体育发展的基本主题。这就是，第一，迅速提高竞技运动水平，在奥运会等国际重大赛事中夺取优异成绩，向全国人民交上满意答卷。第二，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方针指引下，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协调与合作，推动群众体育和青少年体育的发展。第三，完善和强化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推动体育改革，不断探索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体育改革的路子和方向。第四，全面加入国际体育大家庭，积极参加国际体坛事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体育事业争取更好的国际发展空间。

从现代体育史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中国体育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0—1984年。其特点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和国际奥委会“名古屋决议”（1979年）两大事件影响下，中国体育围绕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备战工作，迅速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提高运动水平和力争在国际重大赛事中夺取优异成绩上来。这一决策，不仅使“文革”期间遭受破坏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得到迅速恢复和完善，而且也为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历史性优异成绩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 1984—1988 年。这一时期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取得的胜利推动中国体育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受到了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人的高度关注与赞扬。而汉城奥运会的失利，也使中国体育界看清了自己与世界体育强国的差距，看到了现行体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为下一阶段的体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是 1988—1992 年。这一时期中国体育在总结参加汉城奥运会取得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加大了改革力度，在训练体制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从而使中国运动员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同时通过举办 1990 年的第 11 届北京亚运会和首次北京申办奥运会，为中国体育下一阶段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可以说，20 世纪 80 年代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体育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也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体育所取得的成就将永昭史册，如许海峰夺得中国历史上首枚奥运会金牌、中国女排五连冠、中国男子足球队首次冲击世界杯、中日围棋擂台赛等，都成为了那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事件，给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体育的改革与发展成就是史无前例的。它对 90 年代以至 21 世纪初中国体育的发展具有开拓性意义，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回顾和研究这一时期中国体育发展的历程与经验，无论对追溯那段激动人心的岁月，还是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章　20世纪80年代中国体育改革发展的背景与初期表现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面临的任务是及时地和毫不犹豫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上来。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战略转移，必须在肃清林彪和"四人帮"流毒的同时，认真纠正党在指导思想上多年来存在的"左"的错误，才能保证实现新时期历史任务时的正确领导，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的顺利发展。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出色地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活跃的政治空气和迅速发展的经济建设，为体育事业的拨乱反正和迅速恢复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思想和物质条件。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里，从国家到地方各级体委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保证了国家对体育事业的领导。为了适应党在新时期对体育工作的要求，以及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的新形势，国家体委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调整了战略方向，将工作重点放在"侧重抓提高"上面，一边调整，一边发展，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与腾飞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80年代体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体育工作重点转移的部署与措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使在"文革"十年中长期禁锢体育界的精

神枷锁得以解开。同时，国内理论界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体育工作者大胆对过去体育领域的禁区进行探索，澄清了一些模糊观念，纠正了一些错误现象，确立了体育战线应不失时机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发展体育事业上来的战略方向。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从 1979 年起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左”的错误理论，提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完成”，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从 1979 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的徘徊局面，作出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重大决策。这次会议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国家体委于 1979 年 2 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了体育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会议认为必须集中精力抓体育工作，努力攀登世界体育高峰。体育战线的工作重点就是高速度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在新的时期加速实现 1978 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要在本世纪内成为世界上体育最发达国家之一”的目标。

1978 年 5 月 12 日，国务院发文批转国家体委《1978 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国务院在批示中强调，要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高速发展体育事业，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进一步广泛开展群众体育运动，重点抓好关系到两亿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学校体育工作，积极地、有步骤地开展军事体育，大力加强训练工作，增强人民体质，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以迎接经济、文化建设的新高潮，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国务院还同意 1979 年召开第 4 届全国运动会，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认真做好准备，创造一批新纪录，推动体育运动出现一个新面貌。批示中还强调指出，发展体育运动是增强人民体

质、振奋革命精神、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团结友谊的重要手段，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各地应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列入议事日程，一年抓几次，努力把体育工作做好。

《1978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由3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深入揭批"四人帮"；第二部分是为了澄清路线是非，必须明确坚持党对体育工作的领导，促进青少年德、智、体全面发展，坚持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开展体育运动竞赛，迅速攀登体育运动技术高峰，开展国际体育交往，坚持合理的体育规章制度，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8个方面的问题；第三部分是目标和措施，即在本世纪内，努力做到城乡群众体育大普及，拥有世界第一流的体育队伍、世界第一流的运动技术水平和一流的现代化体育设施，成为世界上体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8年内，要基本普及群众体育，大部分运动项目的成绩接近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3年内，群众体育要开创一个新局面，要有三分之一项目的成绩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79年举行第4届全国运动会，检阅体育战线30年来的巨大成就。会议指出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1. 整顿和建设好各级体委领导班子，特别是要选配好第一、二把手。国家体委要带头，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要有计划地深入下去，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解决实际问题。

2. 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调整和健全政治工作机关，发挥政治机关的职能和作用，学习解放军，总结自己的经验，建立一套适合体育系统特点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方法。切实解决思想问题，保证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3. 大搞群众体育运动，掀起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竞赛。体育是关系着亿万人民健康的大事，要广泛动员工农商学兵各界根据各自的特点，积极开展体育运动。学校体育是关系到两亿青少年全面成长的大问题，各级体委要配合教育部门切实抓紧抓好。在省、市、自治区之间，地区、市、县之间，运动队之间开展

竞赛。建立先进集体和先进体育工作者评选制度，要向又红又专、持续跃进的国家乒乓球队学习，在体工队开展评选“勇攀高峰运动队”的群众运动。

4. 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继续推行国务院批准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修订运动员和裁判员技术等级制度、竞赛制度等。

5. 建立层层衔接的训练网。省、市、自治区都要按照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要求，力争在三五年内建成从基层运动队（中小学）— 业余体校 — 重点业余体校 — 体工队层层衔接的训练网，逐步建立集中统一的训练指挥系统。

6. 大搞技术革新，提高训练质量。体工队必须以训练为中心，坚持执行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方针和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的原则。要大力提高训练质量，加强训练的科学性、系统性和计划性。

7. 大打体育科研之仗。体育大干快上，科研必须先行。国家体委拟建立管理科技工作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体委和体育学院要建立和充实科研机构。要保证科研人员至少必须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业务工作。

8. 大力培养体育人才。体育院、系要继续深入教育革命，加速培训体育教师、教练员和体育干部。培训体育人才必须两条腿走路，开办多种形式的进修班、短训班。

9. 切实搞好后勤保证。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原则，加强对现有场地、器材的管理和维护，提高使用率。在重点城市应有计划地建设现代化的体育设施，以适应承办国际比赛的需要。

10. 恢复健全组织机构，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建立健全县以上各级体委，列入各级革委会的行政编制。恢复体育运动委员会委员制。建立健全基层体育组织，根据条件配备专兼职干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这次会议还确定了“在 1979 年和 1980 年，国家体委和省一级

体委要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的方针。根据全国体工会议的要求和布置，全国整个体育工作开始“一边调整，一边前进”，迅速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会议还就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工资标准、奖励制度、技术职称、技术等级制度、后勤保证方面的一些规定，进行了初步讨论。

为了适应体育工作重点的转移，各级领导带头学科学、学业务、学技术、学管理，主动改变外行管内行行为；积极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恢复了“文革”前党中央提倡的大兴调查研究、经常深入基层的良好作风，深入训练、竞赛、科研第一线，去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各级体委领导工作重心的迅速转移，为实现既定的阶段目标，尤其是使80年代初体育各项工作得以迅速展开并进入有序发展，把竞技体育作为侧重点使运动成绩能从“文革”低谷中大面积大幅度跃升，起到了关键的保证作用。

二、《全国体育事业发展规划》为20世纪80年代体育改革发展提供了依据

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拟定了体育事业发展的长、中、短期目标。即在本世纪内，一定要努力做到城乡群众体育大普及，全国人民体质大增强，拥有世界第一流的体育队伍、世界第一流的运动技术水平、现代化的体育设施，成为世界上体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8年内，要基本普及群众体育，大部分运动项目的成绩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79年举行第4届全国运动会，检阅体育战线30年来的巨大成就。

鉴于当时仍然把揭批“四人帮”的政治运动放在首位的国内形势，各省、市、自治区只是把这个目标作为努力的一个方向，并没有细化和具体成各项标准，拟定出实施的措施和步骤。1978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后，拟订全国事业发展规划，确定好长期、中期、

短期发展目标，立足现实，兼顾以后，着眼未来，成了国家体委、各省、市、自治区体委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1979年3月9日，国家体委以文件形式下发了《1979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分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体育战线的形势；第二部分是1979年和1980年要做好的工作；第三部分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是完成任务的保证。《纪要》在第二部分中重点阐述了4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开好第4届全国运动会，积极准备参加1980、1984年奥运会，力争在全运会、奥运会以及世界性比赛中创造一批优异成绩。第二，进一步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工农商学兵的体育活动都要有新的发展。重点抓好关系两亿青少年学生健康的学校体育。军事体育活动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积极有步骤地开展，扎扎实实抓好普及工作。第三，大力加强业余训练，加速培养优秀运动员后备力量，把大、中城市的训练网建立、健全起来。第四，加强科研工作，着力解决赶超世界水平的课题。努力办好体育学院，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把体育学院办成教学、训练和科研中心。

1979年的体育工作会议把开好1979年的第4届全运会、力争1980年奥运会上进入团体总分前10名、获得15枚左右奖牌，群众体育要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建立健全大、中城市的训练网，搞好重点项目的布局和建立各地区传统项目的业余训练基地，开展教练员轮训，努力办好体育学院和科研所等，作为近两年的目标和工作任务。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都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召开体工会议，并按照近两年内侧重抓提高的要求进行工作部署。

在这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在会议总结中肯定了23年（1978—2000年）设想和8年（1978—1985年）的规划，认为“奋斗目标是鼓舞人心的，实现这一设想，也就可以说实现了体育现代化。我们应结合各项工作，经常地、适当地加以宣传，以鼓舞体育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和教练员、运动员，为实现这一设想而奋斗”。代表们对设想与规划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总的

认为，《规划》的方向是好的，是鼓舞人心的，但有些指标过高。会后《全国体育事业发展规划》以草案形式下发，供各地修订本地区发展规划时参考。应该讲，在制订全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长期、中期规划上虽然由于指标上的分歧及其他如地区具体情况等因素未能确定下来，但恰恰表明了会议代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通过这次讨论，全国和各省、市、自治区体委，在工作上都有了一个长远的共同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意识。

三、"侧重抓提高"是推动20世纪80年代我国竞技体育大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

1979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1980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认为，体育战线内部没有严重的比例失调，调整应抓住当前工作的重点，为中长期规划的实现打好基础。会议总结了20年来体育工作的基本经验，这就是要正确处理好体育与政治、体育与经济、普及与提高、学习与创新等方面的关系，要充分运用竞赛手段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和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办体育。"文革"结束后，运动技术水平落后已成为体育事业发展的突出薄弱环节，多数项目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很大，有的达不到奥运会的报名标准，有的还冲不出亚洲。因此，体育界必须在统筹安排的基础上突出重点。会议肯定了1979年确定的省一级以上体委继续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的部署，提出了"力争在今年奥运会上进入总分前10名，在1984年奥运会上进入总分前6名"的指标，并提出了力图"在80年代根本改变我国运动技术水平的落后状况，使我国体育在全世界大放异彩"[1]。

---

[1]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国家体委关于加速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2：141.

从1980年开始，国家体委和各地体委按照上述思路对发展方向与重点进行了全面的调整。

首先，按照有利于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的原则，对运动项目的布局进行了调整。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就确定过以10个优势和影响较大的项目作为发展重点。1979年随着国际奥委会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以后我国体育全面登上了国际舞台，更须集中力量尽快把若干项目搞上去，这是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一项重大政策性措施。由于奥运会是世界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与奥运会项目对口并突出重点，就成为体育界调整项目设置时遵循的首要原则。一改过去力量分散、重点不突出的倾向，根据奥运会的项目设置和金牌分布，将当时技术水平较高、影响较大和在国内受到群众广泛喜爱或国际影响较大的乒乓球、羽毛球、田径、游泳、跳水、体操、举重、足球、篮球、排球、射击、射箭、速度滑冰共13个项目列为全国重点。与此同时，按照全国一盘棋的精神，组成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常设国家队，并要求承担重点布局项目任务的省、市、自治区体委、解放军和体育学院，从1980年起按每4年为一个周期，定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指标。国家和地方根据可能在参加国内外比赛、技术资料、经费、器材设备等方面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从1979年始，在集中优势、突出重点、优化结构、分类管理的思想指导下，作了重点布局，进行了竞技运动项目调整，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通过布局调整，不少项目如游泳、体操等水平提高较快，一些水平不高的项目列为重点项目后，也逐步有所加强，进步明显。另外，我国传统的武术和围棋等传统类项目继续在全国广泛开展，采取建立武术馆、棋院等方式提高水平。

其次，按照“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原则，调整全运会的项目设置。为了把全运会和奥运会的任务一致起来，经过体育工作会议讨论，1983年9月举行的第5届全国运动会基本按照奥运会的项目设项，在所设的22个比赛项目中，有20个奥运会项目，即田径、游泳、水球、跳水、足球、篮球、排球、体操、射击、射箭、

举重、击剑、手球、摔跤、自行车、赛艇、皮划艇、帆船、柔道、曲棍球；另有2项非奥运会项目，即乒乓球和羽毛球。冬季全运会设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冬季两项、冰球、滑雪共5个比赛项目。以此来达到通过国内比赛锻炼队伍、选拔人才的目的，使备战全国运动会和奥运会的任务相一致。

第三，为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后劲，从1980年开始，按照“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要求，对优秀运动员、业余体校和学校运动队这样的一、二、三线运动队伍进行了调整，逐步建立和健全了按比例发展、层层衔接的训练网，完善了后备力量的培养体系，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小而全、大而全的重复训练和人才浪费的混乱现象，除加强各地和解放军系统的专业队伍外，还积极支持和帮助产业系统逐步恢复建立优秀运动队，也把个别项目放在体育学院或重点城市、对口工厂设队。

1978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以后，全国出现了一个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为了提高干部和教练员队伍的科学文化素质，从1980年至1985年，有计划地轮训了县体委主任，部分教练员的文化程度达到相当于大专或中专水平。同时，建设了一支高质量的裁判员队伍，培养了一批国际裁判员。在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体委下发的《关于加速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要求认真办好体育学院，加强体育科学研究工作，逐步建立科学情报中心和体育科技资料档案，学习推广国外先进经验，继续改革竞赛制度，充分发挥各级各类赛事对体育运动的推动作用。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要纳入城市建设的统一规划，现有的体育场馆不得任意占用，要加强管理并提高使用率，保证完成体育活动的任务。

第四，按照1979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提出的省、市以上体委侧重抓提高的社会分工，强调了动员社会力量办体育。基于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只能保证重点，解决最突出矛盾和问题。如果体育事业不全面发展，提高也抓不上去；为了保证国家能集中人力、物

力、财力抓好提高，就必须动员社会力量来共同办体育事业，减轻体委的压力和负担。1980年以后，体委加强了同教育、卫生、工会、共青团、妇联和解放军等部门的分工合作，并注意了切实发挥全国体育总会及体育分会、产业体协、单项运动协会和基层体育协会等群众体育团体的积极作用，使体育事业得到发展有了更多的支撑点和动力，群众体育逐步转向以各行业、各部门办为主，各级体委主要进行协调指导工作，这样，既保证了体委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方面，又加强了体育的宣传工作，通过新闻单位积极宣传，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从而最广泛地动员、吸引群众参与体育活动。

经过这些调整，我国这一时期的体育事业初步形成了以发展竞技体育为先导，带动体育事业全面发展的战略布局。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初期体育发展的条件与举措

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对体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到1978年底，已全面开启体育工作的新局面。从1979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确定近期“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基础上，侧重抓提高”，在此基础上，为1980年后中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复苏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群众体育发展的政策保障与主要措施

（一）城市体育发展的背景与措施

为了大力开展群众体育运动，推动城市体育的不断深入，国家体委于1978年6月26日至7月8日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了城市体

育工作调查会，并于9月5日下发了《关于加强城市体育工作的意见》。这份文件从10个方面阐述了加强城市体育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具体措施，其主要内容包括：

1. 体育工作要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贡献。城市是发展现代工业的基地，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市人口集中，交通便利，技术力量比较雄厚，体育设施、器材较好，应该而且可能在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城市应在发展群众体育、培养体育专门人才、加强体育科研、攀登世界体育高峰方面作出优异的成绩。

2. 广泛开展群众体育，重点抓好学校体育，积极开展职工体育。学校体育具有战略意义。学校体育应积极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坚持两课两操两活动[1]，努力实现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学生每天应有1小时时间进行体育锻炼的要求。学校体育还要贯彻教育工作"抓好重点"的要求，搞好重点学校和传统重点项目学校的体育工作。要积极开展职工体育。城市职工人数较多，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主力军。现代工业更需要体育活动，以增进职工的身体健康。要在职工中开展以广播操为主的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力争做到每天半小时体育锻炼。要进一步开展郊区社队的体育活动以及街道体育活动。广泛开展群众体育，必须大力加强体育宣传工作，宣传"发展体育运动，是增强人民体质，振奋民族精神，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团结友谊的重要手段，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3. 加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充分发挥业余训练在提高我国运动技术水平中的重要作用，迅速落实关于训练工作"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要求，建立中小学运动队—业余体校—重点业余体校，基础大，尖子

[1] 两课，每周两节体育课；两操，早锻炼或课前操、课间操；两活动，班级课间体育活动、课外体育活动。

尖的业余训练网。各种形式的业余训练，都必须认真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关心学生的文化学习，重视科学研究，提高训练质量。各城市要狠抓重点项目，逐步形成传统。

4. 积极开展并合理安排体育赛事。城市体育要从普及和提高的需要出发，安排好各项竞赛活动。在组织竞赛中认真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和国内练兵的精神，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坚决反对锦标主义等歪风邪气。要发挥有关方面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依靠社会力量办赛事。改进竞赛奖励制度，创造突出成绩的，不仅要奖励运动员，也要奖励有关的教练员、体育教师和运动员所在的单位。

5. 继承和发扬过去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

6. 充分调动广大体育工作者的积极性，积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保证教练员、体育教师每周至少必须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业务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技术专长。

7. 恢复和健全体育组织，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工作。城市体育工作涉及各个方面和各个行业，必须依靠有关部门和广泛的社会力量才能做好。要认真贯彻落实《1978 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有关规定，各城市要迅速恢复体委委员制，恢复、建立体育总会地方分会和单项运动协会。厂矿、企事业基层单位迅速恢复体育协会。

8. 检查评比，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是推动城市体育工作迅速开展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目前有 3 种形式：（1）在本市范围内，定期评选群众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2）在本省、市、自治区内，开展几个城市或市属区之间的评比竞赛；（3）京、津、沪 3 市之间和对口省的城市之间对口赛。

9. 体育场地设备的建设要列入城市建设规划。各市体委应积极商请城建部门，把体育场地建设列入本市建设规划。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搞好学校体育场地设备的建设。体育场地是群众活动的公共场所，任何单位不得擅自占用，已占用的要立即退还。

10. 在党的领导下搞好体委机关的革命化建设。

（二）学校体育发展的背景与条件

学校体育是1978年以后一再强调的重点工作，因而学校体育也出现了新的气象：1978年国家体委等单位发出的《关于加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通知》，对加强党对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领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1982年国家体委、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和《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为学校体育的实施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办法。

全国有两亿多青少年学生正处在长身体的时期，学校体育既可以从根本上达到增强我国人民体质的目的，又是优秀运动员成长的基地，可以源源不断地为优秀运动队输送人才。由于全国80%的学校在农村，抓好学校体育，还可以为广泛开展农村体育活动培养大批骨干。

由于“文革”对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严重破坏，加上一些学校，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条件限制，体育、卫生设施较差，学生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学校如何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正确处理好德、智、体三者之间的关系，纠正忽视体育、卫生工作的做法，摆正体育、卫生工作的位置；如何积极推行《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结合学军开展军事体育活动，在普及的基础上建立运动队，开展业余训练，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如何加强体育教师和卫生人员队伍的建设，加强党对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领导，使学校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等问题，已切实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

1978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4月14日，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联合

下达《关于加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通知》。5月12日，国务院在批转1978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指出："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广泛开展群众体育活动，重点抓好关系两亿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学校体育工作。"1979年5月15日至22日，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在江苏省扬州市召开了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着重讨论了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认识，切实加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组织领导，从实际出发，积极开展学校体育、卫生活动和为搞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努力创造条件等方面的问题。同年10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下达了《大、中、小学的体育工作暂行办法(草案)》。教育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制定了《全国学生体育运动竞赛制度》，国家体委还下达了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精神、抓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意见，学校体育进一步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

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全国有443950大中小学坚持两课、两操、两活动，参加课余体育运动队的学生达724万余人。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活动受到广大青少年的热烈欢迎。许多地方还在调查学校体育和学生体质状况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制定了提高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水平、扭转学生体质下降等方面的措施，学校体育逐渐步入正轨。

1979年以后，国家体委及各级地方体委，在侧重抓提高的同时，也很重视兼顾体育事业其他方面的工作，协助、指导社会各行业、部门抓群众体育活动的普及和深入开展。在科学研究和体育专业人才的培养等方面，也全面地展开了工作。

（三）职工体育发展的背景与前期举措

"文革"中，职工体育活动一度畸形兴盛，但很快跌入低谷。十年动乱结束后，随着整个国家形势的迅速好转，生产、生活正常秩序的恢复，职工又有了开展体育活动的强烈要求和愿望。1978

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通过的《中国工会章程》中，规定各级工会"办好文化体育事业，组织好业余文艺体育活动"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内容。各厂矿、企业、机关在以工会为主，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和机构的协同配合下，全国性职工体育活动迅速开展起来。

为了促进城市职工体育活动的开展，1977年和1978年，国家体委相继举办了8城市工人足球比赛和12城市职工篮球比赛。1978年6月，国家体委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了城市体育工作调查会，并于9月转发了《关于加强城市体育工作的意见》，要求"积极开展职工体育"，"贯彻业余、自愿、小型、多样的原则"，在厂矿、企业、机关、财贸、科技等各方面职工中开展以广播体操为主的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力争做到每天半小时体育锻炼。这个《意见》受到城市各机关、单位的重视和职工的积极响应，如天津市虽然受到地震的影响，一些体育活动场地被毁、被占，但群众锻炼身体的积极性很高，有47万多人参加"天津—遵义"象征性长跑，跑完全程的达30多万人。据统计，全国有33560个工矿企事业单位建立了体育领导机构，配备专、兼职干部5.7万多名，成立1.15万多个体育代表队，近150万名运动员。贵州省有326个厂矿、企业、机关恢复和新建了体育机构，国防工业系统、铁路等单位还建立了体协或体育运动委员会，有专人负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3.1万多人参加了1900多个职工业余体育代表队。北京、天津、上海、四川、广西、辽宁、陕西等12个省、市、自治区体委，会同有关部门，对职工、干部作健康调查，搜集了40多万人的材料，进行研究，提出要开展体育锻炼，增强体质，防止职业病等意见和措施。全国有许多工厂针对工人劳动特点，开展各种生产操、慢跑步等活动。就全国来说，职工体育活动已经达到或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发展规模和水平。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我国的职工体育也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上，职工体育活动能否坚持群众性和经常性，成了检验各地职工体育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好坏的重要标志。

1979 年 2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召集了 7 个省、市、自治区 18 个工会的体育工作干部和火车头体育协会的代表召开了职工体育工作座谈会，为职工体育的开展指明了“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上来”的方向，同时规定了“必须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群众，贯彻普及和提高相结合，而以普及为主的方针，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和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原则”。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全国不少单位成立了体育领导机构，加强了对职工体育的领导，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进入 80 年代，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党和政府更加重视职工体育的工作。1981 年 1 月 23 日，全国总工会、国家体委联合下发了《基层厂矿、企业、事业、机关体育协会章程（试行）》。《章程》指出基层厂矿、企业、事业、机关体育协会，是群众自愿组织的业余群众体育团体，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基层组织。基层体协在基层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由工会具体组织领导。《章程》要求体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根据生产劳动特点，有针对性地经常开展各种体育活动，有效地增强职工体质，促进生产的发展。体育与卫生相结合，配合医务部门建立职工健康档案，掌握职工体质情况，在职工中有计划地开展医疗体育活动，防治慢性病和职业病。体育与民兵训练相结合，充分发挥民兵在开展群众体育和军事体育活动中的骨干作用，丰富民兵训练的活动内容。贯彻“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从实际出发，广泛开展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组织各种业余运动队或锻炼小组，积极推动普及促进提高。

1981 年 8 月 8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重申 1954 年政务院《关于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他体育活动的通知》，在《通知》中重申要求各级政府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并在政府机关中推行广播体操，开展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以改善干部的健康状

况。同年8月18日，国家体委、教育部、卫生部、国家民委、广播事业局、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体育总会13个单位发出《关于积极推行第六套广播体操的联合通知》，尤其是198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以后，各级工会、体委和有关方面努力探索改革开放形势下职工体育发展的道路，我国职工体育工作在面向基层、面向职工群众、讲求实际效果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职工体育人口不断扩大。

1983年9月，由国家体委和全国总工会举办的全国职工体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沈阳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火车头体协、银鹰体协及部分省辖市体委、工会负责职工体育工作的人员，职工体育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交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展职工体育活动的经验。会议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体委和工会及有关方面为加强职工体育采取了很多措施，使职工体育活动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自觉坚持体育锻炼的人越来越多。职工体育工作先进单位的情况表明了开展体育活动的积极作用：一是体育锻炼增强职工体质的效果突出；二是体育促进生产的作用比较明显；三是体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日益显示出来。党的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任务，这个伟大任务既给职工体育指明了方向，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会议经过认真讨论认为，为了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伟大任务，我国的体育事业必须进一步发展，努力开创职工体育的新局面。

这次会议明确了职工体育的方针，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面向基层，积极组织职工开展体育活动，增进职工的身心健康，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会议提出从实际出发，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注重实效，是开创职工体育新局面的基本要求。职工体育的积极作用，是通过吸引和组织尽可能多的职工坚持

经常的锻炼来实现的，因此要强调群众性。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的重点是青年职工。因此，增强群众性，首先要着眼于吸引和组织广大青年职工参加体育锻炼，要从青年职工的特点和爱好出发，开展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组织各种运动队和锻炼小组，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进行锻炼，定期进行达标测试。要组织小型多样的比赛，把体育活动搞得生动活泼。在少数民族地区，还要注意开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要团结和依靠广大业余体育积极分子，实现群众体育群众办。各级体委和工会都要重视和加强对体育干部和业余积极分子的培养训练工作，努力建立起一支力量雄厚的队伍。各级体委和工会都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从实际出发，有计划地开展各种体育活动。要正确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坚持以普及为重点，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要不断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有计划地进行检查、评比。加强对职工体育科学理论的研究。

（四）老年人体育与残疾人体育的兴起

1. 老年人体育的兴起

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人口逐渐进入老龄社会，我国老年人参加体育及娱乐活动，解决老年人健康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和国家体育事业发展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各级政府的关怀下，老年人体育活动得到蓬勃发展，效果显著。1983年4月，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成立。到80年代末，除西藏自治区以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铁路系统，以及80%以上的地（市）、60%的县（区）都成立了老年人体育协会，一些乡镇、街道及企事业单位也相继成立了老年人体育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先后组织了全国中老年人迪斯科健身操电视大奖赛、全国老年人太极拳观摩赛和全国老年人门球比赛，以及全国“健康老人”（80岁以上，身体健康者）评选等活动，调动了广大老年体育爱好者的积极性，扩大了老年人体

育的影响，颂扬了我国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推动了老年体育的迅速兴起和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据80年代末统计，在全国各地30万个晨练、晚练辅导站里坚持锻炼的体育爱好者，大多数是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全国每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老年人有3000万人。各地老年人体育活动不仅参加人数多，而且项目丰富多彩，云南通海县老年妇女迪斯科舞蹈队和河南、河北、吉林等地农村的老年门球队活动数年如一日，沈阳、长春等地的大秧歌队每天早晚都活跃在公园、街头和广场上，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内容不断向趣味性浓、组织方便、易学易练、锻炼效果好并且比较安全的项目发展，如气功、太极拳（剑）、健身操、老年迪斯科、万步走、乒乓球、台球、棋牌类、钓鱼、登山、秧歌、门球等。

许多地区利用报刊、广播、电视广泛宣传老年人体育的意义和作用。不少地区创办了老年体育报，举办体育保建讲座，请专家、学者和体育锻炼受益者讲授体育卫生科学知识、锻炼方法、坚持体育锻炼的实际效果。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各级老年体协与有关部门举办的各种有关体育与健身的讲座上万次，直接听众达百万之多。老年体育竞赛也十分活跃，各省市和地州县每年都有计划地安排老年运动会或单项比赛，有的已经形成制度。为方便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很多地方重视老年人体育活动场地的建设。不少地方的公园，清晨向老年人开放，绿化地带交老年人体协代管、使用。

在老年体育日趋活跃的基础上，我国老年人与世界各国老年人在体育方面的交往也不断扩大。我国老年人体协与世界老年长跑者协会建立了联系，曾两次派团参加世界老年人长跑比赛。1984年在我国举行的第17届世界老年人长跑锦标赛上，张振田获男子55—59岁年龄组马拉松比赛的第三名。我国老年人在网球、门球、羽毛球、武术、太极拳、导引养生功等项目中也开展了国际间的友

好往来，我国老年人体育正在走向世界。

随着老年人体育活动的开展，对老年体育的科学研究和工作指导也得到了加强，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已经注意加强科研工作，设立科研机构，宣传体育科学知识。1988年召开了全国老年人体育学术论文交流会，会上专家、学者们就老年人体育与社会、经济、自然、管理、医学等方面的关系以及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等课题进行了研究探讨。不少体育院系、医科大学和卫生部门，把老年人体育科研课题纳入科研计划，投入资金和人员，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老年人体育科研工作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体现了社会各方面对老年人体育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对推动老年人体育活动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2. 残疾人体育得到重视

1983年10月，全国残疾人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代表会议在天津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1983年12月20日国家体委、民政部、劳动人事部、教育部、卫生部、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下发《关于积极地有计划地开展残疾人体育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残疾人体育是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发动和组织残疾人锻炼身体，参加体育比赛，不仅可以增进身体健康，恢复增强肢体和内脏器官功能，而且可以扩大生活领域，丰富生活内容，增添生活乐趣，鼓舞他们增强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为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因此，开展残疾人体育活动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通知》要求各部门予以重视，加强领导，把残疾人体育进一步开展起来。要广泛宣传残疾人体育的重要意义，积极筹建地方和基层残疾人体育协会。全社会各有关部门要从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给以大力支持。

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残疾人体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新的历史时期。在全国性的组织成立以

后，各地相继地成立了残疾人体育协会，至1989年12月底，在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已建立了27个残疾人体育协会，有10个自治州、60多个省辖市、区、县成立了残疾人体育协会。

随着我国残疾人体育的开展，以及与国际残疾人体育交往的增多，为适应我国残疾人体育走向世界残疾人奥运会的需要，我国残疾人体育的项目也随之增加，并逐步向残疾人奥运会的项目靠拢。到80年代末，残疾人体育的项目，由过去的田径、游泳、乒乓球发展到举重、射击、轮椅篮球、轮椅马拉松、自行车、击剑等。

（五）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背景与表现

1. 武术的挖掘整理与武术运动的发展

武术运动继“文革”后期因周恩来总理亲自干预恢复活动后，在新的时期随着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逐步落实，广大武术工作者解除了思想上的禁锢，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上要求对武术遗产加以保护、继承并向前发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由此，1979年1月国家体委发出了《关于发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要求各级体委努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随后，国家体委组织武术调查组，分赴山西、陕西、四川等13个省、市，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考察。5月，围绕着武术的挖掘整理，在广西南宁举行了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来自24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澳门等地的284名运动员，表演了各种流派的武术达50项。其中有一些埋没多年的拳种，还有属于技击对抗项目的散打、短兵也在会上作了尝试性表演。运动员中70岁以上的占10%，年纪最大的94岁。

由于长期极“左”政策的干扰，我国的民间武术很长时期大多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有的传统拳种和流派濒临灭绝。针对这一情况，80年代体育部门开始组织力量进行武术挖掘和整理工作。除国家体委外，许多地区的体委和武术协会也组织人力，挖掘整理本地区的传统武术。如河北省体委和武术协会，从1980年7月到

1982年8月，挖掘整理了32个县、市的武术传统项目。他们先后访问了属于77个门派、拳种、武术会的234位拳师，为其中50多人拍了照片，为一些介绍拳种的讲话录了音，重点整理了戳脚、通背、八极、六合、燕青等19个拳种的详细资料。又如广东省体科所的研究人员几乎跑遍了全省各县，对洪、刘、蔡、李、莫五大派13家共300多项拳术进行了调查，全部录了像，写出调查报告，出版了专著。浙江省杭州市1983年的普查结果是：有武术拳种76个，武术器械67种，老拳师74人。

1983—1986年，武术挖整工作在全国展开。这次挖整工作，历时3年，对民间武术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全面普查，并对传统武术技艺进行了挖掘整理。挖整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初步查明了流传在各地的“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129个；各省市编写的武术专著651万多字，录制老拳师拳艺395小时。其他还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古兵器等。

1982年12月，首次全国武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28个省、市、自治区（西藏未参加）体委、火车头体育协会、13所体育学院和教育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的代表以及特邀代表共400多人。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3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武术工作发生的根本变化和取得的重大成就。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新形势，要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武术工作者，积极发展各种形式和各种流派的武术，深入挖掘、整理武术遗产，大力普及，努力提高，积极稳步地向外推广，为实现体育工作的3大任务，为振兴中华作出积极的贡献。会议要求在3年内切实抓好几项工作：

（1）大力开展城乡武术活动。要积极放手地在广大学生、工人、农民中开展武术活动，使之遍及城乡。群众性武术活动要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

（2）切实做好挖掘、整理工作，国家体委准备成立一个武术遗产挖掘整理小组。

(3) 逐步完善武术的表演办法和竞赛制度。

(4) 建立和健全武术组织，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5) 开展国际交流，积极稳步地向国外推广。会议要求搞好武术队伍的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对武术工作的领导。

会议期间，全国武术协会召开会议，增补和调整了武协的领导机构。由国家体委顾问黄中担任武术协会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徐才任副主席。会议期间，国家体委副主任徐才作了题为《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开创武术运动新局面》的讲话，北京、上海等9个单位介绍了经验。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作总结讲话。这次会议是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和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和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召开的。通过本次会议，大家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明确了方面，制定了措施，鼓舞了干劲，它对全面开创武术运动的新局面，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有着重要的意义。

随着武术挖掘工作的不断普及和深入，武术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中国武术协会成立了科学委员会，国家体委和有关省、市还创办了《武林》《中华武术》和《武术健身》等武术专业刊物，并出版了大量的武术研究著作。加之武术电影和电视的频繁宣传，从而使全国上下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中华武术热”。

1982年9月27日至28日，国际武术表演赛在南京举行。这次表演赛是由江苏省武术馆和美国全美中国武术协会发起，江苏省体育服务公司承办。举行国际性的中国武术表演赛，这是第一次。美国武术协会、加拿大武术协会、香港武术健身协会、菲律宾“菲华光汉”国术总馆和江苏省武术馆的代表队参加了表演赛。表演赛分拳术、器械和对练3大类50多个项目，按长拳、其他拳术、长器械、短器械、软器械、长短器械和对练共7组进行比赛。

2. 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发展

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反映和表现出了各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以及心理状态等许多内容，它是强国强民、增进民族凝聚力、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关怀。

1981 年 9 月，由国家体委、国家民委联合主持的全国少数民族体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召开专门研究少数民族体育工作的会议，是一次增强民族团结和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会议。来自全国 21 个省、区的 29 个民族代表，以及中央和北京市有关单位、新闻界的 180 多人参加了座谈会。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就民族传统体育和民族工作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遵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党的民族政策，提高对少数民族体育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研究制订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方针、任务，积极促进民族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报告阐述了当前体育工作的大好形势，以及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和它在增进健康、巩固国防、保卫和发展生产、活跃群众文化生活、造就人才和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的作用。明确了当前开展民族传统体育的方针，提出了 5 项措施。

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体育事业虽有较大的发展，但仍不能适应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需要。国家体委、国家民委在全国少数民族体育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少数民族体育工作的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民族传统体育和近代体育活动，提高少数民族健康水平和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促进民族团结，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大会认为，为了完成上述任务，使民族传统体育健康发展，当前的工作方针是："积极提倡，加强领导，改革提高，稳步发展。"会议要求各级体委、民委清醒地看到，随着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传统体育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和提高。在工作中要继续拨乱反正，清除"左"的思想影响，端正不

正确看法。与会者一致认为，少数民族体育内容十分丰富，它既有在本民族广泛开展的、历史悠久的、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传统体育项目，又有在世界通行的、由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所倡导的近代体育项目。民族传统体育除具有同近代体育相同的重要作用外，还有它的特殊性。它是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和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紧密相联。尊重各民族风俗，搞好民族传统体育工作，有益于坚持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因此，它既是一项体育工作，又是民族工作的一部分。会议指出：对待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要和对待其他文化遗产一样，必须继承和发展。继承，就要努力提倡，积极支持，防止失传；发展，除了要有深度、规模和水平外，还包括改革提高，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断地在量和质两个方面得到发展和提高。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除人口众多的汉族外，还有 55 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不仅有田径、游泳、篮球、足球等现代体育项目，还有许多各民族固有的传统体育项目。80 年代末，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组织了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体育文史工作者搜集编写《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收集到少数民族体育活动项目 676 条，汉民族体育活动项目 301 条，共计达 977 条。这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多姿多彩，有的显示出南国水乡的风情，有的散发出北国草原的芳香，有的带有高原的神奇，有的包藏着谷地的奥秘。80 年代，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开展得比较广泛，而且规模比较大的有：

赛马。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满族、白族、哈萨克族、裕固族、柯尔克孜族、水族、纳西族、达斡尔族、塔吉克族、鄂温克族、保安族、鄂伦春族等少数民族喜爱赛马，特别是蒙古族，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赛马会，分为走马、跑马、颠马 3 种，男女老少均可参加。

风筝。汉族及云南、西藏、台湾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风筝较为流行。在云南的傣族地区，常在四五月放风筝，风筝多扎成鸟

禽形状，装饰简洁，艳而不俗。西藏的风筝则多为几何形，形状不大，造型、结构、装饰也极为简单。台湾高山族每到秋天放风筝，风筝可分为平面筝和立体筝两类，竞放时，主要比制作精巧、造型华美、放飞高度。而汉族的风筝，种类繁多，千姿百态，因地区、风俗习惯不同，使用材料和扎制技艺不同，风筝的样式和风格也有较大的差异。我国是风筝的故乡，1980 年 5 月 23 日，中国第一个风筝学会——北京风筝学会在北京成立，1981 年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文化馆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风筝演放会，同年，包头市少年宫也举办了青少年放风筝比赛。为了进一步扩大风筝艺术的交流，增加中外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山东省潍坊市从 1984 年起，每年在草木萌发、春光明媚的杏花天——4 月 1 日举办国际风筝节。

摔跤。蒙古族、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哈尼族、哈萨克族、达斡尔族、佤族、羌族、独龙族、壮族、维吾尔族、瑶族、基诺族、裕固族、怒族、普米族、锡伯族等少数民族的摔跤活动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彝族在举行婚礼和每逢火把节时、蒙古族在每年的“那达慕”大会上都要进行摔跤比赛，侗族还把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日至三月十五日定为摔跤节。由于各民族的习俗不同，摔跤的形式也有所区别。由于摔跤运动的普及，不少少数民族的选手参加了国际间的摔跤比赛，为国家赢得了荣誉，如哈尼族的高文和，他参加的 48 公斤级自由式摔跤连续五次获得全国冠军，在 1981 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 1984 年第 23 届奥运会上获得第四名，在南斯拉夫世界摔跤锦标赛上获第六名。

赛龙舟。汉族、傣族、布依族、白族、苗族、水族、土家族、高山族、壮族等民族都有龙舟活动。傣族每逢 4 月 13 日到 15 日的泼水节举行巨型龙舟赛；白族每年的农历八月初八要海会时开展划龙舟竞渡活动；汉族、苗族和高山族一般在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前后进行龙舟竞渡活动。80 年代，龙舟这一活动得到空前的发展。从 1984 年开始，国家体委将龙舟定为正式的体育比赛项目，并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比赛规则和比赛用的龙舟式样及规格，当年 9

月在广东佛山市举行了首届“屈原杯”全国龙舟赛，1985年6月又成立了中国龙舟协会。从此，龙舟竞渡这个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民间活动项目结束了“群龙无首”的局面，有了全国统一的组织，有了全国统一比赛规则，有了全国的冠军队，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传统体育才获得新生，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关怀下，1953年11月8日至2日，在天津市第二体育场举行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1984年国家体委和国家民委追认这次大会为第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2年我国又举行了第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1982年9月2日至8日，国家民委、国家体委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办的第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有全部55个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乌兰夫、万里、阿沛·阿旺晋美和民委主任杨静仁、体委主任李梦华等出席了开幕式。运动会之前，乌兰夫、万里分别为运动会写了“努力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繁荣各民族文化，增进民族团结”和“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创民族体育的新局面”的题词。来自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5个少数民族代表参加，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等共计1605人。运动会期间，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6个少数民族的800多名运动员表演了傣族的孔雀拳，苗族的滚芦笙唢呐，景颇族的木脑纵歌，彝族的阿细跳月，回族的斗牛，白族的霸王鞭，高山族的背篓球，朝鲜族的秋千，土族的轮子秋，藏族的碧秀，黎族的跳竹竿，壮族的投绣球、高空舞狮，维吾尔族的达瓦孜，哈萨克族的姑娘追和马上拾银，塔吉克族的叼羊，蒙古族的赛骆驼、赛马、马术，达斡尔族的曲棍球，纳西族的东巴跳等68个丰富多彩、形式新颖、民族特色浓郁的传统体育项目300场

次，观众达80万人次。这次运动会还举行了射箭邀请赛和中国式摔跤比赛。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4省区5个民族的24名运动员参加了射箭邀请赛，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个民族的56名运动员参加了4个级别的中国式摔跤比赛。同时还举办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图片展览”和盛大的联欢晚会。

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推动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应定期举办本地区民族体育运动会，有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还举办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单项邀请赛，使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事业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六）农村体育发展的背景与表现

以建立各种生产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为农民参加体育活动创造了时间和物质条件。进入80年代以后，农村体育也掀起了高潮。全国不少农村基层单位积极筹资修建体育运动设施，组织农民参加体育活动。党中央和有关国家机关对这一热潮及时地加以引导，从而使得新时期农民的体育活动能健康地发展。

作为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体育，也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关系八亿农民身心健康的大事。广大农民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对增强体质，提高劳动生产率，振奋精神，活跃业余文化生活，培养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显著的作用。农村体育的发展是与农村经济的发展相一致的。1978年，国家体委在黄陂召开了县级体育工作调查会，根据农村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体育工作的任务，经过充分讨论，制定了《关于做好县的体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应“积极有步骤地开展农民体育”。后来全国广大农村在传统节日间，都普遍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体育活动，很多社队在节假日组织体育比赛，随着后来党的农村政策的落实，农民心情舒畅，生活水准大大提高，体育活动出现勃勃生机。

由于农村的生产、生活、体育工作的基础差别很大，1979 年 3 月，国家体委在《关于加强群体工作的意见》中，强调了开展农村体育活动“一定要分别情况，从实际出发”，仍然坚持 60 年代初提出的“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和勤俭节约的原则”。一些地区生活和体育工作基础好的社、队，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运动队，利用业余时间锻炼和就近组织比赛；民兵组织把体育列入军事训练内容；各地开始提倡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民间体育活动；充分利用端午节、中秋节，组织小型体育表演和比赛。

1982 年 11 月，国家体委、文化部、共青团中央在福建省龙海县角美公社联合召开了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会议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总结和交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展农村体育工作的经验，研究制定了新的历史时期农村体育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措施。会议分析了农村体育的新形势，研究制定的新时期的农村体育工作方针是：加强领导，提高认识，从实际出发，积极、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农村体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提高广大农民健康水平，活跃业余文化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实现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会议强调农村体育工作，一是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二是要坚持因地制宜、业余自愿、小型多样、勤俭节约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开展适合本地区、本民族特点的传统体育活动。会议结合农村实际，提出了一些加强农村体育工作领导的具体措施：体委、文化部门和共青团组织紧密合作，共同搞好农村文化体育工作；加强体育活动阵地建设，文化中心、文化站、青年之家要增加体育场地和器材；广开门路解决经费问题，按照“民办公助”的原则，政府和体委拨出一定的经费，社队集体收入拨一点，青少年搞副业自筹一点，有关方面和热心人士资助一点；积极开展各项体育活动；搞好农村体育骨干的培训工作；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

1983年，国务院批转国家体委、文化部、共青团中央《关于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纪要》批示指出，我国有8亿农民，积极开展农村文化体育活动，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责任，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各级政府加强领导，从实际出发，采取措施，积极地逐步地把农村文化体育活动开展起来。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之后，各地认真贯彻国务院对会议纪要批示的精神，落实会议提出的要求，普遍加强了农村体育工作。1983年，广东等8省在对本地区农村体育现状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本地区发展规划和措施。上海决定分期分批培训乡镇体育干部，每年拨款支援乡镇建立灯光球场，每年举办农民“丰收杯”篮球邀请赛。农村体育活动的组织形式也越来越多，有由共青团系统组织的，以“青年之家”为阵地、开展体育活动；有由文化部门组织的，以农村俱乐部、文化室、文化站为阵地，开展体育活动；有由村镇、联户或个人自发创办的武术馆、拳社、武术学校、俱乐部等组织开展体育活动等。

1984年11月20日至28日，国家体委在湖南省桃源县召开了全国县体委主任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精神，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创体育先进县活动，将我国农村体育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七）国防体育发展的背景与举措

1973年，全国开始恢复“文革”初被迫停止的国防体育活动和训练。粉碎“四人帮”以后，国防体育很快恢复到“文革”前的状况。1979年，为了备战国际国内大赛，使国防体育活动和训练有了较大的发展。根据1978年和1979年全国体工会议精神，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国防体育机构，加强了领导。如湖南全省17个地市体委中有15个配备了专职干部和教练员，有10个成立了军体科；江西省大部分县、市都成立了军体领导小组；辽宁省13个市、地体委也都成立了军体科，建立了11所军体类业余体校，有专职

干部和教练员约400人。

国防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在逐步恢复中走向世界，并有了新的发展。1978年8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队以1766环的成绩刷新了小口径手枪慢加速射团体的世界纪录。在第8届亚运会上，我国射击运动员共获8枚金牌、4枚银牌和7枚铜牌，打破了12项亚运会纪录、3项亚洲纪录。1979年8月1日，我国航空模型运动员敖维训、崔仁智，在成都举行的第4届全国运动会无线电遥控模型直升机直线距离比赛中，以2854米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同年8月22日至9月2日，我国由13名运动员组织的跳伞代表团，参加了在法国夏特鲁机场举行的第3届世界造型跳伞锦标赛，并获得3个冠军。

在一些有条件的省市和个别地区，建立了航空模型、航海模型、射击、无线电等项目的业余训练点，温州、宁波地区建立了摩托车训练点，浙江全省参加训练的约2万人。为结合开展群众性军事体育活动，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海军制作了14种类型的舰艇识别模型600余艘。国防体育活动扩大了普及面，也为优秀运动员的培养打下了基础。

1980年至1982年，国家体委对国防体育的管理体制和方针任务作了根本性的调整。国家体委在报送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我们党在长期的武装革命斗争中创立了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统一领导武装力量体制。没有必要再分设一个部门负责进行军外的军事教育和军事技术训练，为部队培养后备力量的工作。自然这更不应该是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职能，据此，对国防体育进行了重大改革：

1. 改变领导体制。由过去的由中央军委和国家体委双重领导，改为由国家体委统一领导。

2. 调整方针任务。今后不再分军事体育和一般体育，不再承担军事教育与军事技术训练，为部队培养后备力量的任务。统一实施国务院制定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体育运动水

平，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目标。

3. 调整了项目。选择一些我国已经参加了国际体育组织和进行了国际竞赛，并已成为我国传统的项目继续发展。在开展群众活动的基础上，建立一定规模的优秀运动队，在国际竞赛中为国争光。

4. 撤销军体局，设置训练竞赛一司，负责对相关项目的管理，并分别成立各项目的单项运动协会。

以上调整，将国防体育完全纳入体育运动的统一管理，从此，“国防体育”便成为了历史[1]。

二、体育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一）新时期我国体育教育工作面临的挑战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不佳是学校体育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据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卫生部、国家民委联合组织的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组，在 1983 — 1986 年内的调查表明，学生体型有继续向细长型发展的趋势，体重不足；身体素质增长不明显，有些指标下降；青春期高血压检出率急剧上升；心脏病、肝炎、结核、沙眼、脊柱侧弯、神经衰弱的问题比较突出；视力不良尤为严重；各省市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发展不平衡，民族之间差别较大。我国学生视力不良率在 80 年代呈不断上升的趋势。7—22 岁汉族大、中、小学生平均视力不良率达 34.26%，视力不良率最高的年龄组达 74.67%，其严重程度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视力不良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尤其是 13—17 岁年龄段视力不良率增长较快。同时，汉族学生视力不良率高于少数民族学生，城市学生视力不良率高于乡村学生，女生视力不良率高于男生。由于视力不良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最

[1] 秦笃训. 新中国“国防体育始末”. 体育文史，1997（3 期）：42.

终我国成年人将有 2/3 为视力不良患者。和日本学生相比，我国学生沙眼、脊柱侧弯的检出率也远远超出。

引起我国学生体质下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营养的问题、应试教育的问题等等，但突出的问题是学生的运动不足和膳食结构不合理。从学校体育的角度看，体育场地少、设施较差是学生运动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体育场地设施虽然没有全国统一的调查统计材料，但不少省、市都作过统计。从统计的数据看，大多数学校都达不到有关规定的最低要求，不少学校根本就没有体育场地，如北京市 4 个城区的中、小学，体育场地不足或根本没有场地的中学占 30%、小学占 69%，4 个城区只有两所中学有 400 米跑道的田径场，78%的中、小学由于场地不足而影响了学校体育活动的正常开展。浙江省 1988 年进行了统计，全省有中学 3719 所，小学 33570 所，而中、小学运动场、篮球场、排球场、足球场、游泳池、羽毛球房、健身房等数量之和只有 9819 个（间），平均只有 26.33%的学校拥有一个（间）体育场馆，也就是说，还有 73.67%的学校没有运动场、篮球场、健身房等体育场馆设施。更为严重的是，在体育场地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在有关部门曾三令五申不得侵占学校体育场地的同时，侵占体育场地或将体育场地改作他用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学校体育经费匮乏，学生每人每年的体育经费平均不足 1 元，不少教育行政部门用于学校体育的经费，平均不到总经费的 1%。对学校教育工作的评价标准偏颇也是导致学校体育工作相对滞后的原因。社会上衡量学校工作的好差，往往忽视以培养“四有”人才为准，而片面地只看升学率，导致部分学校只重智育而“缺德少体”。

如何从实际出发，尽快改变上述状况，增强学生体质，为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才服务，是学校体育面临的艰巨任务，也是学校体育改革的根本任务。为此，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体育教育状况的改善。

（二）完善学校体育管理体制

80年代，我国教育行政部门体育管理机构得到建立健全和发展，基本上形成了国家和各省、区、市学校体育工作的指挥中心，进一步加强了学校体育工作的领导力量，明确了各行政部门的职责，协调了各个部门的关系。体育教学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加强了体育教学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队伍的建设。体育师资培训管理形成网络，除统一规划、分级负责外，还采取了多形式、多渠道的办法，提高在职体育教师的业务水平。学校卫生保健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使体育与卫生相结合，为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增强学生体质起到了积极作用。80年代，全国性及各省、区、市级的各种有关学校体育研究的群众团体相继成立，这些组织有专家学者，有行政管理干部，也有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的代表，这些组织在教育行政部门和上级学会领导下，围绕每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统一制订研究课题纲要，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定期召开论文报告会，进行学术交流。

（三）对体育院系的整顿与调整

“文革”结束后，从1977年开始，全国各个体育院、系招生工作开始恢复正常。1978年7月13日，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认真办好体育学院的意见》，对人才培养规格、专业设置、学制，以及教学、教材、科研等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和要求，提出了要根据国家体委《二十三年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制订体育学院发展规划，努力实现以下奋斗目标：3年内整顿提高，逐步恢复一些体育学院；办好重点体育学院，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打好基础；在本世纪内，争取实现每省市都有一所体育学院。

1979年3月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大力提高教学质量，充分发挥体育学院在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中的作用的通知》。除强调继续贯彻执行国家体委1978年下发的《意见》外，对体育学院的任务作了更具体的要求：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培训高水平的体育教师；加强训练

工作，为攀登世界运动技术高峰作贡献；大力加强研究生的培训工作和科研工作；加强体育学院师资队伍建设，提高训练和科研水平；培养教练员、运动员和体育干部，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充实、更新教学、科研设备，增加基建投资；加强对体育学院的领导。1980年5月，国家教委在厦门召开全国体育学院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工作经验，讨论办学指导思想和如何进一步办好体育学院。来自北京、上海、武汉、沈阳、西安、成都、天津、哈尔滨、山东、广州、福建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师范学院等单位的代表26人出席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确定的路线，遵照党中央关于全党转移工作重点的战略决策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检查总结体育学院工作，进一步贯彻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关于办好体育学院的指导思想、方针和任务，以便更好地为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更大贡献。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交流办学经验，统一办学指导思想，讨论通过体育学院的任务、专业设置、系科设置、培养目标和学制，体育学院、体育系教学工作存在的问题，体育学院学生学籍管理3个文件。第二阶段逐一讨论落实国家体委所属北京、上海等6所体育学院的规模、专业设置、系科设置、培养目标、学制，以及从长远考虑每个体育学院在某一个或几个专业方面形成自己的特点和有关体育学院承办运动学校的问题。同年，国家体委还下发了体育院系教学计划和学生的学籍管理，对所涉及的学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课时分配以及学生入学、成绩考核、奖励、处分、毕业等方面作了明确详尽的规定，并对体育院校的管理、教学、科研、后勤服务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规范。

1981年1月2日，国家体委又下发了《体育学院的任务、系科设置、专业设置和修业年限的意见》和《北京等六所体育学院的任务、规范、专业设置、系科设置、修业年限和培养目标的通知》，对全国体育院、系、科在人才培养规格和专业设置方面，根据学校的各种条件，分出层次。这样更有利于各体育院、系、科明确任务，突出特色，形成优势，培养出适应体育事业发展的多层次、多规格

的优秀人才。

（四）开展体育教育教学改革

1979年10月5日，教育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布了《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和《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根据上述《规定》要求，各级各类学校体育教学要把增强学生体质和提高学生健康水平作为学校体育工作的主要目标。80年代围绕这一目标，在提高体育课教学质量，选择重点教材，重视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贯彻体育和卫生保健相结合及适当增加体育理论教学比重，改革教法、教具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

为了加强课程、教材的建设，教育部成立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国家体委也成立了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各门课程教材小组。这些组织统一指导、规划、布置普通高等学校及体育学院教材建设和编审出版工作，并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课程、教材建设的文件，如《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工作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体育教育专业学校体育学课程基本要求》和《全国体育学院“七五”期间教材建设规划》等。由于政策落实，方法得当，80年代，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和体育学院的教材建设逐步走上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轨道，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课程和教材改革的同时，在体育教学方面也打破了以往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的组织结构和教学方法日益多样化，不仅考虑到学生的生理负荷，而且考虑到心理负荷；体育教学不仅考虑到教师如何教，而且考虑到学生如何学。体育教学在改善、传授体育技术方法的基础上，重视学生身体锻炼的方法；在面向全体学生的基础上，重视区别对待和发展学生的特长。

80年代的体育教学管理也有了明显的改善。班级授课制尽管有不少弊病，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废除。因此，对于由不同性别、年龄、身高、体质、运动能力等构成的群体，区别对待和有

效地进行教学是比较困难的。为了使优生能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差生得到更多的帮助，80 年代不少学校采取了有效的组织措施，加强了课堂管理。其中最典型的是开始进行多班合并配伍的办法，按性别、年龄、体质状况、运动技术水平分班再分组进行教学，根据不同对象设计不同的教学方案，有计划地运筹调度，加强教学过程的科学管理，提高体育教学质量。

在教学教具方面，也努力向实用、创新和有利于推动教学改革的方向发展。体育器材是体育教学的教具，在教学改革浪潮的推动下，其改革在经济实用和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天津市发明的小体操垫子，清华大学等单位研制和生产的按不同年龄、级别采用的篮球架，江苏省江宁县在自行车轮胎上面涂上红的或白的油漆，用作藤圈操、投掷、拔河等体育活动的教具，都有助于体育教学的改革。

（五）活跃学生课外体育活动

课外体育活动是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学校体育任务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在学校体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80 年代，各校根据本地的情况，使课外体育锻炼形式多样化。

“两操两活动”是传统的课外体育活动形式，在 80 年代，这种形式已得到更加普遍的实施。一些学校结合本校特点，利用课外体育活动时间开展传统体育项目、民族体育项目和围绕《国家体育锻炼标准》项目开展锻炼等，保证了“两操两活动”的落实。

利用一周的课外活动时间组织各种体育专题报告、体育讲座、体育知识竞赛、体育表演、比赛和体育游戏等活动的体育周，以及结合有意义的节日或重大的国际、国内的体育活动，利用一天或半天的时间开展专题性的体育主题活动进行体育教育和锻炼的体育日，是 80 年代学校体育的一项新发展。体育周、体育日和节假日体育具有浓厚的节日气氛，在吸引广大学生参加，提高学生的体育

兴趣，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提高体育素养，增强体育意识和集体观念，密切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调动锻炼的自觉积极性以及培养体育骨干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80年代学校体育活动的另一项新发展，是校内和校际运动竞赛活动日益多样化，各种对抗赛、邀请赛、选拔赛、表演赛、等级赛、通讯赛和运动会等层出不穷。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全国中学生运动会以及各省、市、自治区举办的大、中学生运动会等逐渐形成制度。

全国大学生运动会是由教育部、国家体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全国大学生体协联合举办。根据《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规定，全国大学生运动会每4年举行一次，其主要任务是检查大学的体育教学、训练和群众体育工作开展的情况，总结和交流学校体育工作经验，推动大学体育运动的开展，增进全国大学生的团结与友谊。第1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于1982年8月10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万里、姚依林、习仲勋、胡乔木等出席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开幕式。29个省、市、自治区大学生体育代表团的2432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全国各体育学院、师范院校体育系科、普通高校分别参加甲组、乙组、丙组比赛。运动会设田径、体操、艺术体操、乒乓球4个比赛项目。

全国中学生运动会是由国务院科教组、国家体委、共青团中央联合举办的，首创于1973年，项目只设田径、篮球等几项。根据《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规定，每3年举行一次。主要任务是：检查中学的体育教学、训练和群众体育开展的情况，总结交流学校体育工作经验，推动中学体育运动的开展，增进全国中学生的团结，友谊和进步。

在中小学体育中，施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仍然有重要的意义，许多地方的小学和初中都把达标作为学生体育成绩的主要标准，指导学生按照《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进行联谊也就成了许多学校体育教学的重要内容。截至1988年，全国达到及格以上的人

数已有近2.8亿人次，与1983年相比增长了两倍半，优秀级人数增长了4倍。相当一部分省市城镇中小学的实行面已达到80%以上。《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全面施行，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学校体育工作的发展，为学校体育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六）在中小学开展足球运动

为了在学校体育中广泛开展足球运动，提高我国足球水平，1980年1月17日，国家体委、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在全国中小学生中积极开展足球活动。通知指出：足球运动是世界上开展最广泛、影响最大的运动项目之一。足球运动水平的高低关系到国家的荣誉，反映一个国家的体育发展水平。积极号召和组织更多的中、小学生参加足球活动有利于青少年德、智、体全面发展，对四个现代化建设和对促进我国足球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遵照国务院批准的《关于提高我国足球技术水平若干措施的请示》和《中、小学生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的精神，三部委的联合通知中提出了在全国中、小学生中积极开展足球活动的建议。具体内容为：

1. 各级体委、教育、共青团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领导，积极宣传和贯彻国务院批准的《关于提高我国足球技术水平若干措施的请示》，大力推动和倡导广泛地开展足球活动，把足球活动纳入学校体育计划和团、队体育活动的内容。

2. 开展足球活动要和学校其他体育工作很好结合，做到合理安排。具备师资、场地设备、群众爱好等条件的学校，要把足球活动作为重点，并逐步形成传统。

3. 重点开展足球活动的学校，可在群众活动的基础上建立班级、年级或校级运动队。要切实关心学生的文化学习和思想品德教育。各省、市、自治区的足球队和业余体校要与开展足球活动的学校挂钩，采取切实措施，以多种形式，定时定点到校进行辅导，并

作为制度固定下来。

4. 要提高担任足球专项训练的体育教师的业务水平。

5. 积极地、有计划地举办足球竞赛活动，提倡一个城市中对口学校和一所学校内利用周末、节假日经常开展比赛，逐步形成稳定的竞赛制度。通过比赛达到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目的。

6. 开展足球活动所需的场地、器材、设备等，要贯彻勤俭办事业的精神，发动群众，因陋就简，修旧利废，自力更生去解决。尽可能利用或改造现有的场地、器材、设备。

该通知发出后，加上当时国家足球队参加世界杯等国际重要赛事而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促进了很多中、小学校开展足球运动，大量青少年参加各种层次和类型的足球活动，促进了国内足球运动水平的提高。

三、体育科技工作的开展

体育科学在我国是50年代后期逐步建立起来的，尚处于初创阶段，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很大。1978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提出的要“大打体育科研之仗”和“体育要大上快上，科研必须先行”的方针，引起了体育界有识之士的共鸣。按照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的精神，国家体委开始筹建管理科技工作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体委和体育学院逐步恢复和建立了科研机构。

1978年5月，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加强体育科学技术工作的意见》，要求“必须重视和加强体育科技工作”。《意见》拟定了1978年至1985年体育科研的主要任务，提出以后一个时期内体育科技工作也应侧重抓提高，并规定了抓好体育科研机构的建立、加强学术交流、建立体育学会和体育科学技术委员会、精选与培养体育科技人员、保证科研经费等6方面的工作。为配合体育着重点的转移和侧重抓提高的工作，1979年5月7日至15日，在北京举

行了第2届全国体育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体委，总政文化部，各体育学院以及各体育科研所的有关负责人和科技人员，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新闻单位共计110余人。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副主任荣高棠出席会议并讲话。

与会人员认真学习和讨论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交流了科研工作情况和经验，介绍了国外体育科技动态。根据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精神，对以后一个时期体育科技工作任务、分工、布局和建立健全科研机构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6月11日，国家体委下发了第2届全国体育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纪要。主要内容是提出了以后体育科技工作的任务以及应采取的具体措施。

会议纪要指出，体育科技工作应为体育的普及与提高服务，专业与业余相结合，应用科学与基础科学研究相结合，当前任务与长远任务相结合。根据1979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鉴于运动技术水平落后已成为突出薄弱环节，而参加1980年奥运会的任务又迫在眉睫，我国一些项目的成绩还达不到奥运会报名标准，因此，今明两年，国家体委和省一级体委要在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的精神，以后一个时期内，体育科技工作也应侧重抓提高，主要任务是：

第一，围绕参加1980年、1984年奥运会的任务，广泛开展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研究，集中力量重点抓住若干个接近国际水平和影响较大的运动项目，进行深入研究，促进这些项目在奥运会和重大国际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第二，在群众体育中，要突出抓好中、小学体育和青少年身体健康的研究工作。

第三，加强体育基础理论，如运动生理学、人体解剖学、生物化学、人体运动力学、运动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

第四，要重视体育理论以及其他有关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

第五，科研仪器设备和体育器材的现代化是提高科研和运动训练水平的重要条件，要尽快改变我国在这方面落后的状况，从国外引进是有限的，应立足于国内，有计划地研制一些急需的科研仪器和体育器材。

第六，科学技术情报是科研工作的耳目，要及时了解和分析国外体育科技动态、成就和发展趋势，借鉴有益的经验，避免走弯路。

为了保证上述任务的完成，会议指出要着重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 体育科研机构的建设问题

(1) 各省、市、自治区体委，可设精干的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科技管理工作。

(2) 已经建立起来的体育科研机构，要根据“八字方针”的精神，逐步健全和充实。

(3) 目前尚不具备条件的省、市、自治区体委，可暂不建所。

2. 建立体育学会和体育科学技术委员会。体育学会要吸收体育界的学者和专家参加，学会下面可设若干学科分会。同时，建议成立体育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国家体委领导体育科技工作的咨询决策机构。

3. 加强学术交流。全国综合性科学报告会每年举行一次，单学科或地区性的报告会可经常举行，并编辑出版学术刊物。

4. 选拔与培养体育科技人员

(1) 从国家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和有丰富实践经验、有研究能力的教师、教练员中，选拔一批优秀人才，优先充实体育科技队伍。

(2) 有条件的体育学院和体育科研所都要有计划地招收研究生或进修生。

(3) 要特别关心在职科技人员的业务进修，有计划地安排他们短期脱产进修、参观、考察，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4）要下决心培养一批业务骨干和“拔尖”人才。

（5）建立体育科技人员技术职称制度，从今年开始逐步施行。

（6）继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5. 关于体育科研经费问题。国家财政预算体育事业费中设置了体育科学研究费项目。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认真保证这项经费，科技部门要本着节约的原则，用好这项经费。

1980年12月15日至22日，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成立大会暨1980年全国体育科学学术报告会在北京举行。12月15日，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宣告成立。1981年6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公布了《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的几项工作制度》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召开国内学术会议管理办法（试行草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是学术性的群众团体，它的宗旨是团结组织广大体育科技工作者，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促进体育科技的繁荣和发展、普及和推广，促进体育科技人才的成长和提高，为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把组织建设当做各项建设的根本来抓，积极发展会员，加强分支机构的建设，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进一步扩大横向联系，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吸引不同学科、不同行业的有关人员参加学会建设。根据学科发展和体育事业的需要设立了运动训练学、运动生物力学、体育情报、体育仪器器材、体育建筑、体育理论、体育史、体育统计等专业的分会。据不完全统计，会员人数从1980年的184人发展到1989年1万余人。这些会员除来自体育系统和大专院校以外，还有约占总数10%的会员来自非体育系统。会员的分布遍及全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80%以上的会员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这表明，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既是一个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群众团体，又是一个人才荟萃、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的学术团体。学会还积极促进地方学会的筹建，截至1989年底，大部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体育

科学学会，不少地、市、县也相应地成立了体育科学学会分会等组织。为便于学会开展工作，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组建了办公室，下设秘书处、学术处和书刊编辑部等职能机构，在常务理事会领导下，由秘书长主持处理日常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体育科学学会及各地、市、县的分会也逐步健全了办事机构，配备了专职或兼职人员。体育科学学会组织初步形成了以学科群面貌出现的庞大的科技队伍，形成了一个组织上纵向联系、学科上横向发展的学会体系。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注意把科技培训与科普教育作为重要的工作来抓，每年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根据体育科学的发展和体育事业的需要安排教学内容。80 年代共举办了体育情报、运动生物力学、运动训练学、运动创伤、医务监督、电子计算机、运动心理学以及体育统计等学科的全国性的培训班、学习班、进修班数十期。其中每年举办一期的全国运动训练科学化培训班吸引了全国各地众多的学员参加，有力地促进了体育科研成果的推广运用和运动训练科学化进程。不少全国性二级学会也根据实际需要，采用多种形式举办培训班，如体育情报学会除了促进体育情报理论的自身建设，举办全国性体育情报学术讨论会外，还着重培训体育情报人才和普及体育情报知识，先后举办过包括管理干部和体育声像方面的进修班数次，来自全国 29 个省、区、市体委，体工队，体育院校，体育科研所以及部队的体工队等数百名学员参加了学习，提高了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为改进本地区、本部门的体育情报工作，及时为决策、管理、科研、教学与训练等提供信息，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体质研究会举办的“全国青少年体质研究干部培训班”组织了 16 个专题讲座和 15 次专题对口座谈，教学效果扎实、良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体育科学学会以及各地、市、县的分会针对培训量大、面广而参加全国性培训班的名额有限等矛盾，根据运动实践和提高素质的需要，采取“请进来”或“派出去”的办法，千方百计为会员创造继续教育的条件，通过多种渠道提供科技

信息，如浙江省举办的“运动生物力学培训班”、四川省举办的“体育科技人员培训班”、辽宁省举办的“骨龄发育程度鉴别方法培训班”、湖南省举办的“电子计算机在体育中的运用学习班”以及福建省举办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专题讨论”等等。不少地方学会还积极开展了体育科普活动，如湖北运动学专业委员会，两年中在电台和报刊上发表科普文章65篇，有的会员还编写了有关的科普电影剧本等。《生命在于运动》杂志与《体育报》《健康报》和《中国老年》杂志在中组部、中宣部的支持下，联合举办了“老年保健讲座”两期，在北京直接听讲的老干部达1万余人次；外地利用录音带或举办类似讲座，听众达百万余人次以上。人才培训和科普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科技意识，传播了国内外先进的体育科技知识，它在不同程度上收到了智力开发、知识更新、培训人才的效果，对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有很大促进作用。

这样，在80年代初，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体育科学研究体系，为以后体育发展战略的制订，为实现各个时期、阶段和指定性科研课题任务的完成，提供了组织和技术力量保证。

第三节　“举国体制”的完善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为了适应国内体育运动发展的需要，普及体育运动，提高运动水平，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我国逐渐加强了政府对体育运动的指导与投入。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和“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等思想指导下，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体制，即“举国体制”。这一体制的特点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以政府的直接财政投入和行政管理为保障，以普及体育运动，提高运动水平，在国际赛事中夺取优异成绩为主要任务。在这一体制下面，主要包括了以国家体委和各级体育行政部门

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以国家及省级专业队以及县级业余体校为中心的训练体制，以“全运会”为中心的国内竞赛体制。至20世纪60年代，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体制逐步形成。“文革”期间，这一竞技体育体制受到了极大破坏。“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基础上，“举国体制”得到了恢复与完善。20世纪80年代，为了适应新时期我国体育运动发展的形势与任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国体育界充分利用和发挥了“举国体制”的巨大优势，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洛杉矶奥运会和其他一系列国际赛场上实现了中国竞技体育的腾飞。

“举国体制”是一种国家管理型体制。这一体制是在计划经济的历史条件下，集权于体委，对体育实行独家领导和管理的模式。新中国成立以前战争年代的管理习惯的延续、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反共势力的封锁、以苏联为代表的国家集权型体育模式的影响，以及国民经济基础薄弱的限制和增强国民凝聚力的需要，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与影响，产生了以“举国体制”为核心的中国体育管理体制。“举国体制”的产生，是在整个国家处于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必然。这种由国家与政府直接管和办体育的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我国竞技体育的迅速发展与提高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举国体制”通过政府的力量，通过统一规划、调配和布置，保证了部分重点项目的水平迅速提高，形成优势，在国际赛事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使中国体育在国际体坛一扫“东亚病夫”的耻辱名声，树立了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一、新形势下竞技体育的任务与措施

由于“文革”的破坏和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一度瘫痪，濒临崩溃。在百废待兴之际，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成为了中国新时期的一个转折点，这次会

议的中心议题是把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全国各级体委重新建立起来，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等体育行政机关开始重新运作。1978年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拨乱反正，肃清了“四人帮”在体育领域的流毒和影响。1979年2月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体育业务工作上来，并确定了“要在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的方针政策，初步形成了奥运战略。1980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则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战略，更加确定了以竞技体育为工作的中心。这3年的调整，3次体育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以竞技体育为中心的“举国体制”在历经“文革”破坏后全面恢复，并被进一步完善和强化。

1979年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以后，为了备战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被空前地动员起来。1979年2月，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在第22届莫斯科奥运会上进入团体总分前10名、获得15枚左右奖牌、力争5块金牌的目标。为了保证这一目标和任务的完成，这次会议确定了“在1979年和1980年，国家体委和省一级体委要在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的方针，提出：“要根据准备奥运会和第5届全运会的需要，调整队伍。按照全国一盘棋，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原则，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统一安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分工负责。”[1] 由此而形成了我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大家庭后的第一个奥运战略。

1980年初举行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条件与战略目标进行了判断和规划。在《关于30年体育工作基本经验教训》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在“我们国家现在还穷，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发展体育事业”的条件下，一方面，“在制订体育发

[1] 1979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134.

展计划时，必须从实际出发”；但另一方面，“在我国，体育纳入国家计划，能够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行集中统一领导，调动各个地方和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按比例、有重点地分配财力物力。这样就能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使体育上得快一些。”这实际上明确指出了我国高水平竞技运动要获得迅速发展必须依托“举国体制”。

为了实施奥运战略，1980年初国家体委在上报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将加速提高我国运动技术的整体水平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内体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报告提出了加速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几项措施，包括调整运动项目的重点布局；在1983年召开第5届全运会；改革、完善训练体制，按照优秀运动队、业余体校和学校运动队这样的一、二、三线运动队伍来配置；分批轮训体育干部、教练员等等❶。国家体委主任王猛于是年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中首次对“举国体制”进行了正式诠释：“在我国，体育纳入国家计划，能够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调动各个地方和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按比例、有重点地分配财力、物力。这样就能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使体育上得快一些。”❷

从1979年开始确定“侧重抓提高”的方针而进行的一系列调整，主要基于以下认识：

一是对体育与经济关系的认识。体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归根结底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还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发展体育事业的现实条件下，提出过高的要求，全面跃进，必然会碰钉子，这已经有了历史教训。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体

❶ 国家体委关于加速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140.

❷ 王猛同志在1980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150.

育事业的发展是纳入国家计划的，能够运用计划经济的优势有重点地分配财力、物力，虽然国家对体育事业投入的总量不足，但可以集中使用在竞技体育上。与其在整个体育事业的各个方面平均使用低水平的力量，不如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况且我国已重返国际体坛，参加国际大赛和奥运会的任务迫在眉睫，抓提高是树立国家民族形象的需要。

二是根据历史经验，发展体育事业单靠体委是不够的，社会各行业、各部门均应承担起组织领导本部门、本单位体育工作的重任，各级体委主要进行协调、指导工作。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才形成了80年代选择以发展竞技体育为先导、带动体育事业全面发展的战略思路。“举国体制”在当时生产力比较低下、经济落后的情况下，与我国的国情基本相符，它集中了国家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来最大限度地发展体育事业，使得在“文革”时期被严重破坏的体育工作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运作，并为80年代的体育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期间，国家体委制定的奥运战略推进了竞技体育的迅猛发展，同时，也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的法规政策。1979年，教育部公布了《全国学生体育运动竞赛制度》《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和《中小学体育卫生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但总体来说，由于国家“侧重抓提高”方针的引导，群众体育与学校体育明显滞后于竞技体育，从而形成了竞技体育一头热的局面。进入80年代以来，现代体育发展异常迅猛，以奥运会为中心的竞技体育猛烈地冲击着我国的体育运动，要提高我国的竞技运动水平，就必须改革竞赛制度。80年代竞赛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调动各方面办体育的积极性，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造就大批优秀运动人才，推动体育运动的普及与提高。

三是对赛事实行分类管理与分类指导。50年代，我国开展运动竞赛的主要任务是宣传、组织群众参与体育锻炼。60年代在调整中，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体育运动竞赛主要以有利于提高运动技

术水平来安排。改革开放以来，适应“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战略调整，体育竞赛活动，特别是国家竞赛活动的安排，进一步突出了“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要求，立足于出人才、出水平、练队伍。80年代中期，在竞技体育迅速发展的同时，群众体育需求也日益高涨，为了协调各类体育竞赛活动，国家体委在竞赛改革中注意了对体育竞赛进行分类管理、分类指导。

国家体委将全国性比赛进行宏观调控，包括全运会、城运会、青少年运动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由国家体委直接管理。

高水平运动队肩负着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重任，是竞技体育的主力军，在国内安排的他们的一切竞赛活动均属“练兵”。80年代竞赛改革中更加突出了这一任务，在规程的制订、特殊原则的执行、日程的安排、场地器材的要求等方面都尽量使高水平运动竞赛国际化或接近国际比赛条件和气氛，并实行按水平分级比赛和分级管理，以达到练兵的目的。在竞赛规程的制订上，进一步强化竞争机制，迫使参赛者竭尽全力投入比赛，发挥最高水平，杜绝了一些由于规程不完善而出现的“君子协定”和“争输球”等现象，促进了运动水平的提高。竞赛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按年龄组分级比赛，强调身体素质得分比例，淡化金牌的观念，不强调他们过早出成绩，如1986年对12岁以下少年儿童一般不安排全国比赛，主要由省市举办，全国只安排了田径、游泳等10个重点项目的少年比赛。

学校体育竞赛除发现和培养优秀体育人才外，主要是通过体育活动达到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目的。因此，学校的体育竞赛主要本着大部分学生爱好、能接受、易开展的原则，通过竞赛活动巩固他们的技术，养成他们的锻炼习惯，使他们能热爱和熟练某一两个运动项目，以便在工作岗位上继续从事这些体育项目的锻炼，以达到终生受益的目的。

以奥运战略为目标，将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组合成“一条龙”，在项目设置、参加对象、计分办法、时间安排等方面，进行统筹考虑，侧重目标、任务相互衔接，互为补充。

全国性比赛按运动技术水平分级，青少年比赛按年龄分组，逐步实行集体项目的全国比赛以各省冠军队参加的办法；省级比赛以各市冠军队为参加单位；市级比赛以厂矿企业、大专院校等基层组织为参加单位。省一级单项比赛，重点放在青少年；中等以下水平的比赛，基本上限制在省内或行业系统内。采取分层分级比赛的赛制，有利于加速后备人才的成长，保证全国比赛的高水平，真正达到“练兵”的目的。

80 年代，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以不可阻挡的势头进入体育领域，并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给体育竞赛带来了活力，扩大了参与的主体，促进了竞赛的社会化。

首先是竞赛参与的主体的社会化。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束缚，把体育商品化视为禁区，把体育竞赛引入了体委独家经营的死胡同，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光彩，冲破了人为的禁区，“民办”和“自办”的比重加大，使竞赛场的范围明显增大。竞赛参与主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还扩大了参与竞赛管理的范围，做到了统筹规划，统一政策，协同运作，动员群众，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其次是竞赛资金来源的社会化。进入 80 年代，我国的体育竞赛日益表现出资金密集的特点，竞赛次数和规模的增多与扩大要求经费的投入猛增。而国家财政可承担的实际供给能力则无法与需求保持同步增长，同时企业又需要利用体育作媒介，以赛场为窗口，使商品渗透到社会和家庭，占领消费市场，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因此，竞赛经费来源的社会化成为体育界和企业共同得益的一件新生事物。在 80 年代，除充分调动国家、社会、参赛者的积极性，合理负担竞赛经费和发挥竞赛宣传功能与感召力，以及引导项目（或项群）实体创造经济价值外，还鼓励竞赛与企业挂钩，成立体育竞赛与企业联合体，提倡体育竞赛与经营活动联合进行，形成了“内引外联”和“体育搭台、经贸唱戏”的社会化特色。

第三是促进了竞赛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为了加强竞赛的管理，提高效益，确保竞赛顺利进行，80 年代，国家体委印发了一系列有关竞赛管理的法规性文件，如《裁判员技术等级制度》《仲裁委员会条例》《全国体育竞赛开展“精神文明奖”评选活动办法的要求》《体育运动会全国纪录审批制度》《评选全国体育竞赛最佳赛区的调节和实施办法》《国际裁判员和国家级裁判员考核办法》《厂矿、企业赞助性比赛管理办法（草案）》《全国体育竞赛赛区工作条例》《违反<全国体育竞赛赛区工作条例>的纪律规定》《关于社会各行业与体委系统合办体育竞赛的管理办法》《全国体育竞赛赛区开展“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活动办法和要求》和《全国体育竞赛最佳赛区和优秀赛区评选办法》等。这些竞赛规章制度的完善，使我国的竞赛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并逐步达到了制度化。

在竞赛的组织管理方面，随着我国举办国际、国内竞赛日益增多，要求不断提高管理水平。80 年代，体育竞赛的组织管理已普遍运用现代管理和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采用网络技术进行优化管理。一些大型的运动竞赛都能本着少花钱、多办事和运动竞赛是以出成绩、出人才为主要目的的原则去运作，合理安排竞赛的时间、日程、场地、器材、食宿、交通等，使竞赛达到较佳的效果，竞赛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通过对竞赛制度的改革，各级各类竞赛逐步走向制度化。全国综合性竞赛，除国家体委主管全国运动会和城市运动会外，大中学生运动会由教育部主管，工人运动会由全国总工会主管，少数民族运动会由国家民委主管，残疾人运动会由民政部主管，农民运动会由中国农民体协主管，分工明确，各负其责。竞赛社会化程度也逐步提高，到 1988 年，社会办全国性比赛已占 76%，社会办市级比赛占 70%。竞赛制度向社会办队开门，行业、企业运动队都获得参与竞争的机会，全运会、省运会都有不少行业组队参赛，一些单项比赛，涌现出更多的企业、高校队，增强了企业、高校办高水平

运动队的积极性，突破了长期以来基本上限于省以上体委办运动队一花独放的局面。

以足球为例，为了迅速提高中国足球运动技术水平，国家体委经请示国务院批准，将研究提出的关于提高我国足球技术水平的若干措施以文件形式于1979年6月6日正式下发。

根据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规划的要求，足球到1985年要达到亚洲、非洲的最高水平，进入世界前12名。达到这个目标，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措施，体委要抓好足球项目的工作，并须有有关部门的协助和支持。主要措施如下：

1. 在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少年中大力普及足球运动。国家体委会同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和组织广大青少年学生大力开展三大球（足、篮、排球）运动。同时建议部队、工会等部门，大力开展足球运动，进行业余训练和竞赛活动。

2. 抓好足球运动的重点地区。将当时足球运动开展较好的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旅大（现大连）、广州、武汉、长春、青岛、石家庄、重庆、南京、昆明、西安以及延边、梅县等地作为重点地区，请省（市）体委加强对上述地区的足球工作领导，建立从基层到体工队层层衔接的比赛制度和训练网，为足球运动的普及和提高作出贡献。国家体委在国际国内比赛及训练方面对重点地区给予政策扶持。

3. 迅速组建国家青年足球队，为准备参加1984年奥运会和1986年世界足球锦标赛，并争取取得世界前12名的成绩，组建1至3个国家青年足球队。从全国选拔运动员，由国家体委直接领导，进行严格的、系统的训练，使之成为承担上述任务的一支骨干力量。

4. 派出去，请进来。有计划地分批地将国家队和国内的强队，特别是新建的国家青年队，派到欧洲或南美洲足球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学习锻炼半年至一年，并聘请外国高水平教练员来我国

担任教练员或进行讲学。提高教练员和裁判员的业务水平，有选择地派教练员和裁判员到先进国家进行短期学习和观摩训练与比赛。

5. 大力加强科研工作。在体育科学研究机构中配备专门的足球运动技术研究人员，及时掌握世界足球运动的发展趋势，研究适合我国情况的训练方法和手段。

6. 继续举办国际足球邀请赛。我国举办过的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和中国青年足球邀请赛，对推动我国足球运动水平很有好处，拟从 1980 年起，每年举办一次。

7. 兴建足球训练中心。为加强足球训练和开展国际活动，在北京兴建一处足球训练中心，基建投资预算列入国家体育基建计划。

8. 加强宣传。建议各报刊、电影公司、电视台增加对足球运动的报道和宣传。希望中央电视台能增加国际、国内重大足球比赛的转播，适当组织足球技术讲座等活动。计划于 1980 年出版足球杂志月刊或季刊。

9. 请廖承志担任足协名誉主席。为了体现党和国家对足球运动的关怀和重视，鼓舞足球运动员大干快上，请廖承志副委员长担任中国足球协会名誉主席。

可以说，1985 年全国体育体制改革实施以前，在 1977 年开始恢复被“文革”搞乱了的体育体制的过程中，通过发挥计划经济的管理优势，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突出重点，侧重抓提高，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绩，保证了竞技体育在整个体育事业的发展中有一定的超前性，为 80 年代后期我国竞技体育水平的持续大幅度提高奠定了基础。

二、围绕奥运战略形成的训练体制

1979 年 11 月，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

后，中国重新回到了奥林匹克大家庭。在此前后，许多国际体育组织和亚洲体育组织陆续解决了我国的会籍问题，我国国际体育交往的范围迅速扩大。1980 年以后，每年的国际体育活动比 70 年代平均数增长一倍。为了完成在奥运会等国际重大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任务，提高训练水平，改革和完善训练体制，成为新时期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性环节之一。

为了迅速改变竞技体育水平低的状况，适应中国竞技体育队伍重返国际大舞台的需要，为国争光，1979 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确定了“侧重抓提高”作为两年内的主要工作。经过 3 年的调整，中国的体育事业已基本步入正轨，在“举国体制”的前提下开始对体育体制各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改革试点。1981 年，开始进行以提高体育总会、单项体育协会和行业体协的地位及作用为内容的改革试点；1983 年，开始对训练体制和竞赛体制进行多方面改革；1984 年，开始对体育科研体制进行改革。这一切都为 1986 年的体育体制改革在理论上、实践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同时，在 80 年代中期，国家体委逐步形成以青少年为重点的全民健身战略和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战略协调发展的思路。

80 年代，我国训练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坚持全国一盘棋”，落实奥运战略，解决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改变过分集中于省以上体委办优秀运动队的状况，把训练的路子拓宽，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和行业、厂矿、企业、高校设立高水平运动队。改革的要点是：突破单一优秀运动队的形式，集体项目向城市厂矿企业和高校过渡，逐步发展成社会办队，有条件的优秀运动队积极试行向学校过渡；落实重点布局，集中保证奥运会重点项目；改革国家队组队方式，实行长年、集训和以冠军队为主组队 3 种形式。发展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业余训练，加强专业训练与业余训练的衔接，更好地实现“一条龙”；向总教练员负责制过渡；实行聘任考核制；提倡教练员交流等。在这些思路的指导下，在训练体制的改革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拓宽训练渠道，培养优秀运动人才

1979年，国家体委提出："要广开才路，把培养优秀运动员的路子拓宽。除现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和解放军系统的队伍以外，积极支持和帮助产业系统逐步恢复优秀运动队。"在国家体委下达的《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中，也明确提出了"改变过分集中于省以上体委办优秀运动队的状况，把训练的路子拓宽。在不降低原有运动水平的前提下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和行业、厂矿企业、大专院校设立高水平运动队"。80年代，我国的优秀运动员管理和训练体制，在改变以往由体委独家操办这一单一渠道的模式上有所突破，逐步形成了行业、厂矿企业、学校、社会团体等多样式、多渠道、多层次的训练网络，不少企业以俱乐部的形式组建高水平运动队，并通过经济杠杆来经营管理运动队，培养优秀运动人才。

1980年8月18日至28日，全国冰雪训练工作会议在哈尔滨举行。12个重点省、市和解放军的代表210人参加会议。会议主要总结了冰雪项目训练工作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并制定出参加第14届冬季奥运会的训练计划。

针对我国冰雪项目（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球、越野滑雪、高山滑雪、现代冬季两项）落后，与世界先进水平比较差距很大的局面，会议根据我国的自然地理条件，确定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的部分地区为开展冰雪运动的重点。此外，会议还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火车头体育协会把冰雪运动列为重点项目。

会议对重点地区和单位提出要求：1. 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冰雪活动，形式要多种多样，简便易行。2. 在广泛开展群众性冰雪活动的基础上，要抓好业余训练。3. 建立传统的各级竞赛制度，以推动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4. 重视冰雪运动场地的建设，逐步建设一定数量的冰雪运动场地。

会议指出，要加强国际交往，引进先进技术。为了锻炼队伍，增加比赛经验，冰雪项目除参加每年一度的世界锦标赛（包括成年和青少年）外，还要聘请国外高水平的教练员来华任教或讲学。为了迅速提高我国冰雪运动水平，希望重点地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和解放军的有关领导机关，关心和重视冰雪运动的开展，采取一定的措施，加强领导，经常督促检查，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各重点省、区和地、市体委要切实把冰雪项目作为重点，集中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团结社会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强冰雪项目的工作。

从1979年至1985年间，竞技体育经过拓宽训练渠道、培养优秀人才和调整项目布局，加强体育科研与运动、训练的结合，大量运用科技成果，改变国家队组建形式和选拔制度，加强业余训练和培养后备人才等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竞技体育成绩很快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在国际大赛中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二）搞好项目布局，落实奥运战略

奥运会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奥运会上的比赛成绩，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体育运动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80年代，我国竞技体育工作都是服从奥运会这个大项目来进行规划，运动项目的布局也是围绕奥运战略进行调整的。

奥运会运动项目多，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即使是体育实力最强的国家，也不可能所有的项目都强。我国由于人力、物力、财力有限，不可能把所有奥运项目都作为重点来开展，因此，80年代，在集中优势、突出重点、优化结构、分类管理的思想指导下，集中力量抓了我国优势项目和经过短期就能达到十佳先进水平的项目，如1985年摔跤、柔道、赛艇、击剑被列为全国重点项目后，一线队伍人数有所发展，到1987年仅这4个项目全国就增加了900多人。通过重点项目布局工作，调动了各布局单位优势项目的发展。然而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主要是导致了一些集体运动

项目和非奥运项目队伍的锐减和成绩下滑。

（三）加大科技投入，提高训练质量

随着体育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成果在竞技运动上的大量运用，运动技术的发展和提高越来越快。越来越多的运动项目需要通过或者依靠高精度的电子仪器来检测、提供参数并提供正确的分析材料，以便找到发挥人体的最佳效能，从而来挖掘人体的最大潜能以提高和改进技术的方法，最终达到提高成绩的目的。这不是光凭经验就能做到的，必须充分运用各种科技手段，对运动训练进行科学调控，才能取得成果。80 年代，国家体委认真贯彻执行邓小平提出的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提出“体育振兴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体育科学技术要面向体育运动的发展”的方针，逐步实现体育科学化，把体育科研与体育运动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强调了科研一定要同训练结合，为训练、竞赛服务。一批科研人员深入体育运动实践第一线，抓重点项目的科研攻关和科技服务，解决训练工作中的难题。如在第 16 届冬季奥运会的科技攻关工作中，攻关组由多学科科研人员构成，对叶乔波等速滑运动员进行长期系统的观察和综合评定，掌握了短距离速滑运动员竞技状态规律，有针对性地在训练中调整体能、技术、心理状态，促进了竞技水平的快速提高，并成为冬季运动的优势项目。在体操、田径、游泳、射箭、击剑等项目中，由于科研人员的介入，提高了训练质量，运动技术水平提高很快，有的摆脱了长期低迷的局面。另外，在科学选材、疲劳与恢复、高原训练等一些基础研究中，也解决了训练工作中的许多难题。

为了加强体育“人才学”的研究，1980 年 7 月，国家体委在秦皇岛召开了全国业余体校选材座谈会，共有 29 个省、市、自治区的优秀教练员、体育科研人员、体育院校和中学体育教师共 166 人出席。这次会议是我国召开的研究运动员选材问题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会上宣读论文 30 篇，初步总结和交流了业余体校选材的

经验，提出田径、体操、游泳、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7个项目的选材参考意见，落实了青少年运动员科学选材的研究计划。会议认为，搞好选材的关键是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从中国体育界的实际出发，选材首先着眼于为参加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准备充足的后备力量，不能片面追求一时一地出成绩。会议强调专业体育科研队伍和群众性的科研力量要紧密结合。一方面在广大教练员队伍中继续开展行之有效的、简便易行的选材研究，积累经验，并逐步提高其科学性；另一方面要十分重视专业研究机构的综合实验性选材的研究，加强他们的力量。这次会议是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恢复我国合法席位不久，我国面临全面登上世界体育舞台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对提高运动员选材问题重要意义的认识，加强各级体委对选材工作的领导，推动体育科研部门认真研究科学选材问题，提高我国选材工作的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会后，组织了8个单位的239人用两年时间进行调研，对田径、游泳、体操、排球、足球5个项目、14871名青少年运动员的身体形态、机能、素质、心理、遗传等102个指标进行了测试和数据分析，撰写论文123篇，并出版了《优秀青少年运动员选材研究论文汇编》。由此，深入调查研究得出的科学选材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

（四）打破终身制，实行教练员竞聘上岗

80年代，国家体委提出了运动队以训练为中心，不断提高运动水平的工作方针，对各项目运动队逐步向主（总）教练负责制过渡。从国家队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业余体校、少体校，对各项目运动队的教练员，逐步改变了过去从运动员中直接选拔的做法，引入竞争机制，采用多渠道、多形式的聘用方法，如对教练员队伍实行推荐、考核与批准相结合的录用办法；实行竞选招聘，以及省、市、区间交流的办法等。主（总）教练聘任一般为4年，实行合同制，并用奖励或处罚规定作为辅助手段。选拔的教练员除要求必须是经过体育院校系科学习，达到中专以上文化水平外，还建

立了轮训、进修等制度，实行定期考核、考试、评定、职称晋升。实行这一制度的单位，要求主教练对队伍的训练、比赛和思想政治工作等实施全面领导，改变了教练员的“铁饭碗”“铁交椅”和“终身制”等传统观念和管理模式，激发了教练员胸怀超越旁人的强烈愿望，改变自己存在的价值、地位、作用等方面的旧观念。主（总）教练负责制使教练员有职、有权、有责，它激起了每位教练员自我教育、自我表现、自我完善的欲望，产生了巨大的主动性、责任感和创造性，促使教练员奋发上进，不断更新知识，提高能力，从而提高工作成效，促进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三、参加第8届亚运会

1978年12月，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了第8届亚洲运动会。这是我国继1974年首次参加第7届亚运会以来第二次派出代表团参加该项赛事，也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十年浩劫以来第一次派出大型体育代表团参加重大国际赛事。

本届亚运会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参赛运动员共计2879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288名运动员参加了除曲棍球、拳击、地滚球、帆船外的15个项目的比赛，共获得金牌56枚、银牌60枚、铜牌51枚，金牌和奖牌数均列第二位。在这届运动会上，中国运动员共打破24项亚运会纪录，34项全国纪录。其中成绩突出的是乒乓球、跳水、体操项目。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男女团体和5个单项比赛的全部7项冠军和3项亚军，以及两项第3名；参加跳水的8名男女运动员囊括了该项目所有的4枚金牌和4枚银牌；男女体操队夺得全部15枚金牌中的10枚。这些项目，中国都已进入世界先进水平。更可喜的是，我国运动员摆脱了田径项目比较落后的局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也是本届亚运会获得田径项目金牌最多的国家，共计12枚。

中国游泳运动员在比赛中，尽管打破了3项亚运会纪录和21

项全国纪录，但仍未改变未得1枚金牌的落后局面。正如外国评论的那样，游泳训练还停留在50年代的水平，无论在强度、密度和科学性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1978年12月22日《体育报》记者撰文评述第8届亚运会时指出，我们要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善于向别人学习，借鉴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只有把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和技术学到手，然后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发展提高，才能赶上和超过他们。我国优秀乒乓球运动员在这一点上走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因此，他们十几年来一直保持着世界较高的技术水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我国不少运动项目水平还很低，适应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任重道远。胜利归来的运动健儿们应在祝贺声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认真总结经验，正视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把新成绩作为新长征的起点，向着攀登世界高峰的目标，乘胜前进。

四、备战第22届奥运会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这一重大的国际事件对长期悬而未决的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合法席位问题立即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两天后，即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大事件的重叠，给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体育事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外部发展空间和内部发展环境，从而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体育改革发展奇迹奏响了壮丽而高亢的序曲。

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领导人在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正式宣布，经过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通讯表决，批准了此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翌日，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宣布中国奥委会接受国际奥委会决议，并将派团参加1980年在莫斯科举办的第2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当时，中国体育界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文革”十年浩劫损伤的元气尚未恢复，然而国际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与中国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使中国体育界骤然面对了国内其他行业部门所没有的一种时不我待的巨大挑战与压力。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面对压力，中国体育界勇敢而坚定地迎接了这一巨大的挑战，迅速调整和制定了自己的发展战略重点，为80年代以后中国体育的崛起和腾飞奠定了基础。

面临下一年就要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22届奥运会的紧急任务和巨大压力，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国家体委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使中国体育快速进入恢复与发展时期。其中心工作就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全国的体育资源，统一领导，统一调度，完善和强化“举国体制”。

1980年初，鉴于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任务迫在眉睫，国家体委在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将加速提高我国运动技术的整体水平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内体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报告提出了加速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几项措施，包括调整运动项目的重点布局；在1983年召开第5届全运会；改革、完善训练体制，按照优秀运动队、业余体校和学校运动队这样的一、二、三线运动队伍来配置；分批轮训体育干部、教练员等等❶。

从1979年始，国家体委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开始备战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按照奥运会项目组建国家集训队；在全国选择优秀运动员进入国家集训队；调集有关科研人员就参加奥运会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等等。同时，围绕在奥运会上夺取优异成绩的目标，进行了一系列的国内集训比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79年上半年，在田径、游泳、举重、速度滑冰、赛车场自行

❶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140.

车、射击、射箭、飞机跳伞、航空模型、航海模型10个项目中，有3人打破了世界纪录、2人平2项世界纪录、1人破了1项青年世界纪录、4人4次打破亚洲纪录；有114人186次打破了74项全国纪录。其中田径项目有16人17次打破了10项全国纪录。在东京举行的亚洲田径运动会上，我国运动员邹振先、叶佩素、申毛毛、李晓惠4人分别打破了三级跳远、女子五项、男子标枪、女子铁饼的亚洲纪录。其中，男子三级跳远的成绩可名列世界第7位；男子标枪的成绩可进入世界前15名。游泳项目，有18人31次打破了11项全国纪录，其中17人是少年运动员。举重项目大有起色，有15人42次打破了19项全国纪录，并创造了1项世界纪录、1项青年世界纪录。1980年奥运会规定的10个举重级别及格标准，我国除了110公斤以上级外，其他9个级别都达到了及格标准。速度滑冰技术水平提高显著，有21人45次打破10项全国纪录，占全部纪录的70%。乒乓球、羽毛球、体操、围棋等项目在1979年上半年的一些重要国际比赛中也取得了好成绩[1]。在1980年1月的马耳他国际象棋邀请赛上。我国的刘文哲、梁金荣并列第3名，以9.5分获国际大师的第二序分。而此前他们以相同的分数已获得第一序分。国际象棋联合会根据有关国际大师称号条款，于1980年12月马耳他瓦莱塔召开大会，正式批准中国象棋选手刘文哲、梁金荣为国际大师，这是中国国际象棋手第一次获此殊荣。

然而，1979年12月25日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与人民的强烈反对。1980年1月20日美国总统致函包括我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倡议把奥运会从莫斯科移往另一地点，或推迟举行或取消。2月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情况下，在莫斯科举行奥运会是不适宜的。4月24日中国奥委会在北京举行全体会议，指出苏联的侵略行为严重违背奥林匹克运动

❶ 国家体委. 体育工作情况反映. 1979-07-17.

的宗旨，并决定，只要苏联当局拒绝尊重奥林匹克运动的崇高宗旨，不从阿富汗撤出其全部武装部队，中国将不派运动员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22届奥运会。由于苏联当局未能满足中国政府的正义要求，中国未派出代表团参加莫斯科奥运会。

虽然1980年的莫斯科夏季奥运会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抵制，使我国原定首次派出代表团的计划受阻，然而，由于备战奥运会工作的展开和实施，中国体育界围绕奥运战略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与调整措施，其中主要包括：

1. 强化以往业已证明行之有效，并适合中国国情的“举国体制”。其主要内容就是将“文革”中遭受破坏的中央、省市和县级三级体委“一条龙”的体育训练体制重新恢复和建立起来，并按有利于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的原则，对运动项目的布局进行了调整，确定了乒乓球、羽毛球等13个全国重点发展项目，集中优势、突出重点、优化结构、分类管理，力图发挥制度和体制上的优势，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力量把若干项目搞上去。

2. 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竞技体制。根据1980年体工会议精神，按照“全国一盘棋”的精神，由国家体委组建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常设国家队，由各省市组建专业“体工队”，从1980年起按4年一个周期，订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指标，训练能在奥运会上夺取奖牌的优秀选手。

3. 调整全运会体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和行业体协派队参加的全运会是国内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从1979年第4届始，全运会调整为4年一个周期，于两届奥运年之间举行，其项目设置与奥运项目接轨，由此而成为“奥运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国内竞赛体制的核心，全运会是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重要支柱之一，在调动和促进各级地方政府搞高水平竞技的积极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因而尽管它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和争议，但这一竞赛体制还是保留了下来。

1981年4月13—26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了在南斯拉

夫诺维萨德举行的第3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有来自62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加比赛。中国队获得男、女团体，男、女单打（郭跃华、童玲），男、女双打（李振恃/蔡振华、张德英/曹燕华），混合双打（谢赛克/黄俊群）全部7项冠军。童玲获“最佳运动员”奖，李富荣获“最佳教练员”奖。

1983年9月，中国竞走队在挪威卑尔根举行的世界竞走比赛中，女队获10公里团体和个人两项冠军。徐永久以45分13.4秒创女子10公里竞走世界最好成绩。

与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体委，解放军，行业体协也强化了优秀运动队的训练，增加了对体育科技方面的投入。为检查训练效果，交流经验，总结收获，找出差距，从1979年到1985年，国内赛事大大增加，参加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以上比赛的运动员人数也有了较大的增长。据统计，从1953年至1985年举办的国家级运动比赛会共1559次，其中从1979年至1985年共举办了1160次，占总数的74%左右，约为1953年至1978年25年间399次的3倍；省、自治区、直辖市从1953年至1985年共举办运动会15433次，而从1979年至1985年举办了6566次，约占总数的43%。

1983年9月，在上海举办的第5届全国运动会，有8900多名选手参加，2人3次破两项世界纪录，4人5次平3项世界纪录，66人39队145次破60项全国纪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男子跳高选手朱建华，他在预赛和决赛中两次刷新世界纪录，因此在由38个国家的报纸编辑参加的第37届国际体育通讯年最佳运动员评选活动中，被评为世界男子并列第四名最佳运动员。全运会的比赛成绩证明了中国竞技体育在大多数项目上有了非常迅速的进步。这届全运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首都以外的城市举行，把全运会交给地方轮流举办是竞赛改革的一项成功措施。这一重大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体现了竞赛改革的成果，是以后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轮流举办全运会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由于中国的体育决策层与体育界在 1980 年前后改革开放与参加奥运会这两大激流中果断而冷静地把准了方向，及时制定了正确的决策和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和有效的措施，强化与完善了包括管理体制、专业体制及全运会体制在内的“举国体制”，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在极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将我国体育的战略重心转移到了高水平竞技优先的奥运战略方向上，推动我国竞技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正是这一正确的发展战略的制定，以 1982 年第 9 届亚运会和 1984 年第 23 届奥运会为标志，中国体育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飞跃，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优异成绩，成为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和走向世界的象征。

第二章　20世纪80年代竞技体育的腾飞

20世纪80年代，通过广大竞技体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国竞技运动水平得以较快提高，在国际体育赛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尤其是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金牌总数名列第四，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在全国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体育热”和爱国主义的热潮，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新的内涵，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满腔热情。

第一节　在国际赛事上取得优异成绩掀起爱国主义热潮

一、20世纪80年代初“体育热”的背景与特点

“文革”的浩劫，使我国的体育事业与其他行业一样，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十年动乱结束之后，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初步清除了“四人帮”在体育领域的流毒和影响，各级体委重新行使管理职能。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也重新开始运作。

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我国各行各业得以初步恢复生机，生产力得到较快发展，物质生活条件也得到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

在这一时期，国家体委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于1978年、1979年和1980年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体育业务工作上来，并确定了在“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的方针政策。围绕我国恢复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合法席位这一新的形势，重点研究了提高运动水平、确定重点运动项目、恢复训练体制和备战莫斯科奥运会等问题。

1978—1980年，连续3年的体育工作会议确定了以竞技体育为工作中心，制定了参加奥运会的有关方针与措施，初步形成了新时期体育的“奥运战略”，这标志着中国以竞技体育为中心、“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举国体制的正式形成。经过这3年的调整，“文革”时期被严重破坏的体育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逐步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竞技体育的成效已逐渐体现出来，并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二、20世纪80年代的“体育热”

在20世纪80年代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的优异表现成为提高全国人民凝聚力和振奋全民族士气的强大动力。体育成为全国人民最关注的对象之一，形成了在全国引起极大影响的“体育热”。除了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外，20世纪80年代初，还有几次中国运动员参加的重要国际赛事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当时“体育热”的标志性事件。

1981年3月20日，中国男排健儿在争夺第4届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出线权的关键一战中，临危不惧，受挫不馁，先输后赢，以3∶2战胜了南朝鲜队（现韩国队）获得出线权。当胜利的消息通过电视和广播传出后，全国人民群情振奋，大学生们自发地上街游行，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在全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

1981年4月14日至26日，我国乒乓健儿在南斯拉夫诺维萨德举行的第36届乒乓球世界锦标赛上，一举囊括了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全部7项冠军，为祖国再增光辉，创造了世界乒乓球运动史上首次由一个国家的运动员夺得全部7项冠军的乒坛奇迹，在国际乒坛引起了轰动。当时全国人民的千万封祝贺信，表达了人们热爱祖国的深厚情感。

1981年10月，在世界杯足球赛亚大区决赛中，以苏永舜为教练员的中国足球队舍身苦斗，从逆境中奋起，以3:0胜科威特队，两战两胜强敌沙特阿拉伯队，出线形势大好。中国足球队的这一战绩在全国掀起了空前的足球热。当中国队在比赛中获胜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中国！中国！”“祖国万岁”的口号响彻四面八方。虽然中国队最后在附加赛中负于新西兰未能出线，但中国足球队的表现得到了全国球迷的高度赞扬，对推动中国的足球运动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女排在世界大赛中实现“五连冠”是这一时期体育史上最亮丽的一笔。1981年11月7日至16日，举世瞩目的第3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在日本举行。参加比赛的有上届世界杯冠军日本队、奥运会冠军苏联队、世界锦标赛冠军古巴队，以及咄咄逼人的美国队，在这次世界高水平的争夺战中，中国女排顽强拼搏，力克群雄，以七战七捷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杯，揭开了“三大球”翻身史的第一页。中国女排的胜利，实现了周恩来、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愿，鼓舞了亿万人民爱国主义的热情和为振兴中华而献身的精神。多少人流下激动的泪水奔走相告，集会庆祝。千万封贺信像雪片般飞来，赞扬女排奏响了一曲“振兴中华的志气歌”。爱国热席卷全国，达到高峰。1982年9月12日至25日，第9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在秘鲁利马等地举行。参加比赛的有23个国家。比赛采用预赛、复赛分组循环，带预赛分进入复赛、决赛交叉的办法进行。中国女排虽然出师不利，在预赛中以0:3受挫美国队，但是姑娘们遇险不惧，团结奋战，力挽

狂澜，接连以6个3:0力克古巴、苏联、匈牙利、澳大利亚、日本、秘鲁诸强，首次摘取了世界女排锦标赛的桂冠，为祖国赢得了第二个世界冠军。此后作为世界列强众矢之的我国女排虽几经调整但实力不减，历尽艰辛，又获得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冠军，从而实现了“三连冠”大业。1985年，中国女排挟“三连冠”之余威又一次夺得第4届世界杯赛桂冠。1986年9月13日，中国女排在举世瞩目的第10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中，以3:1力克劲旅古巴队，从而以8战8捷的辉煌战绩卫冕，创造了自1981年以来在世界排球大赛中连续5次荣获冠军的丰功伟绩。中国女排是中国三大球中第一个夺得冠军的集体，并几乎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竞技体育全面进军世界体坛的一个标志，“女排精神”也成为一面旗帜，鼓舞着其他体育项目运动员，甚至各行各业的人民的拼搏与奋斗。

1984年10月5日，由中国围棋协会、《新体育》杂志社和日本棋院共同举办的中日围棋擂台赛拉开了序幕。从此，这一赛事在当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其中，棋圣聂卫平在3届擂台赛上，孤军奋战，所向披靡、力挫群雄，一举战胜数名强大对手，夺取了擂台赛胜利，为中国队的胜利立下了殊勋。其中，第1届擂台赛，聂卫平在中方以5:7落后的情况下，持帅东征，力挽狂澜，先是击败了已经“六连胜”的小林光一，接着又力克日本超一流棋手藤泽秀行，最终使中国队以8:7告捷。第2届擂台赛，在中国队处于4:8的危急时刻，聂卫平又肩负重任，披挂上阵，在他以卓越的棋艺将比分追成8:8后，又开始了与“快棋之神”大竹英雄的“世纪之战”。整个棋局错综复杂、惊心动魄，历时7个半小时，共下了320手。时间之长、着数之多，创下了第2届擂台赛所有17局的最高纪录。最后聂卫平以其非凡的功底和顽强的毅力，以两目半的优势获胜。第3届擂台赛，聂卫平陡变棋风，战胜了加藤正夫，使中国队获得中日擂台赛的“三连胜”。他自己在这3届擂台赛中，共胜9局，被称为“九连胜”。聂卫平在第4届擂台赛上，又轻松地战胜了连胜我方6员战将的依田纪基，接着击败了淡

路修三。聂卫平在4年的擂台赛中连胜11局，让不可一世的强大对手俯首称臣，大长了国人的士气，也有力地推动了围棋在全国的开展。

三、20世纪80年代“体育热”的影响与意义

我国运动员在国际重大比赛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举国上下欢欣鼓舞，海内外华人扬眉吐气。体育健儿在竞赛场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已远远超过了体育本身的意义，成为20世纪中华民族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团结全国人民的旗帜。在全国人民面对百废待兴、人心思变的历史特殊阶段，在全国人民着力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特别时期，体育竞技场上的优异表现恰恰迎合了时代的需要，成了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一种精神动力，为我国形成强烈的“爱国热”提供了有效的素材。

1982年元旦，《体育报》发表了题为《为建设精神文明作出新贡献》的元旦献词，文中说：“过去的一年，是体育健儿奋发进击、龙腾虎跃的一年，是体育运动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的一年。”同时分析指出，从冰球晋级到女排夺冠，从足球奋起到乒乓全胜，从田径丰收到体操跃进，以及跳水、技巧、举重、射击等项目创造一个又一个优异成绩，在群众中激起一浪高一浪的爱国热潮。其影响至深，国家为之增辉，民族为之振奋。在该献词中还特别强调“体育和爱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育在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深处的影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体育在建设精神文明中的作用，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体育运动是向人们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和培养良好品德作风的有力手段。建设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可没有发达的体育。由此可见，体育健儿在国际比赛中创造优异成绩对社会的影响与作用之大，必将对全国各族人民、各条战线的人们以

奋发向上的激情和力量。

1982年的元旦之际，全国体总举行新年茶话会时，时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的钟师统在会上说，1981年体育确实红火，我国体育健儿在每次重大比赛的胜利都在全国人民中激起一股股强大的爱国热流。这充分显示了体育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作用。

1984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美国洛杉矶第23届奥运会上取得的优异成绩，又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体育热”和“爱国热”。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党和国家对体育工作又提出了新的要求。1984年10月5日，在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中，高度评价了体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地位、作用和成就，深刻地分析了体育战线的形势任务，对体育运动的方针、政策、措施作出了重要指示，要求全党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由此可见，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重大体育竞赛中取得的每一次优异成绩，对于进一步推进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运动健儿在体育运动项目中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激发出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人的爱国热情。

纵观这一时期的几次“体育热”，表现出以下重要意义与特点。

（一）体育健儿的“拼搏精神”成为全民族的榜样

1979年我国回到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后，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运动技术水平有了较明显的提高，在国际赛场上初露锋芒。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捷报频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那个特定时期团结和鼓舞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号角与旗帜，使“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响遍中华大地。

1981年我国体育战线捷报频传，创造了中国体育史上的新纪录。体育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我国运动员在重大国际体育比赛中创造的优异成绩，在人民群众中激起了

爱国主义热流，形成一浪高一浪的“体育热”，持续之久、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就是中国男排战胜了南朝鲜后，北京大学的学生最先喊出来的。这一口号由次日《人民日报》以社论标题发表以后，立即成为全国人民的心声。中国女排获得世界杯冠军后，收到贺电、贺信多达 3 万余件。人们称赞她们“英雄志，民族魂”，“最好地表现了经历长期曲折的中国人重新振兴中华的精神”。汹涌澎湃的“体育热”，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体育工作者更加奋发图强，攀登新的高峰。“体育热”带来了宣传热。各新闻单位体育稿件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首都和地方报纸有 28 家辟有体育专栏，专业的体育报刊有很大发展，《新体育》发行突破百万份，有声有色的宣传又促进了“体育热”。

（二）全国人民群众喜爱与崇拜体育明星

随着我国体育健儿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取得一个又一个优异成绩，全国人民关心体育、关注明星的热情逐步提高，全国人民心目中的体育明星逐渐显露，有的已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为此，在全国掀起“体育热”之际，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体育报》联合举办评选了首届全国“十佳”运动员的活动，进一步掀起了全国人民更加关注体育、关爱体育健儿的潮流。从 1979 年开始的一年一度的全国“十佳”运动员评选活动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党和国家领导人宋任穷、习仲勋、王任重和杨静仁等给予了高度关注，亲自为“十佳”运动员颁奖，习仲勋和宋任穷还分别题词“立志攀高峰，苦练创佳绩”和“发扬最佳精神，勇攀世界体育高峰”，祝贺和勉励运动员今后取得更大的胜利。

（三）体育竞赛活动逐步成为人民群众业余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媒介、通讯工具的现代化大大缩短了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各种体育书刊数量剧增，电视、收音机逐渐

普及，体育信息量不断增加，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为传播，因而体育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深入，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的社会物质条件和现代科学已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家庭所需的广播、电视等电器日趋普及，报纸、杂志对体育的宣传力度也与日俱增，为此，当时体育比赛的实况转播（或录播）和体育竞赛信息的报道为广大体育爱好者提供了方便。伴随体育运动对整个社会渗透的范围越来越广，了解体育竞赛活动的人越来越多，使得社会上大多数成员都不同程度地以不同方式卷入了体育这个领域。由此可见，体育竞赛已逐步成为人民群众业余文化活动的内容之一，这为全国“体育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四）体育健儿取得的优异成绩激发更多的人参与体育活动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已得到基本满足，随之而来的是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此时正值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重大比赛中捷报频传之时，这正好迎合了时代的需要。在那特殊的时期，人们不仅仅满足了解体育竞赛的信息要求，而且受其影响（尤其是广大青少年一代）不时地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去，亲身感受某一体育活动的乐趣，为此，参与各种体育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当时有报道说，在我国，体育也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许多地方出现了“八多”：关心体育的人多了，锻炼身体的人多了，观看体育比赛或电视转播的人多了，参与体育活动的家庭多了，参与各种体育知识测验和评选活动的人多了，兴建体育场的多了，宣传体育的多了，推荐体育人才的多了。人们对于我国体育健儿在重大国际比赛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可说是“举国倾城话体育，一分牵动十亿心”，如1981年我国女排获第3届世界杯冠军时，从全国寄来了3万多封热情洋溢的贺电贺信，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感情比较含蓄的东方民族来讲，所表现出来的激情是罕见

的。由于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重大比赛中取得一个又一个优异成绩，从而带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学生参与体育的热情，为全国“体育热”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二节　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金牌“零”的突破

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体育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大力推动下，于1979年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从而结束了自1958年被迫与国际奥委会中断正常关系长达21年的历史，同时也使我国体育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的恢复带动了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快速发展。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金牌总数名列第四，对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首次参加冬季奥运会

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后，于1980年2月首次参加了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办的第13届冬季奥运会，我国共派出28名男女运动员，参加了滑冰、滑雪、现代冬季两项等18个单项的比赛。首次参赛的我国男女选手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无一人进入前六名。

1984年2月，中国奥委会第二次派队出席在南斯拉夫历史名城萨拉热窝举行的第14届冬季奥运会，共派出男女运动员37人，参加了滑冰、滑雪和现代冬季两项的26个单项比赛。中国台北奥委会也派了14名运动员，参加了有舵雪橇、运动雪橇、现代冬季两项等项目的比赛。这是海峡两岸中国选手第一次同时参加奥运

会。中国运动员所获成绩虽比上届略有提高，但与世界水平仍有很大差距，无一人进入前六名，仅得团体总分5分，排在参赛国家的第23位。

二、全面备战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

1981年2月21日至3月4日，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体委主任会议。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遵循经济上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的方针，联系体育战线的实际，在总结1980年工作的基础上，安排了1981年工作，研究了加强优秀运动队伍建设、提高训练水平等问题。会议提出了要积极准备1984年第23届奥运会的议题。会议要求，继续调整优秀运动队伍，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全国项目布局以奥运会项目为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进一步调整本地区、本单位的项目设置。严格执行国家布局的要求，克服“大而全”和“小而全”的现象，突出重点，精干队伍。各地一般不再增加第5届全运会以外的项目。会议讨论了针对运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同意修订《优秀运动队工作条例》和《关于组建国家队的规定》。为在重大国际比赛中创造优异成绩，充分发挥地方和部门的积极性，确定成立足球、排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跳水、田径、体操、举重、射箭、射击、围棋、冰球14项长年集中训练的国家队。

为进一步规范优秀运动队建设，国家体委于1981年4月4日向全国颁布了《运动员守则》和《教练员守则》，并要求各地体委和运动队认真学习，积极宣传，切实执行。两个《守则》从思想政治、训练比赛、学习生活和道德风尚等方面，提出了运动员和教练员共同遵守的准则，对提高广大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运动技术水平，对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81年4月22日，国务院批转国家体委《关于省、市、自治

区体委主任会议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批示指出，近年来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较快，技术水平和其他许多方面有很大提高，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希望广大体育工作者要继续努力，勇攀世界体育高峰，创造优异成绩，为国争光。要认真做好参加 1982 年亚运会和 1984 年奥运会的各项准备工作。

国家体委为加强优秀运动队的建设，于 1981 年 6 月 20 日颁布了《优秀运动队试行工作条例》。该《条例》分训练、比赛、思想政治工作、文化教育、教练员、运动员、管理、医务监督及伤病防治、后勤保证、组织领导共 10 章 40 条。对优秀运动队的性质、主要任务、培养目标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要求运动队必须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科学的大运动量训练的原则；加强训练的计划性和科学性；正确对待比赛，把训练和比赛正确地结合起来，围绕主要比赛目标，合理安排运动队的竞赛活动，对不同性质的竞赛提出不同的要求；运动队必须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渗透到训练、比赛等各项工作中。

国家体委为进一步调动广大运动员训练的积极性，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于 1981 年 11 月 15 日颁布了《体育运动全国纪录审批制度》。制订该制度的目的是为鼓励运动员勤学苦练，不断地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创造全国纪录。

随着四化的进程，体育日益引起各级党政的重视。1981 年，党和政府给体育战线以高度评价和很大荣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两次观看体育电视节目后及时给国家体委鼓励和指示。赵紫阳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地把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列为社会主义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提出要“积极发展城乡体育运动，普遍增强人民体质，努力提高体育运动的技术水平”。女排夺得世界冠军，国务院发电祝贺，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乒乓球队、女排获得胜利，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参加了欢迎大会和到机场迎接。年底党和国家领导人又会见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工作者的代表，进行座谈，给以鼓励。很多省、自治区、直辖

市主要负责同志会见了创造优异成绩的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给予体育工作很大的支持。这些都充分说明党和国家对体育事业的重视和关怀，对体育寄予的期望更高了。

国家体委于1982年6月21—30日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体委主任汇报会议。会议强调，体育队伍不仅要攀登技术高峰，而且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李梦华主任在会议总结发言中明确提出："只有全面发展体育事业，才能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体育战线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体育队伍的共产主义思想、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谈到优秀运动队建设时，他提出"运动队的主要任务是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运动员必须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等要求。

在1983年2月22日至3月4日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讨论和制定了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和进行改革的措施与方案。会议确定了我国体育20世纪的奋斗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要普及城乡体育运动，运动技术水平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拥有现代化的体育设施，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成为世界体育强国之一；"在奥运会上名列前茅，大多数项目达到和接近世界水平"。会后，国家体委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同年10月28日，国务院下发通知，批转和原则同意这个《请示》报告，并指出：在本世纪内要成为世界体育强国，还需作出艰苦的努力，希望各级人民政府切实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并且强调，体育战线的全体同志要充分认识体育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要团结奋战，积极发展城乡体育活动；重点抓好学校体育工作，普遍提高人民体质，努力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

1983年3月2日，在国家体委举行的授奖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万里、余秋里、宋任穷、廖承志等出席并向获奖者颁奖。万里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话。他指出，我国从过去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成为亚洲体育强国，但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应争取在奥运会上为祖国赢得新的荣誉。

1984年1月4—11日，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了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主任会议。国家体委副主任徐寅生、路金栋、陈先、徐才分别就竞赛、国际体育活动、参加第23届奥运会、运动训练、计划财务工作及建设精神文明、清除精神污染等问题作了发言。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作总结发言，他在分析1983年体育大好形势的同时，着重指出要保持清醒头脑，看到存在的问题。他强调，1984年要认真贯彻国务院批转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的通知，结合各地情况安排好全年工作。

为全力做好参与国际比赛的各项准备工作，尤其是第23届奥运会的备战工作，我国各运动项目的国家队，按照上述会议精神和国家体委下发的有关文件精神，坚持“三从一大”科学训练原则和“两严”方针，积极开展科学训练，全力应对各项目的奥运会预赛的准备工作。各运动项目的国家队积极开展“向中国女排学习”活动，结合各自的实际，采取多种形式的训练与比赛，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通过各运动队的努力，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1984年5月17日中国奥委会执委会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委会在北京举行联席会议，宣布由353人（运动员225人，教练员50人）组成的中国参加第23届奥运会的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团长是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副团长是路金栋、陈先、李富荣。这是新中国首次全面参加奥运会。

中国第23届奥运会代表团成立后，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十分关心各运动队的备战情况。为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国家体委曾多次组织召开各类会议或活动，以强化和调整各参赛运动队和运动员的备战情绪。

1984年6月8日中国参加第23届奥运会代表团在北京召开动员大会，353名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大会。团长李梦华指出：奥运会是世界体育比赛的最高形式，是衡量一个国家体育水平的主要标志，新中国成立35年来的体育运动成就，要在第23届奥运会上集中地表现出来。

1984年7月3日，文化部、国家体委举行联欢晚会，热烈欢送中国参加第23届奥运会代表团。宋任穷、朱穆之、李梦华、荣高棠、钟师统等出席联欢晚会。

1984年7月7日，乌兰夫、万里、习仲勋、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倪志福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即将参加第23届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

1984年7月14日，为鼓励我国健儿迎接挑战，《体育报》刊登了人大副委员长荣毅仁"愿中华体育崛起于世界"的题词以及政协委员霍英东"为国争光"的题词。

在全面备战奥运会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民都十分关注我国体育健儿备战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的情况。期间，《体育报》等新闻媒体就我国运动员临战之前的训练、实力分析等进行了大量报道，为国内人民，也为参战将士提供详尽及时的信息，使举国上下沉浸在紧张、兴奋、期待、憧憬的浓烈气氛中。

80年代初，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优异成绩。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我国体育事业得到迅速恢复，成绩不断提高。1980年我国竞技体育选手13人1队15次打破和超过举重、射击、航空模型、航海模型、飞机跳伞等7项世界纪录和1人2队3次平射击、飞机跳伞3项世界纪录。在参加乒乓球、体操等世界杯比赛中，我国运动员获得3项冠军。

1981年我国在国际体育活动中打开了新局面，参加国际和亚洲体育组织增加到60个。我国竞技运动成绩大面积丰收，体育水平有了新的突破，涌现出一批蜚声国际的最佳运动员。全年共获25个世界冠军，是我国体育史上取得世界冠军最多的一年。还有10人11次打破和超过8项世界纪录，2人1队平3项世界纪录，在3个以上国家和地区参加的比赛中取得295枚金牌。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成绩最显著的一年，也是历史上少有的体育丰收年。主要表现在：一是优势项目扩大了优势。获得的世界冠军和所破世界纪录，均属原来的优势项目，包括乒乓球、女排、跳水、体操、

羽毛球、技巧、射击、航海模型、围棋。如乒乓球，20 年长盛不衰，在第 36 届世乒赛中一举囊括全部 7 项冠军，这在乒乓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女排顽强拼搏，夺得世界冠军，奏出了三大球打翻身仗的第一支凯歌。跳水健儿在世界杯赛中，4 个项目拿了 3 个冠军。二是一些后进项目有长足的进步，缩小了同世界水平的差距。田径从 B 组跃升到 A 组，有 3 人进入世界先进水平，11 次打破 7 项亚洲纪录，在重大国际比赛中夺得 36 枚金牌、18 枚银牌、6 枚铜牌。三是老将立新功，新手夺金牌。全年在国际比赛中被评为最佳运动员、教练员等各种荣誉奖的，共有 38 人两个队获 47 个荣誉称号。

1982 年我国体育健儿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新成就。共获得 13 个世界冠军，11 人 2 队 15 次打破和超过 11 项世界纪录，在 3 个以上国家和地区参加的比赛中夺得 415 枚金牌。除世界冠军数外，其他都超过了 1981 年，金牌数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多的一年，比上一年多 120 枚，世界纪录比上一年多 3 项。在我国参加世界比赛的 39 个运动项目中，已有女排、乒乓球、登山、羽毛球、体操、技巧、跳水、围棋、航空模型、举重、射箭、水球、垒球等十几个项目进入世界水平，航海模型、跳伞、射击、田径、击剑、国际象棋等项目的部分或个别单项也达到世界水平。

1982 年 11 月 19 日至 12 月 4 日，第 9 届亚运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在这次运动会上，我国体育健儿奋力夺得金牌总数第一，结束了日本称霸亚洲体坛 31 年的历史。这是我国体育运动在国际赛事上的历史性的突破和重大转折，显示了我国体育振兴的强大势头。从 1974 年我国体育健儿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起，经过短短 8 年，金牌翻了一番，即从第 7 届的 33 枚增加到第 9 届的 61 枚（注：若按第 7 届计入举重单项金牌，则为 67 枚）。在这届亚运会上囊括全部金牌的我国跳水队、赛艇队，赢得男女团体、男女单打冠军的羽毛球队和夺得男女全能冠亚军的体操队，都在印度引起了轰动。女篮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实现了“在祖国人民面前写历史”的豪

言。男子跳高选手朱建华成为1982年世界上跳得最高的人，被评为第9届亚运会最佳运动员。

我国体操队在第6届世界杯赛中，技惊国际体操界，李宁、童非一举夺得7枚金牌，李宁独享6枚，在世界体操比赛史上是空前的。这个队在1982年国际比赛中，共为祖国夺得115枚金牌，占全年各项国际比赛金牌总数的28%。

1983年我国各项运动成绩在1982年取得新的突破的基础上，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我国运动员共有11个项目夺得39个世界冠军，是有史以来获得世界冠军最多的一年。25人18次打破和超过13项世界纪录，1人1次破1项世界青年纪录，5人6次平4项世界纪录。打破全国纪录129项（其中田径15项、游泳18项、举重23项、速度滑冰4项、赛车场自行车3项、射箭9项、射击20项、飞机跳伞4项、滑翔1项、航空模型6项、摩托艇4项、航海模型3项、潜水19项），比前3年都有增加。除乒乓球、羽毛球、男子体操、跳水、技巧等项目继续在世界上保持优势外，新跨入世界冠军行列的有竞走、跳伞、航空模型、排球、射击、航海模型、棋类等项目。中国女篮在第9届世界锦标赛中首次跻身三强。男子体操队在第22届世界锦标赛中，战胜前两届冠军苏联队，首次登上团体冠军宝座，并赢得双杠、自由体操金牌。中国技巧队在第4届世界杯赛中夺得10枚金牌，是我国体育史上在一个比赛中获世界冠军最多的一次。男子跳高运动员朱建华在104天内两次刷新世界纪录，震惊国际体坛。外电评论说，这显示了中国人在体育运动方面的大跃进。

三、第23届奥运会上实现金牌“零”的突破

1984年7月28日至8月12日，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本届奥运会以苏联为首的19个国家和地区抵制或因故未派代表团参赛，中国派出了353人组成的代表团，其中运动员225

人、教练员50名。参加了除足球、曲棍球、拳击、马术、现代五项以外的篮球、排球、手球（女）、田径、体操、游泳等16个项目的比赛。这是中国在阔别奥运会32年之后第一次重返国际体育大家庭，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派出的规模最大的体育代表团。中国台湾遵照国际奥委会的有关决议，派出了67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田径、游泳、举重等项目的比赛（获举重和棒球表演赛铜牌各一枚），这是海峡两岸运动员首次在夏季奥运盛会中相逢。

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一共夺得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金牌数列14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4位。其中，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创造了历史，夺得中国历史上首枚奥运会金牌。中国体操运动员李宁在比赛中获得3枚金牌、2枚银牌、1枚铜牌，是本届奥运会上获得奖牌最多的运动员。中国女排经过顽强拼搏，以3：0战胜美国女排，夺得“三连冠”（1981年第3届世界杯冠军、1982年第9届世界排球锦标赛冠军）。中国运动员栾菊杰在女子花剑比赛中力克对手，获得该项目金牌。这也是亚洲运动员首次在奥运会上获得击剑项目金牌。

本届奥运会的正式比赛于7月29日举行。当天上午，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男子自选手枪慢射个人项目的比赛中，以566环的成绩一举夺取60发慢射金牌。这是本届奥运会的第一块金牌，也是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首次实现金牌“零”的突破。消息传出后，全国人民万众欢腾，海内外华人群情振奋。

自许海峰勇夺中国奥运第一金后，中国代表团势如破竹，连连取得好成绩。

7月29日，“黑马”曾国强在52公斤级举重比赛中，力克日本名将，荣获本届奥运会举重比赛的第一个冠军。

7月30日，吴数德战胜体重陡降的劣势，在举重56公斤级较量中，与对手斗智斗勇，一举夺魁，了却了多年的夙愿。

7月31日，神射手李玉伟承许海峰前日雄威，弹无虚发，将男子移动靶的金牌收入中国队账下。几个小时后，举坛老将陈伟强

披挂出战，略施巧计，战胜了罗马尼亚好手，夺取了举重 60 公斤级桂冠，为中国队锦上添花。

8 月 1 日，洛杉矶蒙特大学格斯顿举重馆再燃峰火，姚景远克服伤痛，鼓足勇气，奋力拼搏，摘取举重 67.5 公斤级金牌。至此，中国队在奥运会举重小级别比赛中，连下四城，轰动了国际体坛。

8 月 2 日，巾帼英雄吴小璇强忍伤痛，沉着应战，终于后来居上，成为中国第一位奥运会女冠军，并创造了女子小口径标准步枪三种姿势的奥运会纪录。

8 月 3 日，栾菊杰顶罩仗剑，杀出重围，最后连闯三关，打破了欧洲人对奥运会击剑冠军的垄断，成为第一个获得女子花剑冠军的亚洲人。

8 月 4 日，“体操王子”李宁以出神入化的动作、无懈可击的表现力，征服了热情的美国观众，一人独得男子体操单项决赛自由体操、鞍马和吊环 3 块金牌，并以 3 金 2 银 1 铜的佳绩成为本届奥运会夺得奖牌最多的运动员，被誉为“力量之塔”。“跳马王子”楼云亦不负众望，以独一无二的高难度动作，登上了跳马王座。

8 月 5 日，“东方燕子”马燕红如飞燕般穿梭在高、低杠之间，在人们如潮的掌声中，走上了女子体操高低杠冠军领奖台。

8 月 7 日，中国女排姑娘再展雄风，以勇不可当之势，直落 3 局，击败东道主美国队，成功夺冠。

8 月 10 日，“碧波仙子”周继红技压群芳，摘取了女子跳台跳水的金牌。

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 23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参加比赛的有 140 个国家和地区、7616 名运动员（其中女子 1719 人）。比赛共 21 个大项 221 个单项。本届比赛破 11 项（田径 1 项、游泳 10 项）、平 1 项（射击）世界纪录。由于苏联等十多个国家抵制，使个别项目的成绩受到影响。

第一次全面出征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这次历时半个月，有 140 个国家参加的奥运盛会中，共夺得金牌 15 枚、银牌 8

枚、铜牌9枚，以及14个第四名、9个第五名、7个第六名、8个第七名、8个第八名。金牌数仅次于美国、罗马尼亚、联邦德国世界体育强国，位居第四。五星红旗一次次升起，《义勇军进行曲》一遍遍奏响。中国成为第23届奥运会最耀眼的明星，受到国际奥委会和国际体坛的高度关注与赞赏。

射击运动员许海峰首夺奥运会第一枚金牌，实现了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后，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自为他颁奖。萨马兰奇主席指出：“这是中国体育史上最伟大的一天，我为能够亲自将这块金牌授给你们而感到荣幸。”中华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改变了人们对中国体育的认识，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洛杉矶奥运会成为中国体育新的里程碑。中国运动员在赛场内外表现出来的为国争光的崇高理想，胜不骄、败不馁，重友谊、守纪律，虚心学习、奋勇进取的良好风尚，也赢得了各国人士的热情赞扬。

8月14日，国务院给中国体育代表团发了贺电，祝贺“我健儿在本届奥运会上赢得了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这对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各条战线的广大群众都有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8月14日晚，宋任穷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首都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凯旋，给予他们莫大的荣誉和鼓励，表示了党和国家对我国健儿取得的伟大成就的高度评价。1984年8月19日，国家体委、中国奥委会、全国体总、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教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隆重集会，热烈欢迎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第23届奥运会胜利归来。国家体委副主任徐寅生致欢迎词，副主任徐才宣读国家体委关于表彰参加第23届奥运会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的决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分别宣读表彰在第23届奥运会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队、运动员的决定。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赠送锦旗。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的领导还向中国女排、中国男女体操队、中国女子篮球队和中国女子手球队赠送锦旗，颁发奖

状。

国家体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具体表彰了运动队和运动员：国家体委为24人颁发了体育运动荣誉奖，为46人颁发了体育运动一级奖章；共青团中央作出了授予中国女子排球队“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青年突击队标兵的称号，授予男子体操队、女子体操队、女子篮球队、女子手球队“全国新长征突击队”的称号，授予李宁、许海峰等18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的称号；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于8月18日作出决定，授予在第23届奥运会获得奖牌的张蓉芳、郎平等50名女运动员全国三八红旗手的称号和授予中国女子体操队、中国女子手球队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的称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8月19日作出决定，授予在第23届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以军功章，其中许海峰、曾国强、吴数德等24人为一等军功奖章，周培顺、赖润明、童非等9人为二等军功奖章，王义夫、黄世平、陈永妍等共37人为三等军功奖章。

继国家有关部门记功表彰之后，各有关省、市、自治区也分别对所属的参加第23届奥运会的运动员举行庆功表彰大会。

中国体育健儿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的杰出表现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中国体育事业的划时代事件。中国体育健儿在奥运赛场上的顽强拼搏精神和优异表现，受到了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的一致赞扬。中国代表团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一雪“东亚病夫”之耻，让海内外中国人扬眉吐气，大长中华民族的志气，也标志着中国竞技体育开始在国际赛场上崛起与腾飞。

第三章 体育体制改革的启动

第一节 体育改革的两个重要文件的下达

第23届奥运会后，面对新形势下全国人民对体育事业的需要和期待，尤其是为了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大背景对体育事业发展的新的要求，我国体育改革的任务开始紧迫起来。为了进一步推动体育工作的开展，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国家体委启动了第一次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我国的体育事业在管理体制、训练体制、竞赛体制、体育科技体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中共中央下达《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

我国体育健儿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取得辉煌成就后，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的士气，提高了体育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地位和影响。为了进一步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发布的第一个有关发展体育运动的重要文件。《通知》为新时期中国体育的发展指出了方向，对推动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出台的历史背景

洛杉矶奥运会前后，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我国的体育事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从而为中国体育下一步的改革与发展打下了基础。

1. 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实现体育工作重点转移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关怀体育事业，是中国体育运动飞速发展的关键。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 1979 年开始，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为体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开创了体育工作的新局面，为我国体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9 年 2 月 12 日至 2 月 28 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会议总议题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讨论体育战线如何转移工作重点，把注意力集中到高速度发展体育事业上来，努力攀登世界体育高峰，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围绕会议主题，确定了在“1979 年和 1980 年，国家体委和省一级体委要在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的方针，讨论修改了体育事业发展规划，加强了体育工作的目标意识。

各级政府和领导认真学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各级体委根据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实际情况，讨论和部署了各自体育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确定了“在调整中前进，在前进中调整”的工作方针，明确指出将工作重点和注意力由过去搞政治运动转移到提高体育业务、发展体育事业上来。上海市体委审时度势，遵照重点转移的精神进行了第 5 届全运会的筹备工作。

2. 以“侧重抓提高”为中心，在调整中发展体育事业

1981年2月21日至3月4日，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省、市、自治区体委主任会议。会议提出，体育事业要在调整中尽可能继续发展。体育战线的调整，总的原则是切实贯彻中央关于文教事业尽可能地继续发展的要求。应在调整中依据可能情况，逐步解决一些问题，以加强体育这个战线。在安排体育工作时，既要量力而行，又要积极设法广开门路，增收节支，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事业内部的调整工作必须认真搞好以下几个方面：继续调整优秀运动队；群众体育工作仍以学校体育为重点，积极加强对职工体育的领导，当前强调优先发展城市体育，同时兼顾农村体育；军事体育工作也必须贯彻调整方针；鼓励社会力量和群众自办体育。

全国各地的体育工作在积极调整中进行着大胆的改革和探索，保证了我国的体育事业在国民经济的调整中不断向前发展。

3. 确立“奥运模式”，实行全方位开放

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领导人在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正式宣布，经过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会通讯表决，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两票弃权批准了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同年10月25日名古屋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议。其主要内容是：根据“一个中国”的原则，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确认代表全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奥委会，正式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会址北京，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台湾地区的奥委会，正式名称为“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会址台北，不得使用原来的旗、歌和徽记，其新的会旗、会歌和会徽须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至此，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中国体育界经过长达21年的斗争，终于重新登上了国际体坛。

“奥运模式”的提出和确立，是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创造

性战略构想在体育领域的成功实践，为我国体育的对外开放创造了条件，为我国体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提供了机遇，是中国体育全面走向世界的新起点。

4. 启动体育体制改革，开创体育新局面

1979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面对新的形势，面临新的挑战，1980年1月7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会议对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体育工作进行了反思，总结了6个方面的基本经验教训，即要正确处理体育与政治、体育与经济、普及与提高、学习与创新等方面的关系，要充分运用竞赛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要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办体育。会议明确提出，进入80年代，提高我国运动技术水平的任务更紧迫了，体育战线必须认真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统筹安排的基础上，突出重点，调整好项目的重点布局，集中力量把奥运会和有重大国际比赛的若干项目搞上去。按照全国一盘棋，有利于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精神，组成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运动队。改革、完善训练体制。这次体工会为80年代的体育改革和发展，勾画出了基本思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1981年的全国体委主任会议，就“搞好体育体制改革的调查研究和试点”的问题进行了讨论。1983年2月22日至3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对社会力量办体育、竞赛体制改革和训练体制改革提出了建议。会后，国家体委在反复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于10月21日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进一步强调“体育战线改革势在必行，必须抓紧，积极进行。改革应当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办体育的积极性，有利于推动体育的普及和攀登世界体育高峰，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进一步搞活政策，走宽路子，讲求效益，提高效率”。文件还具体提出了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改

革的四条措施：发动社会力量办体育应有新的较大突破；竞赛改革；训练体制改革；对武术进行挖掘整理，继承发展。

5. 正视成就与问题，解放思想，锐意改革

1984年，是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赢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一共获得了15枚金牌、8枚银牌、9枚铜牌，金牌总数名列第四，实现了中国在奥运会上金牌数“零”的突破。中国运动员的出色表现，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增长了民族志气，激发了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忱，不仅赢得了国际体育界的广泛赞扬，而且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体育热”。

透过“体育热”，我国体育工作者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体育运动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与体育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距，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矛盾表现得日益突出，如：社会对体育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国家投入不足的矛盾，群众体育的普及与竞技体育的提高之间的矛盾，过于集中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的矛盾，我国体育的科技含量低与国际赛场的要求高之间的矛盾，等等。面对差距、矛盾和问题，要想在世界体坛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生存与发展，只有解放思想，走改革之路。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党和政府对体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1984年10月5日，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这标志着我国体育进入了改革与发展的新阶段。

（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的基本内容

《通知》高度评价了体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和成就，透彻分析了体育战线的形势、任务，对体育运动的方针、政

策、措施都作了十分重要的指示，要求全党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包括思想上重视、财力物力上支持，以及健全组织机构；对体育界也提出了“锐意改革，勇于进取，不断作出新贡献”的要求。《通知》确定了“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体育强国，以增强全民族的体质，强国强民”的奋斗目标，这对全面指导体育工作、保证体育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通知》共分为6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35年来体育事业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概要的总结。35年来，我国体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已初步打开了体育运动的新局面。群众体育活动广泛开展，有效地增强了人民体质，部分运动项目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在第23届奥运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它标志着我国已开始全面登上世界体育舞台，踏上了建设体育强国的新里程。

第二部分，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分析。目前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了尽快地缩小这个差距，必须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积极发展城乡体育活动，重点抓好学校体育，从少年儿童抓起。积极开展业余体育训练。要完善多渠道、多层次的体育人才梯队建设，改革训练和竞赛体制，积极发展体育科研和教育事业。搞好项目的战略布局，集中力量发展优势项目，大力加强田径、游泳等薄弱环节，把那些短期内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项目抓上去，争取在今后的重大国际比赛中，夺取更优异的成绩。

第三部分，对运动员和教练员队伍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建设一支又红又专、有勇有谋的运动员和教练员队伍。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勤学苦练基本功，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对作出优异成绩的运动员、教练员等，要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其中有特殊贡献的，应予重奖。要妥善安排退役的优秀运动员，给予他们进体育院校、师范院校体育系科和其他专业学校深

造的机会，将他们培养成合格的体育教师、教练员、科研人员和体育干部等。对于转业到其他行业工作的有贡献的老运动员、老教练员，有关方面应关心解决他们的困难。

第四部分，对体育事业经费和基建投资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了保证体育事业的大发展，必须逐步增加体育事业经费和基建投资，纳入各级政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必须增加体育设施的数量，提高质量。必须坚决纠正占用体育场地的现象。各地一定要认真落实国家对体育场地建设的要求和城市规划关于运动场地面积的定额指标。体育场馆要布局合理，避免过分集中。要增加群众活动的体育场所，重点增加学校体育设施。体育场馆要改善管理，提高使用率，既要成为开展群体活动和培训体育人才的基地，又要讲究经济效益，积极创造条件实行多种经营，逐步转变为企业、半企业性质的单位。

第五部分，对体育宣传工作提出了导向性的要求。要大力宣传体育对建设两个文明的积极作用，大力普及体育知识，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要加强对运动队和观众的文明礼貌教育，正确对待胜负。在参加各项国际体育活动和进行新闻报道时，要时刻注意考虑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

第六部分，对体育工作的领导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通过整党，加强各级体委领导班子的建设，调整好各级体委的领导班子，选拔一批年轻、有创见、有事业心的干部到各级体委领导岗位上来；健全体育机构，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切实发挥体委对体育事业的领导、协调、监督作用。各级体委都应立足本地区，面向全世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研究制订体育发展战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要加强体育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尤其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体育训练和比赛的全过程。

（三）《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产生的巨大影响与作用

《通知》为体育行政部门指明了工作方向。1984 年 11 月 9 日，国家体委发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的意见。“意见”要求各级体委立即组织学习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深入传达、学习和领会中央通知精神，充分发动群众分析本地区的体育形势，制定出贯彻执行中央通知的具体计划和措施。同时，要求各级体委把落实中央《通知》同贯彻执行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结合起来，认真研究体育战线改革的形势和任务，加快体育改革步伐，使体育工作既有声有色，又扎扎实实地向新的广度、深度和高度发展。“意见”还清醒地认识到放手发动全社会办体育，是当前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首要问题，因此，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抓好体育社会化这一环节，实行国家、社会团体、个人三方共同办体育的模式。

《通知》引起了全国各地各级党委、政府的广泛重视，他们纷纷把体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例如，1984 年 8 月，湖南省委、省政府主持召开了全省体育工作会议，认真学习《通知》，省委主要领导到会讲话，号召全省体育系统积极改革，为振兴湖南体育作贡献，对湖南体育改革进行再动员。再如，为贯彻落实中央《通知》精神，贵州省委、省政府于 1984 年 12 月 24 日至 27 日在贵阳召开了包括省、地、县三级党政分管体育工作的领导，体育、教育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部分体育教师和厂矿企业代表共 400 人的大型全省体育工作会议，共商振兴贵州体育的大计。会后，以《贵州省体育工作会议纪要》作为中共贵州省委文件印发全省，在政策上保证了《通知》的贯彻执行。又如，1985 年安徽省政府主持召开了省体工会，这是 60 年代以来第一次以省政府名义召开的省体工会。会议主要是贯彻《通知》精神，研究讨论安徽体育改革的办法和措施。

《通知》推动了体育的普及和社会化进程。山东省、广西、浙江和湖南等地在《通知》下达后就积极提倡开展体育活动日、体育活动月和农民体育节等活动，并规定了本地区的体育节（体育日或体育月），以推动群众体育的开展。1984年11月20日至28日，国家体委在湖南省桃源县召开了全国县体委主任会议，贯彻《通知》精神，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创体育先进县的活动，将我国农村体育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通知》下达后，各级工会、体委和有关方面努力探索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职工体育发展的道路，我国职工体育工作在面向基层、面向职工群众和讲求实际效果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职工体育人口不断扩大。

《通知》强化了竞技体育优先的战略。《通知》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体育强国”的目标，强化了业已实施的竞技体育优先的战略，促进了竞技体育的进一步发展，为举国体制的进一步实施和完善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在竞赛项目布局和培养运动人才方面，不少地方提出要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和强调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强调竞争、择优选拔等。

二、《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的制订

1986年4月15日，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精神，推动我国体育体制改革，国家体委制定并下发了《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

（一）《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出台的历史背景

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为体育体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全面改革，经济上稳定发展，政治上安定团结，为更快地发展体育运动提供了有利条

件。“六五”期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工作发展最迅速、成绩最突出的时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开创了新局面，踏上了建设体育强国的新里程。在1981年4月1日的《国家体委关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主任会议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已经明确指出：“搞好体育体制改革的调查研究和试点。改革要服从于调整，与调整结合。”

全国各行业的体制改革促使体育体制改革成为大势所趋。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转发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的通知》等一系列有关改革的决定，使全国各行业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各项文化体制改革迈出了新的步伐。体制改革，是关系到各行各业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体育战线的一项首要任务。

体育运动领域自身暴露的问题亟待体育体制的改革。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传统的体育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和体育自身发展的需要，阻碍了体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想束缚，办体育的路子不宽、不活，体育领导体制和训练、竞赛体制等方面存在一些弊端，加之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体育社会化和科学化的进程。要实现本世纪内建成体育强国的目标，必须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中提出的各项要求，坚持改革，存利去弊，继续开拓具有中国特色、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

在社会改革环境的影响下，在体育自身发展的需求下，国家体委在总结体育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和酝酿讨论，于1986年4月15日，下发了《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

（二）《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的基本内容

《决定（草案）》提出了10个方面53条具体的改革措施。各方面的主要内容如下：

1. 改善体育领导体制，切实发挥体委对体育事业的领导、协调和监督作用。

2. 建立科学的训练体制，形成多形式、多渠道和多层次的运动人才梯队。

3. 继续改革竞赛体制，逐步做到社会化、多样化和制度化。

4. 发挥各方面积极性，把群众体育推向新的广度和深度。

5. 大力繁荣民族传统体育，逐步实现科学化和规范化。

6. 逐步实现体育科学化，把体育科研与体育运动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7. 改革体育教育体制，实行多层次、多规格和多形式办学。

8. 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改进体育宣传。

9. 进一步改善物质保证，继续改进奖励制度。

10. 对外，体育活动实行更灵活的开放政策，适应体育全面走向世界的新形势。

（三）《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产生的影响

《决定（草案）》总结了“六五”期间我国体育事业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系统地分析了体育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了以社会化为突破口、以竞赛和训练改革为重点的改革思路，确立了“以革命化为灵魂，以社会化和科学化为两翼，实现体育腾飞”的战略指导思想。其中最核心的是改善领导管理体制、训练和竞赛体制改革以及体育科技体制改革。

《决定（草案）》从理论上理顺了体委抓高水平竞技与抓群众

体育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体委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使之能够集中精力、财力和物力去搞运动水平的提高。例如：《决定（草案）》的公布对河南省体委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体育观念的转变和体育体制改革的课题摆上了省体委领导机构的议事日程。从80年代中期开始，河南省体育系统在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转变了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僵化保守观念，增强了竞争意识，增加了紧迫感和危机感，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了体育事业的发展。

《决定（草案）》的下发，使我国体育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特别是在运动训练、竞赛和体育场馆建设等方面更加突出。截至1992年，我国的体育场馆由新中国成立前近5000个发展到53万个；总面积由不到500万平方米发展到6亿多平方米，其中五分之二是改革开放这十几年内建成的，速度是改革开放前的两倍。在群众体育方面，已有7亿人次达到体育锻炼标准，90%是改革开放后达标的[1]。

三、20世纪80年代体育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与基本思路

（一）20世纪80年代体育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决定（草案）》中明确指出了体育体制改革总的指导思想是：遵循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从全局出发，调动各方面办体育的积极性，推动体育社会化和科学化，创造把我国建设成体育强国的各种条件，促进体育的全面发展和提高，使体育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体育的社会化改革主要是重新强调在体委部门的统一领导、协调和监督下，充分发挥各行各业各部门办体育和管体育的积极性，

---

[1] 谷世权. 中国体育史.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371.

在体制上保证能够实现“以青少年为重点的全民健身战略和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战略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

实践证明，针对我国过分集中于国家办体育的状况，提出的体育社会化的方针，是改革我国体育体制的必由之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尚不发达，发展体育不能仅靠国家而必须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客观实际。它不仅是体育改革的一项根本措施，也是体育发展的一个过程和追求的境界，与体育科学化同为建设体育强国的两翼。

（二）20 世纪 80 年代体育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决定（草案）》中对体育体制改革提出的基本思路主要有：

在体育领导体制方面，实现由国家包办体育到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转变，实现体育的科学化和社会化。

在训练体制方面，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落实奥运战略，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和行业、厂矿企业、大专院校设立高水平运动队。

在竞赛体制方面，强调竞赛要向社会化、多样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要继续缩短战线和突出重点，调整运动项目布局，突出奥运会项目和单项金牌数较多的运动项目。

在群众体育方面，要有利于推动各部门、各行业和群众团体认真搞好系统的体育工作，使群众体育进一步社会化。要在开展近代体育项目的同时，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体育项目最丰富多彩的国家之一。

在体育科技体制改革方面，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实现由注重学科发展向体育科研与训练结合的转变，加强对体育科技政策和规划的统一管理。

在体育教育体制改革方面，要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执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适当调整体育院校的培养任务和专业科类，改善体育队伍的知识结构，培养更多符合体育事业发展

需要的专门人才。

在思想政治工作和体育宣传方面，重点抓好优秀运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体育宣传工作，讲究辩证法，克服片面性，注意宣传的社会效果，反对只以成败论英雄。

在奖励制度方面，实行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奖励制度，坚持对有特殊贡献的给予重奖。

在体育场馆管理模式方面，强调体育场馆要面向群众和面向社会，提高使用效率，讲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优先保证发展体育事业的前提下，实行多种经营，由行政管理型向经营管理型过渡，逐步实现企业化、半企业化。

体育活动的对外方面，实行更灵活的开放政策，发展多样形式和多种渠道的对外交往。总的要求是："坚决执行我国的对外方针和政策，为进一步开创我国体育工作的新局面，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服务。"

第二节　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

一、20世纪80年代体育改革的思路与特点

（一）20世纪80年代体育改革的思路

80年代的体育改革，在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50年代设想的体育工作的社会分工与60年代初步形成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了以竞技体育为先导，带动体育事业全面发展的战略思想，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思想指导下，体育改革的重点放在克服过分集中国家办体育，特别是集中于体育系统办体育的弊端，围绕加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任务，着重抓了训练体制和竞赛体制

的改革，以社会化为导向，重新强调了体育工作的社会分工，旨在重新恢复在体委的统一领导下，国家办、部门办和单位办三结合的体育发展体制，以减轻国家体委既要抓竞技体育又要抓群众体育的独家经营的工作压力。这种基本思路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体育发展模式的完善与发展，目的是建立一个适应新形势要求的体育发展新模式，推动体育的社会化和科学化，促进体育全面发展和提高。

1989 年 4 月 15 日至 20 日，全国体委主任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深化体育改革。伍绍祖主任在《深化改革，发展体育，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服务》的报告中提出了深化体育改革的基本思路：体委转变职能，实行（行）政、事（业）分开；项目分类和多模式管理；竞赛分层次管理；促进体育和教育两个体系的进一步结合；加快体育社会化进程；加快体育与科技的结合，逐步实现体育科学化；加强优秀运动队建设；推动人才交流；积极组织创收，发展体育产业；建立体育工作综合评价体系；加速体育立法；加强和改革思想政治工作。

（二）20 世纪 80 年代体育改革的特点

从 1979 年到 1983 年，是我国体育改革的初始阶段或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改革调整为以竞技体育为重点，是对计划经济体育体制的强化。这一阶段改革的特点是，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照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结合体育工作的实际，提出了体育改革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在领导管理体制、训练和竞赛体制等方面形成了改革的基本思路。虽然这一时期的体育改革还没有提到体制改革的高度，但已开始认识到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可以说，这一阶段提出的体育改革的总体设想，为下一阶段的体育改革做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从 1984 年到 1992 年是我国体育改革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进行的体育改革实际上是对计划经济体育体制的一种进一步完善，即

试图在不触动原有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情况下，对其不足之处进行一些补充和改善。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特点是，体育改革被提到了体制改革的高度，力图改变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的状况，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的新格局。这一阶段体育改革在体育事业的各个领域全面推进，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训练竞赛改革成效更为明显，在某些方面有突破性进展。

（三）转换机制，深化体育体制改革

1988 年 12 月 20 日至 25 日，国家体委委务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深化体育体制改革。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张彩珍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深化体育改革，主要是要建立适应建设体育强国要求的体制。

通常认为，80 年代的体育改革基本上还是属于浅层次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举国体制和运行机制，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这种体育体制不适应时代要求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突出，如关系不顺、机制不活、经费不足、效益不好、人才流动不畅、体育事业发展的活力和后劲不足等。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1992 年，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的影响下，一轮新的更加深刻和更加广泛的体育改革开始了。

1992 年 11 月 11 日至 17 日，在广东省中山市召开了以深化体育改革为主题的全国体委主任座谈会。“中山会议”是个“换脑筋”的会议，在体育战线的改革发展过程中，有着转折性和历史性的意义。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其中指出：“体育改革的关键是体制改革，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机制的转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要求体育从原来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体育体制逐步转移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发展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自我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的轨

道上来。”而在改革和发展的具体目标上，以多年的体育实践经验为依据，明确提出了“五化”和“五转变”的思想（《体育法》发布后改为“六化”和“六转变”）。“五化”，即生活化、普遍化、科学化、社会化、产业化；与此相适应的“五转变”，即个人体育活动费用从福利型向消费型的转变、社会的体育活动从体育部门一家办向大家办转变、体育活动从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体育的组织形式从行政型向社会型转变、体育设施从事业型向经营型的转变。在谈到深化体育改革的进程时，伍绍祖指出，深化体育改革要坚持“宏观管理，微观放活，保住重点，放开一般”的指导思想，遵循“总体规划，因地制宜，分步实施”的原则，力争用两三年的时间完成体育体制的转轨变型工作，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育新体制。

会议对《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为1993年《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的出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体委管理体制的改革

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是各级政府主管体育的职能部门。国家体委作为行政管理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根据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统一领导，协调和监督全国的体育工作，指导各类群众性的体育团体的工作和支持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活动，发挥宏观管理职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州、市各级政府体委，负责领导本行政区域的体育事业。

（一）转变职能，简政放权

为了保证实现“灵活、高效办事机构”的改革目标，为落实1980年提出的为加快提高我国运动技术水平的各项措施，1982年国家体委就对其内部机构作了较大改革。调整了运动项目管理的内

设机构，将原运动司、球类司、军体司，分解为一、二、三、四项目管理司，对相关项目实施管理。1986年国家体委提出改善体育领导体制，切实发挥体委对体育事业的领导、协调和监督作用，要求各级体委改善宏观指导，树立“领导就是服务”的观念。理顺、协调与各有关方面、各体育团体的关系，转变作风，提高效率。于是，1988年又增设五司和训练竞赛综合司（负责综合管理全国优秀运动队的发展和训练竞赛工作），从组织上加强了对竞技体育的领导，加大了对竞技体育工作的力度。

（二）机构改革

1988年，国务院进行了机构改革，根据1988年8月10日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三定”方案》，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是国务院主管体育工作的职能部门，其主要任务是根据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统一领导、协调、监督和发展全国的体育工作，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建设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服务。《方案》的具体内容分主要职责和内部机构两部分。《方案》规定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为：

研究和拟订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制订全国体育事业的中期计划、长远规划，并组织实施。

指导和检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工作，领导和管理直属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体育院校。

指导和配合各部门、各行业积极开展体育活动；协同教育、文化、经济部门和工会、共青团、解放军做好学校、厂矿、企业、农村、机关和部队的体育工作；协同卫生部门发展保健体育和医疗体育、组织体育运动的医务监督；指导和协同有关部门做好体育场地的规划、建造和体育器材的生产供应。

制订有关体育运动的法规和制度，研究和推动体育系统的体制改革，授予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荣誉称号和荣誉奖章。

制订全国性的体育的竞赛计划；组织全国性运动竞赛，审定各

项竞赛规则；审批各项运动的全国纪录。

统一规划全国运动项目的布局；指导优秀运动队伍的建设和业余训练工作。

开展国际体育交流；组织参加和举办国际体育竞赛。

组织和指导体育宣传出版、科学研究工作，培训体育干部和专业人才；负责国家体委直属单位的计划财务和劳动工资工作。

协同地方党委和政府加强体育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

指导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各运动协会和体育协会、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中国体育记者协会等群众团体的工作；支持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活动。

《方案》按照上述任务和职责，本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从机构配置的科学性、整体性出发，确定国家体委设 14 个职能部门，包括办公厅、群众体育司、训练竞赛一司、训练竞赛二司、训练竞赛三司、训练竞赛四司、训练竞赛五司、训练竞赛综合司、国际联络司、科教司、宣传司、计划司、人事司、政策研究司；机关定编为 470 人；党的机构设国家体委直属机关党委；老干部局作为老干部服务机构，机关服务局作为附属事业单位，审计局、监察局作为国家审计署和国家监察部的派驻机构。

第三节　竞技运动体制改革的启动

一、竞技运动管理体制的改革

（一）竞技运动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

80 年代，竞技运动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打破长期沿袭下来的“大锅饭”“铁饭碗”和平均主义等弊端，扭转只讲投入、不讲产出效益的旧的评价方式，建立起新的效益评价体系，调动运动

员、教练员训练和竞赛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这一时期竞技运动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在新的时期、新的形势与任务下，重新整合和强化举国体制。

1979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国家体委和省一级体委要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

1980年3月28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加速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对以后体育工作的重点作了如下部署：第一，调整运动项目的重点布局，集中力量把奥运会和有重大国际比赛的项目搞上去；第二，为了把准备全运会与奥运会的任务一致起来，决定1983年9月举行的第5届全运会中的绝大多数项目为奥运会项目；第三，改革完善训练体制，调整好一、二、三线队伍。按照“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要求，使项目、选材和训练各方面层层衔接。同时提出继续改革竞赛制度，充分发挥各级各类竞赛对体育运动的推动作用，等等。

经过这些调整，初步形成了以发展竞技体育为先导，带动体育事业全面发展的战略布局，从而使我国原有的“举国体制”在目标上更明确，在管理上更严谨，在布局上更合理，在训练竞赛上更系统。

（二）竞技运动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1. 实行运动队目标管理责任制，鼓励竞争，优胜劣汰

在1986年《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中规定了对教练员实行聘任制后，国家队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运动队基本上都实行了目标管理责任制，教练员的积极性和潜力得到了充分发挥，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有水平的中青年教练员通过竞争逐步走上了主要业务岗位，一些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教练员遭到了无情的淘汰。

2. 改革奖励制度，实行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对贡献突出者实行“重奖”

体育界率先在全国打破平均主义，对作出重大贡献的运动员、教练员实行“重奖”。1981年，国家体委在《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奖励试行办法》中提出，在运动队中根据运动员、教练员不同成绩拉开工资、奖金档次，鼓励运动员刻苦训练，争取好成绩。《办法》出台后，首先对在第23届奥运会上获得奖牌的运动员、教练员分别给予重奖，金牌获得者最高一次性奖励1万元，这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1986年，国家体委下发的《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中强调，进一步改善物质保证，继续改进奖励制度。实行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奖励制度，坚持对有特殊贡献的给予重奖。因此，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和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奖金数额再次提升。重奖有效地调动了运动员、教练员的训练竞赛的积极性。

3. 加强人才管理，做到人才合理流动

我国的体育人才受经济条件以及各方面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分布不均衡，加上我国体育人才的流动长期局限于一个地区内，导致有的地区人才富裕，而有的地区人才匮乏。为了更好地开发本地区的体育人才，进一步突破地区界限，1987年七八月间，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体育人才交流及教练员队伍建设会议。会上，国家体委负责人明确提出人才交流的指导思想是从全局出发，突出奥运会战略，为国家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和出好人才服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体育人才交流，互通有无，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是建设世界体育强国的需要，是我国体育战线进行改革的一项内容，势在必行。

二、竞赛制度的改革

（一）竞赛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进入 80 年代，以奥运会为中心的现代竞技体育迅猛发展，我国的体育运动受到猛烈冲击，要提高我国的竞技运动水平，就必须改革竞赛制度。竞赛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调动各方面办体育的积极性，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造就大批优秀运动人才，推动体育运动的普及与提高。

国家体委从 80 年代初开始，对原有竞赛制度进行了政革，形成了新的竞赛制度。1983 年 2 月，在《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开创改革新局面的请示》中，提出要对竞赛进行改革，“要使国内比赛与重大国际比赛衔接好，国内各级各类比赛衔接好，优秀运动队比赛与体校比赛衔接好，逐步做到社会化、多样化、制度化。”在 1985 年 4 月召开的全国体委主任会议上明确指出，竞赛制度改革，一是全国竞赛实行分级管理，形式多样，逐步做到制度化、多样化、社会化；二是竞赛地点和经费试行招标和计划分配相结合的办法；三是集体项目改变为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冠军队参加全国比赛；四是 12 岁以下少年儿童原则上不安排全国比赛。

（二）竞赛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

1. 健全竞赛制度，促进竞赛管理制度化

竞赛是检验训练成果的主要手段。竞赛制度应符合体育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了加强竞赛的管理，提高效益，确保竞赛顺利进行，80 年代，国家体委印发了一系列有关竞赛管理的法规性文件，如《全国体育竞赛赛区工作条例》《仲裁委员会条例》和《全国体育竞赛开展“精神文明奖”评选活动办法的要求》等，这些竞赛规章制度的完善，使我国的竞赛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

依，并逐步达到了制度化。

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制度化、竞赛安排合理化。全运会、青少年运动会、少数民族运动会、城市运动会每4年一次，按有利于奥运会上出成绩的原则，调整召开全运会、青少年运动会的时间顺序。为了调动地方办体育的积极性，促进各地体育事业的发展和体育社会化的进程，全国性运动会的竞赛地点安排在全国不同地市进行。1983年，在上海举办的第5届全运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首都以外的城市举行，体现了竞赛改革的成果，是以后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轮流举办全运会的一个良好的开端。经过竞赛制度的改革，各级各类竞赛逐步走向了制度化。

2. 提高管理水平，实现竞赛管理科学化

在竞赛的组织管理方面，随着我国举办国际、国内竞赛日益增多，要求不断提高管理水平。80年代体育竞赛的组织管理已普遍运用现代管理和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采用网络技术进行优化管理。一些大型的运动竞赛都能本着少花钱、多办事和运动竞赛是以出成绩、出人才为主要目的与标志的原则去工作，合理安排竞赛的时间日程、场地器材、食宿和交通等，使竞赛达到较佳的经济效益，竞赛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3. 重点扶持奥运会项目，改革计分办法

全运会以奥运会项目为重点，兼顾一般。青少年运动会只进行奥运会项目比赛。本着鼓励创造新技术、新成绩和出人才的原则，对计分办法作相应的改革，调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行业体协向奥运会项目倾斜。

4. 理顺赛制，实行分级比赛

以奥运战略为目标，将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组合成“一条龙”，在项目设置、参加对象、计分办法、时间安排等方面，进行统筹考

虑，侧重目标、任务相互衔接，互为补充。

根据比赛项目的特点，制订不同的比赛办法。全国各项比赛不分专业、业余，实行按水平和年龄组分级比赛。全国性比赛按运动技术水平分级，青少年比赛按年龄分组。采取分层分级比赛的赛制，有利于加速后备人才的成长，保证全国比赛的高水平，真正达到“练兵”的目的。

5. 实行分类管理与分类指导，职责明晰

为了分清职责，有利于竞赛的组织管理工作，改变了过去体委行政部门“一把抓”的现象，对体育竞赛进行分类管理、分类指导。

(1) 分类管理

国家体委将全国性比赛分为3类，由国家体委进行宏观调控。

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包括全运会、城运会、青少年运动会，由国家体委直接管理。全国单项比赛，包括锦标赛、冠军赛、杯赛等，主要由各单项协会管理。各系统、各行业的全国性运动会，由各主管部门和行业体协管理。

(2) 分类指导

高水平运动队是竞技体育的主力军，为了达到真正练兵的目的，在规程的制订、特殊规则的执行、日程的安排、场地器材的要求等方面都尽量使高水平运动员竞赛国际化或接近国际比赛的条件和气氛。在竞赛规程的制订上，进一步强化了竞争机制，杜绝了一些由于规程不完善而出现的“君子协定”和“争输球”等现象，促进了运动水平的提高。

各类青少年、业余体校的竞赛，在80年代主要立足于出人才，改革的重点是按年龄分级比赛，强调身体素质的分龄比例，淡化金牌的观念，不强调他们过早出成绩。

学校体育竞赛，除发现和培养优秀体育人才外，主要是通过体育活动达到增强学生体质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普通学校开展体育竞赛的目的是使学生热爱一两个运动项目，养成良好的锻炼

习惯，为终身体育的实施奠定运动基础。

社会体育竞赛，主要根据不同对象提出不同任务，采用不同的竞赛形式，做到因人、因时、因地制宜。

6. 围绕正式赛事，提倡开展形式多样的赛事活动

各项目的正式锦标赛或冠军赛，每年一次。在有利于训练和比赛的前提下，提倡举办邀请赛、集训比赛、俱乐部杯赛和各种形式的补助性、赞助性比赛，作为全国正式竞赛的补充。

7. 竞赛参与主体的社会化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办”和“自办”的比重加大，使竞赛参与主体的范围明显增大。竞赛参与主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还扩大了参与竞赛管理的范围，做到了统筹规划，统一政策，协同运作，动员群众，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8. 计划与招标相结合，推动竞赛社会化

全国性竞赛进行招标是竞赛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是使竞赛走向法制化的重要步骤。于1986年4月下发的《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在1985年全国体委主任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强调指出：“竞赛地点和经费继续实行计划分配与招标相结合的办法，以推动竞赛社会化，调节供求矛盾，促使全国竞赛同地方的体育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就打破了过去长期存在的竞赛全部靠计划安排的方式，调动了地方争办全国性比赛的积极性，同时也减轻了国家的压力。为了推动体育竞赛社会化，充分利用各地的有利条件，调动社会各方面办竞赛的积极性，有效地提高竞赛数量和质量，推动群众体育运动的发展，促进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从1986年开始，国家体委在1985年竞赛招标试点的基础上，全年体育竞赛全部实行招标。

9. 竞赛资金来源的社会化

进入 80 年代，我国的体育竞赛日益表现出资金密集的特点，竞赛次数和规模的扩大要求经费的投入猛增。国家财政的实际供给能力有限，同时企业也希望通过体育这种媒介，将商品渗透到社会和家庭，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因此，竞赛经费来源的社会化成为体育界和企业共同得益的一件新生事物。在 80 年代，除充分调动国家、社会和参赛者的积极性，合理负担竞赛经费和发挥竞赛宣传功能与感召力，引导项目（项群）实体，创造经济价值外，还鼓励竞赛与企业挂钩，成立体育竞赛与企业联合体，提倡体育竞赛与经营活动联合进行，形成了“内引外联”和“体育搭台，经贸唱戏”的社会化特色。

10. 发挥体育场馆的作用，加强裁判员队伍建设

试行由体育场馆承担竞赛的全部或大部分组织工作任务。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全国绝大多数体育场馆基本实行了承包制，通过经营和创收增加活动经费，减少国家负担，为加快体育从事业型向经营型的转变，实现体育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建立专职和兼职相结合的裁判员队伍，各场馆创造条件设专职裁判员，同时在体育系统中大量培养业余裁判员。

三、训练体制的改革

（一）训练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80 年代，我国训练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落实奥运战略，解决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改变过分集中省以上体委办优秀运动队的状况，把训练的路子拓宽，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和行业、厂矿、企业、大专院校设立高水平运动队。

（二）训练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

1. 拓宽训练渠道，发动社会办体育

训练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拓宽体育人才的培养渠道，发动社会有条件的行业、企业、学校和社会团体等办优秀运动队或高水平体育俱乐部。在国家体委下发的《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中明确提出："省优秀运动队应以个人项目（田径、游泳等）为主，集体项目逐步向城市、厂矿企业和大专院校过渡，使原来单一的省优秀运动队这一形式有所突破。"80年代，我国的优秀运动队管理和训练体制，在改变以往由体委独家操办这一单一渠道的模式上有所突破，逐步形成了行业、厂矿企业、学校和社会团体等多样式、多渠道和多层次的训练网络，不少企业以俱乐部的形式组建高水平运动队，并通过经济杠杆来经营管理运动队，培养优秀运动人才。

2. 搞好项目布局，落实奥运战略

1980年3月28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加速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调整好运动项目的重点布局，集中力量把奥运会和有重大国际比赛的若干项目搞上去"。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各级体委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抓了我国优势项目和经过短期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项目。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的策略，保证了奥运会项目中田径、游泳等影响大、奖牌多的项目，为完成国家任务作出了贡献。同时，也调动了各布局单位的积极性，促进了各布局单位优势项目的发展，在全国逐渐形成了重点项目训练网络。但是，这种项目布局的做法，也导致了一些集体项目和非奥运会项目队伍锐减，成绩下滑。

3. 多种形式并存，加强国家队建设

这一措施包括3种形式：第一种是奥运会项目，一般都设长年

国家队，集中全国最优秀的运动员；第二种是临时集训的国家队；第三种是以全国冠军队为主组成的国家队。国家体委每年根据比赛成绩确定国家队队员名单，在地方队及其他一些单位训练的国家队员，均按规定享受国家队待遇。这种新的国家队的组建形式，发挥了国家与地方的各自优势，调动了积极性，形成了多条腿走路和在竞争中提高竞技水平的训练格局。

4. 抓好业余训练，建设后备人才梯队

大力加强和发展各种初级业余训练形式，是我国训练体制的基础。发展多形式、多渠道和多层次的业余训练，业余训练逐步向综合协调和专项管理相结合过渡，制订各项目统一的和符合科学要求的训练大纲，以加强专业训练与业余训练的衔接，更好地实现“一条龙”。在进一步完善业余体校训练体制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办校质量。从 80 年代中期始，在业余训练中对青少年实行有偿训练，并分初级层次、中级层次和优秀运动队 3 种。主要做法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体育系统在业余训练中对参加训练的青少年收取一定的培养费，达到一定水平的青少年可以享受减免费用的优待。这种形式既减轻了训练单位的负担，又激励了青少年参与业余训练的积极性，可以向运动项目实体化、职业化和俱乐部制等改革措施逐步靠拢，构筑起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的框架，使运动训练更加具有活力和后劲，为竞技训练的产业化发展打下基础。

5. 打破终身制，实行教练员竞聘上岗

为了适应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历史变革，国家体委提出了运动队以训练为中心，不断提高运动水平的工作方针，对各项目运动队逐步向主（总）教练负责制过渡。从国家队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业余体校和少体校，对各项目运动队的教练员逐步改变了过去从运动员中直接选拔的做法，引入竞争机制，采用多渠道和多形式

的任用方法。在实行推荐、考核与批准相结合的录用办法的同时，继续试行招聘制、协议制。主（总）教练负责制保证了主教练对队伍的训练比赛和思想政治工作等实施全面领导，使教练员有职、有权、有责，激发了教练员的主动性、责任感和创造性。提倡教练员交流，做到能上能下，鼓励优秀运动队的教练员下基层进行技术辅导，直接从业余训练中发现人才。

6. 加大科技投入，提高训练质量

1984年国家体委认真贯彻执行邓小平提出的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提出“体育振兴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体育科学技术要面向体育运动的发展”的方针，逐步实现体育科学化，把体育科研与体育运动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强调了科研一定要同训练结合，为训练和竞赛服务。

1985年，国家体委再次提出“以革命化为灵魂，社会化、科学化为两翼，实现体育腾飞”的体育发展战略方针，进一步强调科学化的重要作用。一批科研人员深入体育运动实践第一线，抓重点项目的科研攻关和科技服务，解决训练工作的难题。

第四节　群众体育与体育科研体制的改革

一、群众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

（一）群众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体育改革拉开序幕，群众体育的改革也随之开始。80年代，群众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适应体育运动全民性的特点，重新明确社会分工，充分发挥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体育体制的优越性，以有利于推动各部门、各企

业和群众团体认真搞好本系统的体育工作，形成一个由体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各行业具体负责的群众体育管理体制，使群众体育进一步社会化。

（二）群众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

1983年2月，《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中明确指出："发动社会力量办体育应有新的较大突破。体育是全民的活动，不能只靠体委办，必须依靠和发挥各有关部门和全社会的力量。"因此，只有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才能真正把群众体育推向新的广度和深度。

1. 大力倡导、积极扶持各部门、各行业以及集体、个人自办体育，包括自建活动场所、举办各类竞赛、开展运动训练、传授体育技术等。

2. 进一步开创学校体育和职工体育新局面。为了加强群众体育与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和乡村文化相结合，采取了政策性措施，鼓励、支持学校和厂矿企业办高水平运动队，使之逐步形成培养运动人才的基地，为攀登世界体育高峰作贡献，并适应学校、厂矿企业的国际体育交往需要。

3. 以乡镇为中心，积极地、有步骤地发展农村体育，首先抓好较为富裕的乡镇，争取出现更多的先进县。

4. 加强群众体育骨干和积极分子的培养，充分发挥他们的组织、指导作用。

5. 争取建立全国体育节，作为全民体育活动的节日。

6. 扩大群众体育组织结构中非体委系统的成分，加强群体工作中的协调与合作。

7. 开发行政拨款以外的经费来源。依靠各部门和社会力量集资兴办体育事业，建立体育基金等。体委系统不应只靠国家拨款，也要努力增收节支。

二、体育学院管理体制的调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体育学院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体育发展对各类体育专门人才的需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坚持改革开放，努力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体育教育体系的办学新路子。

（一）明确办学方向，建立“三结合”基地，实行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办学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体育合格人才，是80年代高等体育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体育学院办学的根本方向。80年代中期，体育学院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轨道上。可以说，80年代国家体委提出的把直属体育学院建成三结合基地，主要是基于体育体制改革的需要，解决竞技体育体系与体育教育体系的矛盾，解决体育系统所需各类体育专门人才的问题，解决直属体院直接培养高水平教练员、运动员的机制。

1979年3月，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大力提高教学质量，充分发挥体育学院在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中的作用的通知》，对体育学院的任务作了具体的要求。1980年5月22日至6月3日，国家体委在厦门召开了全国体育学院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工作经验，讨论办学指导思想，研究如何进一步办好体育学院，此次会议对于开创体育学院发展的新局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确定的路线，遵照党中央关于全党转移工作重点的战略决策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检查总结体育学院工作，进一步贯彻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关于办好体育学院的指导思想、方针和任务，以便更好地为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会议提出：积极创造条

件，把体院（首先是几所老体院）逐步办成教学、训练和科研三结合的中心，既培养体育师资，又承担培养教练员、科研人员、体育干部的任务，出优秀运动员。要调整、改革系科、专业和学制。据此，1981年1月2日，国家体委同时下发了《关于体育学院的任务、系科设置、专业设置和修业年限的意见的通知》和《北京等六所体育学院的任务、规模、专业设置、系科设置、修业年限和培养目标的通知》，对全国体育院、系、科在人才培养规格和专业设置，要求从国家整个经济状况和学院的实际出发，分出层次，处理好需要与可能、普及与提高、重点与一般、当前与长远等方面的关系，不强求一律，这样更有利于各体育院、系、科明确任务，突出特色，形成优势，培养出适应体育事业发展的多层次、多规格的优秀人才。

为了满足社会对各个层次体育人才的需要，体育学院在办学层次上，已形成了以本科生教育为主，同时培养研究生、专科生和中专生的多层次纵向教育结构。另外，还承担了培养留学生的任务。体育类的研究生教育在1979年恢复招生后，从1982年起开始设定授予硕士、博士学位单位。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其中所设体育研究生专业有体育教育理论与方法、武术理论与方法、体育史、体育概论、运动训练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等。上述研究生专业的设立反映了我国体育事业对体育人才的多样化和高层次化的需求。

进入90年代后，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全面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模式，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体育专门人才培养模式，满足社会对体育专门人才数量、类型和规格的要求，是体育学院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为适应体育专业发展的需要，体育学院的办学形式也逐渐由单一的普通高等教育拓展为普通高等教育与成人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并存的形式。

（二）改革内部管理体制，优化结构，加强竞争

1986年4月颁布的《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中明确提出："改革体育教育管理机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实行简政放权，扩大院校办学自主权。逐步实行院长负责制，理顺校内管理体制。"据此，为了解决国家投入经费不足、教师待遇偏低和"大锅饭、铁饭碗"的问题，体育学院从机构设置、人事制度和工资分配3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在机构设置上，精简机构，明确职责范围；在人事制度上，压缩编制，实施事业编制与企业编制结合管理；在工资分配上，采取与个人工作实际挂钩的校内多元结构工资。

（三）调整专业结构，加强学科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体育学院逐步改变了过去专业设置过细、专业口径窄小、专业名称不规范、专业设置脱离实际等弊端。1982—1987年，随着教育部对全国普通高校专业目录进行第二次修订（第一次修订在1952—1953年间，即院系调整时所设专业），各体育学院普遍增设了运动训练专业。1989—1993年，国家教委对全国普通高校专业目录进行了第三次修订，体育学类被作为教育门类之下的一个一级学科，所设本科专业有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人体科学、体育保健康复、警察体育等。198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本科的29种专业调整为6类9种专业，其中正式设置专业5种，试办专业4种。

学科建设是提高办学水平的一项重要工作，为加强重点学科建设，国家体委根据国家教委1987年颁发的《关于评选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的暂行规定》内容，在体育学院确立了26个重点学科点，为了更好地促进重点学科建设工作，1988年国家体委下发了《国家体委重点学科评估方案》，并于当年5月对国家体委直属体育学院重点学科进行评估与检查。1991年国家体委下发《直属体育学

院“八五”事业发展计划》中要求，直属体院应在学科建设等方面形成特色，“八五”期间建设2～3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优秀重点学科，并有计划地发展和引进新学科。

（四）推动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

修订教学计划、大纲。国家体委于1980年下发了体育院系教学计划和学生的学籍管理，对学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课时分配以及学生入学、成绩考核、奖励、处分、毕业等作了明确、详尽的规定，根据国家教委对专业培养目标、人才规格、质量标准的要求，体育学院先后多次修订教学计划和大纲，并在新修订的教学计划中增加了实践、实验、讨论、实习、见习等教育实践环节，突出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压缩了必修课，增加了选修课、辅修课；加强了基础理论教学；突出了主干学科和主干课程。各校根据新的教学计划大面积修订了教学大纲，新的大纲精选、更新了教学内容，优化了教学内容体系，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学内容的交叉、重复问题。

加强课程、专业教材建设。课程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是联结教与学活动的结合点。十几年来，各校增设了大量的新课程。为了加强体育学院的教材建设，国家体委于1987年3月17日发布了《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暂行工作条例》，决定成立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为了加强和改善教材管理，提高教材质量，又于同年6月24日，发布了《全国体育学院教材推荐、评审、出版试行办法》。1989年，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各门课程教材小组成立，统一指导、规划、布置体育学院教材建设和编审出版工作，并制定和颁布了《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工作规定》《全国体育学院“七五”期间教材建设规划》《全国体育学院“八五”期间教材建设规划要点》和《体育学院各专业规划教材推荐、评选与出版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同时各体院也成立了教材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与办法，以落实本院的教材建设工作。由于政策落实，方法得当，体育学院教材建设逐

步走上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轨道，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教材品种、数量明显增强，质量有所提高，各专业教材逐步系统配套。

完善教学管理。为了创造良好的教学和育人环境，体育学院以完善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深化教学改革为目的，采取了一系列整顿教学秩序、完善教学管理的措施。主要有：严格执行课堂常规，狠抓考勤和课堂纪律；开展课堂教学质量检查；制订课堂教学质量评估办法；改革考试制度，加强考试组织管理，建立试题库考试制度；完善学籍管理制度，等等。为了互相学习，加强学术交流，6所直属体育学院于1985年联合组织了教学检查，调动了各级领导、教师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学校的建设，受到了各学院的欢迎。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在师资队伍管理上，体育学院重点开展了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的考核工作与职称评审工作。通过考核为教师职务评审与聘任工作提供依据，把聘任制落到实处。每年制度化、规范化的考核工作和职称评审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教师队伍的建设；通过加强对中青年教师队伍的培养，有效地解决了师资队伍中年龄老化和断层的问题；通过采取优先选留和调入研究生、鼓励青年教师攻读硕士学位在职研究生等办法来提高教师的高学历比例，解决体育学院教师学历结构偏低的问题；通过科研成果、学术交流、著书立说、培养研究生等来提高中年以上教师的业务素质和学术水平，使之成为本学科有较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中小学体育师资的培养任务主要由各师范院校体育系、科承担；为了促进知识更新，在上海、武汉、沈阳体院举办了体育管理学、解剖标本制作、足球、运动生理、学校体育等学科和专业的教师进修班，为各学院解决了教师短缺而无法开课的困难。

（五）探索训练新路，办好竞技体校

十几年来，体育学院以办好竞技体校为核心，结合对本专科优秀运动员的培养，在运动训练工作中，坚持亦读亦训和科学训练的

办学方针，建立了优秀运动队；实施了本专科优秀运动员学分制，完善了领队和教练员责任制，建立了科技攻关组，采取了医务监督、康复治疗等方法，培养了大批的优秀运动员，在国际国内大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六）开展科学研究，提高科研水平

体育学院积极贯彻“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和“以科技为先导”及“科技兴体”的战略方针，鼓励教师紧密结合教学和运动训练实践，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性研究，积极开展学术活动，提高科研水平，为体育学院的教学与训练，乃至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七）面向实践，开展联合办学

学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是我国学校体育为适应国内体育发展和国际交往需要形成的重大改革，是单一训练体制的发展和补充。体育学院为主动适应社会需要，于1987年开始在试点高校试办培养高水平运动队，积极开展了与国家、省、市体委优秀运动队的横向联合办学，通过合办高水平运动队和承接体育竞赛等，促进了竞技体系与教育体系的结合，改善了办学条件，提高了办学效益，扩大了学校的知名度。但是由于教育规律与竞技运动规律的区别，多数学校经费投放不足和场地设施落后，教练员水平低等原因，高校中的高水平运动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竞技水平并不高。高校在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同时，还借助普通中等学校、体育运动学校等建立各种教学、科研训练基地，进行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把社会实践活动与学生培养过程紧密结合起来。

但是，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也存在着运动员的学习与训练的矛盾、训练管理水平和教练员水平不高、资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差、科研水平低、医疗与营养条件差、高校竞技运动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八）坚持对外开放，发展国际交流

在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体育学院坚持对外交流为教学、科研和训练服务的指导思想，积极开展对外友好往来，广开国际交流渠道。十几年来，先后与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乌克兰、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一些著名体育学院建立了校际关系，开辟了合作交流的新途径，扩大了国际影响。

为及时了解国外有关学科的学术动态，提高体育学院广大教师的科研、教学和训练水平，体育学院每年都有计划、有目的地邀请一些国际上比较著名的专家和教授来华讲学，主动引进国外先进理论和技术。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体育学院接受与派遣的留学人员也不断增加，同时还充分发挥武术、太极拳、导引养生功方面的优势，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不仅弘扬了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且提高了国际声誉。

（九）发展院办产业，改善办学条件

体育学院本着增强办学活力、减轻国家负担、补充教育经费不足的原则，积极发展院办产业，增加学校创收能力，以改善办学条件和教职工的福利待遇。各体育学院相继成立了院产办委员会并下设办公室，以统一管理学校的各种经济实体。为了不断改善教学环境和办学条件，体育学院还在后勤服务、图书馆建设、实验室建设和电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改革。

（十）体育学院帮助提高教练员和运动员的文化素质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各级体委不仅建立了负责教练员培训和运动员文化教育的组织管理机构，还制定了有关教练员到体育学院培训和体育学院协助开展运动员教育的政策、法规和制度。高等教育与成人教育相结合、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脱产与半脱产和函授（在职）相结合、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练

员培训体系框架已经形成。自1988年始，一套区别于学历教育，突出能力培训，有计划、有步骤地培训教练员的培训制度得到逐步建立和完善，各体育学院不同程度地承担了这些培训任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优秀运动队的文化教育工作有了较大发展，逐步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专的多层次“一条龙”式的学历教育办学体系，使优秀运动队文化教育纳入了教育结构，为提高运动员文化素质提供了基本保证。在体育学院的大力参与与协助下，全国优秀运动队中60%以上的运动员都能在相应的学历层次中参加学习，对提高优秀运动队运动员的文化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体育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

进入80年代后，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体育科技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历史形势的需要，逐渐显露出弊端，例如：统得过死，科研机构缺乏自主权；科研机构数量多，质量差，人力分散，发展很不平衡；科研与教学、训练有脱节现象，不能一体化；国家、省、市、自治区之间缺少分工协作，不能做到全国一盘棋，低水平重复研究泛滥；学科不成体系，缺乏决策研究能力，不利于发展体育系统工程。因此，体育科技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1979年5月7日至15日，第2届全国体育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建立健全体育科研机构等问题。会议指出，体育科技工作应为体育的普及与提高服务，实行专业与业余相结合，应用科学与基础科学相结合，当前任务与长远任务相结合。在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根据会议要求，1979年对国家体委科研所、各体育学院、各地方体育科研所、解放军体育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体育系、各级专业运动队、解放军体工队等作了任务的分工和科研布局，并对研究领域和课

题提出了建议，商请有关院校单位协作攻关。

1984 年 11 月底，第 3 届全国体育科技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总结了近年来的经验，集中讨论了体育科技体制改革、体育科研机构整顿、改善体育科研条件，并着重讨论了体育科研与运动训练相结合，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服务的问题。明确提出了体育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针，即“体育振兴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体育科学技术要面向体育运动的发展，为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体育科技在为增强人民体质服务中，重点抓好学校体育的研究；在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服务中，重点围绕亚运会、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夺取优异成绩开展研究；进一步加强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加强体育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促进体育科研与运动训练相结合。

会议提出，体育科技体制改革主要应遵循两个原则：一是有利于体育科研与体育运动实践相结合；二是有利于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体育科技体制改革提出了具体措施。

根据 1984 年全国体育科技工作会议所确立的体育科技方针，从 1985 年起，围绕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国家体委开始了体育科技体制的改革。

1990 年 3 月 5 日，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深化体育科技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了进一步转变观念，转变职能，促进科学技术与运动训练的结合，加强科研机构的组织建设，进一步完善所长负责制，科研课题实行公开招标和合同制管理，加强科技成果的应用推广等改革意见。

为适应我国体育改革和迅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需要，20 世纪 80 年代在体育科研管理体制改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实行指导思想的战略转移

从注重学科发展为主的研究，转向与运动训练相结合为主的研

究；从自选题单项研究为主，转向计划指导，以多学科综合研究为主；研究机构从扩大外延为主，转向充实内涵，重视研究质量，发挥现有仪器设备作用，提高整体效能为主；从主要运用行政手段，转向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和行政管理手段。

（二）体育科技力量向运动训练主战场转移

把体育振兴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体育队伍素质的轨道上来，关键在于建立起科技与体育运动实践密切结合、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通过科技攻关和科技服务，使科学技术进入训练，科技人员深入到运动训练这个主战场，狠抓重点运动项目的攻关研究和科技服务，发现和帮助解决训练中的难题和关键问题，进而提高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多年来，在运动员科学选材研究、青少年体质研究、运动训练科学化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体育器材设施的研制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三）重点抓好分类管理制度

改革运行机制，调整科技工作任务，对科研实行分类管理，进一步健全科研管理制度。对部分有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应用和开发研究项目实行课题招标，采用合同制管理，或实行贷款、部分贷款管理；对综合性的重大科研项目，打破单位界限，加强横向联系，共同承包，并经专家严格审议论证，试行项目经费包干制、结余提成的办法管理；对应用基础研究或体育实践需要的重大项目，或采取申请国家拨款或给予经费补助。

（四）实现体育科技管理的专业化、现代化

集中力量抓重点项目攻关研究和科技服务，促进科研与训练的结合，初步建立起科技与体育运动实践紧密结合和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逐步实现体育决策与管理、运动训练与竞赛等方面的科学化。根据现代化管理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加强体育

科技管理理论和方法研究，建立一支专业化的体育科技管理干部队伍，逐步实现体育科技管理手段的现代化。

（五）改革内部管理制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领导体制上，科研所逐步实行所长负责制；在人事管理上，科研人员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在科研计划管理上，实行科研责任制或课题承包制。通过引进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积极挖潜创收，努力改善科研条件和科研人员待遇。同时，还通过法规、政策和具体条例，加强宏观领导，加速实现体育科技的现代化。1985年7月28日，国家体委下发了《体育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和《体育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奖励范围和评审标准实施细则（试行）》，1987年2月25日又公布了《体育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管理条例》和《体育科学技术研究课题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有关体育科研管理的文件，为促进体育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体育科研工作的管理，调动广大体育科研工作者和体育科技人员积极性发挥了作用。

（六）改革拨款制度，拓宽经费渠道

体育科研经费匮乏，是80年代体育科研机构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为了解决科研经费，不少科研机构广开思路，在经费来源的途径上做了一系列的探索工作。改革科技拨款制度，使科研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面向经济建设的活力。通过实行技术合同制，削减事业费拨款，面向市场，在竞争中多渠道地换取科研任务和经费，实现事业费自给；把体育运动的理论研究成果推向社会；通过开拓市场把体育科研成果转化成商品进而产生经济效益；将体育科研机构和企业结合，形成体育科研生产联合体。

（七）发挥学会作用，体育科学研究体系初步形成

1980年12月15日，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成立。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是学术性的群众团体，具有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横向联

合和学科齐全、人才荟萃、知识密集等特点。它的宗旨是团结和组织广大体育科技工作者，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促进体育科技的繁荣和发展、普及和推广，促进体育科技人才的成长和提高，为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贡献。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并随着现代化建设和体育事业发展步伐成长、壮大，现已成为发展我国体育事业的一支非常重要的科技力量。学会根据学科和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设立了分会和专业委员会，并积极促进地方学会的筹建。体育科学学会初步形成了以学科群面貌出现的庞大的科技队伍，形成了一个组织上纵向联系、学科上横向发展的学会体系。各级体育学会在体育学术交流、人才培训、科普教育、科技咨询与服务等方面，为我国体育科技水平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1981 年 6 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公布了《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的几项工作制度》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召开国内学术会议管理办法（试行草案）》。这样，在 80 年代初，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体育科学研究体系，为以后体育发展战略的制订，为实现各个时期、阶段和指定性科研课题任务的完成，提供了组织和技术力量保证。

（八）参加国际体育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科技事业在对外开放方针的指引下，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日益增多，体育科技的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美国、联邦德国、澳大利亚、苏联、民主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的科研工作者积极同中国进行体育学术的合作和交流。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医、中药在运动损伤方面的运用正在逐步走向世界。日本、法国、联邦德国、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罗马尼亚等国家要求中国派人去讲学或派人来华进修针灸、按摩。1990 年北京亚运会科学大会，是我国首次举办的大型综合性国际体育学术会议，此次大会无论是从规模、参加国家或地区的数量，还是从学术水平、大会的组织工作，

都是一次成功、圆满、团结和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是我国体育科技事业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是亚洲体育科技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以上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体育科研的发展，为促进我国体育的科学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我国体育事业，特别是竞技运动水平的迅速提高提供了保障。

第四章　群众体育与体育教育的蓬勃发展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国的群众体育事业和学校体育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高度发展时期。群众体育逐步转向以社会办为主，各行业、各部门承担起主管本行业和本部门体育的工作，国家积极扶持、协调、指导和依法管理。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府重视，我国的群众体育获得了较大发展。但是，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现的“武术热”和“气功热”中，也暴露出不少新的问题。

第一节　群众体育的发展及问题

群众体育作为体育的主体组成部分，它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从总体上反映着体育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群众体育的发展不仅受到经济、政治的制约和影响，也受到体育发展方向和水平的制约与影响。国家体委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于80年代提出了全民健身和奥运战略，并要求在实践中把这两者协调起来；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提出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方针，从而确立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辩证关系，保证了新时期群众体育的蓬勃发展。

一、党和政府对群众体育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群众的健康问题，对群众体

育的开展予以了高度重视。

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是宪法规定的国家发展体育事业的基本责任。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国家发展体育运动，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一规定确立了发展我国社会体育事业的根本方针，明确了国家发展群众体育事业的责任，明确了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发展群众体育事业的主体地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的诸多法律中，都有涉及开展群众体育的条文和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及科学技术进步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工会法、民法通则等等的法律条文中，对不同群体从事群众体育作了明确的规定，为群众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指导下，作为中国体育事业的主管部门，国家体委在20世纪80年代将工作重点转向提高竞技运动水平的同时，也对群众体育予以了高度重视。1979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就指出："进一步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工农商学兵的体育活动都要有新的发展。群众体育要开创一个新局面，提倡人人参加体育活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层层破纪录运动，掀起群众锻炼热潮。"1981年全国体委主任工作会议中提到："群众体育工作仍以学校体育为重点，积极加强对职工体育的领导，当前强调优先发展城市体育，同时兼顾农村体育。大力加强业余训练，改变后备力量不足的状况。"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国家体委和教育部、共青团及各部委合作，积极推动和开展青少年体育、职工体育、国防体育以及农村体育，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中共中央在1984年10月5日下达的《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中，对群众体育予以了高度关注和重视。《通知》指出："体育关系到人民的健康、民族的强盛和国家的荣誉"，"全党全社会都要重视加强体育工作，进一步发展全民族的体育运

动。”与此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关心群众体育的发展。1983年7月1日，宋任穷同志为《体育报》创刊25周年题词，体育要“为增强人民体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努力奋斗”。1983年9月2日，薄一波同志为《体育报》创刊25周年的题词中写道：“开展多种形式的体育活动，增强各族人民的身体素质”。李鹏同志在1985年题词：“为使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必须重视体育教育，学校也应为国家培养大批优秀体育后备人才”。1990年2月21日，江泽民总书记为体育工作题词：“发展体育，振兴中华。”江总书记的题词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体育事业的关怀，指出了要坚持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服务的方向，对体育战线是极大的鼓舞。

二、20世纪80年代群众体育活动的蓬勃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思想解放，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增长。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标志着我国体育进入了改革与发展的新阶段。1986年4月，下发的《国家体委关于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提出了我国群众体育的改革方向与措施，核心问题就是进一步推进体育社会化，实现国家与社会办相结合，充分调动社会办体育的积极性。

体育体制的改革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在各级体委及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全国各地、各类和各个层次的群众体育组织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得到恢复与完善。人民群众的体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活动内容由过去以广播操、生产操、武术、球类等项目为主，开始向新的体育活动项目，如体育舞蹈、健美操、气功、保龄球、网球、门球、钓鱼、登山、旅游等项目扩展。高尔夫球、赛车、登山、攀岩、热气球等新的运动项目也开始成为很多体育爱好者所喜爱的活动。体育作为高尚的精神享受纳入中国现代生活方式之中，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缺少的内容。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体育社会化”成为新时期

中国体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表现之一。除了传统的青少年体育、职工体育、农村体育外，社区体育、乡镇体育、老年人体育、伤残人体育等新的体育组织形式与群体开始兴起。我国的体育事业日益体现出全民性特点。据有关资料统计，仅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全国就有3亿多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有4.6亿青少年达到国家锻炼标准，新建各类体育场馆22万多个。中国的群众体育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

（一）农村体育的发展

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是和以建立各种生产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适应的。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加，为农村体育活动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党中央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和《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下达后，农村体育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蓬勃兴起的农村文化中心、文化站、“青年之家”，都把体育活动作为重要内容，并且积极修建体育场地，组织体育队伍，使农村体育活动朝着阵地化、经常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1. 加强领导，促进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

1982年11月，国家体委、文化部和团中央根据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精神，在福建省龙海县角美公社召开了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展农村体育工作的经验，研究制定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村体育发展的方针、任务和措施。为了开创农村体育工作的新局面，特别强调要“加强农村体育工作的领导。各级政府在制订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要把发展农村体育事业列入，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比较长远的规划，经常督促检查，保证贯彻落实”。

国务院于1983年2月批转了《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特别强调：“积极开展农村文化体育活动，满足农民日益

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责任，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领导，从实际出发，采取措施，积极地逐步地把农村文化体育活动开展起来。”1987年4月，国家体委、农牧渔业部和中国农民体育协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在总结自1983年贯彻国务院批转《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纪要》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如何加强领导，加快农村体育的发展步伐，更好地为农村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问题。

2. 争创全国体育先进县活动

体育是全民的事业，县的体育工作仅靠体育部门和体育系统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做好的，只有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调动各部门、各系统、各群众组织的积极性，同农村的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做好。

1978年12月，国家体委在湖北省黄陂县召开了全国县级体育工作调查会，制定了《关于做好县的体育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县的体育工作必须面向农村，面向基层，为广大农民服务。

为适应农村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和改革县的体育工作，1984年12月20日，国家体委在湖南省桃源县召开全国体委主任会议，发出《关于加强县体育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提到：“县一级是贯彻落实党的体育方针政策的重要环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加强县的体育工作，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发展我国体育事业的一项战略任务。”[1] 通知决定从1985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争创体育先进县的活动，将我国农村体育向前推进了一步。1987年6月14日，为了使各级政府切实把农村体育作为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增强农民体质的重要工作来抓，进一步推动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国家体委颁

[1] 俞继英. 农民体育指导.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3.

布了《全国体育先进县的标准和评选办法》和《全国体育先进县标准的细则》，从而使农村体育工作有了明确的目标、方向、步骤和方法，这是从我国农村的实际出发，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农村开展体育工作经验的结晶。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参照全国体育先进县的标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标准，开展了争创本省、直辖市、自治区体育先进县和体育先进乡镇活动。

争创全国体育先进县的活动，是适应我国农村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服务于我国体育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充分调动了县的党、政领导和各部门、各系统抓好农村体育工作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使各级党政领导对体育工作更加重视，加强了各级政府对农村体育的领导，加快了农村体育设施的建设，推动了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使体育成为展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窗口。

争创农村体育先进县活动，使农村体育的工作机构显著加强。原来撤销或合并的县体委大都恢复了机构，不少县体委还增设了业余体校、技术辅导站、体育场馆等二级单位。许多县还加强、充实了体委班子，有些县（市）建立了乡镇体育机构。争创全国体育先进县活动，促进了人、财、物对体育的合理投入，对基层单位的体育工作起到了全面的推动作用。

争创全国体育先进县的地区，全面贯彻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方针，认真抓好业余训练工作，切实完成输送优秀运动人才的任务。他们建立起业余体校、传统校、学校代表队三级训练网络，慎重选定重点项目，重视选材，坚持长年训练，建立起教练员责任制和竞赛奖惩制度。

3. 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村体育竞赛活动

在开放搞活政策推动下，我国农村出现了国家办、地方办、集体办、个人办体育的生动局面。群众活动规模大、范围广、形式新颖多样，而且向制度化、经常化方向发展。随着农村经济实力的增强，农民群众自愿筹集资金组织体育比赛的活动逐渐增多。

农村体育竞赛活跃，对推动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乡镇体育是县体育工作的基础，许多省市非常重视乡镇体育工作。这些乡镇普遍建有体育机构、有一场（篮球场）、一室（乒乓球室）和有运动队伍，平时有活动，节假日有比赛。农村体育活动丰富多彩，农民“丰收杯”篮球赛、摩托车赛、娃娃足球赛、少年智力运动会、专业户运动会等十分活跃。各地富有特色的由成百万上千万群众参加的大规模的传统性的体育活动，趋向制度化。内蒙古的那达慕大会还把体育同信息、物资交流结合起来，使它更富有特色和旺盛的活力。

1984 年 9 月 5 日至 26 日，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届全国“丰收杯”农民篮球邀请赛顺利举行，这是中国体育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农民体育比赛。参加比赛的 510 名运动员全部来自人均年收入达 400 元以上的乡镇，反映了富裕起来的亿万农民迫切要求文化体育的心愿[1]。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88 年 10 月，国家体委、农牧渔业部和中国农民体育协会，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联合举办了第 1 届全国农民运动会，把农村体育推向了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出席了大会，有 4500 人参加了主题为《金龙腾飞》的大型表演，获得了巨大成功，为两年后的北京亚运会开幕式打下了基础。这届运动会由于领导重视、社会支持，进展顺利，影响较大，有力地推动了农村体育的普及与提高，发现了一些体育人才，活跃和丰富了农村文化体育生活，填补了中国体育史上没有全国农民运动会的空白，开创了由农民在运动场上唱主角的先河，扩大了农村体育的影响，推动了农村体育的普及和提高，进一步促进了农村两个文明的建设。第 2 届全国农运会于 1992 年 10 月在湖北省孝感地区举行，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一届农运会非常关心，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和李先念同志为农运会

---

[1] 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新闻与出版委员会. 中国体育年刊（1985）.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5：4，134.

题了词，田纪云副总理还专程前往参加开幕式。本届农运会给孝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变化。4 年一届的全国农民运动会已形成了制度。

4. 开展“亿万农民健身活动”

“亿万农民健身活动”是中国农民体育协会在 1990 年工作年会上提出，并得到全国各级农民体协组织热烈响应的一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农民健身活动。目的是最大规模地发动农民参加体育锻炼，强健体魄，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项活动一开始，就得到了农业部和国家体委的充分肯定与支持，成为贯彻农村体育工作方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全国各级农民体育协会主要的工作内容。

“亿万农民健身活动”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依托乡镇，面向基层，号召广大农民积极参与，使发展农村体育的任务真正落实到基层，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各地区根据各自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提出具体口号和要求，如有的省（区、市）提出“开展百乡、千村、万民健身活动”“千万农民健身活动”和“百万农民健身活动”[1] 等等。在开展“亿万农民健身活动”的同时，还举办了每两年为一期的“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评选表彰活动。

在“亿万农民健身活动”的推动下，农民群众办体育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不少乡、村的农民出钱资助比赛，兴建场地，如江苏省沙州县欣桥乡农民开创了出钱资助国际比赛的先例；山西农村妇女自办旱冰场、辽宁农民自办足球比赛等[2]。

---

[1] 俞继英. 农民体育指导.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30.

[2] 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新闻与出版委员会. 中国体育年刊（1985）.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5：136-137.

5. 农村体育文化市场的兴起

随着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生产结构、知识结构的变化和媒体宣传作用的增强，在农村经济发达地区，体育文化市场逐渐兴起，成为群众体育活动中的新内容。由集体和个人经营的游乐场、台球室等，在乡镇占娱乐场所总数的2/3以上。蓬勃兴起的农村文化中心、文化站、青年民兵之家等，都把体育作为重要内容。体育文化市场的兴起，使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农民对体育价值的认识有了提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体育是改善人们素质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不仅可以提高人的身体素质，而且在提高人的文化素养，移风易俗，转变社会风气，建设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

6. 农村体育面临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体育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这一时期农村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仍然处于落后状态，开展体育运动仍然存在着很多障碍和问题。

首先，不少农村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山区和贫困地区要开展体育活动十分困难，普遍存在缺机构、缺经费、缺设施、少活动的状态，严重制约着农村体育的开展。

其次，农村的体育设施本来就极为缺乏，再加上“文革”期间的破坏，造成农民参加体育活动的条件普遍很差，参加体育活动的设施、器材、场地等都难以保证。

再次，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忽视农村体育工作，对农村体育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造成农村仅有的体育场地被随便侵占、改作他用的现象十分严重，农村体育在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另外，由于我国农村医疗保健体制尚不健全，致使广大农民的身体素质不高，发病率较高；农村体育组织领导机构、资金投

入、设施建设等方面缺乏扶持政策，等等，影响了农村体育的发展。

以上问题都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体育的开展，使占我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难以参加体育锻炼，使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娱乐活动都受到很大影响。造成上述问题和现象的主要原因，固然是由于多年极左思潮和十年动乱的干扰，使我国农村生产力低下，大多数农民的生活贫困问题还没有解决，因而谈不上发展农村文化与体育；但另一方面，也与一些地方政府和领导片面重视生产和经济，忽略提高广大农民的精神生活和身体健康，在观念上对农民的文化生活和体育活动重视不够有关。这些问题，都对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二）职工体育的发展

职工体育是我国群众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职工体育的开展有利于提高职工队伍的身体素质和思想素质，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80 年代，我国企业发展到近 50 万个，职工人数达 1 亿多（不包括乡镇企业）。职工体育由于坚持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广大职工的方针，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因而得到全面发展。

1. 党和政府重视职工体育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职工体育的开展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国家体委和全国总工会连续两次联合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陆续恢复和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1979 年 2 月，国家体委和全国总工会为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出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高度发展体育事业上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新思路。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有 28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参加的职工体育工作会议。会议强调指出：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后，职工体育工作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为

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上来，职工体育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是通过增强职工体质来体现的。会议认为，职工体育活动是否做到群众性和经常性，应当成为检验各地职工体育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得好与坏的标志。会议还强调：开展职工体育活动，必须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群众，贯彻普及和提高相结合，而以普及为主的方针，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和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原则[1]。这次会议，使大家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增强了信心，有力地推动了职工体育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80年代后，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党和政府更加重视职工体育的工作。1981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重申1954年政务院《关于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他体育运动的通知》，在《通知》中要求各级政府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并在政府机关中推行广播体操，开展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以改善干部的健康状况。同年8月18日，国家体委、教育部、卫生部、国家民委、广播事业局、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体育总会13个单位发出《关于积极推行第六套广播体操的联合通知》。同年9月1日，国家体委正式公布了第六套广播体操。

为了实现开展职工体育的目的，根据1981年全国总工会与国家体委颁发的“(81)体群字3号”文件的指示精神，职工体育必须遵循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体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体育与医疗卫生相结合、体育与民兵训练相结合、体育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原则。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提出“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的伟大号召下，国家体委和全国总工会于是年9月在沈阳召开了全国职工体育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十二大”精神，同时交流了各地的经验，表彰了150个先进集体和300名先进个人。198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

[1] 荣高棠. 当代中国体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62-63.

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各级工会、体委和有关方面努力探索改革开放形势下职工体育发展的道路，使我国职工体育在面向基层、面向职工群众、讲求实际效果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职工体育人口不断扩大。

1981年9月1日国家体委公布了第六套广播体操后，党中央直属机关、外交部、民政部、煤炭部、冶金部等领导干部带头开展做操、打球、长跑、游泳和棋类等体育活动。党中央直属机关还订立“长跑日”，从1981年起，每年1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组织职工绕中南海长跑比赛，并形成制度。在中央机关的带动下，各省、市、自治区的机关干部和厂矿职工也纷纷参加锻炼。1987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企业深入改革，转换经营机制，推行岗位责任制以后，给开展职工体育带来了新问题；职工群众对参加体育活动的心态和观念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给职工体育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在这期间，全国总工会为了引导大家开动脑筋，打开思路，想方设法，面对新的挑战。为了鼓励和推动全国厂矿企业不同年龄层次的广大职工群众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提高强身健体效果，以增强体质，振奋精神，促进改革和两个文明建设，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于1989年3月29日发出了《关于在全国厂矿企业中试行（全国职工健身七项锻炼标准）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适应当前厂矿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充分发挥单位在提高企业劳动者素质，增强企业活力，培养“四有”职工队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请根据各地情况，认真执行。

在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指引下，国家体委和全国总工会为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开创职工体育工作新局面，于1991年8月在青岛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职工体育工作会议”。会上提出了今后几年的职工体育工作任务：要不断适应形势发展和职工群众的需要，积极研究开展职工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内容、方法和形式，开创职工体育工作的新局面，为建设“四有”职工队伍，为早

日实现“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作出积极贡献。

2. 职工体育竞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

80年代的职工体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开展了灵活多样、内容丰富的多种类别、多种级别的体育竞赛。体育从行业纵向发展朝着打破行业横向联合的方向发展。各行业、各地区之间的各种形式的体育竞赛尤为活跃，体现了社会力量办体育的旺盛生命力。这些协作形式的体育竞赛活动主要有：地区性协作赛，行业系统协作赛和省、市单项体育协会牵头举办的职工体育比赛。各种协作赛指导思想明确，主要以增强职工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活跃文化生活、促进生产、为四化建设服务为目的；单位间协商轮流办竞赛，合理有效地解决了竞赛的组织工作和经费问题；职工体育的竞赛还与交流经验相结合，推动了职工体育活动的深入开展；许多单位普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把开展竞赛活动作为增进团结和友谊、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一项措施。

1983年，长江三峡地区商业体育协会结合物资交流举行了体育比赛，并且形成了制度，建立了常设机构。1984年5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产业系统职工篮球邀请赛，检阅了产业职工的运动技术水平，推动了产业系统职工体育活动的开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产业系统单项体育竞赛。

1984年12月，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办了工农友谊杯篮球赛。这次比赛，增进了工农友谊，是体育改革的一次新尝试。1985年10月，经党中央批准，在北京举行了“第2届全国工人体育运动大会”。中断了30年的全国工人运动会从此恢复举行。这届大会共有3个产业（火车头体协、银鹰体协、水利电力体协）和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32个代表团的1700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同时还有来自全国的64名职工体育先进单位代表和先进个人参加，并举行了全国职工体育活动先进经验交流会，将职工体育的基本任务确定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职工体质，振奋职工革命精神，为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3. 职工体育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80年代，随着改革的深化，职工体育管理方法和活动方式等相应地进行了调整。一些大型的企事业单位把职工体育工作纳入了目标管理，列为企业“双文明建设”和“创建职工之家”等评先创优竞赛活动的一项内容。这些单位还把职工体育工作分解为若干项具体要求，分别落实到分厂、车间、班组，列为各级责任目标。职工体育工作的目标管理，促进了职工体育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一些地方在实行目标管理后，逐步做到了组织、经费、场地、器材、活动、计划6个方面的落实，保证了职工体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4. 医疗体育蓬勃发展

80年代，针对部分职工患有职业病和慢性病的情况，推行和开展的医疗体育成为这个时期我国职工体育的一个特色。在各级工会和体委、卫生部门的密切配合下，太极拳（剑）、气功、三浴功、练功十八法、五禽戏和各种保健操得到广泛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总工会共举办了5届全国性的工会体育干部培训班。第四期于1980年分3次连续组织了“医疗体育”轮训，借以推动全国各地工会在职工群众中开展医疗体育活动。据统计，到1981年底，全国有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工会和20个工人疗养院及工人文化宫先后举办了105期医疗体育学习班，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医疗体育骨干，对于普遍在病弱职工中开展医疗体育活动，防治各类慢性疾病，收到了良好效果。

第五期培训班是在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为开创职工体育工作新局面的形势下，于1982年12月在上海体育干部进修学院举办的，历时1个半月，总计有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49名工会体育干部参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时最长、参加人数最多、学习内容最为全面的一次培训班，为进一步推动全国职工体育

工作开创新局面准备了良好的条件[1]。

5. 企业办高水平运动队

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随着企业的自主权逐步扩大，出现了企业办高水平运动队、兴建较大规模的体育设施的新形势。国务院在批转1981、1983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提倡和支持有关部门、产业系统、大的厂矿企业和大专院校尽可能举办各种形式的青少年业余训练，设置高水平运动队伍。"国家体委根据国务院的批示精神，把企业办运动队作为体育社会化和体育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大力提倡和扶持。这一时期，一些有条件的行业、企业，如铁道部门的火车头俱乐部、银行系统的银鹰俱乐部等先后恢复或建立起来。解放军的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也都建立了自己的高水平运动队。

除了自办和与体委系统联办的高水平运动队外，为使职工体育队伍后继有人，行业、企业还自办或联办了业余体育学校。自办的高水平运动队为活跃职工业余文化生活、提高职工体育运动水平、推动职工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树立企业形象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6. 这一时期职工体育面临的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企业经营机制在转换的过程中，职工体育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管理体制不协调，职工体育的组织管理中存在着专门的政府部门、工会的体育管理部门、社会上的体育管理组织等多头、分散性管理的弊端；传统的福利型、事业型的职工体育模式难以满足职工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尤其是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成为制约职工体育发展的"瓶颈"，如群体组织机构和管理人员是否保留以及怎样开展工作、场地设施的维

[1] 俞继英. 职工体育指导.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25-27.

持和完善、运动器材的补充以及开展活动所需经费、职工劳动和活动时间的协调安排等，都需要从有利于职工健康，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高度去重新认识而加以解决。

（三）开展老年人体育

老年人体育作为老年保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标志着一个国家社会进步的程度。老年人体育的发展，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面临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如何加强老年人体育工作，解决老年人健康问题逐渐成为事关我国社会安定和家庭幸福的一个严峻的课题。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党和各级政府的关怀下，我国老年人参加体育及娱乐活动逐渐成为时尚，老年人体育活动蓬勃发展，效果显著。

这一时期，由于政府和各单位的重视，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适合老年人参加的各类体育项目。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内容不断向趣味性浓、组织方便、易学易练、锻炼效果好并且比较安全的项目发展，如气功、太极拳、太极剑、健身操、老年迪斯科、钓鱼、秧歌、门球等，这些活动吸引了大量老年人热心参加体育活动。

科学地开展体育活动是老年体育的一个重要原则。为普及科学知识，许多地区利用报刊、广播、电视广泛宣传老年人体育的意义和作用，指导老年人进行科学的锻炼，《新体育》杂志从 1978 年起开辟了《中老年体育和健康》专栏。1982 年，《体育报》《健康报》和《生命在于运动》杂志，联合举办了“老年保健讲座”，聘请专家、学者向老年人讲授体育卫生科学知识和锻炼方法。

这一时期，老年体育竞赛活动也开展得十分活跃，各省市和地州县每年都有计划地组织老年运动会或单项比赛，并已逐渐形成制度。1979 年第 4 届全运会上的老年长跑表演赛和 1983 年第 5 届全运会上老年人的太极拳、练功十八法、长跑和足球表演等，在社会上引起了积极反响。为方便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很多地方重视老

年人体育活动场地的建设。

在老年体育日趋活跃的基础上，我国老年人与世界各国老年人在体育方面的友好交往不断扩大，在长跑、网球、门球、羽毛球、武术、太极拳、导引养生功等项目中开展了广泛的国际交流。我国老年人体协与世界老年人长跑者协会建立了联系，曾两次派团参加世界老年人长跑比赛。1984 年，安徽省老年人体协组队参加了第 17 届世界老年人长跑锦标赛，并取得了较好成绩。我国老年人体育正在走向世界。

随着老年人体育活动的开展，对老年人体育的科学研究和工作指导也得到了加强，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已注意加强科研工作，设立科研机构，宣传体育科学知识。1988 年召开了全国老年人体育学术论文交流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就老年人体育与社会、经济、自然、管理、医学等方面的关系，以及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等课题进行了研究探讨。不少体育院系、医科大学和卫生部门，把老年人体育科研课题纳入科研计划，投入资金和人员，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老年人体育科研工作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体现了社会各方面对老年人体育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对推动老年人体育活动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开展残疾人体育

开展残疾人体育活动，发展残疾人体育事业，是中国体育事业和残疾人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残疾人全面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之党和政府的进一步关怀和残疾人自身的努力，残疾人的体育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国家体委曾两次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开展残疾人体育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体委抓紧、抓好残疾人的体育工作，并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措施。1990 年 12 月，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明确规定：“国家和社会鼓励、帮助残疾人参加各种文

化、体育、娱乐活动，努力满足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从而保证了残疾人有更多的机会参加文化、体育活动和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

随着我国残疾人体育的开展，以及与国际残疾人体育交往的增多，为适应我国残疾人体育走向世界残疾人奥运会的需要，我国残疾人体育的项目也随之增加，并逐步向残疾人奥运会的项目靠拢。到 90 年代初，残疾人体育的项目由过去的田径、游泳、乒乓球发展到举重、射击、柔道、轮椅篮球、轮椅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盲人门球等十余项。

为了推动残疾人竞赛活动的开展，我国体育部门分别于 1984 年、1987 年和 1992 年在合肥、唐山和广州 3 个城市举办了第 1 届、第 2 届和第 3 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这 3 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的举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残疾人体育的开展，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反响。

1987 年 3 月，民政部、国家体委、国家教委在深圳联合举办了首届中国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专为智商在 70 以下的弱智人士举办的运动会，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各类残疾人的关怀，国际特奥会会长史维法先生说：“中国开展特奥会活动，开创了国际特奥会的新纪元。”1991 年 3 月，在福建省的福州市，又为智残人举行了第 2 届全国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这一时期，我国还加强了残疾人体育的国际交流。1982 年 11 月，在香港举行的第 3 届远东和南太平洋残疾人运动会上，我国就派出了 15 名运动员，分别参加了游泳和田径两个项目的比赛，共夺得了 6 枚金牌，这是我国首次参加区域的国际残疾人运动会。1984 年 6 月 17 日至 29 日，我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一行 41 人参加了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 3 届国际残疾人运动会，共获得 24 枚奖牌，7 人破 9 项残疾人世界纪录。这是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残疾人体育盛会，并首次在世界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榜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残疾人同健康人一起谱写了体育新篇章。1985 年 3 月，中

国应邀派观察团参加了在美国盐湖城举行的首届冬季国际特殊奥运会[1]。此外，我国残疾人还参加了 1987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8 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举行的第 7 届国际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我国首次派队参加国际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五）社区体育和家庭体育的兴起

城市社区体育是依托城镇居民小区开展的体育活动。这是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后在我国出现的新的社会体育形态。社区体育的兴起是中国社会体育发展主动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从 80 年代开始，随着人民群众参加体育活动的热情越来越高，北京、天津、上海、沈阳等大城市出现了以街道办事处牵头组织的体育活动，成立了社区体育协会，打破了行业隶属关系，组织辖区单位和居委会就地就近开展体育活动。

1989 年，天津市河东区二里桥街道成立了街道联合体协，在当年召开的街道工作经验交流会上，这种街道联合体协模式得到重点推广。会后，该区领导参照民政部“社区服务”的概念，把这种体育形式定名为“社区体育”。1991 年，国家体委在天津市召开了“全国部分社区体育工作研讨会”，会上对“社区体育”作了初步定义，统一了与会者对社区体育的认识。自此，“社区体育”一词被人们广泛接受和应用，社区体育活动也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2]。社区体育是体育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使我国紧缺的体育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为职工及城市居民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促进了城市体育的发展。

80 年代中期，随着体育社会化的不断深入，家庭体育也逐渐活跃起来。1984 年 2 月，在北京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全国家庭运动会，在它的影响下，体育家庭日益增

---

[1] 李建国，等. 社会体育.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312.

[2] 李建国，等. 社会体育.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128.

多，体育进入了千家万户。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自觉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逐渐增多，许多地方出现了全家老少齐锻炼、父母子女同比赛的喜人局面。

三、群众体育组织与设施的完善

（一）群众体育组织的完善

1. 建立、健全农村体育组织

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体育需求增加，农村体育工作的各方面力量迫切需要紧密地联合起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1986 年 9 月 11 日，经中央批准在北京正式成立了中国农民体育协会。中国农民体育协会的建立，是我国农村体育的重大变革，从此全国 9 亿农民有了自己的直接体育组织，农村体育改变了由体委一家抓的旧格局，形成了以农民体协为轴心的农村体育网络，促进了体育社会化的发展。

农民体育协会的诞生，是中国体育史上的创举，也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体育社会化的成果。中国农民体育协会建立之后，遵照“面向广大农村，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普遍增加农民体质，促进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的方针，积极而稳妥地开展了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全国农民体育协会成立后的数年间，在农业部和国家体委的提倡、推动下，各省（市、区）也相应建立了农民体协，深入到广大乡镇、农村，开展广泛与深入的宣传，普及与推广农村体育工作。许多农民体育协会已成了实体或半实体的机构，不少地区从建立农民体协组织入手，将农村体育工作落到实处。

2. 职工体育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1981 年，全国总工会和国家体委联合发布了《基层厂矿、企

业、事业、机关体育协会章程（试行）》。这种遍布我国基层单位的体育组织，对发展我国职工体育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983年，国务院批转的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下达以后，全国行业体育协会等体育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各行业体协坚持体育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职工服务的方针，以企业为依托，从本行业的特点出发，广泛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从而达到了为生产建设服务的目的。一些省、市、自治区在建立体育协会的同时，还建立了职工体育联合会、地区体协、街道体协和各种体育宣传部等组织。其中，街道体育协会和体育宣传部使职工体育活动与城市居民的社会群众性体育活动在组织上联系起来，既有利于厂矿机关的职工体育得到更广泛的支持，获得更多的发展条件，又有利于推动整个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

水电、公安、石油、煤炭等体协的恢复与建立，为体育社会化增添了新活力。老年体协、伤残体协、钓鱼协会、旱冰协会、信鸽协会等群众性体育协会，广泛开展活动，使体育深入各领域。不少行业体协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受到了各种嘉奖，如中国火车头体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1988年度体育运动突出贡献奖，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荣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等。1990年，全国性的行业体协总数达到了27个，拥有职工体育组织10.2万个❶。

3. 各级老年人体育协会成立

1980年以来，老年人体育活动逐渐由分散发展到有组织地进行。全国各地城镇和许多单位，成立了数以万计的老年长跑队、老年球队、老年自行车队、老年锻炼队等。1983年4月，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成立后，老年人体育协会的组织建设发展很快，到80

❶ 李建国，等. 社会体育.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121.

年代末，除西藏自治区以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铁路系统，以及80%以上的地（市）、60%县（区）都成立了老年人体育协会，一些乡镇、街道及企事业单位，甚至一些边远地区都相继成立了老年人体育协会，成千上万的老年人有了自己的体育组织，我国老年人体育活动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新阶段。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先后组织的全国中老年人迪斯科健身操电视大奖赛、全国“健康老人”评选等活动，调动了广大老年体育爱好者的积极性，扩大了老年人体育的影响，宣传、发扬了我国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推动了老年人体育的迅速兴起和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4. 各级各类残疾人体育协会的建立

1983年10月20日至21日，全国残疾人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代表会议在天津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残疾人体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新的历史时期。此后的9年中，全国有27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残疾人体育协会。这些协会的建立，使我国残疾人的体育活动纳入了一条相互联系和协调发展的轨道。

1986年6月和12月，中国智残人体育协会及中国聋人体育协会相继成立。这两个协会和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一起，组织和领导了全国残疾人的体育活动。80年代中期，我国的残疾人体育组织相继加入了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IPC）、国际残疾人体育组织（ISOD）、国际盲人体育协会（IBSA）、国际脑瘫人体育组织（CPFSRA）、国际轮椅体育联合会（ISMWSF）、国际特殊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SOI）、国际聋人体育联合会（CISS）和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联合会（FESPIC）8个世界残疾人体育组织，并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伤残人体育协会建立了联系与交往，我国残疾人体育协会已成为世界残疾人体育组织的重要一员。

（二）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体育场地的建设正日益受到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逐步纳入了各级政府的建设计划之中。80年代，体育场地建设的一个新特点是出现了社会化，投资多元化，不少厂矿、企业，甚至农民出资兴修体育场地。

1983年6月27日至7月6日，国家体委在上海召开了全国体育场地普查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国家体委、国家统计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方案的通知》。会议认为，体育场地是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从事身体锻炼，活跃人民体育、文化生活，建设精神文明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对全国体育场地进行全面普查是体育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制订年度计划和长远发展规划的需要；是进一步加强场地管理，提高场地使用效率的需要；是国内外宣传的需要；是制止体育场地被占作他用的需要。

我国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要‘适当加强体育场地建设’。1983年10月国务院批转《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的通知中也指出：‘体育事业发展的主要指标包括体育设施，一定要列入社会发展规划。’”[1] 国务院于1984年初转发了《城市规划条例》，其中规定：“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占风景名胜区、文物古迹、公共绿地和公共体育场地进行建设，或者改变使用性质。”[2] 1986年，中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与国家体委联合颁发了《城市公共体育运动设施定额指标暂行规定》，对各类城市公共体育场地和居住区、小区的体育用地定额分别作了规定，这个规定对进一步落实场地建设长远规划和满足城乡人民体育活动的需要起到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田径场地设施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

[1] 荣高棠．当代中国体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557–558.

[2] 荣高棠．当代中国体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483.

建于1986年的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体育场，是广东省为举办第7届全国运动会投资建设的体育场，可容纳观众6万人，田径场设施可以满足田径重大赛事的需要。它采用进口屏幕系统和合成面层，照明和扩声音响等设备均采用了世界著名品牌，代表了80年代末期我国体育场建造和体育专用设施的技术水平，曾在世界获得过体育建筑奖。但是在天河体育场投入使用后，也暴露了当时我国体育设施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忽视可行性研究，特别是使用功能、专用设施设备的研究论证和规划设计，盲目引进，缺乏充分地比较、考察论证和有力的监督机制等等[1]。

1978年，河北保定合成橡胶厂开始研制田径场地合成面层，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已经发展成为4个生产厂家。1980年10月，我国首块田径场地合成面层在国家体委训练局田径场地铺设成功，结束了我国进口合成面层的历史，为提高我国体育运动和援外水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80年代中后期，我国相继在援外项目中广泛使用了田径场地合成面层，如肯尼亚体育场、贝宁体育场和约旦体育场，提高了我国援外体育设施的装备水平，受到了受援国的欢迎。1989年，河北保定市合成橡胶厂组织编写了《体育运动用塑胶跑道》和《体育运动用球类场地塑胶铺面》的标准草案，后来该草案经过多次修订，为我国最终颁布实施的《塑胶跑道》GB/T14833-93标准提供了蓝本。

第二节 学校体育发展走上正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各项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改革教育的同时，学校体育步入正轨。与教育思想和体育思想相适应，学校体育的内容、组织形

[1] 李志实. 学校体育设施.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4：30-31.

式、方法手段、管理体制和场地器材设施等方面，不断丰富和完善，并朝着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人的全面发展成为主题，儿童青少年的体育活动受到重视。进入 90 年代，在素质教育、终身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的理念和手段、内容和方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发展的格局。

一、党和政府对青少年健康的关心与指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1979 年 3 月 9 日，国家体委以正式文件形式下发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其中提到，"重点抓好关系两亿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学校体育，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1979 年 6 月 11 日，国家体委下发的《第 2 届全国体育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在群众体育中，要突出抓好中、小学体育和青少年身体健康的研究工作。"

1979 年 5 月 15 日至 22 日，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共青团中央在江苏省扬州市联合召开了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会议研讨了切实加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组织领导，从实际出发，积极开展学校体育、卫生活动和为搞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努力创造条件等方面的问题。会议要求各级学校要上好体育课，抓好每天 1 小时的体育锻炼，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建立健全竞赛制度，将学校卫生工作和体育工作结合起来。扬州会议是中国学校体育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它在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为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办法。同年 10 月 5 日，经国务院批准下达了《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指出"中、小学的体育工作，要为青少年一代身心的健康成长，为增强中华民族的体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在同时下达的《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

规定(试行)》中指出："高等学校的体育工作，要为培养又红又专、体魄健全的各种专门人才，为增强中华民族的体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这两个规定的总则中都提到："学校教育质量，要德、智、体全面衡量。体育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予以重视。"此后，中国的学校体育就在这两个《规定》的指导下，走上了恢复和逐步发展的道路。

1980年，邓小平同志曾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1] 在这"四有"中，小平同志把"有体力"作为为人民、为人类作贡献的基础。

从1981年起，教育部开始在大、中、小学中设立健康卡片制度，为以后深入、持久地了解研究学生身体素质的发育状况、把握生长与运动规律打下了基础。

为了鼓励和推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儿童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以增强体质，1982年8月27日，国家体委发布了国务院批准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要求"学校应把本标准的施行工作同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紧密结合，并纳入学校工作计划"。1983年5月15日，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新时期指导我国学校体育工作开展的一个重要文件，对于推动和促进这一时期我国学校体育和青少年体育的开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意见》指出："增强中华民族的体质，提高我国的体育运动技术水平，需要在今后的几代人身上下工夫，战略重点应放在青少年、儿童身上。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指导学生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使学生掌握体育的基本知识和运动技能，学会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养成经常锻炼的习惯，逐步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向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守纪律教育，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风

[1] 吴在田.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核心对体育事业的指导作用. 体育文史，1999 (6)：5.

尚。学校体育工作要面向全体学生。以普及为主，同时，也要不断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提出“到本世纪末学校体育工作总的奋斗目标是：学生体质指标和体育运动技术水平有大幅度提高。到2000年，我国学生的体质主要指标应该接近日本学生当时的体质水平；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学校体育前十年主要打好基础，为后十年学校体育大幅度提高创造条件”。《意见》同时还提出了14条措施。

1985年，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卫生部、国家民委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学生体质调研，测试了29个省、市的28个民族7—22岁城乡男女学生90多万人，进一步全面了解了我国各民族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状况，并获得了16个省市汉族学生1979—1985年间体质发展的动态资料。调查结果引起了国家教育、体育、卫生部门的重视[1]。1987年12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卫生部、国家民委、科委、财政部下发了将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工作制度化的原则意见。1989年制定了《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监测实施方案》，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1991年开始，按照统一的实施方案，每3年开展一次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监测工作，每10—12年组织一次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研究。这是国家教委与有关部委共同制定的一项对学生体质健康定期进行监测研究的法规性文件，标志着学生健康体质调研制度已经形成[2]。

二、推动学校体育开展的措施

为了进一步推动学校体育的开展，提高青少年健康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❶ 李秀梅.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简编.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116.

❷ 国家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文件汇编.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514.

（一）明确学校体育指导思想

1978年4月，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人才培养的标准问题，他说："培养人才有没有标准呢？有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邓小平的讲话再次澄清了人们的思想认识，明确了中国的学校教育应该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由此，教育部长何东昌在1982年首先提出了新时期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坚持三个为主"，即以增强学生体质为主，以普及为主，以经常锻炼为主。在这一指导思想被确立后，随着现代科技和世界经济的发展，随着学术空气的活跃和学术研究的深入，新时期学校体育思想的内涵被不断充实、丰富和加强。

（二）完善学校体育管理体制

80年代，国家及地方的教育和体育行政部门逐步健全和完善了学校体育管理机构，基本上形成了国家和各省、区、市学校体育工作的指挥中心，进一步加强了学校体育工作的领导力量，明确了各行政部门的职责，协调了各个部门的关系。体育教学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加强了体育教学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队伍的建设。体育师资培训管理形成网络，除统一规划、分级负责外，还采取多形式和多渠道的办法，提高在职体育教师的业务水平。学校卫生保健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使体育卫生相结合，为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增强学生体质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健全学校体育工作法规制度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检查体育教学训练工作，有效地推动体育运动的普及与提高，1979年3月29日，国家体委发布了《全国学生体育运动竞赛制度》。1979年10月5日，教育

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布了《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和《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草案)》，要求各级学校坚持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不断改善学校体育工作。据此，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纷纷成立了体育卫生处，地、市级教育局成立了体育卫生科，首先从机构建立上确保了学校体育工作的正常开展。1980年2月，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精神抓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体委把抓好学校体育工作当成自己的一项任务，要会同教育、卫生、共青团等部门检查各地落实扬州会议的情况。1983年，国家体委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学校体育工作的奋斗目标、阶段性要求，以及达到目标的14条具体措施，对于发展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进一步完善业余体校的训练体制，也提出了目标和具体措施。1987年，国家体委和国家教委又颁布了《中学生体育合格标准试行办法》。1990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更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体育课是学生毕业、升学考试科目”。从《暂行规定》到《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这一系列法规制度的建立，是党的教育和体育政策取得的成果之一，它们使学校体育工作走向了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使我国学校体育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巩固，保证了学校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的正常开展，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学生体质健康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强。

（四）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

体育教师是开展学校体育工作的骨干力量，1980年，国家体委就要求各级体委要关心爱护体育教师，注意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业务水平。为了进一步调动体育教师的积极性，推动学校体育工作，国家体委会同教育部于1982年在全国评选了千名优秀体育教师，1987年再次在全国开展了评选千名优秀体育教师的活动。这种评选活动，不仅为全国体育教师树立了先进的典型和学习的榜

样，而且使全国人民增加了对体育教师这个光荣职业的了解。1985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高了包括体育教师在内的全体教师的社会地位。同时，国家还相继建立了体质研究会、学校体育研究会等学术团体，不断推动学校体育沿着科学化的道路向前发展。为了解决80年代体育师资数量严重不足的问题，1986年2月，国家教委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体育师资队伍建设的意见》，强调指出，“新补充的体育师资，必须达到合格学历的要求”，并对体育院系的招生数额、师资培训方式等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要求。

20世纪80年代，各级体育、教育部门还举办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进修班、函授班和助教班，通过电大、夜大和校内、校际的互帮互学、组织专家讲学与举办经验交流大会，举办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组织考察团参观学习，在职接受继续教育等多种培训形式，不少在职教师达到了有关学历的规定，绝大多数体育教师都能够胜任体育教学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体育师资，尤其是农村和边远地区学校体育教师严重缺乏的状况。

（五）开展体育教学改革

80年代，各级各类学校根据《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和《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的要求，把增强学生体质和提高学生健康水平作为学校体育的主要目标。围绕这一目标，在提高体育课教学质量，选择重点教材，重视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贯彻体育和卫生保健相结合及适当增加体育理论教学比重，改革教法、教具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

加强学校体育的课程和教材建设，是80年代学校体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1978年，教育部组织人力编写出《十年制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和《中、小学体育教材（试用本)》，解决了中、小学体育教学的当务之急。1982年10月，全国中小学体育教材会议在福建举行，会议肯定了从增强体质出发的教

材选编原则，同时强调“新编教材要符合三项基本任务的要求和青少年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既要有统一的大纲，又不能规定得过死，在统一的基础上应给地方一定的机动权”，并提出了指导性的原则。1987年开展的修订工作，使教学大纲在体系内容方面有了许多新的发展，首次提出了“发展学生个性”和“使学生懂得锻炼身体的基本原理和独立进行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以适应终生锻炼身体和生活娱乐的需要”等新观念[1]。教材大体上都在重视身体锻炼、增强体质教育的同时，增加了体育基础理论的教育，体现了终身体育的教育理念。体育课本的使用，是体育教学的一种新尝试，这对加强课程、教材的建设，指导学生更好地完成体育教学目标和方便教学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80年代，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和体育学院的教材建设逐步走上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轨道，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为了加强课程、教材的建设，国家教委成立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国家体委也成立了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各门课程教材小组。这些组织统一指导、规划和布置普通高等学校及体育学院教材建设和编审出版工作，并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课程、教材建设的文件。如《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工作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体育教育专业学校体育学课程基本要求》和《全国体育学院“七五”期间教材建设规划》等。

在课程和教材改革的同时，随着学校体育思想的演变，体育教学也打破了以往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的组织结构和教学的方法手段日益多样化。学校体育思想从80年代初以增强体质为主的单纯的生物体育观，向注重身心协调发展的生物、心理二维体育观转变，并于80年代中期初步形成了生物、心理、社会的三维体育观。与此相适应，体育教学在改善、传授体育技术方法的基础上，重视和加强了学生身体锻炼的方法，开始考虑学生的心理感受，发展学

[1] 范国梁，谭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的演变. 体育学刊，2005（1）：82.

生的特长，大力提倡终身体育。体育的教学教具和体育器材，也努力向经济实用、创新和有利于推动教学改革的趋势发展。

（六）完善学校体育场地设施

1984 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下达后，各级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教育主管部门，拨款为学校修建了一批体育场地，补充了一部分设施和器材，缓解了学校体育场地的困难。在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和东部地区，不少中、小学有了标准的田径场、游泳馆、训练房。《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下发后，基础教育归地方管理，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学校及其运动场地的建设有了很大改观，尤其是将全国大、中学生运动会放在校园中举办的改革出台后，使学校体育场地和设施得到了明显改善，为体育教学和学生锻炼提供了保证。

1986 年我国颁布了《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规定了人均运动场地的面积、田径场地的尺寸类别、风雨操场室内高度等基本的要求。由于当时我国没有体育设施的建筑设计规范，该规范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技术要求[1]。

为逐步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学体育场地的问题，1989 年，国家教委印发了《中学体育器材配备目录》和《小学体育器材配备目录》，推动了学校的器材建设。1990 年，国家教委在颁布学校验收工作标准中，再次对中、小学体育的场地设施器材作了具体的规定。

（七）施行新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中、小学体育课程内容，在全面发展学生身体素质的基础上，注重了配合《体育锻炼标准》的达标要求进行教学。通过课堂教

[1] 李志实. 学校体育设施.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4：134.

学和课外活动相结合，提高了中、小学生的达标率。1982 年修改后施行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沿用至 1989 年 12 月，重新修订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体委于 1990 年 1 月公布施行。新的《国家体育锻炼标准》适当地增加了灵敏性素质和力量性素质的锻炼，适当地增加了运用小场地开展锻炼的测试项目，修订了基础分数线和评级标准，更加适应了我国当时青少年儿童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的实际发展水平，使中、小学体育教学更加切合学生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实际。《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不仅丰富了广大学生的课外体育活动内容，促进了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了体质，而且对学校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完善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相当一部分基层学校中，施行《标准》的工作，已经与体育课教学、课外体育活动、体育运动训练和竞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学校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推动了学校体育工作的广泛开展。

（八）活跃学生课外体育活动

课外体育活动是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学校体育任务的重要途径之一，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1982 年，教育部发出了《关于保证中小学生每天有 1 小时体育活动的通知》。1992 年 2 月，国家教委颁布实施了《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这一系列文件为学校体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确立了课外体育活动的地位和意义，促进了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

80 年代，各校根据本地的情况，使课外体育锻炼形式多样化。“两操两活动”这种传统的课外体育活动形式，得到了更加普遍的实施。一些学校结合各自特点，利用课外体育活动时间开展传统体育项目、民族体育项目和围绕《国家体育锻炼标准》项目开展锻炼等，保证了“两操两活动”的落实。

利用一周的课外活动时间组织各种体育专题报告、体育讲座、体育知识竞赛、体育表演、比赛和体育游戏等活动的体育周，以及

结合有意义节日或重大的国际、国内的体育活动，利用一天或半天的时间开展专题性的体育主题活动、进行体育教育和锻炼的体育日，是80年代学校体育的一项新发展。体育周、体育日和节假日体育具有浓厚的节日气氛，在吸引广大学生参加，提高学生的体育兴趣，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提高体育素养，增强体育意识和集体观念，密切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调动锻炼的自觉性以及培养体育骨干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广播体操是深受人们喜爱的体育锻炼形式，1981年和1990年，国家体委先后公布了第六、第七套广播体操；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体育的发展，丰富小学和初中学生课余活动的内容，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1988年8月5日，国家体委、国家教委、广播电影电视部、共青团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小学和中学（初中）积极推行第七套儿童广播（韵律）体操和第五套少年广播（韵律）体操的联合通知》；1992年2月，又公布了幼儿园广播体操。至此，从大学、中学、小学到幼儿园都有了适合自己年龄特点的广播体操。

（九）开展校园运动竞赛

80年代学校体育活动的另一项新发展，是校内和校际运动竞赛活动的日益多样化，各种对抗赛、邀请赛、选拔赛、表演赛、等级赛、通讯赛和运动会等，层出不穷。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全国中学生运动会以及各省、市、自治区举办的大、中学生运动会等逐渐形成制度。

（十）发展高等学校体育

1979年，教育部新编了《高等学校普通体育课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同年在扬州的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后，又颁发了《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试行)》，要求高校一、二年级学生除每周有两学时的体育课外，每天要做好早操和课间

操，每周还要参加两课时以上的课外体育活动。对未开设体育课的三年级以上学生，则要求有领导地组织锻炼小组或运动队，保证平均每天有1小时以上的体育锻炼时间。这些要求都促进了高校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此外，在高校还建立了以各校传统项目为主的运动代表队，经常组织院、系和年级以及班际之间的小型竞赛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各校都定期召开全校运动会。一些高校还试办了高水平运动队，促进了高等学校体育运动水平的不断提高。全国还于1982年举行了首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起初每4年举行一次，后来改为每两年举行一次，成为全国大学生的体育盛会。

为了加强体育人才的培养，1979年国家体委下达了《关于大力提高教育质量，充分发挥体育学校在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中的作用的通知》和《关于体育学院的任务、系科设置和修业年限的意见》，对高等体育专业教育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划，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培养博士、硕士、本科、专科等多层次专门体育人才的基地。

三、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校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校体育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青少年体质和健康状况不佳，“文革”时期学校体育经费、体育设施、场地、器材等欠账太多，体育师资缺乏和相当部分体育教师业务素质达不到要求等等。

（一）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不佳

80年代，我国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不佳是学校体育工作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国家民委联合组织的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组，对1983—1986年间中国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了我国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有：学生体型继续向细长型发展，体重不足；身体素质增长不明显，有些指标下降；青春期

高血压检出率急剧上升；心脏病、肝炎、结核、沙眼、脊柱侧弯、神经衰弱的问题比较突出，其中沙眼、脊柱侧弯的检出率远远超过日本学生；视力不良尤为严重，不仅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且民族之间、城乡之间、性别之间差别较大，视力不良率最高的年龄组达74.67%，汉族学生视力不良率高于少数民族，城市学生视力不良率高于乡村，女生视力不良率高于男生。由于视力不良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如不加以控制，将导致我国成年人视力不良率大大增加，因此学生视力不良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这次调查的结果引起了国家教育、体育、卫生部门的高度重视。

引起我国学生体质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营养问题、应试教育问题、应有的体育锻炼时间得不到保障、运动不足、膳食结构不合理等。

（二）体育场地少、设施差，体育经费严重不足

从许多省市的统计数据看，大多数学校的体育场地设施都达不到有关规定的最低要求，不少学校根本就没有体育场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体育场地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即使有关部门三令五申不得侵占学校体育场地，但侵占或将体育场地改为他用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基础薄弱，再加上受“智育重要、德育次要、体育可要可不要”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导致学校体育资金投入不足，学校体育经费匮乏，学生每人每年的体育经费平均不足1元，按《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的规定，学校体育的经费应占学校教育支出的1%以上，但仍有许多学校的体育经费投入达不到这个要求，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一些学校体育物质条件更差[1]。

---

[1] 刘志敏，孙晓春. 近代我国学校体育的演进轨迹与发展.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6）：102.

（三）体育师资队伍素质较低

我国学校体育近百年的发展历史表明，体育教师队伍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学校体育的发展，关系到社会对体育的态度。20世纪80年代，我国体育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参差不齐。由于“文革”时期体育院、系、科招生和培养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导致中小学普遍缺少受过专门教育的体育教师，很多学校的体育教师是由没有受过专门教育的其他学科教师或临时聘请社会上的体育爱好者兼任，一些偏远地区及农村的中、小学则根本没有体育专职教师，体育课都由班主任或科任老师兼任，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接受过专门的体育教育。而高等学校的体育教师虽然在数量上基本能够满足工作的需要，但整体学历层次不高。

（四）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学生健康发展

自1977年高考恢复以来，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学校和社会上形成片面追求升学率，导致学校体育受到较大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和学校功利主义思想严重，片面追求升学率和竞技运动成绩，注重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忽视了大多数学生的体育活动，忽视了学生对体育的健身性、娱乐性的心理感受。学校体育的教育、教学观念陈旧，社会体育意识不强。有些家长迫于“应试教育”的压力，对子女参加体育活动进行控制和干扰。“应试教育”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差异，使学生喜欢“体育”而不喜欢“体育课”。1981年4月24日至30日，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交流了一年多来贯彻落实高等学校、中小学体育和卫生工作《暂行规定》的情况和经验，分析研究了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讨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意见，并尖锐地指出：“那种对学生健康漠不关心，不加过问，一味加重学生负担，单纯地追求升学率，而忽视体育卫生工作的倾向，实际上

是对青少年儿童的摧残。”[1]

（五）学校体育法制不健全

由于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体育基本法和高层次的教育法规，国家的教育法和体育法制建设明显滞后于学校体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学校体育领域无法可依的现象还比较多，学校体育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 体育法规体系不完备，立法层次不高，立法层面较窄。虽然在进入 80 年代后，一系列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法规制度的建立为我国学校体育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使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从简单的职能管理转向科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但体育法规的内部结构分布不合理，还没有形成上下有序、结构合理、条理清晰的体育法规体系。

2. 有些体育法规不够规范。1987 年 4 月国务院批准公布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对行政法规的名称、起草、审定和发布等作了规定，使行政法规的制订科学化和规范化了。而且国务院规定部门法规不得称“条例”，可是有的学校体育方面的行政法规仍使用了条例的名称，致使名称不够规范。特别是有的用了十几年也没有进行修订和完善，降低了体育法规应有的效力和权威。

3. 执法不严和违法追究不力。学校行政执法存在着随意性和任意性的状况，执法的“弹性”多于“刚性”，对于一些触犯教育和学校体育法规的行为并没有给予及时的、严格的追究，或是追究时淡化了处理结果，例如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以及学校体育场地被占用等问题就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4. 执法监督的力度不够，法制宣传教育不够。教育和体育执法虽有多种监督形式，但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由于受传统教育法制观念和体育管理观念的影响，人们的体育法制意识和观念淡薄，

[1] 范国梁，谭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的演变. 体育学刊，2005（1）：81.

依法治体的思想还没有真正确立，直接导致了体育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的发生。

（六）学校体育发展不平衡

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各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存在着鲜明的地域性特点，总的发展方向是由南至北、由东至西、由城市向农村辐射。特别是 1978 年以后，我国政府决定在沿海建立 14 个开放型城市，推行沿海发展战略，沿海地区经济的长足发展，在促进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学校体育的发展。为此，受总体发展趋势的影响，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既有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存在着学校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第三节　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整与恢复

民族传统体育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同时融合了多种民族文化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我国优秀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工作和体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关系到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体育的共同繁荣，所以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关怀。

80 年代，在“积极提倡，加强领导，改革提高，稳步发展”工作方针的指导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进入了较系统的挖掘、整理、研究和发展的时期。遵循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的原则，一部分有价值、有影响的传统体育项目经过加工与改进，完善了表演和竞赛的规则（如武术、龙舟、毽球、珍珠球、打陀螺、赛马、抢花炮、射弩等等），武术、气功等遍及城市，并开始流传到许多国家，使民族传统体育由自然状态逐步向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并使其从单一民族文化发展成为各民族人民共同享有的文化财富，适应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1986 年 4 月，国家

体委下发的《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中明确指出："大力繁荣民族传统体育，逐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进入90年代后，迈向了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阶段。在1990年北京举行的第11届亚运会上，中国武术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并成立了国际武术联合会。从此，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体育开始走出国门，面向世界。1991年11月，第4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即"更具有民族风格、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更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更有利于发扬传统和便于推广"。1991年在内蒙古举办了"国际那达慕大会"，向世人展露了具有草原风采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另外，毽球、龙舟、风筝、围棋等项目的国际性表演和竞赛日益增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

一、武术挖掘工作的实施与成果

武术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现代武术运动是在传统武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传统武术文化的继承与提高。广大武术工作者本着"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精神，继承和发扬了各拳种和流派的武术技艺的传统风格，收集整理了大量濒于失传的拳术和器械套路，并对一些传统武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和创新，使得现代武术在技术风格、结构布局、质量难度上都有很大的突破和提高。

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家体委做了对武术恢复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3件大事：一是在1982年召开了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全国武术工作会议；二是于1982—1986年，历时3年、耗资百万、动员七八千人参加了挖掘整理武术遗产、普查家底、抢救遗产的大行动；三是使武术推向世界的工作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除此之外，建立武术组织、健全科研机构、完善武术的训练竞赛制度等措施，都有效地保障了武术向着科学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

（一）召开首届全国武术工作会议，全面开创武术运动新局面

1978年以后，随着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逐步落实，广大武术工作者解除了思想上的禁锢，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上要求对武术遗产加以保护、继承和发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80年1月11日，针对1980年初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取消武术比赛的决定，来自湖南、北京、云南和江苏的5名武术教练员联名上书国家体委，建议维护以专业队为主体的武术运动，“一年一度的全国武术比赛和观摩交流大会必须坚持……武术既然是中国的国宝，那么就不能用一般的体育眼光看待它，就必须突出它的特点，给予应有的地位”。1982年6月21日至30日，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体委主任汇报会议。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同志专门就武术问题提出：“希望大家重视武术，摆到重要位置上来。对武术，要挖掘、整理、继承、提高，当前主要任务是挖掘继承下来。从长远看，武术是要作为一项竞技体育项目好好发展的。”

1982年12月5日至11日，首次全国武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盛大、最重要的一次武术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8个省、市、自治区（西藏未参加）体委和火车头体育协会、13所体育学院和教育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的代表以及特邀代表共400多人。会议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新形势，要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武术工作者，积极发展各种形式和各种流派的武术，深入挖掘、整理武术遗产，大力普及，努力提高，积极稳步地向外推广，为实现体育工作的三大任务，为振兴中华作出积极的贡献。”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武术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制定了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武术运动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其中一条就是“切实做好挖掘、整理工作。国家体委准备成立一个武术遗产挖掘整理小组”。这次会议，提高了武术和武术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振奋了精神。大家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明

确了方向，制定了措施，鼓舞了干劲，它对全面开创武术运动的新局面，适应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需要，有着重要的意义，是一次很成功的武术界的动员会议，是中国武术运动发展的历史的转折点。从此，我国武术运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会议下发了被称为80年代武术工作纲领性的文件的《全国武术工作会议纪要》。

1983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中再次强调“对武术进行挖掘整理，继承发展”。在国家体委于1987年8月6日发布的《关于加强武术工作的决定》中也指出：“继续做好挖掘整理武术遗产工作。今后要把挖掘整理工作经常化，有计划地把挖掘的成果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把具有独特风格和科学价值的武术技法保存下来，并通过传授，继承发展。”

（二）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的武术挖掘整理工作

1979年1月国家体委发出的《关于挖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对武术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通知》的精神，国家体委专门组织了调研组于2月28日至4月9日，分两路在山西、陕西、广东、福建等12个省市的城市和乡村，就传统武术的现状和挖掘整理工作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这次调研既是考察武术活动的现状，又是一次对沉默已久的武术界的一次大发动；既是对地方体委贯彻落实《关于挖掘武术遗产的通知》的一次督促检查，又是对即将于广西南宁举办的首次武术观摩交流大会的推动。

经过40天的深入调研，1979年4月28日，国家体委武术调研组向国家体委领导递交了挖掘整理工作的调查报告。报告着重从4个方面汇报了武术挖掘整理工作的情况：第一，国家体委下发的《关于挖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在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各地对此项工作是比较重视的；在省市体委的推动下，广大武术工作者，特别是老拳师备受鼓舞，他们从消极的情绪中解放出来，积极参加了各项活动；总的看来，国家体委发掘整理遗产的通知，调动

了武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对传统武术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发现了个别地区对这一工作重视不够。第二，对传统武术现状的初步了解。我国的传统武术运动内容丰富，基础厚，遭受的摧残和破坏十分严重，目前状况值得重视。第三，在发掘整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贯彻“百花齐放”方针与武术界的门户之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和专业与业余的矛盾；按照体育特点，探索武术的技击运动；抓紧落实对老拳师的政策，设法为他们创造工作条件；多出些武术书籍，创办一个学术性刊物很有必要。第四，几点建议。应抓紧对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工作；采取积极措施为老武术工作者落实政策；抓紧出版武术书籍。这份调查报告为1983—1986年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那股有组织、有计划的“挖整”武术遗产的热潮做了指导思想上与决策上的准备。

1983年5月，在江西南昌召开了第一次挖掘整理武术遗产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区、市体委参与“挖整”工作的中层干部、体育院校的武术权威和社会上的知名武术家。会议气氛活跃、民主，大家共商深入“挖整”武术遗产大计，探讨的内容广泛、实际，是体育界关于发展传统体育项目武术的一次群英会。会议提出了国家体委制定的1983年5月至1985年底的3年“挖整”计划和具体的工作任务。这次会议起到了誓师、动员的作用，自此深入地挖掘整理武术遗产的工作开始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进。

1983—1986年，全国普查武术、挖掘整理武术遗产的工作，发动了除台湾、西藏外的28个省、区、市的7814人，寻访了14881位拳师，历时整整3个年头。通过艰苦卓绝的普查，摸清了我国数千年来留传下来的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达129个。经初步整理，各省、区、市已编写出的地方拳械录有651万字，为各拳种流派代表人物、老拳师摄制的技术录像394.5小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同时通过以献拳经拳谱、献兵器实物和献功法技艺为中心内容的“三献”活动，收集了有较

高价值的文献资料482本，旧兵器392件，有关武术历史活动的实物29件[1]。挖整工作还推动了武术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发展，锻炼与造就了一支年轻的业务精湛的武术队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80年代振兴传统武术的中坚力量。

为了汇报全国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取得的初步成果，交流工作经验，表彰先进，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的任务，1984年6月26日至7月4日，首次全国武术挖掘整理工作成果汇报会在河北省承德市召开。来自全国34个单位的161名代表汇报交流武术挖掘整理工作中的经验和成果，并举办了实物展览，放映了技术录像，作了学术报告。1986年3月，在北京故宫再次举办了全国武术挖掘整理成果汇报会，同时举办了“武术遗产挖掘、整理成果展览”，展示了3年来挖掘整理的琳琅满目的古兵异器、哲理深邃的拳经和拳谱，以及珍贵的录像资料等等[2]，为武术的普及提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7年8月6日，国家体委发布了《关于加强武术工作的决定》，为更好地发展武术运动，提出了战略构想和发展部署。《决定》从12个方面提出了加强武术工作的具体措施和要求。其中提到：“继续做好挖掘武术遗产工作。今后要把挖掘整理工作经常化，有计划地把挖掘的成果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把具有独特风格和科学价值的武术技法保存下来，并通过传授，继承发展。”挖掘、整理工作健全了各级体委的武术组织，这些组织在督促武术挖掘、整理工作的同时，通过成果交流会等形式，将武术成果向全社会推广，极大地丰富了武术运动的内容，使武术理论体系更趋完善，技术更加全面，使更多的人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习武内容和形式，促进了武术的普及与发展[3]。

[1] 赵双进．对80年代武术工作的回顾与随想．体育文化导刊，2003（3）：64.

[2]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448-451.

[3] 于春岭．20世纪80年代形成“武术热”的原因．体育学刊，2001（5）：69.

（三）增强武术的国际交流与推广

1979 年 5 月，围绕着武术的发掘整理，在广西南宁举行了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来自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台湾省外）和香港、澳门等地的 7 个民族的 300 余名运动员参加了这次盛会。交流表演的项目极其丰富，其中传统拳术 249 项，器械套路 197 项。由国家体委指定的试验项目——散手和短兵在大会上亮相。此外，“硬气功”的表演也在南宁引起了轰动。

这次大会内容丰富，群众基础广泛，是继 1952 年民族形式运动会后的首次武术观摩交流大会，在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预示着武术春天的到来。这次大会为建立合理的武术竞赛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即在我国的竞赛机制中，既有符合竞技理念与要求的武术比赛，又有按照中国文化传统进行的符合武术特性的观摩交流，在同一竞赛机制中两种形式并存。这次大会是在国家体委的《关于发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要求下举办的，它为 1983—1986 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挖掘整理武术遗产大行动做了先期工作，进行了舆论与组织准备。大会的成功举办，使各地的武术挖整人员增强了信心。

自 1982 年 12 月第一次全国武术工作会议后，中国武术协会先后选派了一批优秀的武术运动员和教练员赴墨西哥、加拿大、英国、新加坡、菲律宾、澳大利亚、泰国、马来西亚、尼泊尔等国家做援外教学工作，在国外培养了一大批武术骨干力量。除此以外，中国武术协会、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先后在上海、杭州、济南、青岛、广州、深圳、北京等地，以及香港、韩国、马来西亚等地区和国家举办了一系列武术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国外武术骨干，在武术走向世界的传播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

1982 年 9 月 27 日至 28 日，国际武术表演赛在南京举行。这

[1] 邱丕相，郭玉成．武术在国际传播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体育学刊，2002（6）：61．

次表演赛由中国江苏省武术馆和美国全美中国武术协会发起，江苏省体育服务公司承办，这是我国第一次举行国际性的武术表演赛。美国全美中国武术协会、加拿大武术协会、香港武术健身协会、菲律宾“菲华光汉”国术馆总馆和中国江苏省武术馆的代表队参加了此次表演赛。表演赛分拳术、器械和对练 3 大类 50 多个项目，按长拳、其他拳术、长器械、短器械、软器械、长短器械和对练共 7 组进行比赛。

1982 年 12 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武术工作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次武术会议，会议总结了三十几年来武术工作的经验，提出了今后的方针、任务和措施。在这次会议的《会议纪要》中，就武术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明确表态：“开展国际交流，积极稳步地向国外推广。当前，武术工作应立足国内，随着形势的发展，适当搞一些国际交流，派出一些武术团队和教练员出国表演、传授，或邀请国外人士来我国观摩武术大会。不论采取哪种形式，都要积极稳步地进行，并注意政策和保守机密，做到内外有别。”这是国家体委作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策，是继承与发展民族文化的一项载入史册的功绩。

1983 年底，中国武术代表团在新加坡的访问表演获得了巨大成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东南亚，在港、澳、台引起了轰动，这是 1984 年武汉会议的前奏，为武术走向世界做了起步前的准备。

1984 年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5 日，应中国武术协会的邀请，法国、联邦德国、香港、意大利、日本、澳门、墨西哥、菲律宾、新加坡、瑞典、美国和泰国等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术组织负责人，到武汉参观了全国武术比赛，并举行了座谈会，共商中国武术走向世界的大计。大家一致呼吁由中国牵头组织建立国际武术组织，把武术推向世界。

1984 年 12 月 3 日，中国武术专家组一行 10 人应邀访问英国、意大利和瑞典 3 国，以学术讲座、示范教学、公开表演的方式全面

介绍了中国武术，加强了与欧洲武术界的沟通和联系。中国武术专家组访欧是继武汉座谈会后实施武术走向世界战略的又一具体举措，尽管只有10人3国之行，但其影响所及，对于1985年及1986年在中国西安与天津两地举办的国际武术邀请赛和对于1985年欧洲武术联合会的建立都起了孕育与催生作用。1985年11月，欧洲武术联合会成立。

武术运动在世界的迅速发展，使成立国际武术组织的时机日趋成熟。中国武术协会根据1984年在中国武汉举行的有12个国家和地区武术界人士参加的国际武术会议“备忘录”，于1985年8月21日至26日在西安举行了第1届武术国际邀请赛。与此同时，中国武术协会邀请参加比赛和会议的16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术界人士就成立国际武术联合会筹备委员会进行了磋商和讨论，成立了国际武术联合会筹备委员会。8月26日，举行了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国、英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5个筹备委员国代表。这是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中华武术全面走向世界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1986年11月3日，亚洲武术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在天津宣告成立，中华武术走向世界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欧洲、南美洲、非洲的武术联合会相继成立后，1987年9月25日，亚洲武术联合会在日本横滨成立，这说明中国武术首先在亚洲得到了发展。会议通过了《亚洲武术联合会章程》和《关于呼吁把武术列为第11届亚运会的比赛项目的特别会议》，会后举行了首届亚洲武术锦标赛，世界武术锦标赛和洲际武术锦标赛也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相继举行。国际武术组织的诞生，促进了各国和各地区武术团体间的交流，加速了武术国际化的进程。1988年7月，亚洲单项体育联合会正式接纳亚洲武术联合会为该会会员。1988年9月，亚奥理事会会议批准把武术列为1990年第11届北京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这为中国传统武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武术作为一个国际竞赛项目开始形成，确立了以长拳、南拳、太极

拳、刀、枪、棍、剑7个套路项目为统一竞赛内容的竞赛规程和制度，以后又增加了散手。1988年，在兰州举行的散手表演赛中，第一次采用设台的形式比赛，自此，武术以擂台形式进行比赛被确定下来，真正体现了武术的特色[1]。

1990年10月3日，在北京第11届亚运会武术比赛期间，国际武术联合会正式成立，并被国际体育联合会接纳为下属单项协会。按照国际武术联合会首届执委会的会议决定，第1届世界武术锦标赛于1991年10月12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来自日本、巴西、法国、英国、比利时、美国、中国台北、新加坡、澳门等41个国家和地区的440余名选手参加了比赛。比赛设套路和散手两个大项。中国队获得14枚金牌和1枚银牌。

（四）建立武术组织，健全科研机构

武术组织的建立、科研机构的完善，是武术运动得到持续发展和提高的前提与保障。进入80年代，为了使武术遗产进一步得到整理和研究，为了加强武术在国内的普及和在国外的推广，我国武术组织和各种学术团体、科研机构得到了建立和健全。

1985年3月20日，经劳动人事部批准，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成立。武术院是国家体委直属的武术教学学术研究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对中华传统武术进行挖掘整理，开展学术讨论和理论及方针、政策的研究，培训业务骨干，对全国武术业务工作进行指导，是全国武术研究和训练中心，也是团结全国武术工作者开展活动的基地，同时开展将武术推向世界的国际友好往来与学术交流活动。

1986年夏秋之际，武术研究院实行了“三合一”的体制改革，即以协会实体之名，把体委机关的武术处、武术协会与武术研究院合三为一，给武术研究院以行政管理权力，对全国武术运动统一管理，对内实行行政、事业一元化领导。于是，1986年6月4日，

[1] 张山，等．中华武术发展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1：21-22.

中国武术研究院宣布正式成立，中国武协主席徐才任院长。中国武术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对武术运动的管理走向了科学化和规范化的道路。

为提高武术科学研究水平，促进与繁荣武术科研事业，经国家体委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批准，中国武术学会于 1987 年 6 月 25 日在北京成立，它是我国最大的武术学术团体。中国武术学会的宗旨是：团结组织广大专业和业余武术科学研究工作者，促进与繁荣武术科学研究事业，促进武术科技人才的成长与提高，加速武术事业的发展。其任务是：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百家争鸣，倡导科学研究和优良学风；开展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思想，提高科研水平；组织定期的学术研讨活动，普及武术知识，传播和推广武术科学研究成果与经验。以后各省、市体委科研所（处）和体育院校相继成立了中国武术学会分会等科研机构，形成了一个由下至上的武术科学研究网络。

为了加强武术理论研究，适应武术走向世界的要求，1987 年 6 月 23 日至 27 日，全国首届武术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武术界、体育界、教育界、科学界的专业和业余武术研究工作者 300 余人参加了会议。研讨会共收到论文 370 多篇。由于受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文化热”影响，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从哲学、医学、文学、生物学、天文学、军事学等多方面、多角度对武术这一传统文化现象进行研究讨论。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武术的挖掘整理工作要继续加强，把蕴藏在民间的一切拳械、套路、功法用文字、录像等现代科技手段记录下来。”这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武术运动走上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提供了理论依据。

武术的普及离不开教育。1984 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武术硕士学位，为培养高层次武术研究人才奠定了基础；继后，许多学校成立了武术协会和辅导班，不少地方相继成立了业余体校武术班、武术学校、体育中学武术班等；1986 年，部分大学成立了高水平

武术运动队。这样，在我国基本上完善了初、中、高级3个层次的学校武术网络❶。

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与开展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除人口众多的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在本民族广泛开展的、历史悠久而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传统体育项目，又有在世界通行的、由奥委会等国际组织所倡导的近代体育项目。尊重各民族风俗，搞好民族传统体育工作，有益于坚持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因此，它既是一项体育工作，又是民族工作的一部分。

（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挖掘与整理

1981年9月21日至28日，国家体委、国家民委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体育工作座谈会，来自全国21个省、区的29个民族代表以及中央和北京有关单位、新闻界的180多人参加了座谈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召开专门研究少数民族体育工作的会议，是一次增强民族团结和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会议。会议遵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党的民族政策，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少数民族体育工作的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民族传统体育和近代体育活动，提高少数民族健康水平和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促进民族团结，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了完成上述任务，使民族传统体育健康发展，明确提出了当前开展民族传统体育的工作方针是"积极提倡，加强领导，改革提高，稳步发展"。会议指出：对待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要和对待其他文化遗产一样，必须继承和发展。继承，就要努力提倡，积极支持，防止失传；发展，除了要有

❶ 曾于久，等. 民族传统体育概论.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159.

深度、规模和水平外，还包括改革提高。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断在量和质两个方面得到发展和提高。会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门也相继召开会议，根据新时期民族体育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本民族传统体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了更加系统的调查、整理、改进工作，使一批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脱颖而出。例如，80 年代初，北京、河北等地的一些满族干部和教师，发掘整理了 86 个满族传统体育项目，其中的“采珍珠”经过挖掘、整理、改进，现已发展成为一种规则完善、趣味浓郁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被正式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比赛项目。又如，1984 年国家体委组织专家综合古代蹴鞠、花毽和现代足球、排球、羽毛球运动的特点，推出新的传统项目——毽球，这是贯彻“古为今用”和“改革提高”方针的具体体现，是开发民族传统体育的成功尝试。再如，侗族的抢花炮，通过对比赛时间、竞赛规则、炮台设置等进行改革后，更增强了趣味性和竞争性，从 1986 年起被正式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比赛项目。

1990 年，国家体委组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全国范围内挖掘整理民族体育，出版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反映我国 56 个民族传统体育的志书。该书收录了 56 个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记述了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渊源、发展和变化，反映其开展情况及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搜集到 55 个少数民族的 676 项传统项目，还有 301 项汉族的民间体育项目[1]，使一大批具有浓郁民族风格并为各民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传统体育项目得以重新恢复和发展。其中经常开展而且规模较大的有赛马、风筝、摔跤、赛龙舟等。

（二）民族传统体育的主要活动形式与内容

20 世纪 80 年代，国家体委将龙舟、毽球、风筝列为全国正式

[1] 胡小明，等. 民族体育.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1.

比赛项目，并举行了邀请赛和全国比赛。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上，把民族传统体育总结提高成竞赛项目，加以提倡和推广，使具有民族特点的古老体育运动项目重放光芒，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新发展，深受群众欢迎。

1. 开展龙舟运动

进入80年代后，龙舟运动得到了快速发展。1980—1981年，被认为是龙舟竞渡起源地的湖南汨罗江连续举办了大规模的竞渡赛事，不仅吸引了汨罗江沿岸的群众，也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关注。继而，全国冠以各种杯名的龙舟比赛纷纷举行，如"楚天杯""屈原杯""川江杯""洞庭杯""飞龙杯""山城杯""莲花杯"和"希尔顿杯"等等。1984年，在广东省佛山市举办了全国第1届"屈原杯"龙舟赛，有12个省、区的13个队参加，观众达20多万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龙舟赛事。1985年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了全国第2届"屈原杯"龙舟赛，并取得巨大成功。同时，中国龙舟协会成立。国家体委将龙舟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中国龙舟协会的成立全面地推动了龙舟运动"四化"的建设，即制度化、体育化、规范化和社会化。先后于1985年、1988年在厦门、福州和北京举行的国际龙舟邀请赛，为促进龙舟技术的交流与提高起了积极的作用。

龙舟运动由于有着极好的娱乐性、表演性和竞技性，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项国际赛事。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龙舟竞渡十分火热。香港从1976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国际龙舟邀请赛，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龙舟队伍。1982年，澳门也开始举办类似的国际龙舟赛事。与此同时，在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以及菲律宾、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家都得到了开展，日本、泰国、文莱及澳大利亚等国相继举行国际龙舟邀请赛，并设立了专门的组织，使得龙舟竞渡这一极富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发展。1991年6月24日，在香港国际龙舟赛期间，

举行了国际龙舟协会成立大会，成员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洲的龙舟协会共 12 个。中国龙舟协会主席当选为荣誉主席，秘书处设在香港。

2. 开展毽球运动

1984 年，国家体委综合了蹴鞠、花毽和现代排球、足球的运动特点，推出了新的传统体育项目——毽球，为改革、创新和提高民族传统体育进行了成功的尝试。

毽球运动是在踢毽子游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广州。1984 年 3 月 7 日，国家体委正式公布了全国第一个《毽球规则试行草案》。同年 3 月 25 日至 30 日，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毽球邀请赛。比赛期间，国家体委举办了毽球学习班。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同志在学习班上指出："在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方面，在重视近代体育的同时，要重视民族体育项目的推广，也要重视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和发展。开展具有民族传统的毽球运动，其意义不仅限于毽球本身，而且可带动民族体育的开展，现在推广毽球运动，一开始就要将目标定在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从此，全国各地掀起了开展毽球运动的热潮。

1985 年 4 月，全国第 1 届毽球锦标赛在苏州举行，1988 年 2 月，中国毽球协会成立，标志着中国传统的毽球运动走上了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发展道路。同时，也给毽球运动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使得相关的制度、规则和竞赛日趋规范与完善。1991 年，国家体委审定并颁布了第一部《毽球竞赛规则》。毽球运动这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不仅在国内得到迅速发展，而且很快传播到亚洲、欧洲、美洲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国家体委为进一步向世界推广毽球这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积极组队到国外进行比赛和表演活动。

3. 开展风筝活动

1988 年，我国正式把风筝列为体育比赛项目，并在山东潍坊成功地举办了“国际风筝节”，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国内外风筝爱好者。1989 年 4 月 1 日，国际风筝联合会在山东潍坊成立，16 个国家和地区参加。

中国风筝协会主席季明焘担任第一任主席。国际风筝联合会第一次理事会确定将总部设在中国潍坊。会议决定由蝴蝶风筝和蓝色旗面组成的旗帜为会旗。蓝旗象征蓝天，蝴蝶象征世界风筝爱好者团结在一起，为和平飞向天际。

（三）举行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关怀下，民族传统体育获得了新生。1953 年 11 月，在天津市第二体育场举行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1984 年，国家体委和国家民委认定这次大会为第 1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把发展少数民族体育事业作为民族工作的一部分，定期举办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活动内容和形式逐步向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1982 年 9 月 1 日至 8 日，第 2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乌兰夫、万里、阿沛·阿旺晋美和民委主任杨静仁出席了开幕式。来自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55 个少数民族的 1000 多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加了这个民族大团结的盛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有全部 55 个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这届大会设了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两大类：竞赛项目有射箭、中国式摔跤；表演项目有傣族的孔雀拳、纳西族的东巴跳、朝鲜族的秋千、维吾尔族的达瓦孜、蒙古族的赛骆驼等 68 个。这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广泛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贯彻了民族体育方针，对促进民族团结、繁荣民族

文化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于1986年8月10日至17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隆重举行。开幕式上，近万名学生表演了集中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大型团体操《天山的盛会》。来自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5个少数民族体育代表团参加了运动会。运动会共设摔跤、射箭、速度赛马、叼羊、射弩、抢花炮和秋千7个竞赛项目以及115个表演项目。本届运动会首次启用了会徽、会旗、会标，并制定了较为科学的比赛规则，使竞赛进一步规范化，参赛队的技术水平和运动成绩都有较大提高。在另外108个表演项目中，有30多个项目是在近一二年间被挖掘、整理出来的传统体育项目。这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探索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群众性与专业性相结合、传统与现代体育相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发展方向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特别是在挖掘整理传统体育项目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甘肃的“打日计来”和“强板项”、福建的“龙尊”和“牛尊”、广西的“推竿”、云南的“木鼓”、贵州的“铁链械”、湖北的“肉连乡”、北京的“踩珍珠”和黑龙江的“撒网”等项目，都是首次与观众见面。传统项目经过改造和创新，更具有民族的风格和体育的魅力。新疆的“达瓦孜”和广西的“童狮上金山”，尤其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次盛会生动地展示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欣欣向荣的景象，为进一步促进民族体育事业的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91年11月10日至17日，第4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广西南宁市举行。本届运动会竞赛项目有赛马、摔跤、龙舟、抢花炮、木球、珍珠球、射弩、武术、秋千9项，表演项目有120个，来自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5个少数民族的运动员参加了129个传统体育项目的竞赛与表演。由台湾66名高山族运动员组成的男女龙舟队也参加了本届民运会，还有一名高山族运动员参加了摔跤比赛。这是新中国成立42年来，台湾同胞首次

组团参加全国性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这次运动会是我国历届民族运动会中比赛和表演项目最多的一次，而且制定了较为科学系统的总规程、竞赛项目规程和规则、表演项目评判方法，使本届运动会朝着科学化、规范化和社会化的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事业的发展。民运会期间，对民族体育的改革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要使民族传统体育“更具有民族风格、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更能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更有利于发扬传统和便于推广”。

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推动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应地定期举办了地区民族体育运动会，有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还举办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单项邀请赛，使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事业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四）召开全国民族传统体育学术研讨会

为配合第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召开，1986年8月20日至23日，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市召开了全国首届民族传统体育学术研讨会有来自25个省、区、市体委和部分体育学院的59名代表与会。会上，代表们就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演变和现状，以及发掘整理工作进行了座谈讨论，为推动我国民族体育学术研究的更好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充分地显示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91年11月6日至8日，在上海体育学院召开的首次“亚洲民族体育的现状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国内汉、回、蒙古、维吾尔、朝鲜等民族的学者递交了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论文54篇。会议就“传统文化与民族体育”“民族体育的价值”和“民族体育的交流、传播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三、"武术热"与"气功热"中出现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我国群众体育开展过程中出现了"武术热"和"气功热"现象，对这一时期群众体育和民族体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也产生了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一）"武术热"与"气功热"的产生

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我国文化事业的日益繁荣。随着一批以中国武术为背景的电影上映，使广大观众感受到了中国武术的巨大魅力，使武术在国内得到广泛传播。1982年，影片《少林寺》上映后引起了巨大轰动。紧接着，《武松》和《武林志》等武打影片相继面世。香港电视剧《霍元甲》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也在观众中产生了巨大反响。这些影片和电视在社会上引发了空前的"少林热"和"武术热"，使武术得到了空前的传播。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体委高度重视发展武术，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展了民间武术挖掘整理工作，成立了相应的武术挖整机构，各级专业武术运动队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强调对武术开展的指导。与此同时，文化思想的解禁，调动了广大武术工作者从事武术事业的热情和积极性，加强了人们对武术价值的认识，激发了青少年学习武术的兴趣，有效地推动了武术运动的普及。为了推动武术运动在群众中的广泛开展，国家体委于1984年在北京召开了"千名武术优秀辅导员"表彰奖励大会，在全国产生了热烈的反响。

20世纪80年代的"武术热"极大地推动了武术的发展，也使武术的影响扩大到了海外。这一时期，以武术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大量面世，各类武术杂志热销，群众习武热情高涨，各种形式的武术

馆（校、站、社）在全国各地应运而生。武术作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代表因而蜚声海内外。

伴随着“武术热”的升温，又出现了全国性的“气功热”。气功是对中国传统保健功法和体育疗法的统称。包括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导引、行气以及武术的硬气功等健身治病理论与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对传统文化精华的保护和挖掘，于 1954 年成立了唐山气功疗养所，由著名气功师刘贵珍任所长。1957 年，北戴河气功疗养院成立。同年，上海气功疗养所成立。1959 年 7 月卫生部中医司在北戴河气功疗养院主持召开了全国第 1 届中医气功医疗工作会。1959 年 10 月在北戴河召开了全国首届气功学术交流会。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以气功为特色的传统保健治疗法在全国的开展。但在“文革”中，气功被视为“封建糟粕”和“迷信”而受到批判，刘贵珍等气功师受到迫害，气功的发展全面停滞。

改革开放以后，北戴河气功疗养院等恢复了门诊业务，刘贵珍等气功师也得到平反，气功逐渐得到恢复发展。1981 年 9 月 9 日，中华全国气功科研会在保定成立。1986 年 4 月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气功热开始升温。至 80 年代末期到 90 年代中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参加气功锻炼者达到 6000 万，长期坚持气功健身的人达 2000 多万。与此同时，各种功法大量涌现。据有关统计，当时流传的各类传统及创编功法有 2000 多种，流行功法 300 多种。各种气功辅导站遍布全国各地，各级气功研究会、功法组织纷纷成立。各类气功出版物也急剧增加。

20 世纪 80 年代“武术热”和“气功热”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方面，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国民经济迅速好转，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追求健康和治疗疾病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武术和气功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瑰宝，在广大民众中间有深厚的基础，其功理、功法易为大

众接受。另外，改革开放后电影、电视、报纸、杂志、书籍等大众媒体的繁荣，又为传播武术和气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和渠道。

客观而言，20 世纪 80 年代的“武术热”和“气功热”对推动这一时期武术和气功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与后果。

（二）“武术热”与“气功热”中出现的问题

总的看来，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武术热”和“气功热”的出现，是广大群众希望通过练习武术和气功，达到增进身心健康和治疗疾病的目的。但随着“武术热”和“气功热”在很短时间内急剧升温，一些不良现象也在滋生蔓延。这些新暴露出来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群众性武术运动和气功健身活动的正常进行，败坏了武术和气功的声誉，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在“武术热”和“气功热”中，缺乏积极的和强有力的指导与管理。自 1983 年以来，面对骤然兴起的“武术热”，很多地方对武术馆校的管理一度出现较为混乱的局面。一些地方开办的武术馆校没有合法的办学手续，不具备必要的师资力量、场地器材和学生食宿等办学条件，经营水平也十分落后。多头审批、多头管理、乱收费、乱发学历证书、做虚假广告、跨省招生和教学质量低劣等情况严重，这些不仅严重败坏了武术声誉，而且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同样，在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的“气功热”中，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气功组织、气功学习班和气功报告会等一哄而上，到处做广告、招收学员。社会上“气功大师”纷纷“出山”，打着“传功”和“带功报告”等招牌四处办班。同时，各类宣扬气功和“气功大师”的宣传品、出版物充斥街头书摊，令人真假难辨，造成了人们思想混乱。

其二，打着“气功”“特异功能”的幌子宣扬封建迷信和反科

学内容。在“武术热”和“气功热”中，一些人打着“传统文化”“武术”“气功”“生命科学”和“特异功能”等旗号，将一些早已为现代文明唾弃的封建迷信内容用现代科学的名词加以包装，如“人体磁场”“信息茶”等，使很多人上当受骗；有的将武术硬气功和轻功等神秘化，声称可以“刀枪不入”“隔墙打人”和“意念打人”等等；有的打着“气功大师”的招牌，故弄玄虚，招摇撞骗；有的声称自己“发功”时能“使太阳黑子发生变化”；有的声称能“预测”我国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澳星”；还有的人自称“和宇宙间的高级生命有联系，能听到宇宙人对他下达的指令”；甚至还有人声称是自己“发功”扑灭了大兴安岭火灾等等。这些荒唐的反科学的东西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迷信活动猖獗，让很多人上当受骗，在国内外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第二，借武术、气功之名诈骗钱财，从事非法活动。例如，在“武术热”中，有些武校为了拉生源，大做虚假广告，甚至派人到车站和学校强拉生源。有些武校本身办学条件严重不足，却唯利是图，大肆招生，使不少学生上当受骗。更有人以办武校为名，横行乡里，打架斗殴，甚至演变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聚众闹事，扰乱社会治安。同样，在“气功热”中，一些“气功师”用所谓“带功报告”“万人受功”“集体开光”和“集体贯顶”等名目和方式非法获利，大肆敛财。例如，1990 年 3 月，某“气功大师”打着“为亚运会集资”的旗号在北京北太平庄进行“万人受功”，14 天共授功 27 场，牟取暴利 40 余万元，事后被公安机关收留审查并正式逮捕。还有人居心叵测，打着“气功”的幌子，利用气功组织蒙骗群众，从事各种违法活动，甚至冲击政府机关。这些不仅严重干扰了武术、气功的正常开展，而且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恶劣影响。

这一时期“武术热”和“气功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纠正出现的问题。1994 年 12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

干意见》。《意见》指出："一些迷信、愚昧活动日渐泛滥，反科学、伪科学活动频频发生，令人触目惊心。""要充分认识破除反科学、伪科学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把这项工作始终不懈地坚持下去。对利用封建迷信搞违法犯罪活动的要坚决依法打击，对反动会道门组织要坚决依法取缔。"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至 90 年代中期，"武术热"和"气功热"逐渐降温，人民群众也逐渐看清了那些打着武术和气功名号，实际进行诈骗钱财、扰乱社会之实的"武术大师"和"气功大师"的真面目，武术和气功作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精华也恢复了本来面目，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

第五章　体育科研与宣传工作的开展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又强调要大力加强科学技术和教育工作。从此，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在全国迅猛兴起。

1978 年 1 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这次新中国成立以来代表性最广、规模最大的会议上，为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尽快缩小“文革”造成的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提出了要“大打体育科技之仗”。在 1983 年经国务院批转的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问题的请示》、1984 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等文件中，都强调要发展体育科技。1984 年底，在云南昆明召开了第 3 届全国体育科技工作会议，集中讨论了体育科技体制改革、体育科研机构整顿、改善体育科研条件等工作，并着重讨论研究了体育科研与运动训练相结合，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服务的问题，明确提出了“体育振兴要依靠科学进步，体育科学技术必须面向体育运动的发展”，为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在 80 年代全国掀起的改革大潮中，体育界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体育科技组织，体育科研也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在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体育科技与运动训练相结合、体育教育及系统总结历史经验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力地保障了 80 年代我国体育的发展。

第一节 体育科研管理体系的形成与政策法规的制订

1978 年 1 月 22 日至 30 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 1400 余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代表性最广、规模最大的一次体工会。在这次会议上，清算了林彪、“四人帮”集团破坏体育事业的罪行，为尽快弥补“文革”造成的损失，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实现“大治快上”，在提出的以后一段时期的工作任务中，非常明确地要求“大打体育科技之仗”。此后，体育科技管理机构相继建立，至 80 年代末，整个体育科技体系得到恢复、充实和完善。体育科研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对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引领和推动作用。

一、体育科研管理体系的初步形成

（一）体育科研机构的恢复与建立

1977 年国家体委召开了全国体育科学技术规划会议，草拟了《1978—1985 年全国体育科技发展规划》。从 1978 年起，体育科技列入了国家科委制定的《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之中。

1978 年 5 月，国家体委发出《关于加强体育科学技术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和体育学院按照文件精神，高度重视体育科学研究工作，把科研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意见》提出了 1978—1985 年体育科研的主要任务有 5 项：

1. 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研究。着重进行对各重点项目，特别是田径、游泳、足球和体操的大运动量训练的生理生化基础、机能

评定和合理安排的研究，最大限度地提高和发挥运动员的身体机能的可能性，促进运动技术迅速赶超世界水平。

2. 开展体育运动对增强人民体质的作用和规律的研究。重点查清我国少年、儿童身体形态、机能和素质的特点，研究不同年龄阶段的体育教学、训练任务和身体全面发展的指标。这是关系到改善一代人的体质和攀登世界运动技术高峰的战略任务。

3. 中西医结合防治运动性伤病，消除训练、比赛后疲劳的方法、手段和运动员合理营养的研究。

4. 加强运动生理、生化、生物力学等体育科学技术的基本理论的研究。

5. 积极研制现代化的体育器材、场地设备和体育科学仪器。

从当时全国体育科研的实际状况看，要达到实现任务的目的，面临的困难很多。首先，科研机构在“文革”前尚未在省市级完全建立，已建立的在“文革”中已完全瘫痪；科研队伍人员少，而且流失严重。因此，建立、充实机构和队伍是必须尽快解决好的首要问题。为了能大干快上出成果，《意见》对建立、充实机构和队伍与合理布局作了规定：

1. 国家体委和省、市、自治区体委建立科技工作管理机构，负责统一规划、协调和组织管理体育科技工作。首先整顿和建设好国家体委体育科学研究所。在全国逐步建设几个重点科研机构。

2. 体育学院是发展体育科研的重要方面军，必须建立相应的科研机构，制订科研规划，发动广大教师进行科研，并配备相当数量的专业研究人员，加强领导，在全国体育科研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3. 各省、市、自治区体委、解放军，应根据各自的条件加速建立和健全体育科研所（室、组），分别负责某些重点项目的科研任务，逐步形成全国体育科研体系的合理布局。

4. 国家队、八一队和各省、市、自治区体工队与重点业余体校是体育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要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应成立必要

的科研机构，配备专职科研人员，结合训练、教学，建立由教练员、医务人员、运动员和研究人员相结合的科研小组，制订计划，大搞群众性的科学实验运动，认真做到专业科技队伍与广大群众相结合。

5. 专业科研机构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对被“四人帮”干扰破坏搞乱了的体制和制度，要进行调整与整顿。

6. 针对体育科技人数很少，水平不高的状况，《意见》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充实和提高，要广开才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做到快出人才，多出成果。

其具体的做法是：

体育学院和有条件的科研单位都要招收研究生，举办科技人员进修班，组织好科研人员的业务学习。1980年，要求现有科研人员大部分都能阅读一种外文的专业书刊。要逐步选拔和培养具有相当于大学文化水平、懂得一种外文的，或有长期实践经验，并有一定的研究能力的人员，充实科技队伍。要保证科研人员至少必须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业务工作。在学术问题上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

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国外先进的体育科学技术，洋为中用。有计划地派遣科技人员出国学习、考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创造条件使科技人员在国内外的重大体育比赛中进行调查和科研。

为了充分发挥现有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作用，加速我国体育科技事业的发展，对科研工作应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各科研机构之间应分工协作，全国一盘棋。要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又要互相衔接和密切配合，以便多快好省地把体育科研搞上去。《意见》明确要求：国家体委科研所应以研究重点运动项目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带有共性的问题为主；体育学院以研究体育的基本理论和学校体育为主；省、市、自治区以研究本地区的重点项目和群众体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为主。

为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意见》希望各级体委和解放军体育部门领导的作风、工作方法，要适应新形势总任务的要求，要把体育科技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有人分管，认真抓出成果来。要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妥善解决科技人员生活上和工作上的困难。"尽快建立技术职称和技术岗位责任制。建立定期考核和晋级制度，特别优秀的，可以随时考核，越级提升。对有发明创造和其他重要贡献的，要给予表扬和奖励，以精神鼓励为主，也要有适当的物质奖励。"❶

在各省、市的支持和体委的努力下，各省、市科研机构迅速恢复和建立，体育科技人员队伍很快得到了充实。

在这一时期，成立了国家体委科教司，各省市体委相继建起了相应的下属机构。改革开放前，我国体育科研工作十分薄弱，专门的体育科研机构仅有 7 个。改革开放后，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全国各地的体育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逐级出现，到 1985 年全国独立的省级以上的体育科研机构就达到 28 个，在职科技人员 729 人；到 1990 年科研机构发展到 38 个，在职科技人员 1148 人。全国不少体育院系也相继成立了体育科研所或研究室，大大增强了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的力量，分别在机构建设、体制改革、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推广应用、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以及开展国际体育科技合作与交流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促进体育科技及我国体育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样，以国家体委科教司和国家体委科研所所属的管理序列和专职研究机构序列构成了体育科研管理系统。

1979 年 5 月 7 日，在北京召开了第 2 届全国体育科学技术工作会议，集中讨论了建立健全体育科研机构和进一步开展体育科研工作等问题，在国家体委于 6 月 11 日下发的《第 2 届全国体育

❶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700.

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指出：体育科研在我国是一项新的事业，如何建立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实际情况的科研机构，尚处在探索阶段，各地可根据任务和具体条件而定，不必强求一律。《纪要》对体育科研机构的建设提出了以下要求：

1. 各省、市、自治区体委，可设精干的专门机构或由专人负责科技管理工作。

2. 已经建立起来的体育科研机构，要根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精神，逐步健全、充实。

3. 目前尚不具备条件的省、市、自治区体委，可暂不建所。

《纪要》还提出了要建立体育学会和体育科学技术委员会，并指出：“成立体育学会，对调动积极因素，进行学术交流和活跃学术气氛十分必要，体育学会主要吸收体育战线上的学者和专家参加，学会下面可设若干学科分会，拟于最近成立中国体育学会筹备机构，进行筹备工作，争取明年全国科学报告会时正式成立中国体育学会及下属的运动医学会。”

《纪要》建议成立体育科学技术委员会，作为国家体委领导体育科技工作的咨询机构，起参谋和顾问作用。该委员会除包括体委系统有关领导同志外，主要吸收有威望的专家参加。其主要任务是对体育科技重大方针、政策、规划、计划的制订和重大成果的审议、鉴定、推广提出建议。

1980 年 12 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在北京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学会章程，建立了运动医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心理学、运动训练学和体育科学理论 5 个分科学会，学会会员 184 人。至 1992 年，体育理论学会、运动训练学会、运动生物力学学会、运动医学学会、运动心理学学会、体育情报学学会、体质研究会、体育仪器器材研究会、体育建筑研究会、体育统计研究会、学校体育研究会、武术学会和中国体育史学会相继建立，形成了一个组织上纵向联系、学科上横向发展的学会体系。学会会员由 1980 年的

184人增加到1992年的15016人[1]。

（二）体育科研为体育运动服务，为奥运会重点项目服务

体育科技工作本应为体育的普及与提高服务，实行专业与业余相结合，应用科学与基础科学研究相结合，当前任务与长远任务相结合。

由于十年“文革”浩劫带来的严重破坏，运动技术水平落后已成为突出的薄弱环节，而参加1980年奥运会的任务又迫在眉睫，我国一些项目的成绩还达不到奥运会报名标准。因此，在第2届全国体育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作出决定，根据1979年全国体工会议的精神，国家体委和省一级体委要在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今后一个时期内体育科技工作也应侧重抓提高。

按照会议的精神，确定了体育科技工作在1980年前期的主要任务是：体育科研为体育运动服务，为奥运重点项目服务。至此，这项任务成为了贯穿于整个体育科研工作的主线。在第2届全国体育科研工作会议上确定的科技工作任务是：

1. 围绕参加1980、1984年奥运会的任务，广泛开展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研究，特别要集中力量重点抓住若干个接近国际水平和影响大的运动项目进行深入的研究，促进这些项目在奥运会和重大国际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

2. 要十分重视青少年运动员的选材和多年系统训练的研究。这是一项长远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

3. 在群众体育中，要突出抓好中、小学体育和青少年身体健康的研究。对工、农、兵体育以及医疗体育方面的研究，也要作适当安排。

4. 加强体育基础理论，如运动生理学、人体解剖学、生物化学、人体运动力学、运动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有条件的单位，要

[1] 黄汉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科技发展史.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50.

积极创建实验室，对研究工作作出长远安排，避免中断。

运动医学与体育实践的关系十分密切，应当大力加强运动员身体机能评定、运动性伤病防治和营养的研究。要贯彻中西医结合的方针，研究祖国医学遗产在体育运动中的应用。

5. 要重视体育理论、体育史以及其他有关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

6. 科研仪器设备和体育器材的现代化，是提高科研和运动训练水平的重要条件。要尽快改变我国在这方面十分落后的状况，从国外引进是有限的，应立足于国内，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有计划地研制一些急需的科研仪器和体育器材。拟于明年举行一次科研仪器（自己研制的）展览会。

7. 科学技术情报是科研工作的耳目。要及时了解和分析研究国外体育科技动态、成就和发展趋向，借鉴有益的经验，避免走弯路。

体育科研工作必须与国家经济发展相适应。安排计划和确定研究课题要实事求是，从现有的人力、物力等具体条件出发，集中力量，突出重点，扎扎实实地工作，争取早见成效。

为了保证任务的执行，会议有针对性地作了分工和布局。为力求取得实效，会议要求：

1. 各省、市、自治区体委和解放军的体育科研机构，可围绕自己的重点运动项目和国家体委关于“各单位准备第23届奥运会任务运动项目布局”规定的项目，确定研究课题。此外，也要作些基础理论和青少年运动训练的研究。

2. 体育学院除围绕教学和体育基础理论以及学校体育进行研究外，还应当对承担的奥运会项目安排研究课题。

3. 国家体委科研所着重研究优秀运动员提高技术水平和体育基础理论方面的问题。也要安排一定力量进行青少年多年系统训练和中、小学体育的研究。

4. 高等院校体育系（科）和体育教研室，以及某些重点中、

小学校体育组，是体育科研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建议他们进行学校体育和某些体育基础理论的研究。

5. 国家队，各省、市、自治区优秀运动队，解放军体工队和体育学校、业余体校，要围绕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开展科研活动。

会议还建议：

北京运动医学研究所侧重研究运动伤病和营养方面的问题；成都体育学院继续体育史的研究；成都体育学院附属体育医院和解放军体工队进行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结合防治运动创伤的研究；黑龙江、吉林体科所主要进行冰雪运动训练的研究；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国科发（78）计字458号文件，正在积极筹建的昆明体育电子设备研究所，其任务是研制体育电子设备和体育科研仪器；北京、成都体育学院，吉林、上海、山东体科所，湖南体工队科研科，河北体委科研室等单位，把科研仪器设备的研制列为本单位的重点研究项目之一。

商请卫生部，安排上海、南京、安徽、湖南、湖北、四川、山东、武汉、哈尔滨、中山等医学院校，进行一些运动医学课题的研究。

体育科技人员是实现和达到科技任务的关键。会议建议各级科研机构，把对科技人员的选拔和培养作为一项经常和长期的工作，不拘一格，广开才路，精心挑选和认真培养体育科技人才。

科研组织管理系统的建立和完善，科研工作的主要方向和任务的明确，是科研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和保障。从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体育科技人员在经过“文革”浩劫后科研基础的废墟上，几乎是从头开始，一边建设、一边发展，面对现实，结合体育事业发展的要求，解决了一个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为体育改革、为战略规划、为在国际大赛中争创佳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的成立与学术活动的开展

（一）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的成立与制度建设

1980年12月15日，在中国科协的领导下，在国家体委及有关职能机构的积极支持下，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在北京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会听取了学会筹备工作的报告，通过了学会的章程。这次大会建立了运动医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心理学、运动训练学和体育科学理论5个分科学会，并讨论了学会刊物编委会的问题。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及学科分会的成立，有利于把全国体育科技工作者聚合起来，为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和运动竞技水平，为在奥运会和国际大赛中创造优异成绩，共同努力，作出更大的贡献。

大会通过的《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章程》是科学学会制度建设的体现和依据。此后各分学科（专业）学会或研究会作为理事会领导下的学术机构相继建立。1981年6月，湖南在全国率先成立体育科学学会，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参照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的要求，成立了省、市、自治区科学学会，体育科学学会会员人数迅速发展（表5-1）。

表5-1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会员发展情况

年份	1980	1984	1987	1988	1989	1992
会员人数	184	5164	7571	8205	10925	15016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把组织建设当做各项建设的根本来抓，积极慎重地发展会员，加强分支机构的建设，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进一步扩大横向联系，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吸取不同学科、不同行业的有关人员参加学会组织，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设立了运动训练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心理学、体育信息、体育仪器器

材、体育建筑、体育理论、体育史、体育统计等分会。截至1992年底，据不完全统计，会员总数从1980年的184人，发展到1992年的1.5万余人。这些会员除来自体育系统和大专院校以外，还有约占总数10%的会员来自非体育系统。会员的分布遍及全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80%以上的会员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这表明，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既是一个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群众团体，又是一个人才荟萃、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的学术团体。学会还积极促进地方学会的筹建，截至1989年底，大部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体育科学学会。不少地、市、县也相应地成立了体育科学学会分会等组织。为便于学会开展工作，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组建了办公室，下设秘书处、学术处和书刊编辑部等职能机构，在常务理事会领导下，由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体育科学学会及各地、市、县的分会也逐步健全了办事机构，配备了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体育科学学会组织初步形成了以学科群面貌出现的庞大的科技队伍，形成了一个组织上纵向联系、学科上横向发展的学会体系。

1981年6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又公布了《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的几项工作制度》，就工作中的请示报告、召开会议、简报的编辑等作了较详细的规定，使学会各项工作更加有序和规范。

（二）学术活动的开展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及各省、市、自治区的体育科学学会，联合各（专业）学科分会，根据《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章程》的要求，积极开展了体育学术交流活动；组织重点课题的探讨；对我国重要的体育科技政策和问题进行研讨，发挥咨询作用；加强了同国外体育科技团体和体育科技人员的联系与交流；积极传播体育科研、教学和训练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1980年，召开了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第1届论文报告会暨第2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近500名代表

出席了大会。会间，共有200多位代表在各种规模的会上交流了280篇论文。论文数量比1964年召开的第1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增加1倍多，拓展了研究涉及的学科和领域。这些论文结合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和学科建设、运动训练的需要，在研究选题上注重了实用价值，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了科学性。很多论文是采用多学科交叉，在综合性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从整体来看，学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1987年12月15日，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第2届论文报告会暨第3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在石家庄市召开。这次大会报送的论文1082篇，入选论文412篇，会议报告242篇，书面交流170篇。这次报告会入选的论文，涉及几十个学科领域，议论作者是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体育管理人员、体育科技人员、高校体育教师、专业体育教师、运动队的教练员、管理人员、医务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具有中高级职称的近70%，中青年占80%以上。这表明，经过几年的发展，我国体育科技队伍得到了迅速的扩大，这支以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为主形成的队伍，覆盖了全国广大地区和多个学科。在这一届论文报告会上，围绕体育发展战略、体制改革、体育社会化、学校体育、专业体育学科基础理论研究、运动训练理论和实践等方面的论文，尤其在宏观决策理论研究和运动训练科学化方面的论文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更体现出科学性。

1992年12月8日，第4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暨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第3届论文报告会在山东潍坊市隆重开幕。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在大会上作了讲话，并深入到学科专题会场，听取论文报告。出席这届报告会的506人中，增加了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报送的论文1830篇，选录了538篇，其中会议交流和书面交流各269篇。会后论文编辑成册，并有部分论文刊登在《体育科学》上。

这届报告会，是我国体育科技发展中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除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的一些分会和专业委员会设专场讨论进行外，还

举办了“群众体育学术研讨会”“训练学研究研讨会”“奥林匹克精神与奥林匹克运动”等专题研讨会，在被选录交流的论文中，有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以及部委级课题，省市级课题占近三分之一。不少成果获得了国家级、部委级奖。这些论文，无论是理论性研究还是应用型研究，都更加注重联系运动实践。研究竞技体育、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的论文分别占入选论文总数的64.8%、18.9%、16.3%，显示了我国体育各分支学科逐步走向协调发展[1]。研究水平有所提高，研究方法和手段又有了较大的进步。

全国性体育科学大会及论文报告会的定期召开，既是对一个阶段体育科学研究成果的综合性汇报，又是对下一阶段体育科研的指导和促进。各省、市、自治区在每一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前都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严密的组织，各学科、各专业在各省、市乃至跨省、市、自治区间，进行交流合作，共同完成课题研究。一些专业学科、专业学会还定期召开了论文报告会。

随着学科建设的不断发展，全国体育科学大会所设学科为适应需要不断增加，至1992年，大会所设学科由最初的5个增长到14个。学科的增多，使研究得以更加深入，也有利于学科间相互渗透，进行综合性研究。

（三）科普教育与科技培训工作的开展

根据《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章程》规定，学会应将“努力普及体育科学技术知识”和“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需要，举办各种培训班”作为主要工作任务。在80年代，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及各省、市、自治区学科、专业学会，很注意把体育科普教育和科技培训作为重要的工作来抓。

根据体育科学的发展和体育事业的需要安排教学内容。80年代共举办了体育情报、运动生物力学、运动训练学、运动创伤、医

[1] 黄汉升．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科技发展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52.

务监督、电子计算机、运动心理学以及体育统计等学科的全国性的培训班、学习班、进修班数十期。其中每年举办一期的全国运动训练科学化培训班吸引了全国各地众多的学员参加，有力地促进了体育科研成果的推广运用和运动训练科学化进程。不少全国性二级学会也根据实际需要，采用多种形式举办培训班，如体育情报学会除了促进体育情报理论的自身建设，举办全国性体育情报学术讨论会外，为着重培训体育情报人才和普及体育情报知识，先后举办过包括管理干部和体育声像方面的进修班数次，来自全国 29 个省、区、市体委、体工队，体育学院，体育科研所以及部队的体工队等数百名学员参加了学习。学员提高了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为改进本地区、本部门的体育情报工作，及时为决策、管理、科研、教学与训练等提供信息，起到了很大作用，培训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体质研究会举办的“全国青少年体质研究干部培训班”组织了 16 次专题讲座和 15 次专题对口座谈，教学效果扎实而良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体育科学学会以及各地、市、县的分会针对培训量大、面广而参加全国性培训班的名额有限等矛盾，根据运动实践和提高素质的需要，采取“请进来”或“派出去”的办法，千方百计地为会员创造继续受教育的条件，通过多种渠道提供科技信息，如浙江省举办的“运动生物力学培训班”、四川省举办的“体育科技人员培训班”、辽宁省举办的“骨龄发育程度鉴别方法培训班”、湖南省举办的“电子计算机在体育中的应用学习班”，以及福建省举办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专题讨论”等等。不少地方学会还积极开展了体育科普活动，如湖北运动医学专业委员会，两年中在电台和报刊上发表科普文章 65 篇，有的会员还编写了有关的科普电影剧本等。《生命在于运动》杂志与《中国体育报》《健康报》和《中国老年》杂志在中组部、中宣部的支持下，联合举办了“老年保健讲座”两期。在京直接听讲的老干部达 1 万余人次；外地利用录音带或举办类似的讲座，听众达百万人次以上。人才培训和科普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了

人们的科技意识，传播了国内外先进的体育科技知识，它在不同程度上收到了开发智力、更新知识和培训人才的效果，对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体育科技体制改革与政策法规的逐步完善

（一）体育科技体制改革的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使我国经济和包括体育在内的社会各项事业走上改革之路，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奥运模式”的提出和确立为体育的对外开放创造了条件，为中国体育全面走向世界提供了机遇。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体育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形势喜人，形势逼人。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世界体育先进水平，只有解放思想，走改革之路。1981 年，开始了进行体育体制改革的调查研究和试点。1983 年，国家体委在给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中，进一步强调体育改革是当前工作的重要方面，并提出了 3 个“有利于”的改革原则，即“改革应当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办体育的积极性，有利于推动体育的普及和攀登世界体育高峰，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从 1979 年到 1984 年，是我国体育改革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遵照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结合体育工作的实际，提出了体育改革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在领导管理、训练、竞赛体制等方面形成了改革的基本思路。

1984 年在第 23 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的优异成绩，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随着我

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党和人民对体育工作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20号文件），对体育界提出了"锐意改革，勇于进取，不断作出新贡献"的要求。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原先在体育事业发展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体育科技体制逐渐显露出弊端。这些弊端概括起来主要有：统得过死，科研机构缺乏自主权；科研机构数量多，质量差，人力分散，发展很不平稳；科研与教学、训练有脱节现象，不能一体化；国家、省市自治区之间缺少科研分工协作，不能做到全国一盘棋，低水平重复研究泛滥；学科不成体系，缺乏决策研究能力，不利于发展体育系统工程。

1984年底，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了第3届全国体育科技工作会议，集中讨论了体育科技体制改革、体育科研机构整顿、改善体育科研条件等工作，并着重讨论研究了体育科研与运动训练相结合，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服务的问题。会议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体育科技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体育科技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现行体育科技体制不适应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科研与运动训练脱节、存在不重视体育科技工作的观念、没有把它摆到应有的位置上等。这次会议在总结交流这一时期体育科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央科技方针和体育工作的实际，明确提出了体育科学技术发展方针是"体育振兴要靠科学技术进步，体育科学技术要面向体育运动的发展"，为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并提出了体育科技主要任务是：在为增强人民体质服务中，重点抓好学校体育的研究；在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服务中，重点围绕亚运会、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夺取优异成绩开展研究。并要求体育科研要根据运动训练实践选题，研究成果应为运动水平、运动成绩的提高发挥作用，要采取比较有效的形式，促进科研与运动训练相结合。同时会议要求各级体委领导要重视体育科技

工作，要充分认识体育科技工作是整个体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育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要加强对体育科技工作的领导。同时会议提出了体育科技体制改革主要应遵守两个原则：一是有利于体育科研与体育运动实践相结合；二是有利于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体育科技体制改革也提出了具体措施。这次会议的最大成绩，就是按照中央的精神，明确了体育科技工作方针，是在体育科技体制改革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1985 年 3 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又进一步推动了体育科技工作的发展。

为此，国家体委经过长时间的酝酿讨论和调查研究，在 1986 年作出了《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系统分析了体育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明确了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提出体育改革要以社会化为突破口，以训练竞赛改革为重点，通过改革，把“以革命化为灵魂，以社会化和科学化为两翼，实现体育腾飞”的战略指导思想，并把它落到实处。

这一时期，各体育科研单位在体制改革和与运动训练相结合等方面都有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1986 年底，国家体委在成都召开了全国体育科技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集中研究和讨论了在新的改革开放时期，如何做好体育科技工作，讨论了国家体委体育科技管理的有关条例和“七五”期间体育科研课题。会议通过交流经验，研究讨论，进一步明确了体育科技工作方针，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鼓舞了士气，增强了信心。会议要求，要继续提高对体育科技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进一步加强体育科研机构的整顿和体制改革，处理好依靠与面向的关系、应用和开发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关系、成果应用与成果推广的关系、金牌与论文的关系，以及体育科学化与社会化的关系；不断提高科技人员的素质，为体育腾飞而奋发工作。至 1992 年，体育科技体制改革，进展顺利，改革效果明显。

（二）体育科技体制改革

1. 管理制度改革

根据现代管理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的具体情况，从加强体育科技管理理论和方法研究、建立一支专业化的体育科技管理干部队伍和逐步实现体育科技管理手段的现代化等方面着手，认真整顿、充实和健全体育科技领导体系。在领导体制上，实行所长负责制；在人事管理上，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在科研计划管理上，实行科研责任制或课题承包制。有些科技机构，还打破按学科建立研究室的组织结构，按照科研任务需要设立多学科、跨室的综合研究中心或科研组。在加强体育科研管理工作上，还通过法规、政策和具体条例，加强宏观领导，加速实现体育科技管理的现代化。1985年7月28日，国家体委下发了《体育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和《体育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奖励范围和评审标准实施细则（试行)》。1987年2月25日，又公布了《体育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管理条例》和《体育科学技术研究课题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有关体育科研管理的文件，为促进体育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体育科研工作的管理，调动广大体育工作者和体育科技人员积极性发挥了作用。同时引进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积极挖潜创收，努力改善科研条件和科研人员待遇。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进一步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管理方式方面，将备战亚运会、奥运会的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的具体管理职能由国家体委科教司转移到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各中心根据需要与有关单位签订合同，双方根据合同共同组织实施。这一改革，促进了各中心、运动队从被动接受服务向主动管理科技的转变；促进了经费投入从政府单一渠道向多渠道的转变；促进了从少数科研单位包揽课题向国家体委系统和各省市体委、科研系统与体育学院、体育系统和社会力量都积极参与的转变；促进了科研单位、科技人员从过去“下”队服务向“上”门竞争的转变；促进

了组织管理从过去单一的“课题”模式向更符合实践需要的多种模式的转变；也促进了政府部门职能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的转变。

2. 运行机制的改革

为保证体育科研系统组织能够正常、高效地运行，首先必须着手运行机制的改革。通过体育科研管理机构、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各学科（专业）学会，对体育科技工作进行了全面调整，对科研的任务和课题进行了分类管理，把以自选单项研究为主，转向计划指导，以多学科综合研究为主；研究机构从以扩大外延为主，转向充实内涵重视研究质量，发挥现有仪器设备作用，提高主体效能为主；从主要运用行政手段转向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和行政管理手段。重点抓了分类管理制度，对部分有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应用开发研究项目实行课题招标，采用合同制管理，或实行贷款、部分贷款管理；对综合性的重大科研项目，打破单位界线，加强横向联系，共同承包，并经专家严格审议论证，试行项目经费包干制结余提成的办法管理；对应用基础研究或体育实践需要的重大项目，或采取申请国家拨款或给予经费补助。据初步统计：1980—1984 年 5 年中，委管课题共 97 项，其中合同课题 29 项，经费回收 1.5 万元，约占课题经费的 1%，对昆明体育电子设备研究所等单位课题贷款百余万元。

其次，在运行机制的转变中，比较明显的是体育科技力量已经向运动训练主战场转移，提倡和鼓励广大科技人员深入体育运动实践第一线，集中力量狠抓重点项目的科研攻关和科技服务，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一改革措施促进了科研与训练结合，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3. 改革科技拨款制度

为使科研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面向经济建设的活力，各级行政部门的经费投入方式从对科研机构、科技人员的一般支

持，改变为以项目为主的重点支持。各项目管理中心也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充分重视体育科技。这不但是解决体育科研经费不足的根本途径，也是促使体育科研结构转变机制、面向体育发展实践和经济建设第一线的重要措施。如昆明体育电子设备研究所是国家体委直属科研所，在拨款制度改革中属于前沿的技术开发结构，通过实行合同制，削减事业费拨款，面向市场，在竞争中多渠道地争取科研任务和经费，实现了事业费自给。这个所自拨款制度改革以来，共争取各种纵向、横向收入上千万元。其他独立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体育科研机构，也逐渐形成了从体育、教育、科委以及企事业等部门多种渠道争取课题和经费以促进体育科研的运行机制，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体育科技拨款渠道单一的弊病，正在逐步得到根除。这说明经过几年的努力，科研机构通过拓宽任务来源，开辟各种经费渠道，功能扩大，活力大为增强。

4. 提出体育科技决策

1990 年 3 月，国家体委颁发了《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科技体制改革的意见》和《1991—2000 年体育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是我国体育科技工作 20 世纪 90 年代的指导性文件。为了把体育事业的发展引入到科学的、法制的轨道，1991 年又着手研究制订《中国体育发展与改革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并通过实施两个“科技工程”，加强了群众体育科技工作，努力改变群众体育科技工作长期相对滞后的状况。

（三）体育科技政策、法规的逐步完善

体育政策、法规的逐步完善，是改革深入的结果，同时又是使改革得以深入的保障。在体育科技体制改革、完善体育科技体制和强化科学管理的过程中，推出了一系列体育科技政策和法规，对体育科技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从 1981 到 1992 年，国务院、国家体委颁布和下发的有关体育

科技的政策和法规，可归为3类：

第一类，是关于高等学校培养体育科技人才的政策和法规。主要有：1981年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了《关于下达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的通知》。并批准北京体育学院（体育理论、人体生理学、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运动训练学），上海体育学院（体育理论、人体生理学、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运动训练学）、国家体委体育科学研究所（运动医学）为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1984年5月5日，国家体委下达《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1991年7月8日，国家体委、国家教委联合下发了《体育运动学校办校暂行规定》《三年制中等体育学校教学计划》和《体育运动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对体育运动学校实行规范化管理。

第二类，是直接关系到体育科技发展，宏观性的指导政策，主要有：1979年第2届全国体育科技工作会议后，国家体委于1980年8月制定的《1981—1990年体育科技发展计划纲要草案》。

1984年5月7日，国家体委发出《关于统一发布重要体育新闻的规定》。

1984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11月9日，国家体委发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的意见》。11月22—28日，全国体育科技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与会代表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的要求，总结交流了体育科技工作经验，研究了贯彻党的科技工作方针，解决体育科研与运动训练相结合的问题，以及科研体制改革等问题。1987年7月18日，国家体委发布了《关于制订体育法规程序的规定》。

1992年5月20—25日，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着重讨论通过了《中国体育发展与改革纲要》《体育事业十年改革规划和“八五”计划》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3个草案。此后，国家体委开始着手制订《体育科学技术十年（2000—2010

后）规划》。

第三类，是关于体育科技工作的政策、规定。主要有：

1985年7月28日，国家体委颁发《国家体委体育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奖励条例》和《国家体委体育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奖励范围和评审标准实施细则（试行）》。

1987年2月25日，国家体委下发《国家体委体育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管理条例（暂行）》。同年6月2日，国家体委下发《关于加强重大体育比赛宣传报道组织工作的几点意见》，并通知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城市体委，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切实把新闻宣传报道的组织工作做好，进一步完善体育科技的规章制度。

1989年7月10日，国家体委发布并施行《国家体委体育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

1989年9月22日，国家体委发布了《国家体委关于授予"体育工作荣誉奖章"的规定》。同年10月4日，国家体委又发布了《国家体委关于授予"体育事业贡献奖"的规定》。这两项规定都是为表彰在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而制定的。

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整个国家改革的不断深入，体育科技的政策、法规逐步得到完善。中共中央、国家体委发布的宏观性指导政策，是制订体育科技制度、法规的依据；体育科技人才培养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是促进体育科技发展的战略性举措；体育科技工作的政策、规定的制订，为完善体育科技的规章制度，对政策、规定的指向范围的具体实施、操作，提供了标准和依据，为建立体育科技的法律体系和政策保障体系，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第二节　体育基础性、应用性与战略发展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初，体育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在各个领域、学科（专业）全面展开。对体育科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术语，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体育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面向运动训练的应用性研究；把握全局和规划未来的战略性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基础性、应用性研究的开展

（一）体育人文科学研究

80年代初，改革开放使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逐步打破封闭状态和单一化格局，在当代科学发展和世界体育科学发展的影响下，我国体育理论界在对一些体育基本理论问题重新认识和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开展了对体育社会科学若干新领域的理论探索；同时，把一些研究成果运用于体育实践，极大地推动了体育的改革与发展。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我国体育改革和发展实践的需要，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一方面在基础研究上向深层次发展，另一方面开始承担起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咨询、决策、预测和战略研究方面的任务。在体育实践需要的推动下，体育社会科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同时并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相继提出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战略思想，为国家制订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任务、方针、政策和措施提供了依据，对体育宏观决策和体育事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80年代以来，我国体育理论界突破了“体育理论”的原有框架，扩展了视野，注意把体育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角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拓展了研究领域和范围。开始重视体育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相互关系的研究。随着体育运动的发展，体育社会科学积极引入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和知识，从过去仅仅从生物学和教育学研究体育，迅速发展为运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法学和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体育运动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立体的和综合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极大地促进了体育社会科学体系的建立，除原有的体育史学以外，产生了体育哲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和奥林匹克学等大量新兴学科，从而使体育社会科学逐步由过去的单一学科发展成为多学科体系。以下是80年代一些主要学科和研究领域发展的状况。

1. 毛泽东体育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的体育思想，是体育史学界关注的研究热点，也引起了其他领域研究者的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体育理论界对毛泽体育思想的研究水平上了一个台阶，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从过去单纯对《体育之研究》一文的一般原理、意义、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发展到较深层次的文化和心理研究，发表了很多有关毛泽东体育思想的论文。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对毛泽东体育本质观、价值观、伦理观、系统观、体育教育观以及方法论进行广泛而深刻的探讨；在研究方法上也从过去较为简单的言论与活动资料的收集整理转变到根源的探索、原理的阐述、本质的揭示、深层次文化心理分析，以及运用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生理学、系统科学等学科方法，使毛泽东体育思想的研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从而推动了该项研究向着更深入的方向发展。

研究者认为，毛泽东作为我们党、军队、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

论家，在漫长的革命实践中，长期身体力行从事体育实践，对体育发表了许多蕴涵着丰富思想内涵的文章、讲话和指示，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体育实践和思想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即青少年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的体育思想可以归纳为10个方面：一是以"物质第一性"为基础；二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三是坚持体育工作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四是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五是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六是主张体育的多元功能；七是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八是倡导磨砺吃苦能力；九是以实践性为重要特征；十是闪耀着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党的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体育思想，领导我国体育事业走上了改革发展的新里程。

2. 体育史和体育文化研究

作为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学科，体育史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体育理论界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体育史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曾有较大的发展，在国家体委领导下，陆续出版了《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和《体育年鉴》。1960年，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室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的体育史研究机构。该研究室作出了《中国体育史研究资料》和《中国近代体育史简编》等一批成果。但在"文革"中，体育史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体育史研究受到高度重视，获得了迅速发展，成为体育科学体系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1979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决定成立体育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随后，许多省市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和组织。1982年，国家体委文史工作委员会在北京成立。1983年，该委员会出版了体育史学术刊物《体育文史》。同年，中国体育史学会成立。1984年，中国体育史学会被国际体育史学会接纳为团体会员。1985年，国家体委批准成立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1983年至1986年，国家体委在成都体育学院举办了数届体育史教师培训

班和助教进修班，为后来体育史研究的开展培养了大批骨干和人才。1979年，成都体育学院首次招收体育史硕士研究生。1990年，为配合北京亚运会的召开，中国体育博物馆在北京开馆。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体育史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仅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在《体育文史》上发表的有关体育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就达1600余篇，正式出版的体育史教材和各类专著达100余种，并和国际体育史学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学术界文化研究热的兴起，体育理论界也开展了对体育文化的研究和讨论，研究的热点是体育与文化的关系、文化对体育的影响以及体育文化的内涵等。从80年代中期始，以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为中心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对体育文化进行了探讨，于1986年在成都召开了首届体育文化研讨会，在全国体育理论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文化对体育的影响也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多数学者认为，体育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它的产生、发展必然要受到整个人类文化各种因素的制约，它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宗教、伦理观念、审美意识等其他文化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时期或一定区域的社会文化形态不同，而社会结构、民族风俗、生产力、体育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

体育这种文化的形态是由社会文化形态决定的，社会文化形态不同，表现出来的体育形态也就不同。体育活动是由有思想的人进行的，体育不仅是为了强身健体，也是社会及个体文化生活的需要。在现代社会里，体育是实现人的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为了塑造一代完整的全面发展的新人，使其具有新的观念、意识和健全的人格与心理。还有的学者认为，体育运动是只有人类才能创造出来的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体现着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它具备文化的各种特征，因而体育运动是文化的一部分。

体育文化的概念应该如何把握，是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学

者们认为，体育文化是一个模糊概念，就其范畴和研究对象来说有3个层次。一种观点认为表层是运动形态（体育活动），中层是制度形态（体育体制），内层是观念形态（体育观念）。另一种观点认为，外层为精神物化层，中层为精神外化层，内层为精神内涵。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体育文化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体育观、体育价值观、体育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等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及反映这一形态的体育方式、民族习俗、心理特征、审美情趣等。也有的学者认为，体育文化的范畴包括体育的科学研究、体育的价值、观念、意识、心理等社会因素，研究体育文化主要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体育，也有的学者直接表述了体育文化的概念，他们认为：体育文化是指有关人类体育运动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大体包括体育意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制度和体育的物质条件❶。

3. 体育哲学研究

我国体育理论界从哲学角度来研究体育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1年，我国体育理论界在沈阳体育学院召开了第1届体育辩证法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明确了体育哲学在体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1982年，第2届体育辩证法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体育学院举行。与会代表广泛讨论了体育哲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诸问题，并正式将体育辩证法改为体育哲学。1983年在福建泉州举行了有来自12省市33个单位参加的体育哲学与体育经济学研讨会。1985年，体育哲学的研究正式被纳入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的领导之下。同年8月，在福建永安市召开了以"体育科技发展战略的哲学思考"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1987年8月，在湖南桑植召开了体育哲学学科理论建设学术讨论会。

上述有关体育哲学的学术会议的召开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体育哲

❶ 课题组. 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36.

学研究的开展。在这些会议上，发表了大量有关体育哲学的论文，对体育哲学进行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并出版了《体育哲学基础》和《体育哲学》等专著。由于种种原因，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体育哲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低潮期，这使得20世纪80年代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黄金时期。

4. 体育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化研究

中国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80年代初，为了克服体育过分集中于国家办的弊端，发动全社会办体育，国家体委提出了“体育社会化”的方针。此后，体育理论界开始关注和涉猎体育社会化问题的研究，并尝试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我国群众体育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如对国外大众体育高潮形成原因和特点的分析、我国群众体育发展过程中各种制约因素的形成与解决、对球迷骚乱的社会原因的阐释、对中国体育训练体制弊端和改革的社会调査等等。1985年左右，发表了一批较有价值的体育社会学方面的论文。1987年，国家体委在《关于加强体育理论建设的决定》中，提出要“有计划地加强体育社会学研究”。同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设立了体育社会学组。1987、1989、1992年分别在苏州、北京和银川召开了3次体育社会学研讨会，就学科建设、研究方法、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已有5部《体育社会学》教材和专著陆续问世。1991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将“体育社会学”列为词条。这标志着社会学界正式承认了体育社会学是该学科的一个分支。经过80年代的建设与发展，体育社会学已经成为体育科学体系中一个正式的学科。北京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等先后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

80年代体育社会学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是开展对“体育社会化”问题的研究。研究者认为，80年代初之所以提出并逐步推进体育社会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和体育运动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

求。随着生产的增长、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改革的深化，体育全面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已成为必然趋势。必须在体育体制改革中推行社会化，突破过分集中于国家办体育的旧局面，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的新格局，逐步完善运行机制，才能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满足人民对体育日益增长的需求。

随着体育社会化的发展和研究的逐渐深入，研究者对体育社会化的内涵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一种意见认为，体育社会化是从“人的社会化”这一概论借鉴引申过来的，体育社会化就是体育“改造自己，适应社会，实现自己的社会性”；“体育作为社会的参与者，必须与不同的社会相适应，协调一致”。这里既包括个体的社会化，也引申到群体的社会化。概括起来，体育社会化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是“使社会（包括男女老幼各色人群，各类组织、团体）都认识和理解体育，支持并参与体育”；“体育社会化的实质是社会对体育的全面参与和全面占有”。另一种意见认为，体育社会化是从社会这一基本概念派生、演绎而来。社会是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是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从而认为，社会化是指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社会行为、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等所有社会现象之间相互作用和联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整体化的过程和趋势。而体育社会化就是现代社会这种整体性在体育领域的反映。体育社会化属于社会生活社会化的范畴，就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经济的发展，体育逐渐成长为独立的社会过程，体育结构复杂化、体育内部及体育与社会各方面联系日益紧密的状态和趋势，这是现代社会体育的特征。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体育社会化的实质可概括为体育的社会性和社会办体育两个方面。一方面，体育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因素，是促进个体社会化的过程，由此而提出体育对社会的适应性，社会（包括各色人等、各类团体）对体育的参与性；另一方面，体育与社会其他领域之间存在着互动性、整体性、制约性，由此而产生社会办体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两方面互相渗透，互为因果，构成体育社会化

概念的基本内涵。有关体育社会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加深了对体育社会性的认识，丰富了我国体育社会化过程的理论，对体育社会化的实践产生了积极的作用[1]。

5. 奥林匹克研究

中国的奥林匹克研究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才起步的。1988年，中国体育史学会在四川省平武县召开了首次奥林匹克运动史研讨会。与会代表主要就奥林匹克运动史和奥林匹克文化展开了讨论。80年代末90年代初，围绕北京申办奥运会，出现了体育理论界第一次奥林匹克研究高潮。1989年，奥林匹克出版社在北京成立，并出版了《顾拜旦文集》等著作。1992年，国家体委和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研讨会”。与会代表从各个方面对奥林匹克运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993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体育学院通用教材《奥林匹克运动》，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奥林匹克运动教材，也是第一部全面介绍奥林匹克的书籍。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亲自为全书及其各篇作序。此后，各体育院校开始开设“奥林匹克运动”课程。随后，用于中小学的奥林匹克教材《奥林匹克知识》与《奥林匹克故事》也相继问世。另外，在这一时期，体育理论工作者也发表了一批以奥林匹克史、奥林匹克思想研究为主体的学术论文。

1992年北京第一次申奥未能成功使奥林匹克研究进入了相对低落时期。但80年代和90年代初这段时期的奥林匹克研究为后来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1] 课题组. 我国体育社会科学体系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38.

6. 体育管理学与体育经济学研究

体育管理学科是在原来“体育行政”课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中国的体育管理学研究逐步建立，并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

1982年国家体委科教司在成都体育学院召开的全国体育院校工作会议对中国体育管理学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这次会议研究了新兴学科的建设和分工问题，决定把体育管理学作为重点建设的新兴学科之一。此后，由武汉体育学院牵头，我国第一本《体育管理学》试用教材于1984年出版。在此基础上，连续举办了两届全国体育管理学讲习班，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上百名教师和干部参加，为该学科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并标志着体育管理学在中国的初步建立。1985年，北京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设立体育管理学本科专业。同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全国体育管理研究会学术讨论会”。这是我国第一次全国性的体育管理学学术会议。1986年、1988年分别在山东威海和广西南宁召开了全国体育管理学术论文报告会。1987年，在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社会科学分会下面正式设立了体育管理学组。此后，在该组的领导下举行了一系列学术活动，为中国体育管理学的建设与发展发挥了核心作用。1989年正式出版了全国体育院通用教材《体育管理学》。至90年代初，各体育院校的专家学者陆续出版了体育管理学教材和论著20余种，并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

中国体育经济学的研究也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80年代以来，我国体育运动的迅速发展，不仅提出了建立体育经济学的需要，也提供了研究的条件。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后在1985年的全国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和1987年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提出要研究体育运动的经济问题，建立中国的体育经济学。体育理论学术界也开始关注体育经济学的研究。至80年代末，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体育经济学的论文已达

200余篇，多数体育学院开设了体育经济学课程，并编写了教材与讲义。1988年，国内第一本《体育经济学》专著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1990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体育经济学概论》。这两本专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体育经济学的初步建立，并为20世纪90年代该学科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7. 关于体育科学属性和体育概念的讨论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体育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归属问题成为体育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围绕这一问题，国内体育理论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一时期体育科学属性问题之所以引起关注，其背景是随着80年代全社会的“体育热”的兴起，体育科学的研究开始受到体育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体育科学也开始由几个单一学科向学科体系化发展和演进。因此，体育科学研究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归属和地位问题，自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成为这一时期的热点问题之一。另外，由于70年代末以来，随着社会上的思想解放和体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我国科学界的一些知名学者对现代科学体系的分类、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属性等问题，提出了颇有影响的见解，成了科学界的热门话题，从而启发了体育科学工作者的思路，激起了研究体育科学的属性和在科学体系中的归属问题的兴趣。80年代对体育科学归类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见：

（1）认为体育科学属于自然科学

一些学者提出了体育是一门自然科学，属于生产力范畴。认为体育科学属于自然科学属性的主要理由是：体育是人通过体育运动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掌握活动技能，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实践过程。它作为一门科学，来源于人的体育实践，其研究成果反过来又指导人的体育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人们运动的规律和人通过运动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规律，是体育科学的特定规律，是体育科学特定的研究内容。这些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规

律，反映了体育的本质特征，任何阶级、任何个人都可以利用它为自身利益服务，但不能违反它。人的身体是一个自然物，通过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是一个自然现象，它存在的规律是自然规律。因此，体育科学属于自然科学是毫无疑问的。持这种观点的一些学者还认为，要把体育的思想、观点、路线、方针、政策等和体育严格区分开来。体育的思想、观点、路线、方针、政策是社会现象，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对体育的发展有直接影响（推动或限制），但它并不是体育运动实践的直接反映，不能说明人在运动中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客观规律，因而不能归属"体育"概念，不能包括在体育科学本身之内。这同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属于自然科学，而对它们的观点、制度、教育作用等上层建筑部分不能归于自然科学范畴是一个道理。如果把这些上层建筑部分的内容当做某些科学本身的话，客观世界就没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分了。

体育科学属于自然科学的观点提出后，引起了体育界的广泛争论，不少学者和专家认为，把体育科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的见解，是与把体育看做一种纯粹增强体质的手段和自然过程的观点分不开的。这种观点反映了我国长期以来把人体运动的生理机制和生物力学等问题作为体育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的实际情况，既与把体育理解为单纯增强体质的身体活动的观点有关，也与我国长期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有关。体育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体育，而体育并不是一种天然的自然现象，也不是单纯人和身体的机械运动和生理活动，它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人直接参与的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和社会文化现象。体育是以人的身体运动为基础的，但并不是身体纯自然物的运动，人的体育运动既有身体活动，又有心理活动，有特定的目的，并且蕴涵着人类文化，反映着人与人的关系。在体育中包含着人体运动这低一级的生物运动形式及其他更低级的运动形式，但不能归结为生物等低级运动形式。如果把体育看成仅仅是人的骨骼、肌肉的运动，这就抹杀了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体育与动物身体

本能活动的区别。因此，以体育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体育科学，从整体来看不属于自然科学。至于体育科学内部有一部分源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人体运动的学科，那是体育科学内部的层次结构问题，并不能决定体育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归属。

(2) 认为体育科学归属于教育科学

说体育科学归属于教育科学的见解，其主要论据是：顾名思义，体育的关键在一个“育”字，体育是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体育要研究的中心问题，不是“人是什么”和“人干什么”，而是怎样从身体方面培育全面发展的人。从某种角度说，这体现了人的意识、意志和愿望在社会实践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它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一种社会现象，有明显的社会属性，而决非自然现象。体育是属于教育的内容之一，体育科学研究的中心是怎样从身体方面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因此，体育科学应当属于教育科学之下的分支学科。但更多的人认为把体育科学归属于教育学科的见解，是因为他们把体育仅视为一种教育现象，把体育的整体仅视为教育一部分的传统观念而产生的。从历史上看，在西方一些国家里，很长一段时间，体育主要表现为学校体育，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时研究体育、鼓吹体育、实施体育的主要是教育家。在现代社会里，体育虽然还是教育的重要内容，但它已远远超出了学校教育的范畴，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体育的概念、结构、功能都大大发展了，体育已成为一种结构复杂、功能多样的与教育并列的文化形态；现代体育与教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相互交叉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把体育科学视为教育科学下属的分支学科的观点，已经落后于当代体育运动和体育科学发展的现实。

(3) 认为体育科学归属于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的综合学科群

体育界的一些学者认为，体育科学既非研究天然的自然现象，又非研究单纯的社会现象，而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科学。其理由是体育所研究和涉及的问题不仅与自然科学的许多

学科，而且与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均有密切关系。它既包括体育史、体育原理、体育概论、体育哲学、体育社会学、体育行政管理、体育组织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学科，又包括运动形态学、运动生物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医学以及各运动项目的理论和实践等自然科学的学科。概括起来说，体育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所创造的有关增进人的健康，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理论观点、手段、方针、政策、体制和制度、场地器材设备等全部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因此，不能把体育这门科学笼统地归入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之列，而应称之为一门综合科学。

大部分学者认为，体育科学具有综合科学的性质，体育科学可归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的综合科学（交叉科学）之中。但也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分类设想在实践上、操作上会有很大困难。他们的理由是：随着科学的飞跃发展，今后新兴的、具有交叉科学、综合科学性质的学科和学科门类会层出不穷，如果把综合科学单独列为一个科学门类，就会遇到两方面的困难：一是综合科学这个门类会日益膨胀，内容日益庞杂，在其内部再要归类分层就十分困难；二是会使这些综合学科与其派生来源、与其母学科失去联系，不利于理清学科源流，不便于科技管理部门、各系统对科学事业的管理。对综合性质的学科及学科门类较为可行的处理方法是：依据科学分类的原则及该学科与其他学科关系的密切程度、学科的派生来源，确定这一学科在科学体系中的归属。

（4）认为体育科学归属于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

把体育科学归属于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的观点，是在钱学森关于科学分类的主张基础上产生的。钱学森认为：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有 4 个组成部分，概括一切的是哲学，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辩证法）这两个桥梁和自然科学、数学科学、社会科学相联结。在这 3 大学科之下，介乎用来改造客观世界的工程技术之间的是技术科学。这种科学分类主张把整个科学技术分为 4 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哲学，第二层次是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第三层次是技术科学，第四层次是工程技术。依据钱学森的这一见解，一些体育学者主张将体育科学列入“技术科学”类，将“体育专项技术”列入“工程技术”类。把体育科学列入技术科学（即第三层次），认为体育科学可下分为3类，即自然科学类、管理科学类、社会科学类。体育科学3大类中的各个学科，如运动学、体育经济学、体育教育学等均属于第四层次。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上述这种对体育科学的归类、归属的见解，是对钱学森科学分类主张的误解。钱学森在其科学体系分类中，从来没有把技术科学和应用技术作为一个科学门类。他多次指出，在整个科学技术体系中，在大的科学门类中，都包括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工程技术3个层次。他认为与自然科学3个层次相对应，社会科学也可以分为基础科学、应用的理论学科、应用的业务性学问。在具体学科划分上，他将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心理学归入技术科学层次。上述3个层次的划分回答的是科学体系和大的科学门类的层次结构问题，并不是科学体系的分类问题。因此，说体育科学属于技术科学和应用技术，并没有回答体育科学分类体系中应归属于哪个门类的问题。

（5）认为体育科学归属于人体科学

认为体育科学归属于人体科学的观点，其依据是钱学森对科学分类的补充意见。钱学森在原先提出的现代科学分为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3大类之后，又补充了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3大类。钱学森提出，人体科学研究的范围是人体的功能，如何保护人体的功能，并进一步发展人体的潜在功能，发挥人的潜力。他认为人体科学也包括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技术这3个层次，并设想人体科学从应用技术、工程技术讲起，可以先讲体育技术，这也包括武术杂技，以及中国戏曲中的武打功、身段功。为上述应用技术提供直接理论依据的是技术科学的学问。联系体育技术的是运动生物力学和运动生理学。前者运用力学原理研究身体各类动作的合理性，后者研究运动员的心理在体育运动中的状态和作

用。在钱学森上述论述的启发下，一些体育界的学者认为，体育科学在现代科学技术总体系中的位置，是和医学科学一样同属于人体科学的组成部分。把现代体育科学体系划分为两大组成部分，一部分是以人体在进行身体锻炼条件下的规律性为研究对象，它包括一系列不同层次的学科，体现着从基础理论研究到实际应用方面的科学认识；另一部分则是以体育科学、体育工作者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多种学科，构成一组学科的集合体（或称科学群）。

对于体育科学归属于人体科学的见解，不少学者认为从人体科学的研究范围和学科性质看是不合适的。钱学森认为，人体科学研究的是人体的功能。人体科学有 3 个层次：体育技术、医疗学科等，属于其中的应用层次；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组织学、胚胎学、遗传学等属于基础科学；联系二者的中介是技术科学，包括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理学、人体工程学、病理学等学科。可见，人体科学是从人的生物属性方面来研究人体的功能，以达到保护人体的功能、发展人体潜在的功能、发挥人的潜力的目的。尽管体育科学的某些学科和体育技术被列入人体科学的技术科学或应用技术层次，但这只表明体育科学与人体科学有某些交叉，并不能说明体育科学整体上应归入人体科学之中。体育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体育及体育运动中人的社会性，并不属于人体科学研究的领域。研究体育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的体育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归入人体科学中去是不合适的。

体育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社会活动，体育科学也是与众学科有广泛联系的科学群。体育科学属性既受一定的哲学思想指导，又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的发展的影响。因此，人们根据不同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对体育科学归属问题进行了分析与研究，研究的角度归纳起来主要有：从运动形式上对体育科学属性进行研究；从整体观出发，辩证处理体育科学中所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的关系并对其进行研究；从现代科学体系及与体育科学各种

学科在其中的位置进行研究。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造成了对体育科学属性的认识难以统一，便产生了上述诸种意见。

虽然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体育理论界对体育科学归属的看法观点不一，有的甚至是对立的，但这些意见都各有所据，反映了体育科学的不同侧面和个别特性，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着合理的因素。这说明我国体育工作者思想活跃，勇于探讨；也说明体育科学的归属问题不但是个新问题，也是个难题。尽管这一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但运用科学理论和方法去研究，总是有益的。在探索过程中展开不同意见的争鸣，在同中求异，在异中求同，有助于认识的深化。对于体育科学属性的讨论，多数人的意见是，体育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体育科学中存在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种学科，体育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

除了体育的属性问题外，20世纪80年代，体育理论界还就体育概念等问题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讨论。

关于究竟什么是“体育”，其内涵和外延如何，“体育”与“运动”“竞技”等概念之间的是什么关系，学术界历来看法和观点不一。由于概念不统一，词语混乱，造成了政府起草和下发有关文件、讨论工作和从事体育研究时常常遇到困难。为此，国家体委有关部门于1984年在山东烟台召开了全国体育理论学术研讨会，专门就一些体育的基本问题进行研讨。在会上，持不同看法的专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虽然未能完全统一看法，但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明确体育的概念，使体育词汇规范化，无论对于认识体育的规律，发展体育理论，研究体育科学属性、体育科学思想体系、体育本质或对闲暇体育的理解，都具有重要意义。经过激烈讨论，形成了相对一致的意见。80年代后期出版的全国体育院系《体育理论》统编教材在编撰过程中，采取了既考虑到中国人的习惯，又考虑到与国际接轨，使用了综合性的定位和定义方法。将体育及体育的下位概念即体育教育、竞技体育、群众体育进行基本的定位和定义，从而明确了体育的概念，界定了体育的内涵和外

延，从而为中国体育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体育自然科学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我国的运动医学等学科的发展处于引进和学习苏联及欧美有关理论与方法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的运动医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等体育自然学科逐渐建立起来，并开始为运动员提高成绩提供科技咨询与服务。

1. 基础科学研究

在运动医学、运动生理学及营养学、运动生物力学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某些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少研究成果都是国内先进水平，有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国家体委运动医学研究所共同完成的“兴奋剂检测方法的研究与实施”研究成果，通过对绝大多数禁用药物的代谢研究，找出特征代谢产物，建立了完整的兴奋剂色谱质谱数据库，在总结规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具有我国特色的准确可靠的分析方法，有很强的科学性和独创性，曾准确无误地完成了 1990 年北京亚运会、北京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大型比赛的检测任务，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该成果于 1991 年获得国家体委体育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后来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由北京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完成的“运动员末端病的防治研究”的成果，从发病机制、解剖、病因病理，以及临床手术等方面作了系列的研究，具有独立见解，提出了正确的命名，澄清了国内外对该病的含混认识；运用生物力学知识分析末端结构的发病原因的研究难度也很大，有较高的学术水平，1987 年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国家体委科研所承担的“耐力训练后大鼠训练心肌组织学、酶组织化学、超微结构及形态计量学研究”的研究课题，从组织学、酶组织化学、超微病理学及显微形态计量学诸方面，展示了在不同方式耐力训练下不同性别实验动物左右室心肌、内膜下心肌存在着不同

的适应性反应。该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上一些学者的极大兴趣（1991年获得国家体委体育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该所在对运动延迟性肌肉和肌肉疲劳机制的探讨，乳酸无氧阈机制的研究，骨骼肌纤维组成、结构与运动能力——肌活检技术在体育中的应用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高质量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肌肉运动后延迟性酸痛的研究”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科学荣誉奖。

2. 运动员科学选材和运动训练科学化研究

（1）运动员科学选材的研究

运动员科学选材的研究，是由国家体委科研所、上海体育科研所、广东体育科研所、辽宁体育科研所、北京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甘肃体委科研室8个单位承担的《优秀青少年运动员选材研究》课题。该课题被国家科委列为国家级科研课题。参加研究工作的239名科技人员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对优秀运动员及青少年运动员4871人的身体形态、机能、素质、心理、遗传等102个指标进行了测试。获得原始数据74.8万多个，经过计算机处理和分析，完成了选材论文123篇，对田径、游泳、体操、排球、足球等运动项目的科学选材和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选材数据和某些理论依据，于1985年获得国家体委体育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87年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青少年体质的研究。为了掌握我国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国家体委两次与有关部委对青少年体质进行调查研究。第一次，是1978年至1983年，由国家体委、教育部、卫生部共同组织1500例抽样测试，掌握了大量的数据。第二次，是1983—1986年，由国家体委、国家教委、卫生部、国家民委共同领导和组织的“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研究”，对29个省区市28个民族98万多学生的体质、健康调研，共获得28个省区市7—22岁汉族学生和14个省27个少数民族学生29项指标的原始检测数据14779341个，为制定《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学生体育锻炼标

准》和《军人锻炼标准》等提供了科学依据。这项课题于1989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 运动训练科学化的研究

1986年，国家体委组织全国30多名主要学科的专家、学者，成立《运动训练科学化探索》课题组，进行了一项大型的综合性应用研究。其成果的完成和推广应用，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科学地、系统地论述和总结了提高运动训练科学化水平的方法和手段，广泛介绍了科学训练最新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对我国运动训练科学化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该项成果于1989年获得国家体委体育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我国优势竞技运动项目发展规律的总结和发展趋势的预测”研究。面对一些优势项目正面临危机的状况，同时也根据加强运动训练科学化的需要，国家体委组织了“我国优势竞技运动项目发展规律的总结和发展趋势的预测”研究课题。参加课题研究的有女排、乒乓球、体操、跳水、举重、游泳等8个项目的近40位专家、学者、教练员和管理人员。通过研究探索了各项目发展的内在规律，认真总结分析了我国各项目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科学地预测了未来的发展趋势，结合我国运动项目的现状、特点，及时地寻找相应的对策，跟上世界竞技水平飞快发展的步伐，力争继续保持优势。根据运动训练需要，科研人员还与训练部门密切配合，研究制定了田径、体操、举重、游泳、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9个运动项目的措施，其成果获国家体委体育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987年，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和科学训练的需要，国家体委组织了国家体委体科所、训练局，北京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以及上海、湖南、云南、河南、山西等体科所56名有高级职称的专家、青年科研人员，对“我国优秀运动员的机能评定”课题进行了研究，这一国家体委的重点研究课题，包括如何制订机能评定制度和机能评定的新指标、新方法等问题。经过科研人员的深入研

究，总结了机能评定的方法和手段，阐述了优秀运动员机能评定的内涵和外延，运动医学检查的目的、内容、要求、注意事项、结果评定和处理原则，提出了机能评定的常规或常用的20个指标及其测定方法、标准和注意事项。系统介绍了25个运动项目运动员机能评定的特点和各指标的具体应用。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著了国家体委体育科技成果专辑《优秀运动员机能评定手册》。这是一部科学性和实用性很强的专著，是国内第一项运动员机能评定综合性研究成果。

国家体委组织专家编著了《血乳酸指标测定与应用手册》(1992年获国家体委体育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并举办了多期培训班，加强指导，使血乳酸指标更有效地为科学训练服务。此法近年来已推广应用于许多运动项目，已成为教练员掌握和安排训练负荷的主要依据。山东省生物研究所研制的“S21A—30血乳酸分析仪”和“乳酸酶膜及其配套试剂盒”，荣获了1991年国家体委体育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3. 应用性研究

现代科学的发展，给体育科学提供了许多新理论、新技术，推动体育科学迅速发展，并取得了可喜成果。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就有12项体育科技成果获奖，它们是《乒乓球的打法类型与技术分析》《恒力矩自行车测动器》《游泳相应速度表》《运动员关节软骨损伤、机制、修复、再生的研究》和《我国优秀马拉松、中长跑和自行车运动员呼吸循环机能的研究》等。

根据全国体育科技工作会议对体育科技提出的主要任务，80年代体育科研主要是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服务。重点围绕亚运会、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夺取优异成绩，根据运动训练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选题，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应为运动水平、运动成绩的提高发挥作用。

为帮助教练员、运动员进行科学训练，提高训练效果，科技人员研制了一批实用的体育仪器器材，并在运动训练中得到推广应用。针对乒乓球训练的需要，研制出科学性、智能化程序高的“B－82型乒乓球发射机”，并获世界尤里卡金奖；为解决短跑运动员速度障碍问题，研制了“速度牵引机”，经过科学训练，打破了我国男子百米多年徘徊于10.4～10.5秒（手计时）的局面，提高到10.26秒；为解决游泳运动员接力和转身技术问题，研制了“接力测试仪”和“转身测试”，改进了游泳接力和转身技术；为射击运动员研制了“射击运动员抗疲劳眼镜”，获得了1987年国家体委体育科技进步奖二等奖，“速射模拟训练靶”获得了1988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还研制了具有先进水平的体育科研仪器，如“肌纤维组成的无损测定方法与仪器”获得了1988年国家体委体育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三维测力平台微机专用系统”获得了1991年国家体委体育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昆明体育电子设备研究所，经过十多年的探索研究，吸取世界先进技术，完成了田径比赛成套电子设备、大型彩色显示屏、游泳电子计时成套设备等的研制。该所与国家体委电子信息中心合作研制完成了“第11届亚运会计时计分系统”，荣获了国家体委体育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在这一时期，电子计算机也开始应用于体育训练和比赛中，如“第6届全运会电脑管理系统”（获1988年国家体委体育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计算机排球技术统计系统”（获1991年国家体委体育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和“三维测力台组合计算机同步测试系统的研制和应用”（获1992年国家体委体育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等[1]。

---

[1] 中国体育改革十五年//国家体委文史工作委员会，全国体总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 体育史料：第18辑.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

二、体育战略发展研究的兴起

（一）开展体育战略研究的背景与过程

进入20世纪下半叶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生活和现代体育的发展突飞猛进，相互间的联系也日趋复杂，科学决策对于发展过程和结果的影响也越来越突出。80年代，我国的体育发展战略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开展体育发展战略研究是80年代推进我国实现体育决策、管理科学化的一项重要措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体育决策与管理的科学化，也推动了体育科学的发展。

自1983年开始，体育战线在较大范围内开展了对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的研究。全国性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段时间研究的成果与进展状况。1984年8月，在北京第一次召开了全国体育发展战略、体育改革会议，这次会议交流了关于体育发展战略和体育改革的调研成果，座谈《2000年的中国体育》，研究了当时体育改革的方向、原则、方针、步骤，酝酿了总体改革方案。1985年8月13日至23日，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的全国体育发展战略讨论会上，成立了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这次讨论会理论联系实际，探索领域较广，进一步研讨了体育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对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世界体育强国问题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并提出了若干战略性对策建议。这次讨论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体育发展战略学术讨论会，在我国体育发展史上是一次创举。

1986年以后，体育战略研究由总体研究转入重点课题研究。1986年3月至5月，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分别召开了关于中国体育事业指标体系、我国学校体育发展战略和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三个课题研讨会，中心要求是共同研讨各该课题的指导思想、

主攻方向、课题内容以及协调分工等问题。研讨会突出强调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密切配合，从实际需要出发，着眼于未来发展战略，围绕决策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确定课题。1987 年 8 月，在北京市密云县又召开了中国体育发展战略讨论会。这次会议的大会报告和讨论展示了 1986 年确定的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等 30 多个课题中已经完成的部分研究成果。

1990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3 日，在河南省洛阳市召开的全国体育发展战略讨论会上，总结了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成立以来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的进展情况，讨论了国际、国内的体育形势，进一步研究了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会议认为，体育的发展必然受到国家发展的总战略和体育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国家对体育可能的投入水平的制约；体育的发展必须在其外部与经济建设和教育、科技、文艺、卫生等方面的发展相协调，在其内部实现群众体育发展与竞技体育发展相协调。

（二）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的制订

1. 体育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20 世纪 80 年代在讨论体育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人们认为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世界体育强国，必须确定一个正确的体育发展战略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应包括从实际出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发展道路，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等几个主要内容。

（1）从实际出发，走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发展道路

在 80 年代体育战略指导思想的讨论中，不少学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具体分析了我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管理体制、地理环境、人口资源、人民生活水平和需要层次、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对体育事业带来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回顾和总结了我国或本地区体育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研

究和制订体育发展战略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分析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基本国情，通观全局，掌握体育发展的进程及其规律和特点，才能切合实际发展的需要。体育发展战略的研究要考虑国际因素的影响，学习各国一切有用的经验，但决不能搞“照抄”战略，一切照搬外国的模式和做法；也不能搞“封闭”战略，一切都要自力更生；更不能搞短期“赶超”战略，一切都要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或超过世界体育强国。要根据我国体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我国开始全面登上世界体育舞台的有利时机和一切可能的条件，直接把一些世界新技术运用到我国体育领域中，特别是运动训练中去。坚持学习、继承与创新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切合我国国情地取天下之长来丰富和发展中华体育，创造性地走自己的路，就可以较快地把体育搞上去，在一些主要方面达到体育强国水平。在走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发展道路过程中，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占有重要地位，民族传统体育应当与现代竞技体育比翼齐飞。否则，我国体育就不能在世界上大放光彩，也不能成为世界上体育项目最丰富多彩的国家。

(2)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在这一时期的关于体育发展战略的讨论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体育的发展离不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和需要。体育要面向现代化，是指体育要很好地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体育要面向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集中地表现在增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保卫者的体质，开发人才的体力和智力资源，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体育要面向世界，是开放政策的需要，也是体育自身的国际性和竞赛性所决定的。1979 年我国恢复奥委会合法地位之后，体育全面地走向世界，特别是竞技体育几乎天天都在横向比较，参加世界大大小小的竞赛，面临着与世界体育强国争雄的形势，因而强调体育要面向世界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体育要面向世界，必须深入地对体育发达的国家和不发达的国家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消化吸收国外的好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体育

要面向未来，既要使体育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从预测未来社会经济、科技发展中，筹划体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又要应付世界的新挑战，培养明日之星。

（3）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又是体育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在80年代的讨论中，大部分学者认为，随着我国四化建设的进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身和全民族的全面发展问题将更加关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用于学习、娱乐和休息的时间增多，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活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余暇生活中对体育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体育将成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成为人们消费的重要内容。因而，用发展的眼光来透视体育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扎扎实实地做好体育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既是体育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体育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

2. 关于体育战略目标的选择

自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中号召“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之后，人们对体育强国概念的内涵以及实行这一战略目标的可行性和措施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对体育强国的认识

体育强国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动态概念，是世界各国进行比较中得出的概念。要理解体育强国在世界体育格局中的位置，就要把中国体育放在世界这个大参照系中去审度，离开了比较分析，体育强国的概念是无意义的。在80年代关于“体育强国”的讨论中，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确切含义认识不尽一致。有的学者认为，体育强国是指那些既是体育发达国家又是运动强国的国家。体育发

达的国家是以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发展水平为主要标志，指那些人均体育经费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制定了完善的学校体育和大众体育计划，拥有充分的保证群众锻炼和承办大型国际比赛的场地设施，体育人口超过全国总人口半数以上的国家。运动强国是以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为主要标志，指那些在奥运会等综合性国际大赛中名列前6名，全国半数以上运动项目的水平达到或接近世界水平的国家。在世界上可以称上体育强国的只有美国、苏联、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加拿大等为数不多的国家。有的学者持不同的观点，认为不能将体育强国同体育发达国家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体育强国往往是以国际重大比赛中成绩优异为重要标志的，如芬兰、瑞典、丹麦、瑞士等国家，体育运动的发展规模和场地设施条件均堪称体育发达国家，但由于他们在奥运会和其他国际重大比赛中总成绩没有名列前茅，人们不称他们为体育强国。而我国在亚运会上金牌数获得第一，总分超过日本时，世界舆论就称我国为亚洲体育强国了。可见，在人们的习惯中，体育强国同体育发达国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世界体育强国的内涵中是否包括中国特色的内容？多数学者认为，我们要建设的体育强国，必须突出和始终不能忽视中国特色这一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的体育模式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国家和社会结合办体育；体育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体育事业内部各个组成部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通过实现体育工作的任务，以普遍增强人民体质；努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积极建设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服务；坚持改革开放，取天下之长，走自己的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等几大基本特征。

(2) 建设体育强国的指标体系和标志问题

体育强国是一个比较庞杂的复合体，是一项系统工程，1985年《2000年中国的体育》研究组在研究报告中提出8项主要指标，即人民体质、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人才、体育科学技术、体育场地设施、体育精神。并提出，我国成为体育强

国的主要标志是：全国近5亿人参加体育活动；青年一代的身体形态、机能、素质有明显提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名列前茅，大数运动项目达到和接近世界水平；出现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体育科技成果，在重要领域有所创新和突破；普遍增加群众体育活动场所，建成一批现代化的场地设施；拥有一支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彻底改善体育队伍的人才结构。但必须承认，普及城乡体育运动，使青年一代身体形态、机能、素质有明显提高，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基础，是根本。运动技术水平是体育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最集中、最鲜明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体育水平。如果我国在奥运会上不能名列前茅，即使其他各项指标均达到先进水平，也不可能被世界公认为体育强国。当然，体育强国的各项指标是互相联系的，如果没有体育其他各项指标作保证，运动技术水平也不可能迅速提高。

3. 实现体育强国目标的步骤

怎样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在80年代的讨论过程中，不少专家和学者提出，依据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我国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实现我国的体育强国目标可以分为两步走，即力争在本世纪末建成运动强国和到下世纪中叶建成世界体育强国。

专家们认为，体育发展有其规律性，在不发达的经济条件制约下，国家体育的战略往往以竞技体育为先导，这在世界上不乏其例。如日本，60年代为实现经济“起飞”，积极举办奥运会，大量投资竞技体育，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取得第三名，实现了运动强国的目标。70年代以后建成了经济大国，国家体育战略转向体育发达国家的目标，80年代开始出现了建成体育强国的趋势。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水平不发达的情况下，有80%的体育经费用于竞技体育，我国体育也是符合规律地在发展。我国要在本世纪末建成运动强国，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发展竞技体育，以竞技体育的多重功效来鼓舞全国人民的政治热情，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声威和我

国的国际地位，为经济建设服务。

到下世纪中叶我国的人民将彻底摆脱贫困，开始康乐富足的生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上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的实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劳动强度将会大大减轻，闲暇会越来越多，体育活动将成为人们提高生活质量的自我需要，系统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将超过总人口的半数以上，人均体育经费大幅度增长，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差不远，我国实现体育强国的奋斗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但即使在那时，我国仍然要采取体育先行的策略，即在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上，依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体育适度超前，建成体育强国的同时也兼顾运动强国与体育发达国家于一体。

（三）制订体育发展战略的意义

体育发展战略的讨论与研究对 80 年代的体育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体育发展战略的研究，我国体育战线的战略意识普遍增强，各级领导逐步树立了长远发展的观点，并带动了地区和跨地区的体育发展战略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有 20 个省区市召开了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 70 余次，撰写和交流论文 1100 多篇，出版论文集 25 册；9 个省市体委成立了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促进了对实际问题的研究，注重战略研究风气的形成和发展。

开展战略研究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加深了对我国体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认识，促进了科学研究与体育管理实践的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重要的体育改革战略思路。例如：在 1985 年全国体育发展战略讨论会上，提出了“以革命化为灵魂，以社会化和科学化为两翼，实现体育腾飞”的改革指导思想；在 1987 年全国体育发展战略讨论会上，提出了“以青少年为重点的全民健身战略与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战略在实践中协调发展”的观点。

体育发展战略也促进了体育科学自身的发展，促成了一些新学

科的形成，也促进了不同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和结合。战略研究的重点课题研究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研究会组织完成的38项研究课题，有3项获国家体委科技进步奖。一支由理论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的研究队伍正在形成。

80年代开始的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的研究在各个领域全面展开，为90年代打下了基础。各级体育行政领导和体育科技人员，自此都很关注战略研究。在体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善于把握全局，抓住全局性战略问题，从战略的高度去指挥体育工作，是掌握工作的主动权，推动体育事业向着长远目标稳步前进的依据和保证。

第三节　体育宣传与体育报道的发展

体育宣传出版是体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体育宣传出版恢复很快，取得了惊人的突破性发展。体育宣传的人员大量增加；体育报道的内容丰富，质量很快提高；出版的体育报刊数量剧增，科普性、学术性书籍大量出版，体育已成为众多报纸必备的栏目。体育宣传出版的发展成为体育事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一、新闻媒体的体育报道激增与体育记者队伍扩大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国新闻媒体体育报道量很少，报纸上没有专门的体育版，也很少有固定的体育专栏。体育消息一般登在副刊上，且版面很少。新闻媒体也很少有专职的体育记者，一般都由时政新闻或文化记者兼任。80年代初，随着中国女排“五连冠”、中国男子足球队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连胜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等强队、棋圣聂卫平在中日擂台赛中连克强手取得胜利，直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取得辉煌胜利，体育界所取得

的一系列成就掀起了全国性的"体育热"，也使新闻媒体的体育报道成为最受公众欢迎的内容。体育新闻报道和宣传工作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

在80年代的"体育热"中，各类新闻媒体的体育报道量急剧增加。为此，各地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纷纷成立专门的体育部，建立专职的体育记者队伍。例如，1978年时新华社的体育报道还放在国内部和对外部，负责国内部发稿的只有一位专职记者，对外发稿的只有两位记者，全年发体育通稿仅17条。进入80年代后，新华社的报道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体育新闻成为新华社报道的重头戏之一。1981年新华社成立了体育部，建立了专业的体育记者队伍。在洛杉矶奥运会和汉城奥运会期间，新华社每天向国内外发出大量稿件，最高时日发稿量达到上百条。1990年6月，在无重大赛事的情况下，新华社发体育新闻通稿达485条，日均16条多[1]。到1994年，新华社体育部已有专职体育记者近30人。紧接着，各省市党报也纷纷成立了体育部，建立了自己的体育记者队伍。

至1991年底，全国专职兼职的体育记者已有2000余人，比1979年的500余人增加了3倍。数量增加的同时，体育记者的业务素质和学历水平也有大幅度提高。国家体委宣传司在1991年底曾对全国新闻单位进行了一次调查，在回收到的350家新闻单位问卷中（其中省市新闻单位297家，中央新闻单位28家，国家体委系统新闻单位25家），有专职体育记者1282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747人，中专程度70人。其中高级记者41人，主任记者167人，记者473人，助理记者380人；有443人不同程度地懂外语，286人受过体育专业培训，425人受过新闻专业教育。经过80年代的建设，体育记者和体育宣传队伍整体业务水平和专业知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体育记者在媒体中不再是"小儿科"，而日渐发

[1] 郝勤. 体育新闻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9.

展成为我国新闻媒体中一支重要的采访报道力量。

二、广电媒体体育报道的发展

（一）广播电台体育节目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体育报道十分重视。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除每天都要播放《广播体操》外，开办的体育新闻和体育知识讲座节目很受听众欢迎，成为群众及时获取体育信息及健身方法的来源。《体育节目》专题作为中央台的一个传统节目，已有40余年。它的宗旨是及时报道国内外赛事；广泛传播体育知识，宣传群众性体育活动。该专题已成为中央台众多节目中最受群众欢迎的节目之一。至90年代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节目》每天播出两次，每次半小时，内容有《明星访谈》《体坛文摘》《健身咨询》和《体育信箱》等10余个专栏。

20世纪80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除播送体育专题节目外，还在《新闻联播》和《报摘》等黄金节目段里及时播发体育方面的重要消息。每逢我国运动员在大型国际运动会上获得好成绩时，中央台都会打破惯例，在各类节目中插播体育报道，提高新闻的时效性，扩大影响。中央台的体育报道注意发挥“声”的优势和“声情并茂”的特点，多采用现场手段，混声播出，增加了报道的现场感和亲切感。电视逐渐普及后，广播并未因电视的竞争而退出舞台，它以时效快、小巧和适应性广而受到听众的喜爱。中央台的体育宣传在新闻方面努力做到扩大信息量，增加新闻背景、新闻分析、赛事评点、人物介绍等深度报道，在专题节目方面，探索信息，使知识性、服务性和娱乐性更好地结合，将体育宣传不断推向新的台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播部是对台湾同胞广播的部门，下设体育

组。该部针对台湾听众的喜好，对棒球、垒球、篮球、田径等台湾体育的强项给与重点报道，吸引了大量台湾听众。对大陆体育的飞速发展及大陆和台湾选手在国际赛场创造的好成绩，给予了及时全面的报道，成为沟通海峡两岸人民心灵的一座桥梁。

中国国际电台每天用近 40 种语言对境外各国播出，其中体育是重要的播出内容。除了语言组有体育宣传外，该台还专门设置了体育组，统筹全台的体育宣传报道工作。一些重要赛事，国际台都派出采访记者，及时进行报道。该台每年收到的大量听众来信中，有许多是在听了该台体育节目后询问中国体育情况的，并对中国体育的成就表示祝贺。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国际台体育广播还首次尝试了对国外听众现场实况直播的方式，收到良好反响。该台还经常结合一些大赛举办听众知识测验、有奖答卷等趣味活动，吸引了境外大批听众的参与。

除中央级的 3 个广播电台外，省市级的电台也都十分重视体育广播宣传。一些重点省市电台都设有体育组、体育专栏节目，对本地区的体育活动进行了充分的宣传报道。

这一时期，著名的体育广播解说员宋世雄、宋建生等，在比赛转播中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解说风格，不仅使亿万听众陶醉，还对中国广播和电视体育解说风格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二）电视体育节目的发展

电视体育节目包括电视体育新闻报道、比赛转播和其他与体育有关的电视节目等。它以直观、形象、快捷的形式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成为宣传体育运动、传播体育知识和提供体育娱乐欣赏的最有效的手段。国际体育组织都很看重电视的作用，许多比赛，都积极争取电视台的转播和合作。

中国的电视体育转播始于 1958 年 6 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对八一男女篮球队对北京男女篮球队表演赛的实况转播。其后，在 1959 年 9 月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1 届全国运动会和 1964 年 4 月在

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中央电视台也对其中一些比赛进行了实况转播。但由于当时电视尚未普及，电视技术也受到局限，因而影响并不大。此后受十年“文革”干扰，电视体育节目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电视体育节目发展迅速。央视大规模转播体育赛事始于1978年6月首次通过国际通讯卫星频道对在阿根廷举行的第11届世界杯足球赛半决赛和决赛实况进行转播。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中央电视台通过与香港无线电视台合作，直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并成功地直播了中国女排获得“三连冠”等激动人心的比赛场面。至此，中国体育电视进入了大型体育赛事转播阶段。

为了适应体育报道的需要，中央电视台于1980年成立了体育部。这是全国新闻媒体中最早成立的体育部。1984年，中央电视台将体育新闻从新闻节目中分割出来，增办了独立的《体育新闻》节目。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1988年汉城奥运会是中央电视台大型赛事转播的起步阶段。虽然这一时期中央电视台还主要是借用香港无线电视台的信号向内地转播，自身报道力量相对薄弱，但以体育赛事转播为龙头的体育电视节目已经成为最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和欢迎的电视节目。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在这一时期在转播体育赛事和其他体育节目方面的尝试也为后来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开播，以及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大型赛事转播奠定了基础。

三、体育报刊与图书出版的繁荣

在20世纪80年代，体育报刊、图书出版发展十分迅速，对宣传和普及体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报纸体育报道的发展

报纸是体育宣传的重要阵地。至1992年，全国约有1700种报

纸，大多有对体育消息的报道，有不少报纸还辟有体育专栏。

《人民日报》是全国第一大报。从80年代初开始，《人民日报》的国内版和海外版都设有体育组，有专兼职记者10余人采访报道体育消息、新闻、人物、赛事专访。《人民日报》体育报道有很强的宣传效果和导向作用，对一些体育活动、现象、赛事有独到的评论，宣传基调健康、稳重、激昂，既鼓舞人心，又贴近群众。尤其是在80年代的中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优异成绩引发的爱国主义热潮中，《人民日报》因势利导，发表了一系列报道，在全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例如，1981年4月，中国男子排球队在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选赛与韩国队的比赛中，先输后赢，战胜对手，激发起全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大学生们走上街头，自发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次日，《人民日报》就以这一口号为题，在头版头条上以通栏标题发表了社论，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体育热”的大背景下，《光明日报》《中国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中央级专业和综合性报纸特别重视体育报道。这些报纸大多辟有体育专栏，每逢大赛还开设体育专版。各种报纸都根据自己的读者群，进行针对性强的体育宣传，其特点和风格也各异。《光明日报》庄重冷静，《中国青年报》激情火爆，《解放军报》贴近军营生活，《工人日报》考虑到群体的口味，《中国日报》适应外国人士阅读习惯等等。连一些行业性的报纸也增加了体育报道内容，如《科技日报》《中华工商时报》《国际商报》和《中国教育报》等，除了对奥运会等重要体育新闻进行报道外，还在副刊上开设有一定比重的体育栏目或报道。

20世纪80年代，各地方性报纸，无论是各级党报，还是行业报，体育报道日益成为报道重点。一些经济发达、体育发达的省市的报纸，如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广东的《南方日报》《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辽宁的《辽宁日报》、

天津的《天津日报》、湖北的《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和北京的《北京日报》等，都开辟有体育专版。

各地的晚报也是体育宣传的主要阵地。由于晚报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城市的市民群体，因而体育新闻成为最受读者喜爱的报道内容之一，被称为晚报的四大报道支柱之一。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各地绝大多数晚报都设有体育部（组），开辟有体育专版。如《北京晚报》和《新民晚报》都有两个版以上的版面报道体育，逢有大赛时版面多达4版、6版。晚报的体育报道主要特点是短小精炼，丰富多彩，不拘形式。各地晚报形成的“京派”“海派”“粤派”和“关东派”等流派风格，也渗透到各报的体育报道中，使得更有特色和韵味。

体育专业报刊是体育宣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阵地，因其专业性而使之具有权威性、深入性和全面性等特点。国家体委办有50余种体育专业报刊，《中国体育报》是机关报，其前身是1958年创刊的《体育报》，由毛泽东亲自题写报名，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历届国家体委领导人的支持和指导。《中国体育报》作为我国第一体育大报，拥有中国最大的一支体育记者编辑队伍，记者的专业化程度和体育项目的专业知识水平很高。改革开放后，《中国体育报》努力探索自己的办报风格，增加可读性，同时保持机关报的指导性与庄重。由于《中国体育报》占据了对体育界采访的“近水楼台”之利，因而具有很强的权威性，深受广大体育爱好者的欢迎。

《中国体育》（英文版）杂志是我国唯一的一份对外体育宣传刊物，发行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我国除《人民画报》外第二大对外宣传品。

另外，20世纪80年代“体育热”中，很多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体委也办有专业体育报，如《山东体育报》《四川体育报》《贵州体育报》《甘肃体育报》《新疆体育》和《西藏体育》等，这些报纸侧重于对本地区体育工作的指导和宣传，对推动这些

地区体育工作的开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体育期刊的发展

体育期刊分为学术类体育期刊与大众类体育期刊。大众类体育期刊的读者对象是广大体育爱好者。随着20世纪80年代“体育热”的升温，大众类体育期刊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当时不少体育期刊发行量都达到几十万份甚至上百万份。创办于1950年的《新体育》杂志是新中国创办最早的体育专业杂志。该杂志以很强的专业性和可读性成为最受广大体育爱好者喜爱的杂志之一。20世纪80年代的“体育热”中，《新体育》进入了其发展史上的巅峰期，其最高发行量曾超过100万份。另外，《中华武术》《武林》《围棋天地》《搏击》《中国排球》《健与美》《健康之友》《中华气功》《气功与科学》和《体育画报》等都是这一时期发行量很大的体育期刊。这些发行量很大的体育期刊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一时期“体育热”的热点有关。

除了上述大众类体育期刊外，国家体委下属的各项目协会还办有一些体育专业刊物，如《篮球》《足球世界》《田径》《游泳》《乒乓世界》《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等，这些刊物满足了专业读者的需要。另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有20多个省市级体委陆续办起了自己的刊物。其中湖南的《体育周报》、黑龙江的《当代体育》、北京的《体育博览》、山西的《搏击》、广东的《体育之春》等都深受体育爱好者的欢迎。

（三）体育图书出版的发展

1954年，新中国成立了第一家体育图书专业出版社——人民体育出版社。改革开放以来，又陆续成立了蜀蓉棋艺出版社、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奥林匹克出版社等体育专业出版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体育出版社作为国内最大的体育专业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体育书籍，包括体育类教材、体育知识读

物、竞赛规则、体育学术专著等。除图书外，该社还办有《体育大市场报》《中国钓鱼》《健康顾问》等十几种期刊，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蜀蓉棋艺出版社成立于1985年6月，是当时中日围棋擂台赛所掀起的全国性“围棋热”的产物。该出版社的前身为成都棋苑编辑部，后由四川省体委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是全国唯一的棋牌专业出版社。该社成立后出版了大量棋类专业书籍，为推动我国围棋的普及与发展作出了贡献。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原称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成立于1985年。1994年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更名为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该社以出版实用武术、传统武术、气功养生保健、中国书法、棋牌、实用生活、体育、体育教材8类图书为主。奥林匹克出版社成立于1989年，是适应亚运会和申办奥运的形势而成立的，重点出版奥林匹克运动专题书籍。该社所出版的一些书籍受到国际奥委会和国际体育组织的赞赏。

除上述4家专业出版社外，国内其他专业性或综合性出版社在20世纪80年代也出版了大量体育类图书，其中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等都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四）体育对外宣传

体育对外宣传，是对外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特殊的作用与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视做好体育对外宣传工作，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体育对外宣传媒体涉及通讯社、广播、电视、报刊、图书等各种媒体。在80年代的“体育热”中，我国以新华社体育部为主，对外发了大量有关中国体育的稿件，其中很多报道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我国选手许海峰获得中国历史上首枚奥运会金牌后，新华社记者抢在国外媒体前面，首先向全世界发布了这一消息。此后，汉城奥运会、巴塞罗那奥运会及

其他重要国际赛事，中国都派出了强大的新闻报道团队，向全世界发布了大量报道，成为国际体育新闻界一支重要力量。在 20 世纪 70 年代，新华社每年向外发布的体育报道数量还很少，80 年代报道的数量迅速增加。到 1992 年，新华社体育部就对外发稿达 8760 篇，中新社体育部也向海外华文报刊和港澳台及东南亚发稿 700 余篇。中国国际台每天用 40 多种语言对外国广播体育消息。中央电视台新辟的第四频道，以港澳台观众为主，也有大量的体育节目。《人民日报》（海外版）体育报道的比重也很大。《中国日报》是我国 1981 年创刊的英文综合性报纸，体育报道一般占有一两个版。外文局的几个对外宣传刊物，如《人民画报》《中国报道》《今日中国》《人民中国》和《北京周报》等，在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体育情况方面也发挥了良好作用。

除以新闻的形式对外宣传体育外，各级体委和宣传部门还编印了多品种的对外宣传读物和对外宣传品。仅国家体委宣传司 1984 年以来编印的对外宣传画刊画册就有 30 余种，还制作了体育宣传纪念品和体育录音、录像带多种。

做好外国来访记者和驻京记者对体育采访的服务接待工作，是对外宣传的重要工作。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每年要举办大大小小比赛数百起，随着中国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外国记者越来越频繁地采访中国运动员的比赛和训练，采访在中国举办的体育比赛实况。各级体委都把做好对外国记者接待工作看做是送上门来的难得机会，利用外国记者的报道为我国体育的发展和为我国改革开放服务，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承办国际竞赛活动越来越多，规模和水平越来越高，我国不仅在组织竞赛工作上，在组织新闻报道上，质量也越来越高，效率、服务水平、通讯联络等都基本和国际接轨，逐渐接近世界先进水准。

四、20 世纪 80 年代体育宣传和体育报道的特点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体育的迅速发展，国内新闻媒体的体育报道和体育部门的体育宣传工作相互配合，共同为我国体育事业的普及、发展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国内体育宣传和体育报道表现出了一些鲜明的特点。

（一）体育宣传工作为体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1979 年国际奥委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合法权利的决议，使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推动了中国体育重新走向世界体育大舞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竞技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体育宣传在这样的形势下，取得了新的突破和发展，无论是体育宣传阵地的扩大，体育宣传队伍的增加，还是体育报道内容的丰富，体育报道质量的提高，以及宣传数量、规模、声势、影响，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任何历史时期所不能比拟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对体育事业和体育宣传工作更加重视。1985 年，党中央在批转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中，对体育宣传的作用、内容、指导思想与具体实施都作了全面准确的论述。正在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草案）》和《中国体育发展与改革纲要》，以及《体育事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中也都列上体育宣传的内容，强调“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和体育社会团体应广泛运用传播媒介宣传体育”。中央宣传部和各级宣传领导部门也很重视体育宣传工作，曾就体育宣传问题多次发出通知和指示。特别是一些重大体育比赛和重要体育事件，中央宣传主管部门的有关领导亲自挂帅，对体育宣传报道工作进行组织和指导，保证了体育宣传报道的正确方向。国家体委领导也十分重视体育宣传工作，对体育宣传工作定期研究讨论，及时作出指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曾于1982年、1987年、1992年召开过3次全国体育宣传工作会议，对体育宣传工作进行了讨论和部署，并发出《关于加强和改进体育宣传工作的意见》等文件。

由于中央和各级体育部门、宣传部门的重视和支持，改革开放以来，体育宣传一直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原则。

体育宣传工作以团结、稳定、鼓劲为基调，以正面宣传为主，全面准确地体现社会主义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为我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政治条件和社会舆论环境。围绕女排、乒乓球、男排、足球等项重大比赛所取得的成绩，高奏起爱国主义的激情和奋勇拼搏的凯歌，"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和发扬"拼搏精神"等口号，就是这期间叫响的。在报道内容上，由于中国走向世界体育舞台和国际体育交往的内容比重加大，扩大了国内群众和体育爱好者的视野。在报道形式上，较"文化大革命"前更加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摒弃了极左的、形而上学的一些宣传报道模式，更加贴近读者，贴近实际生活。这段时期体育宣传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有些宣传把某个项目与政治生硬地联系；有的报道缺乏辩证法，有片面性；有的不实事求是，把成绩说得过高，把群众的心理期望值吊得过高等等。这些问题对体育事业也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在90年代初，体育宣传的这些问题得到了较好的改正。爱国主义、拼搏精神依然是体育宣传的主调，同时体育宣传更加客观公正。

（二）新闻媒体注重对大型赛事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报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宣传工作摆脱了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的束缚，更加客观公正，贴近实际，国内新闻媒体的报道更加开放，能够充分满足群众观赏和参与的愿望与要求，从而使体育报

道成为各类媒体报道的重头戏。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新中国首次登上夏季奥运会舞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国体育报》等国内媒体近80位记者参加了报道工作。他们初次尝试了大型国际综合性运动会报道工作的艰辛与喜悦，向国内外发出了大量高质量的新闻稿件，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赞赏。在与世界各国体育记者同行的竞争中，中国记者以严肃认真、作风严谨、工作勤奋而树立了自己的形象。如许海峰夺得我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的消息，就是由新华社记者抢先第一个发出稿件的。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我国新闻媒体组织了100多名记者前往采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首次派出上百人的记者队伍出国采访。各新闻单位赛前都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在报道版面与时间安排上，力求做到突出、充分、及时。在报道方式上，许多媒体作了有益的尝试，如电台的插播、电视台的移动字幕新闻等，提高了奥运会报道的时效性。版面安排也力求突出、醒目、图文并茂。与此同时，在奥运会期间，国内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将奥运会消息作为头版重点加以报道，通过消息报道、图片、评论等形式，向国内读者提供全方位的奥运报道。

1990年在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是我国首次承办的国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这届亚运会的报道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最大的一次宣传战役。这次规模空前的亚运会报道工作，从投入力量之多、声势之大、水平之高和影响之广来看，都是我国历次体育宣传之最，开创了中国新闻史和体育宣传史上的新篇章。

在被誉为“亚运第二战场”的宣传报道工作中，中外记者中有5000余人参加，其中中国记者3000余人，还不包括大量的后方保障、编辑和勤务人员。从9月中旬到10月初，新华社发中文稿8287条，158万多字，英文稿2258条，53869行。中央电台播出亚运新闻12万字，亚运专题27.5万字；对少数民族广播用5种语言播出亚运消息4.5万字，专稿7.7万字；对台湾广播播出亚运专

题节目58个，各类稿件25万字，《亚运快讯》7万字，录音报道150个；现场实况转播约百场，总计138小时。中国国际电台用30多种语言播出了480小时的亚运特别节目；首次进行4种语言的体育比赛现场直播共19场，总计58小时；《亚运知识竞赛》收到102个国家和地区3.9万份答卷。中央电视台播出亚运电视节目335小时，比上届多170多小时；为外来转播者提供14路卫星通道，对外卫星传送的时间高达2045小时，发送10个亚运节目，录像带2200盘，计2600小时。《人民日报》国内版在二、三版共出亚运专版9块，39万字，图片160余幅；另编辑出版《亚运新闻报》共17期，51万字，图片200余幅。《中国体育报》加出晚报，日报晚报共刊登亚运稿件120万字，图片400多张。《北京日报》也增出《亚运专刊》，与日报共刊登亚运稿件810篇，30.4万字。而《北京晚报》则每天用3个半版登载亚运报道，共50万字。

行业报纸也用了大量版面报道亚运会。《工人日报》每天一个半版，共20万字。《解放军报》亚运期间出了39.5个专版，稿件301篇，图片107幅。从以上首都几家主要新闻媒体看，其宣传声势和报道规模确实可说是空前的。

在北京亚运会的报道中，中国体育记者不再紧盯着竞技场和金牌，而是以体育为中心向外延伸和辐射。体育是政治、经济、文艺、科技都在上面表演的舞台。第11届亚运会的报道，是真正全方位的、多侧面的、立体化的报道。记者的宏观意识强，紧紧把握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和突出亚运会“团结、友谊、进步”的宗旨，体现“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团结协作、争创一流”的亚运精神。这就使得亚运会报道如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有很强的思想性和哲理性。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宣传报道，是我国体育宣传报道的又一次新的突破。我国有112位记者，代表国内29家新闻单位远涉重洋参加报道工作。临行前，经中央宣传部批准，国家体委专门就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宣传报道工作提出了意见。《意见》分析了

形势，提出了明确的宣传报道指导思想和宣传报道要点，对宣传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提出要求，这就为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报道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中国媒体对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宣传报道在规模、数量、质量、时效以及多样性上均超过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报道。全国人民从各媒体那里详尽地了解到中国健儿的拼搏事迹和勃勃英姿，通过记者传神的笔触和生动的画面及感人肺腑的现场音响，又一次受到爱国主义的激励和奥林匹克理想的熏陶。

体育部门对新闻媒体为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巴塞罗那奥运会后国家体委领导指出，国内各媒体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新闻工作者的精神同样值得人们学习，成就同样值得敬佩，辛勤劳动同样应给予肯定和奖赏。

（三）新闻媒体与体育界紧密合作，互相促进

通过80年代的“体育热”与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汉城奥运会以及主办北京亚运会，体育界越来越认识到了体育宣传在现代体育运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重视舆论的力量，重视新闻媒体在体育传播和宣传中的独特作用。运动员和体育界人士开始主动接近和配合媒体报道，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树立自己的形象。如这一时期中国女排的“五连冠”以及作为时代精神代表的“女排精神”的树立，就是体育界与媒体共同打造的结晶。

新闻媒体也借助这些著名运动员、教练员和知名人士扩大了自身的影响，丰富了报道内容，扩大了受众面，提高了收视率和发行量。同时，随着体育社会化的进程，很多新闻媒体也从单纯报道和宣传体育发展到赞助体育活动与经办体育赛事，进一步推动了体育运动的发展和普及，如80年代《人民日报》举办的“围棋名人赛”、《新体育》杂志举办的“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国体育报》举办的“中国十佳运动员评选”、新华社举办的“中国

杯体操赛”和《中国体育》杂志社举办的“泰山自行车比赛”等等，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有的还形成传统体育项目。

第六章　从汉城奥运会到巴塞罗那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极大地激励我国人民团结奋斗、奋力拼搏的精神，鼓舞了体育界的士气。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代表团在1988年第24届汉城奥运会上成绩不理想，在全国人民中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和争论。我国体育界痛定思痛，及时总结了经验与教训，发愤图强，扎实工作，在1992年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获得国内外一致的赞誉。

第一节　洛杉矶奥运会后竞技体育所取得的成就

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和优异成绩，不仅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而且一举获得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在金牌榜上居第4位，令世界为之震惊，海内外华人扬眉吐气，成为当代中国体育全面走向世界的里程碑。我国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证明中国已经成为奥林匹克运动和国际体坛一支不可忽视的劲旅，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令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在洛杉矶奥运会的激励下，我国竞技体育选手在国内外赛场上佳绩频传，成绩斐然。

一、全运会上的突破

1987年11月20日至12月5日，第6届全运会在广州举行。这是洛杉矶奥运会后举行的首次全运会，其主要目的之一是为1988年在韩国汉城举行的第24届奥运会选拔运动员，因而具有重要意义。本届全运会共设44个比赛项目（男、女足球为一项），其中，奥运会项目有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网球、手球、曲棍球、田径、游泳、跳水、水球、花样游泳、体操、艺术体操、举重、射击、射箭、击剑、柔道、国际式摔跤、自行车、现代五项、马术、赛艇、皮划艇、帆船、帆板；非奥运项目有足球（女）、羽毛球、垒球、棒球、技巧、国际象棋、围棋、中国式摔跤、武术、航海模型、潜水、滑水、航空模型、跳伞、摩托艇、无线电测向。在这次全运会上，共有37个代表团，5500多名运动员参加，有18人次打破15项世界纪录，2人2次超2项世界纪录，4人4次平世界纪录，打破和超过48项亚洲纪录和亚洲最好成绩，14队87人174次打破82项全国纪录。这是历届全运会破、超世界和亚洲纪录最多的一次，取得了空前突破。

为了加速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培养体育后备力量，迎接在汉城举行的第10届亚运会和第24届奥运会，洛杉矶奥运会后，国家体委决定在第6届全运会上的部分项目试行新的规则。如手球项目，为了全面考核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制定了30米跑、对墙传球、障碍运球、手球掷远、十级跳、3000米跑、防守脚步移位7项专项素质测验考核，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都必须达到各项规定的标准，未达到者，不予报名；为提高防守能力，发扬快速灵活的风格打法，制定了9米线以外的1.5分制（原为1分制）；全队12名队员必须有10名队员上场打满10分钟，以利于促进新队员的成长。又如篮球项目，增加了“4分球”，就是在国际篮联制定的3分球的基础上（6.25米外远投进球），改为投进第四个3分球后，从第

五个起即为4分球，其目的是鼓励运动员发展外围投篮技术，发挥和培养我国篮球运动员的优势与特长。这些措施都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第6届全运会是在中国体育事业全面走向世界的大趋势下举办的。本届全运会首次采用由地方承办，采用社会集资的办法解决大会的经费。37个代表团中有7个产业系统体协代表团，社会办体育的趋势和成果得到进一步显现。在此次全运会上设立了总分制，突出了奥运项目，激发了各路健儿为祖国建功立业的热情；多年来居于体育先进行列的地区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竞技水平较低的地区却异军突起，展示了在奥运会的激励下近年来中国体育运动水平的飞速发展，也为各地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实施奥运布局提供了新的依据。

二、蝉联亚运会金牌总数第一

1986年9月20日至10月5日，第10届亚运会在韩国汉城举行。中国派出了由514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全部25个比赛项目中的20个，共夺得94枚金牌、82枚银牌、46枚铜牌，以1枚金牌的微弱优势险胜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东道主韩国队，蝉联了亚运会金牌总数第一，继续保持了我国在亚洲体坛竞技体育的领先地位。

在本届亚运会上，我国某些薄弱项目有了新的突破，游泳获得了10枚金牌，比上一届增加了7枚；自行车、网球、帆船、帆板、射箭等项目冠军的获得，结束了这些项目亚运会的金牌与我国无缘的历史。这届亚运会上我国的一些传统优势项目受到了挑战和冲击，乒乓球、羽毛球中部分项目的失利也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不足，并加以改进，在今后取得更大的优胜。

三、我国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取得的成就

1984年第23届奥运会之后，我国体育运动健儿除了在第10届亚运会上蝉联金牌总数第一外，在其他国际重大比赛中也取得了优异成绩，呈现出我国竞技体育在这一时期的勃勃生机。

1985年是我国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中，挟洛杉矶奥运会之势，我国运动健儿意气风发，刻苦训练，技术水平得到持续提高，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在这一年，体育健儿们有7人9次打破和超过5项世界纪录，在国际大赛中有56人次7个队获得46个世界冠军[1]，是在此之前中国体育史上获得世界冠军最多的一年。在这一年所获得的46个世界冠军中，有女排、跳水、射击、技巧、乒乓球、羽毛球、竞走、航海模型、跳伞、帆板和围棋等共13个项目。中国女排在第4届世界杯赛中以7战全胜的成绩蝉联冠军，获得“四连冠”的荣誉，成为世界女排中第2个获得这一称号的优秀运动队。我国体育健儿在乒乓球、羽毛球、跳水、举重、帆板、航空模型和航海模型等项目的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中，还获得15枚银牌、18枚铜牌。历时一年多的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激动人心，我国棋手江铸久连克日本5名战将建奇功，接着日方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反胜我国6员战将，在我方处于不利的情况下，主将聂卫平孤军奋战，在击败日本两名超一流棋手后，决战中又战胜日本主将、名誉棋圣藤泽秀行，使中国队以8比7获得最终胜利，取得了重大突破。

1986年我国体育健儿继续取得显著进步。全年共获26个世界冠军，12人12次打破和超过7项世界纪录，404次打破172项全国纪录[2]。在重大国际比赛中，我国一些高水平的运动项目继续保

[1] 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1986）.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97.

[2] 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1987）.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231.

持着优势。女子排球在第10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中，以全胜的战绩再次夺魁，成为世界女子排球史上第一个获得“五连冠”的优秀队伍；男女羽毛球队首次双获世界最高水平的男子团体“汤姆斯杯”和女子团体“尤伯杯”。举重选手在世界锦标赛中获得一项世界冠军，打破一项世界纪录，呈现出上升势头。在我国首次举办的世界杯体操赛上，我选手获4枚金牌，3枚铜牌。跳水新秀在第5届世界游泳锦标赛上首次获得两枚金牌。射击获3项世界冠军，4人5次打破和超过两项世界纪录，6人4次平3项世界纪录。技巧选手在第7届世界技巧锦标赛中获4枚金牌、9枚银牌和4枚铜牌。中日围棋选手在对抗赛上再次交锋，中国队以31∶25取胜。在一些新开展的项目中，我国选手在世界大赛中初露锋芒：蹼泳和柔道在世界锦标赛中首次夺得3项世界冠军；女子垒球队首次参加强手如云的世界锦标赛即获亚军；女子足球队在亚洲锦标赛中以全胜的成绩获得冠军。在1986年，我国一些弱势项目有了新的起色，其中以奥运会重点项目田径、游泳最为突出：作为基础项目的田径运动，原与世界水平差距较大，在1986年破、超两项竞走世界纪录和15项亚运会纪录；在第10届亚运会的田径比赛中夺得17枚金牌，为我国取得亚运会金牌总数第一起了决定性作用。游泳健儿在第10届亚运会上获得的金牌数为在第9届亚运会获得的3倍，女子蝶泳100米成绩进入当年世界前10名，有4项成绩进入世界前20名，为20年来的最好成绩，改写了26项全国游泳纪录，占全部游泳全国纪录的79%。我国长期落后的冰雪项目，在第1届冬季亚运会上获得4枚金牌，在前进的道路上迈出了新步子。

1987年，我国运动员共获得69个世界冠军，41次打破和超过22项世界纪录。据不完全统计，1987年我国参加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共17个大项200多个小项，其中有120多个小项可进入世界前十名。中国举重队在日本举行的第19届亚洲举重锦标赛上，获11枚金牌、10枚银牌、3枚铜牌，并打破9项亚洲纪录。何灼强以116.5公斤的成绩打破他自己保持的52公斤级抓举世界纪录；

随后，他又在日本爱知县新居滨市举行的中日举重友好对抗赛中，以118公斤的成绩超过他自己保持的116.5公斤的52公斤级抓举世界纪录。中国女子举重队参加在美国举行的首届世界女子举重锦标赛，蔡军获44公斤级抓举和总成绩两枚金牌，陈爱珍获挺举金牌，黄晓瑜获48公斤级3枚金牌，严章群获52公斤级3枚金牌，崔爱红获56公斤级3枚金牌，曾新玲获60公斤级3枚金牌，高丽娟获67.5公斤级挺举和总成绩两枚金牌，李红玲获75公斤级挺举和总成绩两枚金牌，韩长美获82.5公斤级3枚金牌。在这次比赛中，中国队共获22枚金牌、4枚银牌、1枚铜牌，夺得团体总分第1名。中国跳水队参加在荷兰举行的第5届世界杯跳水赛，获女子团体冠军，高敏、许艳梅分获女子跳板跳水和跳台跳水冠军，童辉获男子跳台跳水冠军，中国队另获3枚银牌。在挪威举行的第6届世界分龄组跳水锦标赛上，许艳梅获女子（A组）跳台跳水冠军，吴浩涛获女子（B组）跳台、跳板跳水两项冠军。中国队还获1枚银牌和1枚铜牌。中国赛艇队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第14届世界赛艇锦标赛上，获女子轻量级4人单桨无舵手铜牌。这是中国人，也是亚洲人第一次获得世界赛艇锦标赛的奖牌。

在这一年举行的第2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第9场比赛中，聂卫平以2.5目优势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大竹英雄，中国队以9:8的总成绩获得冠军。这次胜利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进一步促进了围棋在全国的普及和开展。中国技巧队参加在美国巴吞鲁日市举行的第6届世界杯技巧赛上，男子获4人全能、第一套、第二套3枚金牌，女子获双人第一套金牌，冯涛、黄瑞芬分获男子单人第一套、女子单人第一套金牌。中国队共获6枚金牌，9枚银牌，6枚铜牌。中国体操队参加在荷兰鹿特丹举行的第24届世界体操锦标赛，男队获团体第2名，女队获团体第4名，楼云获两枚金牌，李宁获1枚银牌。中国射击队在委内瑞拉举行的世界飞碟射击锦标赛上，冯梅梅以192靶的成绩获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冠军，中国女队获多向飞碟团体冠军，尹亚萍、高娥分获该项个人冠亚军。中国柔道队在联

邦德国埃森举行的第15届世界男子柔道锦标赛和第5届世界女子柔道锦标赛上，高凤莲获女子72公斤以上级和无差别级两项冠军，李忠云获女子84公斤级冠军，团体总分列第1名。中国女队获最佳女子代表队奖杯，男子获1枚铜牌。

1988年，我国运动技术水平又有新的提高。全年共获得54个世界冠军，打破和超过36项世界纪录，创两项世界纪录，打破138项全国纪录，取得了新的成就。在这一年里，我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中，有59人获得跳水、体操、赛艇、乒乓球、羽毛球、跳伞、技巧、女子举重、航空模型、航海模型和无线电测向11个项目的54个世界冠军，其中赛艇和无线电测向项目是首次获得冠军；女子羽毛球队在尤伯杯赛中荣获“三连冠”；女子举重在世界锦标赛中夺得全部9个级别27项比赛中的26项冠军，继续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技巧获得8个世界冠军，是近年来获得冠军较多的年份。16岁的小将杨文意在亚洲游泳锦标赛上，以24.98秒的优异成绩打破由罗马尼亚运动员科斯塔凯保持的女子50米自由泳25.28秒的世界纪录，这是我国女子继田径选手在50年代打破世界纪录以来，首次创造游泳世界纪录，也是亚洲第一次打破女子游泳世界纪录。还有李琰在第15届冬季奥运会表演赛中，先后打破女子短跑道速滑1000米和1500米世界纪录，获得金牌和铜牌，首次在冬季奥运会上奏响中国国歌，升起五星红旗。这是我国选手在60年代初期打破速度滑冰世界纪录以来，多年沉寂之后，冰雪运动的一次重大突破。

1988年，我国田径、举重、游泳3个主要项目有多人进入当年世界前10名的行列。田径有女子4人8项，其中径赛项目有女子10000米和女子马拉松，女子铅球有2人分列第2和第6位；男子举重有6人4个级别，其中52公斤级和56公斤级的最好成绩均列世界第2位；女子游泳进步突出，有7人7项进入世界前10名。我国登山健儿与日本、尼泊尔组成的联合登山队，实现了人类登山史上的第一次南北“双跨”珠穆朗玛峰的壮举，我国有4名队员登

顶；中国和美国联合登山科学考察队，在向南极最高峰5140米的文森峰进军中，我国两名登山队员克服重重困难，胜利登上顶峰，创造了以最短时间登顶的纪录。

在1988年举行的第8届残疾人奥运会上，我国43名残疾运动员共获得44枚奖牌，其中金牌17枚、银牌17枚、铜牌10枚，有11人打破9项残疾人世界纪录，是近年来在国际比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第二节 参加汉城奥运会

1988年第24届汉城奥运会是奥运会自1976年第21届蒙特利尔奥运会后东西方体育强国的第一次全面较量，世界顶尖运动员悉数参赛，其水平之高、竞争之激烈为历届奥运会所罕见。这也是中国代表团首次面对所有欧美强队。由于实力有差别，加上在一些项目的比赛中发挥不好，本届奥运会中国队战绩不佳，引起了国内舆论的批评，同时也激起了学术界对中国体育发展方向的激烈争论与反思。

一、中国代表团在汉城奥运会上的表现

1988年9月17日至10月2日，第24届奥运会在韩国汉城举行。共有160个国家和地区的9581名运动员（其中女运动员2476名）参加了本届奥运会23个大项、237个小项的比赛，另有3个表演项目、两个展览项目。这是继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第一次没有受到大规模抵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奥运会。也是继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第二次在亚洲举行的奥运会。

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派出了299名运动员参加了除曲棍球、

马术外的21个大项的比赛和羽毛球、女子柔道表演项目。中国代表团由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任团长，何振梁、袁伟民、徐寅生任副团长，李富荣任秘书长，魏纪中任副秘书长。此外，由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指定的30名中国代表担任了裁判员、技术代表等职务。中国台北由140人组成的代表团也参加了本届奥运会，其中运动员90名，参加了12个项目的比赛和3个项目的表演赛。

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获得5枚金牌（女子跳台跳水的许艳梅、女子跳板跳水的高敏、男子跳马的楼云、男子乒乓球双打的陈龙灿/韦晴光、女子乒乓球单打的陈静）、11枚银牌、12枚铜牌，金牌数居第11位，奖牌数居第7位，总分居第8位。与上届洛杉矶奥运会相比，中国代表团所获金牌数量大大减少，且一些强项如女排、体操等表现不尽如人意，与国人期望值有一定偏差。尽管如此，中国代表团仍打破了3项奥运会游泳纪录，创造了7项亚洲纪录，显示出中国仍具有相当的实力和水平。

跳水是我国在本届奥运会上取得成绩最好的项目，比上届奖牌数增加了一倍（上届获金、银、铜牌各一枚，本届获2金3银1铜），与本届奥运会跳水强国相比，金牌数与美国相等，奖牌数和总分均超过美国而居首位。我国年轻选手，仅14岁的跳水运动员熊倪在与美国著名的“跳水王子”洛加尼斯在男子跳台比赛中不畏强手，勇于拼搏，仅以1.14分的微弱差距屈居亚军，赢得观众一致赞扬。

在田径项目上，中国队6名选手在4个项目上进入前8名，其中女子铅球进步幅度较大。本届奥运会有3名选手进入决赛，获得1枚铜牌、1个第8名、1个第9名。李梅素为亚洲夺得唯一的1枚田径奖牌，她在女子铅球比赛中获得铜牌，其成绩仅比获得亚军的民主德国选手差1厘米。女子马拉松选手赵友凤获得第6名，把她本人保持的全国纪录提高了50秒。

一些原来较弱的项目如游泳、赛艇等在这次奥运会上实现了奖牌“零”的突破。在上届奥运会上，我国游泳选手在预赛中均被淘

汰，只有一项进入前 16 名。而在本届奥运会上，有 3 名女选手获得了 3 枚银牌，1 名女选手获得 1 枚铜牌，并获得 1 个第 4 名、4 个第 7 名、1 个第 8 名。当庄泳在女子 100 米自由泳比赛中第一次为中国队夺得银牌时，被当地报纸誉为“突然闪现在天空的新星”。中国游泳由此告别了奥运会上无奖牌的历史。黄晓敏获 200 米蛙泳银牌，其成绩打破了亚洲纪录和奥运会纪录，展现出中国人游泳方面的潜力。赛艇项目也实现了奖牌“零”的突破，张香花等参加的赛艇女子 4 人单桨有舵手项目由上届第 8 名跃为银牌获得者，李荣华等 8 人获 8 人单桨有舵手赛铜牌和 1 个第 5 名。这两个项目的新突破，为我国的体坛增添了光彩❶。

尽管中国在汉城奥运会上某些项目有所突破，但总的来说，较之上届洛杉矶奥运会一举夺得 15 枚金牌，而本届仅获得 5 枚金牌，且国人期望值很高的强项如女排、体操等表现不尽如人意，因此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响和批评，同时也引发了学术界和理论界的反思和争论。

客观而言，虽然我国代表团在 1984 年第 23 届奥运会上夺得了 15 枚金牌，但这并不能完全表现中国体育在国际体坛的实力和地位。因为洛杉矶奥运会毕竟是一个不完整的奥运会，苏联和东欧一些世界竞技体育强国没有参赛，使得竞赛水平大打折扣。而汉城奥运会则是自 1980 年以来首次世界上所有体育强国都参赛的一届奥运会。其竞技水平之高和竞争之激烈远非洛杉矶奥运会所能比。因此，汉城奥运会实际上是中国体育首次在聚集全球体坛精英于一堂的大赛中接受的全面挑战与考验。对于刚走向世界不久的中国体育而言，本届奥运会上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水平和实力，以及与世界体育强国之间存在的差距。在这次奥运会上，由于苏联和东欧国家参赛，竞争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苏联和上届未参加的东欧国家共得金牌 118 枚，占全部金牌数的 49%；获奖牌 316

❶ 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1989）.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800-829.

枚，占 42.7%。而中国对这一形势估计不足，对如此高水平大赛的规律和特点也掌握不够，这是造成在本届奥运会上成绩较上届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在汉城奥运会上，一些国人期望值很高的强项发挥不尽如人意，原有的优势有所下降，因而引起舆论的批评也是可以理解的。

例如，曾获“五连冠”的女排在预赛中遇到秘鲁队，在关键的决胜局中 14:9 领先的大好局面下未能顶住，被对手大逆转，反以 14:16 败北，只能以小组第二名队进入半决赛去硬拼另一组的第一名苏联队。在半决赛中，中国队发挥更加失常，以 0:3 负于苏联队，其中一局竟以 0:15 告负，最后跌落到第 3 名。由于中国女排此前拥有“五连冠”的辉煌战绩，“女排精神”是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这样的表现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内舆论的强烈批评。

又如体操，在上届奥运会上我国是得奖大户，本届奥运会成绩出现滑坡，仅楼云获 1 枚金牌和 1 枚铜牌。在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失误频频，全队临场技术失误达 11 次之多，实属罕见，成绩也由上届亚军跌到了第 4 名。一些著名选手在单项比赛中也出现了明显失误。“体操王子”李宁在上届奥运会轻取 3 枚金牌，而在本届奥运会上却出现意想不到的失误，名次排在 50 名之外。

中国举重队在上届奥运会上获得 4 枚金牌，但在汉城奥运会上表现失常，未能夺得一枚金牌。人们曾寄厚望的举重名将何灼强，1987 年以来曾 7 破世界纪录，有争夺金牌的实力，但在这次比赛中表现失常，6 次抓举和挺举中有 4 次失败，问鼎无缘，仅得铜牌。

射击项目也在本届奥运会上表现不佳，多数选手没有打出自己的最好成绩，与上届奥运会相比，得分跌落近一半，仅取得两枚奖牌和其他 6 个名次。

出现上述失利，除了苏联和东欧强队参加等客观因素外，主要原因在于刚走向世界的中国体育界对奥运会这样的国际顶级大赛的

规律和特点尚认识不足，缺乏大赛经验，对国外竞争对手了解不够，可以说训练方法需要改进，运动员的心理素质有待提高。汉城奥运会给中国体育界带来了深刻的教训，但是它也是中国体育在前进道路上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在认真总结这些失利和不足的基础上，中国体育在此后的 4 年中卧薪尝胆，终于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重新夺回了自己的优势，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绩。

二、汉城奥运会后引起的争论与反思

中国代表团在汉城奥运会上的失利，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哗然。由于中国体育在 80 年代前期，尤其是洛杉矶奥运会上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在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声望和期待，因此汉城奥运会的失利引起了各界批评和争论。如当时《中国体育报》就接到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就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 24 届奥运会上的得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鼓励，也有尖锐的批评；有建议，也有指责；不少人还就中国体育如何重振雄风献计献策。“如来自内蒙古的一封来信写道，‘究其原因，我以为运动员背上了沉重的奖牌包袱，临场表现紧张，害怕，失误多。’他进而认为，‘领导方面夺牌要求高，势必给运动员增加了负担。’”“广西南宁的一封联名来信指出，‘这届奥运会简直看不到多少中国人的意志和精神，有的队伍松松散散，毫无斗志。’”“天津一位老人的来信说，‘这次奥运会是面镜子，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也暴露了我们工作中的重大失误。’”“联名来信的几位武汉大学生指出，‘从这次中国队员在奥运会的失利，应考虑我国体育体制存在哪些弊端，应如何深化改革。”“也有些来信说，‘金牌多少无所谓，关键是有的项目在气势上也输掉了。’”“不少来信认为，队伍老化，心理素质差，临场发挥及指挥不力。”“还有一些来信认为，这次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表现不佳，‘有关领导负有责任’。一封烟台的来信写道：‘我们对当今世界体育运动水平的新形势，缺乏明智而清醒的认识

和估价。'这封来信认为，'希望这些能引起国家体委领导人的反思。'""几乎所有的来信都谈及了中国女子排球队的失利。他们认为，女排队员以悬殊的比分负于苏联队，在于她们'没有斗志'。他们发出了'女排精神到哪儿去了'的疑问。""来信中也有人谈到了体育全面深入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甘肃的一封来信在论及如何振兴中国体育时说，必须进一步改革开放，本着出人才的原则，促进竞争，并从小抓起，从各行各业抓起。这封信还说，要加强体育科学研究，使选拔人才、训练走上科学化的轨道。"❶

一些文章则针对汉城奥运会一些中国运动员暴露出来的问题，探讨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和背景下运动员应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为国争光精神的问题，指出："一个运动员有正确的比赛动机，产生了积极的情感，才可能产生超人的坚强意志，在赛场上把平时的训练水平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我们的一些运动员平时练得不错，为什么在奥运会上如此失态？这不能不从'比赛动机的确立'上探求原因。过去，我们对端正比赛动机的工作，是通过政治思想工作、通过耐心细致的语言诱导和激励进行的，过去我们的乒乓球、女排等优秀运动队，凭借着这一条，开疆立业，一次次走上领奖台的。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奖金制度，这是人民给予优秀运动员超常劳动的一种报酬。但是一些人却认为，有了这条，运动员就好管了，工作不用多做了，把我们独具特色的好传统——扎实的思想工作打入冷宫，致使某些运动员比赛动机不端正，把比赛结果与个人利益联系过密，无形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单靠物质刺激是创造不出优异成绩的"，"'向钱看'的最后结果是到国外发财，优势项目的人才大量流失。"❷

汉城奥运会的失利也引发了学术界和理论界的讨论与反思。不

❶ 群众纷纷纷投书本报和国家体委 奥运赛场得失牵动亿万人心. 中国体育报，1988-10-12（1）.

❷ 思想政治工作——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 中国体育报，1988-10-14（1）.

少专家学者撰文就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如体育管理体制改革、训练体制改革、运动员管理体制改革、奥运战略与全民健身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国情与体育强国目标的关系等等。虽然其中有些观点显得较为激烈，也有的看法较为偏颇，但总的来说，这些讨论触及到了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国体育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为下一步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与思路。

第三节　中国竞技体育的重新崛起

1988 年第 24 届汉城奥运会使中国体育界认识到了我国与世界体育强国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也暴露出了我国体育体制、项目布局、队伍管理教育、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以及赛前准备和临场指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薄弱环节。在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国家体委领导下进行了多项改革，推进了体育社会化和科学化，扩大了竞技体育的基础，提高了我国体育运动的整体实力，缩短了与世界体育强国的差距，运动成绩也得到提高，终于在 1990 年第 11 届北京亚运会和 1992 年第 25 届巴塞罗那奥运会上重新取得了优异成绩。

一、中国成功举办亚运会

1990 年 9 月 22 日，第 11 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首次举办世界大型综合性运动会。这次运动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推动了亚洲各国人民和运动员的友谊，而且为中国和北京积累了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宝贵经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竞技运动水平的提高。

（一）中国获得第 11 届亚运会主办权

1983 年 8 月 23 日，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钟师统致函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席法赫德·艾哈迈德·萨巴赫，提出中国正式申请在北京举办 1990 年第 11 届亚洲运动会。同年 9 月 10 日，钟师统致函各亚洲国家和地区奥委会主席，希望他们支持中国在北京举办第 11 届亚运会。11 月，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代表北京赴科威特，向亚奥理事会作北京市情况的介绍，指出中国举办亚运会是经过慎重考虑，并得到我国政府的批准后才决定的。

1984 年 2 月 29 日，外交部长吴学谦致函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亲王，受权申明中国政府支持中国奥委会于 1990 年在北京举办第 11 届亚洲运动会，并保证允许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所有会员组织的代表团届时顺利入境。3 月 7 日，钟师统致函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亲王，提交北京举办 1990 年第 11 届亚运会的正式申请和外交部的保证书。6 月 14—19 日，以法赫德亲王为团长的亚奥理事会代表团一行 5 人访问中国，就北京申办第 11 届亚运会进行实地考察。

1984 年 9 月 23—30 日，以陈先为团长、张百发为副团长的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代表团，赴韩国汉城参加第 3 届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代表大会。9 月 28 日，亚奥理事会第三次会议经过投票表决，以 43 票赞成、22 票反对、6 票弃权的多数票，决定 1990 年第 11 届亚洲运动会在中国北京举行。同时决定 1994 年第 12 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广岛举行。代表大会还决定 1986 年在日本札幌举行首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二）第 11 届亚运会组委会成立

1985 年 3 月 25 日，经国务院批准，第 11 届亚运会组织委员会正式成立。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担任名誉主席，北京市市长担任主席，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担任执行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何振梁、

袁伟民、徐寅生和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担任副主席。何振梁兼秘书长。

承办亚运会，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开展了迎亚运活动，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支持和参与亚运会的筹备，新建和改建了55个比赛和训练场馆，建筑面积46万多平方米。

亚奥理事会38个会员组织全部报名参赛；比赛和表演项目共有29个，其中比赛项目27个（含308个小项），表演项目两个（含5个小项）；各体育代表团人数6400多人，国际裁判员、仲裁、技术代表600多人，国际奥委会委员、亚奥理事会官员、亚洲各体育组织和各国或地区奥委会及其他贵宾约900人，还有采访盛会的中外记者5000人左右，其中境外记者3000余人。

1989年8月8日，第11届亚运会基金奖券新闻发布会和首发仪式在北京举行，首批亚运会基金奖券总额为4亿元人民币。

1990年8月7日，在海拔7117米的念青唐古拉峰，藏族姑娘达娃央宗手持火把，在太阳能取火器上采集了第11届亚运会的神圣之火。8月22日，第11届亚运会“亚运之光”火炬接力点火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江泽民同志用这个火种点燃火炬，正式拉开了第11届亚运会的序幕。火炬分4路由飞机送至祖国东北（哈尔滨）、西北（乌鲁木齐）、西南（拉萨）、中南（海口），经过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接力传递，在9月20日同时到达北京天安门广场。历时一个月的“亚运之光”火炬接力，遍及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程18万多公里，参加者达1.7亿人。

1990年9月1日举办了亚洲艺术节，有1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我国的40多个艺术团体参加演出。亚运会科学大会于1990年9月16日至20日举行，有35个国家和地区上千名科学家报名参加，报来论文1000多篇。组委会还举办了中国体育展览、第2届中国体育美术展览、国际体育集邮展览、亚洲体育图片展览、亚洲少年儿童体育绘画展览、中国体育艺术摄影展览、中国现代雕塑艺术展

览7个展览会。

1990年9月8日亚奥理事会执行局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第11届亚运会组委会常务副主席何振梁关于亚运会最后阶段筹备工作的汇报。

9月9日，第11届亚运会组委会宣布，将于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第11届亚运会的会徽和吉祥物，分别采用雄伟的万里长城和憨态可掬、手持奖牌的熊猫图案，以此体现"团结、友谊、进步"的亚运会精神。

（三）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

第11届亚运会于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的亚洲体育盛会。37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共6548人参加（伊拉克因侵占科威特而被亚奥理事会暂停参加），其中运动员4655人（男3193人、女1462人）。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成员（除伊拉克）全部到齐。国家主席杨尚昆宣布第11届亚运会开幕，中国运动员许海峰等点燃亚运会主会场的巨型火炬。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万里、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以及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等出席开幕式。开幕式上进行了中日太极拳、军乐演奏、航空跳伞表演，最后表演了大型团体操《相聚在北京》。

运动会设田径、游泳（包括跳水、水球）、体操、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手球、垒球、曲棍球、高尔夫球、藤球、射击、射箭、举重、摔跤、柔道、拳击、武术、击剑、卡巴迪、自行车、赛艇、皮划艇、帆船27个正式比赛项目308个小项，另设棒球和软式网球两个表演项目5个小项。本届运动会有4人1队7次打破4项世界纪录，1队1次平1项世界纪录，39人5队89次打破43项亚洲纪录，9人1队11次平6项亚洲纪录，82人16队89次打破95项亚运会纪录，15人20次平12项亚运会纪录。在打破的世界纪录中，韩国代表团有3人1队6次打破3项射箭世

界纪录，中国代表团有1人1次打破1项自行车世界纪录。

10月7日，第11届亚洲运动会闭幕式在北京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乔石、李瑞环以及各国来宾出席了闭幕式。亚奥理事会副主席德·西尔瓦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闭幕式上表演了大型文艺节目《今夜星光灿烂》。

（四）中国代表团参加第11届亚运会的情况

中国派出670名男女选手参加了全部27项比赛和两项表演赛，共获341枚奖牌，其中金牌183枚、银牌107枚、铜牌51枚。奖牌总数、金牌总数和总分均列首位，是自参加第7届亚运会以来取得的最好成绩。在竞赛中，中国选手打破1项世界纪录，30次打破27项亚洲纪录，96次刷新64项亚运会纪录。在27个正式比赛项目中，中国选手囊括了女子游泳、跳水、排球、女子举重、武术和赛艇6个项目的全部金牌，获得半数以上金牌的项目有田径、游泳、体操、乒乓球、羽毛球、射击、举重、击剑、自行车、皮划艇10项，没有获得奖牌的项目只有高尔夫球、藤球、射箭、卡巴迪4项，男子足球未进入前4名。游泳项目进步突出，夺得23枚金牌，远远超过日本取得的7枚金牌，特别是女子游泳的金牌全部落入中国运动员之手。中国在这次亚运会上有5人1队11次打破10项亚洲游泳纪录，有13人4队32次打破23项亚运会纪录，其中进入当年世界游泳前10名的有6人4队12项，进入世界前3名的有3人1队5项。

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来自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运动员都参加了本届亚运会。中国大陆和来自中国台、港、澳的运动员同场竞技，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中国台湾地区是在阔别亚运会20年后重返赛会，共派出288名男女运动员，参加了20个项目的比赛和两项表演赛，获10枚银牌、21枚铜牌，表演项目获棒球冠军和软式网球男子团体冠军。中国香港地区组成了283人的体育代表团与会，有217名运动员参加了20个项目的比赛，获两枚银

牌、5 枚铜牌。中国澳门地区是首次参加亚运会，由 74 人组成的代表团中，有 49 名运动员参加了 7 个项目的比赛，获 1 枚武术铜牌。

二、国际赛场上竞技体育的突飞猛进

(一) 1989 年取得的成就

1989 年，我国竞技体育选手在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中，共获得 82 个世界冠军；在国内外比赛中，有 23 人 44 次打破 33 项世界纪录，两人两次超过两项世界纪录，16 人 26 次打破 18 项亚洲纪录，80 人 7 队 163 次打破 95 项全国纪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这一年，有 83 人在田径、跳水、举重、体操、技巧、射击、赛艇、柔道、短道速滑、乒乓球、羽毛球、帆板、航海模型、航空模型、跳伞和弓弩共 16 个项目上夺魁。在 82 个世界冠军中，田径获得 3 个、跳水获得 7 个、航海模型获得 13 个。短道速滑和弓弩是首次获得世界冠军。

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世界先进水平。跳水选手在第 6 届世界杯跳水比赛中，获得全部 9 个比赛小项目的 7 项冠军。

权威性的美国《游泳世界》杂志评选出的 1989 年世界跳水 4 杰中，我国选手占了 3 名。举重选手在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中，有 12 人获得 28 枚金牌，在国际比赛中有 10 人 29 次打破 19 项世界纪录。其中男子获 4 枚金牌，蔡炎书的 75 公斤级抓举金牌是中国在这个级别上首次获得；刘寿斌的成绩突出，共获两枚金牌，并以 134.5 公斤的成绩打破了 56 公斤级抓举世界纪录。此外，在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上获 1 枚金牌、1 枚银牌和 3 枚铜牌。女子举重运动员在第 3 届世界举重锦标赛上，夺得全部 27 枚金牌中的 24 枚，并有 10 人次打破 18 项世界纪录；在第 2 届亚洲女子举重锦标赛中，获得全部 9 个级别的 27 枚金牌，3 人 10 次打破 6 项亚洲纪

录，继续保持着在世界和亚洲的优势。射击运动员在世界飞碟射击锦标赛中获两项冠军，且两项成绩均打破世界纪录。女子赛艇选手继1988年首次夺得1项世界冠军后，1989年在第15届世界赛艇锦标赛上又获金、银、铜牌各1枚，并在第15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赛艇比赛中获两枚金牌和两枚银牌，在第3届亚洲赛艇锦标赛上夺得全部14项比赛中的7枚金牌，成绩突出。技巧选手在第7届世界杯比赛中获得7枚金牌、4枚银牌和7枚铜牌；在第一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中又获得5枚金牌、3枚银牌和6枚铜牌，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航海模型运动员在第5届世界外观航海模型锦标赛和第6届世界航海模型动力艇锦标赛中，共夺得13项世界冠军，并有5人6次打破5项世界纪录，保持了世界先进水平。

一些优势项目面临挑战。中国乒乓球运动在世界上保持了近30年的优势，在第4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女子仍保持着一定的优势，女团和女单蝉联冠军，女双包揽了前3名，男子项目受到欧亚强手的挑战，纷纷落马，男团以0比5的悬殊比分败于瑞典，获亚军，男单和男双被挤到第3名，混双也退到第3位，失去了优势，好在第10届世界杯乒乓球赛中夺得男子单打冠军，取得一席之地。羽毛球选手在第6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和第9届世界杯羽毛球赛中共获6枚金牌，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在衡量整体实力的混合团体（苏迪曼杯）赛中被韩国队挤出决赛圈，只获第3名。体操项目在1988年奥运会比赛中滑坡，只获1枚跳马金牌，男子团体败在日本手下，降到第4名，女子团体获第6名；1989年在第25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中，夺得3枚金牌，其中女子获1枚，是自1979年首次夺魁以来的第3枚女子金牌，男子团体战胜日本获第3名，女子团体上升到第3名，走出了低谷，一代新秀正在崛起。

田径、游泳项目有新的发展，特别是女子运动员。在第5届世界杯田径赛中，黄志红以20.73米的成绩夺得女子铅球金牌，这不仅是中国选手在世界杯田径赛中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也是亚洲

夺魁的第一位选手，侯雪梅和张丽还分获女子铁饼和标枪银牌；在第7届世界女子15公里公路越野锦标赛上，中国女队首次夺得团体冠军，王秀婷和钟焕娣夺得个人冠亚军；在第15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中，中国选手获得两枚金牌、两枚铜牌；在世界杯竞走比赛中获女子10公里团体亚军；在世界杯马拉松比赛中获女子团体第3名；在第8届亚洲田径锦标赛中获22枚金牌、15枚银牌和6枚铜牌。在这一年，中国田径女选手有6人5项进入世界前10名行列。

游泳运动在这一年无重大国际比赛，中国选手只在第3届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中获3枚金牌、6枚银牌和4枚铜牌，金牌数列第2位。但这一年游泳成绩有明显进步，有11项（男2项、女9项）进入世界前10名的水平，其中女子有3项位列第2。

（二）1990年取得的成就

由于这年是亚运年，因此，中国代表队参加的国际赛事相对较少，但仍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在南斯拉夫萨拉热窝举行第4届世界女子举重锦标赛和第16届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上，中国队获世界女子举重锦标赛17枚金牌、7枚银牌，并获团体第1名；获世界青年锦标赛7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和团体第3名。在东京举行的第16届国际羽毛球男子团体锦标赛（汤姆斯杯）和第13届国际羽毛球女子团体锦标赛（尤伯杯）上，中国男女队双获团体冠军；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第10届世界杯羽毛球赛上，中国选手获两枚金牌、两枚银牌。在第10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中，中国获男子团体、单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4项冠军。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第45届世界射击锦标赛上，中国运动员获两枚金牌、6枚银牌、6枚铜牌；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1990年世界杯射击赛决赛中，中国运动员获1枚金牌、1枚铜牌。在日本举行的第11届世界杯乒乓球赛上，中国选手马文革获亚军。在奥地利什雷姆斯举行的第7届世界耐久航海

模型锦标赛中，中国队获1枚金牌和1枚铜牌。在罗马举行的第5届世界蹼泳锦标赛上，中国运动员共获10枚金牌、5枚银牌、9枚铜牌，并获团体总分第2名，我国运动员1人2队4次打破4项世界纪录。中国运动员周玲美在女子自行车比赛中，以1分13.899秒的成绩打破1000米计时赛世界纪录。在德国奥格斯堡举行的第9届世界技巧锦标赛上，中国运动员获7枚金牌、6枚银牌、6枚铜牌。在第5届亚洲青年男子排球锦标赛上，中国队获得冠军。

（三）1991年取得的成就

1991年中国运动员参加了近40项重大国际比赛，有86人（男33人、女53人）在田径、游泳、跳水、体操、举重、射击、柔道、摔跤、赛艇、乒乓球、羽毛球、速度滑冰、短道速度滑冰、技巧、武术、象棋、国际象棋、航空模型和航海模型19个项目中，获得93个世界冠军，有24人2队51次创31项世界纪录，34人9队64次创49项亚洲纪录[1]。

在这一年获得的93个世界冠军中，首次出现了游泳、武术、摔跤和国际象棋4个项目的20个冠军。特别是在第6届世界游泳锦标赛上，中国女选手夺得4枚金牌，是历史性的突破。在世界游泳排名表上，中国有6人1队8项进入前10名，其中3项排名世界第一，进步十分明显。引起世界瞩目的还有国际象棋女将谢军，她在取得与世界冠军的挑战权后，战胜了苏联名将奇布尔达尼泽，登上冠军宝座，打破了欧洲棋手对国际象棋64年的垄断，结束了苏联女棋手称霸41年的局面。首届世界武术锦标赛上，中国选手在16项比赛中获得12项冠军。第3届世界女子自由式摔跤锦标赛上，中国首次夺得3个级别的金牌，这些都是空前的战绩[2]。

跳水运动员在第6届世界游泳锦标赛和第7届世界杯跳水比赛

[1] 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1992—1993）.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197.

[2] 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1992—1993）.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197.

中，共有12人获10个冠军，是历史上获得冠军最多的一年，并涌现出13岁的伏明霞、15岁的孙淑伟等一批富有潜力的年轻新秀。伏明霞成为世界跳水史上最年轻的世界冠军，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美国《游泳世界》杂志评选出的1991年4名世界最佳跳水运动员中，中国占3名。冰上项目有新的进步，取得了500米速度滑冰和短道速度滑冰两项世界冠军[1]。

乒乓球列入奥运会项目后，引起各国重视，近几年一些国家的技术水平提高很快。中国选手面对困难的局面，发扬拼搏精神，在第4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夺得女子单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3项金牌；在第2届世界杯乒乓球团体赛中，中国男、女队双双获得冠军。男子举重在世界锦标赛上获得3项冠军，并打破两项世界纪录；女子举重仍保持绝对优势，在世界举重锦标赛的27项比赛中共获23项冠军，全年在国际比赛中有13人34次创19项世界纪录[2]。

作为基础项目的田径，中国与世界水平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但1991年有3名女选手在铅球、标枪两个项目上夺得3个世界冠军，其中隋新梅和徐德妹是首次获得金牌。这一年，在第3届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选手获1枚金牌、两枚银牌；在第3届世界田径锦标赛上，又取得两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都是参加这两个比赛以来的最好成绩，实现了亚洲田径史上金牌“零”的突破[3]。

（四）1992年取得的成就

1992年，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和世界杯赛三大赛事中，有68人在田径、游泳、跳水、射击、体操、技巧、举重、

[1] 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1992—1993）.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197.

[2] 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1992—1993）.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197.

[3] 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1992—1993）.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197-198.

摔跤、柔道、乒乓球、羽毛球、速度滑冰、短道速度滑冰、蹼泳和航海模型15个项目中，共获得89个世界冠军。其中游泳成绩突出，自1991年首获4个冠军以来，1992年跃升到9个冠军，成为世界泳坛的一支新生力量。冬季项目的速度滑冰和短道速度滑冰也跨上了新台阶，分获4个和两个冠军，取得了历年来的最好成绩；田径、体操、举重、射击等项目继续保持着优势[1]。

中国健儿在第25届夏季奥运会上夺得16枚金牌、22枚银牌和16枚铜牌，金牌和奖牌总数排在独联体、美国、德国之后，居第四位。田径、游泳和柔道是第一次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在第16届冬季奥运会上，中国选手勇夺3枚银牌，实现了奖牌“零”的突破。

在获得世界冠军和创造世界纪录的运动员中，不乏年轻新手，如体操新秀、高低杠冠军陆莉年仅15岁，双杠冠军李小双才18岁，跳水小将、女子跳台金牌获得者伏明霞只有14岁，男子跳台金牌获得者孙淑伟也只有16岁。后备力量的迅速成长，为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三、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取得重大成就

1992年7月24日—8月9日，第25届奥运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参加本届奥运会的运动员10251人，来自18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人数最多的国家是美国609人，最少的国家是库克群岛，只有两名运动员。

本届奥运会共设25个正式比赛项目，257个小项，3个表演项目（跆拳道、轮滑球、回力球）。我国派出由380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20个项目的角逐，共获奖牌54枚，其中金牌16枚，银牌22枚，铜牌16枚，有两人两次创两项世界纪录、1人1次平1项

[1] 国家体委．中国体育年鉴（1992—1993）．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1349.

世界纪录，有5人7次创6项奥运会纪录。我国获金牌的位次由上届的第11位，上升到第4位，在“第二档次”中由居后变成首位，大部分优势项目仍然保持优势，基础项目有较大突破。

（一）田径项目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田径选手取得了参加奥运会以来的最好成绩。共计夺得1枚金牌、1枚银牌、两枚铜牌和1个第4名、4个第5名、1个第6名、两个第8名。竞走女将陈跃玲勇夺10公里竞走金牌，成为中国奥运会史上第一位田径冠军，实现了中国奥运史上田径金牌“零”的突破。本届奥运会田径比赛进入前8名的中国选手有女子9人4项、男子3人3项。其中女子10公里竞走有3人获得名次，反映了这个项目的雄厚实力。女子1500米取得了1枚铜牌和1个第5名的好成绩，具有较强实力的女子铅球也有两名选手获得第2和第5名。

（二）游泳项目首获奥运金牌

中国游泳选手在第25届奥运会上大显身手，夺得4枚金牌、5枚银牌，开创了中国在奥运会上首次拥有金牌的历史。

在参赛的12名女选手中，有8人取得名次。庄泳以54.64秒的成绩击败了世界纪录保持者美国选手汤普森，夺得女子100米自由泳金牌，打破了保持12年的54.79秒的奥运会纪录，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一枚金牌，也是中国游泳运动员第一次登上奥运会的冠军领奖台，中国游泳史辉煌的一页从此翻开；钱红以58.62秒的成绩获女子100米蝶泳金牌，打破59秒的奥运会纪录；林莉以2分11.65秒的成绩获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了沉睡11年的世界纪录；杨文意以24.79秒的成绩获女子50米自由泳金牌，并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24.98秒的世界纪录。这四朵“金花”取得的突出成绩，充分显示了中国女子游泳的雄厚实力。此外，还获得两个第4名、1个第6名和1个第8名，

使中国游泳总体水平仅次于美国、独联体和匈牙利，跻身世界四强。

（三）体操项目成绩卓著

在第25届奥运会上，中国男女体操队共获得两枚金牌、4枚银牌和两枚铜牌。

18岁的湖北运动员李小双在自由体操决赛中，拿出了最具威慑力的“杀手锏”——团身后空翻三周。这个动作既难又险，集中体现了运动员精湛的技术、准确的空间感觉，以及非凡的勇气和自信，荣获自由体操金牌。这是继李月久、李宁、童非、楼云之后第五个在世界大赛获自由体操金牌的中国运动员。

中国女队获得团体第4名，在48项次规定和自选动作比赛中无一失误，成功率达到百分之百。高低杠决赛中，15岁新秀陆莉脱颖而出，她的一套动作难度大、连接新，成套中用反转360°接反吊前空翻，下法采用了直体后空翻两周下，完成得又高又飘，落地纹丝不动。全套动作无懈可击，使6位裁判员同时亮出了本届奥运会体操项目的第一个10分。女子体操世界大赛高低杠的桂冠继马燕红、樊迪之后，又一次戴在了中国姑娘头上。

（四）篮球项目迈上新台阶

中国男女篮球队夺得了参加第25届奥运会决赛资格，成为我国三大球中唯一双双进军巴塞罗那的队伍。特别是女篮，继1983年获得世界锦标赛和1984年奥运会的第3名之后，勇夺第25届奥运会女篮亚军，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中国男篮在奥运会比赛中，也缩小了与世界强队的差距。

（五）乒乓球项目再度辉煌

在1992年7月28日至8月6日第25届奥运会乒乓球比赛中，中国运动员获3枚金牌、两枚银牌和1枚铜牌，成绩好于上一届。

女子双打在上届比赛中败给了韩国选手，而这次比赛的决赛则是在两对中国选手之间进行，结果邓亚萍/乔红以3:1战胜陈子荷/高军获得冠军。在女子单打比赛中，中国队员同样发挥出色，半决赛邓亚萍以3:0轻取韩国选手玄静和，乔红以3:1击败朝鲜名将李粉姬，双双进入决赛，最后，邓亚萍以3:1战胜乔红，戴上了女子单打桂冠，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自为她颁奖。中国男选手吕林/王涛在双打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击败韩国选手金泽洙/刘南奎和德国名将罗斯科普夫/费兹纳尔登上冠军宝座，男子单打由上届的第5名上升到第3名。

此外，中国跳水队的“世界跳水女皇”高敏在女子3米跳板决赛中，夺得了她跳水生涯中的最后一枚金牌。刚满15岁的跳水小将伏明霞一跳惊人，以近50分的绝对优势荣登女子跳台跳水冠军宝座；少年老成的孙淑伟在男子跳台决赛中，动作高难精彩，执法的7位裁判员有6位打出10分，创造了跳台比赛中的奇迹，赢得了桂冠。庄晓岩过五关斩六将，勇夺女子72公斤以上级柔道比赛的金牌，成为名副其实的“无冕之王”。射击运动员张山在双向飞碟射击比赛中战胜了50多名男女选手，成为奥运会飞碟射击史上第一个女冠军；上届奥运会铜牌得主王义夫宝刀不老，在男子气手枪比赛中获金牌，圆了他的金牌梦。

在此次奥运会上，中国健儿共获得金牌16枚、银牌22枚、铜牌16枚，3人两次创两项平1项世界纪录，7人9次创7项奥运会纪录。在参加第25届奥运会的170个体育代表团中，中国的成绩列第4位，这是中国体育从未有过的辉煌，这次全面历史性的超越，将载入中国体育史上光辉的一页。此外，中国台北队在新列入的棒球比赛中获亚军，这是台北队继杨传广在1960年第17届罗马奥运会上获田径十项全能银牌32年后取得的另一枚银牌。

大 事 记

1980 年

1 月 7—23 日 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共 163 人参加。会议主要研究如何适应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和我国参加奥运会后的新形势，加速把体育事业搞上去，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和运动技术水平，更多更快地培养体育人才，争取在世界体坛创造优异成绩，促使体育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2 月 12—24 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第 13 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中国运动员首次参加冬季奥运会。

3 月 28 日 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加速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了“项目设置应尽可能与奥运会对口，并突出重点”。同时提出要“改革、完善训练体制”。

6 月 19 日 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体育理论专题座谈会。体育理论工作者、专家、教授以及有关方面的人员就体育基本词汇的科学概念、体育属于何种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中体育的特点、体育科学的体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7 月 19 日—8 月 3 日 第 22 届奥运会在莫斯科举行，由于发生了苏联侵略阿富汗事件，我国抵制了这届奥运会。

8 月 16—21 日 第 2 届中学生运动会在太原举行。

12 月 15 日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在北京成立，下设体育科学理论、运动训练学、运动医学、运动生物学、运动心理学 5 个分会。

12 月 17—22 日　全国体育科学学术报告会在北京举行。

1981 年

2 月 21 日—3 月 4 日　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主任会议。会议提出要在调整中前进，要使体育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更大作用。

2 月 24 日—3 月 4 日　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滑冰、滑雪队）首次参加在西班牙举行的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

3 月 23 日　国际奥委会宣布，台湾奥委会同意改为“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并改变原来使用的会旗和会徽。

3 月 25—27 日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表参加在墨尔本举行的“各国体育总会国际大会”成立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4 月 14—26 日　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 36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队一举获得比赛的全部 7 项冠军。

7 月 19—30 日　中国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 11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获总成绩第四。

8 月 19—28 日　国家体委在秦皇岛召开全国体育宣传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地体委把体育宣传工作纳入议事日程，采取有效措施，并依靠新闻单位做好体育宣传工作。

9 月 20—28 日　全国少数民族体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着重研究少数民族体育工作的会议。

10 月 2 日　何振梁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10 月 21 日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常委会和中国奥委会执委会在北京召开联席会议，倡议台湾海峡两岸开展体育交流，并提出 5 项建议。

11 月 26 日　中国队获第 3 届世界杯女排赛冠军。这是我国在三大球赛中首获世界冠军。

1982 年

1 月 《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编写工作完成。这是我国第一次编写体育方面的百科全书。

4 月 7 日 国家体委发出《关于开展评选“田径之乡”的通知》。通知指出，举办这样的评选活动，对推动各地田径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迅速提高田径运动技术水平有十分积极的意义。1982 年的评选是第一次，以后每 3 年评选一次。

6 月 21—30 日 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主任汇报会议。会议强调，体育队伍不仅要攀登技术高峰，而且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7 月 25 日—8 月 1 日 体育科学理论学会在烟台召开了有关体育概念、体育科学的属性与体系的专题学术研讨会。

8 月 4—14 日 我国首次举办女子足球邀请赛。

8 月 10—19 日 我国首届大学生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8 月 27 日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体委发布施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同时公布新《标准》的测验规则和测验成绩评分表(试行)。

9 月 2—8 日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11 月 19 日—12 月 4 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一行 144 人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 9 届亚洲运动会。在参加的 18 个项目中，中国运动员获金牌 81 枚、银牌 51 枚和铜牌 41 枚，赢得金牌和总分第一。跳高运动员朱建华被评为亚运会“最佳运动员”。

12 月 4 日 第六届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 21 条中首次明确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

1983 年

2 月 23 日—3 月 4 日 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

肯定了体育事业这两年的新发展和重大突破，体育战线开始出现新局面，讨论了本世纪的奋斗目标："普及城乡体育运动，达到世界第一流的运动技术水平，建设现代化的体育设施；拥有一支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成为世界体育强国"；布置了"六五计划"后三年的体育工作；提出了体育改革的若干建议。

3月3日 李梦华在全国体工会议上提出：我国本世纪要成为世界体育强国。

5月7日 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在东京举行代表大会，决定接纳中国台北乒协为会员。中国乒协主席徐寅生在会上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省乒乓球运动员同我们是骨肉同胞，我们希望同他们一起为发展乒乓球运动作出努力。

6月24—29日 全国体育文物工作会议在河南郑州举行，会议讨论了《体育文物管理暂行办法（试行)》，并转发各地试行。

9月16日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上海举行授勋仪式。他代表国际奥委会把一枚奥林匹克银质勋章授给荣高棠，以表彰他对发展中国体育事业、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体育交往作出的重大贡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奥林匹克勋章。

9月18日—10月1日 第5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共3破5平3项世界纪录。

10月8—11日 首届亚洲杯乒乓球赛在江苏无锡举行。

10月20—21日 全国残疾人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代表会议在天津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

1984年

1月初 国际运动科学和体育理事会吸收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为A类会员。

1月4—11日 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省、自治区、直辖市体委主任汇报会，103人参加，会议主要汇报1983年体育工作情况和1984年工作设想。

2月8—19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举行的第14届冬季奥运会。这是海峡两岸中国选手第一次同时参加奥运会。

7月7日 中国体育史学会成立。

7月18日 国务院批准全国青少年运动会将4年举行一次。

7月28日—8月12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23届奥运会上共获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金牌数列第四位，奖牌数列第六位，总分列第七位。

8月21—31日 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全国体育发展战略、体育改革会议，92人参加。会议就本世纪末使我国成为世界体育强国问题进行了探讨和预测。

10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通知要求积极发展城乡体育，积极开展业余训练，完善人才梯队，改革训练和竞赛体制，发展体育科研、教育，搞好项目布局，逐步增加体育事业经费和基建投资，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体育强国。

10月6—14日 全国首届残疾人运动会在合肥举行。2人破两项世界纪录。

10月9日 新中国成立35年来的50名杰出教练员、运动员颁奖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10月21日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性的体育论文报告会在南京召开。

12月31日 国家体委重新修订颁发《体育运动全国纪录审批制度》和《运动员技术等级制度》，自1985年1月1日起执行。

1985年

1月9日 国家体委、教育部公布105所中、小学为1984年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先进集体。

2月 《当代中国》丛书中的一部《当代中国体育》出版发

行。这部书记述了新中国成立35年来体育事业的成就和经验。

3月4—7日 首届全国体育新闻学术讨论会在福州举行。会间成立了中国体育新闻学会。

3月18日 国家体委、教育部、中国科协、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群众性航空、航海、车辆模型及无线电活动的意见。

3月20日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成立。

4月2—11日 全国体委主任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体育运动的通知》，深入研究了体育改革问题。

4月3日 《体育报》报道，国家体委发出《关于1986年全国体育竞赛招标工作的通知》。决定从1986年起全国体育竞赛全部实行招标。

5月1日 西藏登山队首次由中国一侧登上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海拔8201米）。

5月19日 中国队在第13届世界杯足球赛中以1∶2负于香港，举国震动。

7月4日 国际特殊奥林匹克组织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仪式，接受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参加该组织。

7月8日 国际地掷球联合会接纳中国地掷球协会为正式会员。

7月9日 国家体委批准授予乒乓球、羽毛球、田径、举重4个项目的42名运动员国际运动健将称号。这是我国第一批国际级运动健将。

7月28日 国家体委颁发《国家体委体育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

7月31日—8月11日 首届国际足联16岁以下柯达杯世界锦标赛在京、津、沪、大连4个赛区举行。

8月1日 国家女子手球队成立。

8月21日 国家体委下发《关于公布室内短道速度滑冰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和建立全国纪录的通知》。

8月21—23日 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在青海西宁举行成立大会。研究会由64名委员组成，张彩珍任会长。

8月21—26日 国际武术邀请赛在西安举行，同时成立了国际武术联合会筹委会。

9月7日 第2届全国工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其间对276个全国职工体育先进单位和977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10月6—18日 第1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在郑州举行。

10月15日 国家体委公布《全国体育先进县标准的细则》(试行)。

11月20日 历时一年的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在北京结束。中方以8∶7获胜。

12月30日 国家体委下发关于公布《登山运动员技术等级试行标准》的通知。

1986年

1月 首届欧亚乒乓球对抗赛在欧洲举行。

2月 国家体委公布《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决定以体育社会化、科学化为重点，以竞赛体制和训练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推进体育体制改革。

2月1日 1985年全国10名最佳运动员评选揭晓大会在西安举行。朗平、聂卫平、韩健、童非、阎红、曹燕华、杨锡兰、李宁、江嘉良、李玲蔚当选。

2月12—13日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后致电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以及中国奥委会副主席黄中和中国奥委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授予国务院副总理万里金质“奥林匹克勋章”；授予中国奥委会副主席黄中银质“奥林匹克勋章”；同时为表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体育设施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授予中国奥委会

"奥林匹克奖杯"。

2月20日 国家体委下发《秋千、抢花炮、叼羊、民族射弩竞赛规则（试行草案）》。

国家体委公布《全国体育竞赛赛区工作条例》和《违反全国体育竞赛赛区工作条例纪律的规定》。

2月24日—3月1日 全国武术训练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60多人参加。会议认为，武术必须向科学化、规范化方向迈进。

3月1日 1985年世界10名最佳运动员评选揭晓大会在北京举行。当选的运动员有中国的朗平（排球）、联邦德国的罗格斯（游泳）、美国的克拉姆（田径）、苏联的布勃卡（田径）、保加利亚的苏莱曼诺夫（举重）、中国的聂卫平（围棋）、苏联的科罗廖夫（体操）、苏联的帕克林（田径）、美国的纳芙拉蒂洛娃（网球）、民主德国的安·埃里格（速滑）。

3月2—9日 我国参加在日本札幌举行的第1届亚洲冬季运动会，获4枚金牌。

3月6—15日 全国体委主任会议在北京举行，有100多人参加。会议根据体育发展的新形势，作出关于体制改革的重要决定。

3月27日 国家体委发出《关于公共体育场所应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积极向群众开放的通知》。

4月12日 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第五十章第三节体育事业中提到："进一步加强专业体育队伍的建设，大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促进整个民族健康水平的提高。适当加强体育设施的建设。除国家建设一些重点体育设施外，有条件的地方，也要因地制宜地逐步建设体育运动设施。"

4月17日 国家教委、国家体委联合下发《全国培养高水平学生运动员试点学校申报审批暂行办法》。

4月29日 中国体育集邮协会在北京成立。

5月15日 中国林业体育协会在北京成立。

6月4日 中国武术研究院在北京成立，中国武术协会主席徐才任院长。

7月5—20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在苏联举行的第1届友好运动会上获4枚银牌和5枚铜牌。

8月3—9日 第2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在大连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李鹏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当代大学生要有健全的体魄”的讲话。

8月10—17日 第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9月20日—10月5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514人（其中运动员384人）参加在汉城举行的第10届亚运会，共获94枚金牌、82枚银牌和46枚铜牌，金牌总数列第一位。

10月19日 北京国际马拉松赛举行。中国运动员朱树春获第八名。

11月29日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颁发《城市公共体育运动设施用地定额指标暂行规定》。

12月10日 中国聋人体育协会在北京成立。

1987年

1月8—17日 全国体委主任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就进一步促进体育体制改革、加强体育战线精神文明建设和为做好1987年全国体育工作进行了部署。

2月21日 国家统计局关于198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中写到：体育事业取得新成就。1986年我国运动员共获得26个世界冠军，12次打破和超过7项世界纪录，404次打破172项全国纪录。

2月21日 中国举重协会健美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3月10—17日 第6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在吉林举行。

3月26日 国家体委公布新修订的《男子标枪运动员技术等

级标准》，并决定从4月1日起执行。

3月27—29日 首届中国特殊奥运会在深圳举行。

4月1日 国家体委公布关于《授予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体育运动奖章的暂行办法》。

4月22—26日 首届国际奥林匹克电影节在突尼斯举行，中国彩色纪录片《民族体育之花》获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联合会大奖。

4月25日 中国地质体育协会成立。

5月3日 中国业余拳击协会成立。

5月5日 全国总工会、国家体委联合发出通知，决定从1987年7月1日—1988年6月31日，开展全国性的基层职工足球赛，并评选先进足球城。

5月10—14日 全国首届女子举重锦标赛在长春举行，超16项世界纪录。

5月18—24日 第5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

5月30日—6月4日 全国体育社会学、体育概论、群众体育学学术讨论会在苏州大学召开。59名代表就各学科的研究对象、领域、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进行探讨，力争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学科建设规划和中近期研究课题咨询意见，为以后体育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6月11日 中国邮电体育协会恢复。

6月14日 国家体委颁发《全国体育先进县的标准和评选办法》与《全国体育先进县标准的细则》。

6月28日 中国电子体育协会在北京成立。

7月18日 国家体委发布《关于制定体育法规程序的规定》。

8月6日 国家体委发出关于加强武术工作的决定。

8月6—12日 全国体育哲学、美学、伦理学、经济学学术讨论会在湖南桑植召开。60多名代表就各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主要内容及发展规划进行了讨论。

8月10日 中国毽球协会在北京成立。

8月10日 中国门球协会在北京成立。

8月22—28日 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北京密云召开，172人参加。会议检阅了两年来体育发展战略研究经验，并就建设体育强国、深化体育改革等进行了讨论，制定了以青少年为重点的全民健身战略与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战略协调发展的方针。

8月30日—9月7日 中国首次派运动员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第7届国际特殊奥运会。

9月23日 国家体委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学生体育合格标准试行办法》从1988年开始试行。《办法》规定，凡身体正常而体育不及格的学生，不评"三好生"，不能报考高一级学校。

9月26—27日 首届亚洲武术锦标赛在日本横滨举行。

11月5日 国家体委、国家教委联合发出《关于在全国中小学生中进一步开展小足球、小篮球、小排球活动的通知》。

11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体育组织法》起草领导小组和起草小组成立。

国家体委公布《关于举办国际国内大型体育活动的规定》。

11月15—19日 第2届全国体育科学学术会议在石家庄召开。

11月20日—12月5日 第6届全运会在广州举行。本届运动会共19次打破和超过16项世界纪录，67次打破和超过37项亚洲纪录，14次创10项亚洲最好成绩，174次打破82项全国纪录，是历届全运会成绩最好的一次。

11月30日 国家教委、国家体委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纠正不良赛风的通知》。

12月15—20日 第2届全国体育科学学术报告会在河北石家庄召开。本届报告会共征集论文1082篇，录选412篇。论文有3个特点：一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新的发展。二是科研为体育实践服务的目标更加明确。三是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手段在不断更新。

12 月 19 日 国家体委颁布《国际象棋棋手技术等级标准》和《国际象棋棋手等级分制和技术等级标准实施细则》。

1988 年

1 月 14 日 国家体委下发《关于修订蹼泳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通知》。

2 月 10 日 国家体委发布《龙舟裁判员技术等级的实施细则》。

2 月 13—28 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加拿大卡尔加里举行的第 15 届冬季奥运会。在短道速度滑冰表演赛中，李琰夺得女子 1000 米金牌。

2 月 29 日 国家体委发布《教练员管理工作暂行办法》。

3 月 7 日 国家体委下发《关于在我国开展女子摔跤的通知》。

3 月 24 日 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卫生部、国家民委联合发出《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研究公报》。

3 月 29 日 国家体委公布《马术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4 月 1 日—9 月 3 日 第 1 届富士通杯世界围棋锦标赛在日本举行，中国棋手聂卫平获得第三名。

4 月 16 日 国家体委发布《围棋国家段位标准》《围棋国家段位标准实施细则》和《围棋地方段位制》。原下发的《围棋段位标准》《围棋段位标准实施细则》和《围棋地方段位制》停止使用。

4 月 20 日 国家体委下发《关于更改花样游泳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的通知。

5 月 5—7 日 中国、日本、尼泊尔 1988 珠穆朗玛 / 萨迦玛塔峰联合登山队 12 人登上顶峰，并实现了会师、双跨的伟大壮举。12 名登顶队员中有中国的次仁多吉、李致新、大次仁、仁青平措 4 人，次仁多吉创造了在顶峰停留 98 分钟的最高纪录。

5 月 9 日 国家体委发布《加强拳击运动管理有关规定》。

5月11日 邓小平为《中国体育报》题写报名。

5月15日 国家体委发布《关于运动员参加全国比赛的资格审查暂行办法》。

5月18—24日 全国体委主任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座谈会的3个主要议题是：交流各地自第6届全运会后深化体育改革的情况和经验；讨论、确定第7届全运会的方案；研究如何开好第5次全国体总大会。

6月1—10日 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起草工作研讨会。

6月21日 国家体委、国家统计局、国家教委、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关于对1983年以来全国新建体育场地进行普查的联合通知》。

6月26—29日 第1届世界反对在竞技中使用兴奋剂的常设会议在加拿大召开。中国代表在会上表明了中国奥委会在世界反兴奋剂这一重大问题上的态度。中国成为制订第一个《国际反兴奋剂宪章》的成员国。

7月1日 《体育报》更名为《中国体育报》，并由原来每周4期改为日报。

7月10日 国家体委发布《关于加速提高游泳运动水平的决定》。

国家体委发布《关于加速发展田径运动的决定》。

8月2日 国家体委发布《中国象棋棋手技术等级标准》和《中国象棋等级分制和技术等级标准实施细则》。原下发的《中国象棋棋手等级标准》和《中国象棋棋手等级分制和技术等级标准实施细则》作废。

8月22—24日 由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卫生部联合主持的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

8月26日 国家体委发布《拳击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制度》。

国家体委公布《拳击国家级裁判员报考资格和批准手续》。

9月1日 国家体委、国家教委联合推出新编第七套和第五套儿童少年广播（韵律）体操，并在全国中小学推行。

9月5日 国家体委公布《短道速度滑冰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和《短道速度滑冰国际级运动健将标准》。

9月7日 国家体委同意成立中国石化体育协会。

9月17日—10月2日 第24届奥运会在汉城举行。160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运动员参加。中国选手共获得28枚奖牌，其中金牌5枚、银牌11枚、铜牌12枚。

9月23日 国家体委发布《游泳国际级运动健将标准》。

10月9—16日 首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在北京举行。获得金牌总数前三名的是辽宁、山东、河北代表团。

10月15—24日 第8届残疾人奥运会在汉城举行。中国43名运动员在田径、游泳、乒乓球和射击4个大项的比赛中，共获得44枚奖牌，其中金牌17枚、银牌17枚、铜牌10枚。

12月2日 参加中美联合登山科学考察队的中国队员李致新和王勇峰成功地登上南极最高峰——文森峰，并创一天之内用7小时零2分钟成功登上文森峰的纪录。

12月17日 国家体委发出《关于深入、扎实地开展冬季群众性体育锻炼活动的通知》。

国家体委公布《自行车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12月23日 国家体委公布《武术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原《武术技术等级试行标准》自行作废。

12月29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国家主席杨尚昆任命伍绍祖为国家体委主任。

12月30日 国家体委发布《国际象棋等级分制和技术等级标准实施细则》。1987年发布的《国际象棋等级分制和技术等级标准实施细则》自行作废。

12月 台湾的吴经国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1989年

4月15—20日 全国体委主任会议在北京召开。

4月27日 国家体委同意成立中国航空航天体育协会。

5月4日 国家体委、国家教委等11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国庆前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的通知》。

5月9日 国家体委公布《全国性体育竞赛检查禁用药物暂行规定》。

5月30日 国家体委公布《关于我国运动员创造的世界纪录、亚洲纪录和全国纪录管理办法》。

6月11日 国家体委公布试行《全国体育运动单项竞赛制度》。

7月10日 国家体委公布《国家体委体育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

8月22日 国家体委下发《关于开展铁人三项运动》的通知。

10月14—19日 国家体委在湖南大庸召开各国体育改革与发展学术研讨会。

11月27—30日 全国体育科技工作会议在山东泰安召开。200多人出席。国家体委副主任张彩珍作了《深化体育科技体制改革，加快体育科学化进程》的报告，伍绍祖主任作总结。会议讨论了《1991—2000年我国体育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草案)》和《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科技体制改革的意见（草案)》，交流了工作经验。

何振梁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

12月25日 国家体委公布《门球裁判员技术等级实施细则》。

1990年

1月6日 国家体委公布《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施行办法》。

2月6日 国家体委下发《裁判员技术等级制度保龄球、地掷球项目实施细则》。

2月21日 国家体委公布《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测验规则》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评分表》。

江泽民总书记为体育工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振兴中华"。

2月28日 国家体委发出《关于在1990年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的通知》。

国家体委下发《全国省、区、市群众体育工作评定办法实施细则》的修改和说明。

3月1日 国家体委下发《关于中国拳击协会实体化的通知》。

3月12日 国家教委、国家体委联合公布《学校体育工作条例》。

3月24日 中国科学院体育协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

4月18日 国家体委下发《关于中国武术协会实体化的通知》。

4月30日 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以优异成绩通过国际奥委会资格考试，成为国际奥委会批准的第一流检测机构。

6月4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全党全社会都要关心、支持办好第11届亚运会的通知》。

6月23日 中国藤球协会在北京成立。

7月2日 国家体委下发《关于发展皮划艇运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十年规划》。

9月22日—10月7日 第11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341枚奖牌，其中金牌183枚、银牌107枚、铜牌51枚，金牌、奖牌和总分均列第一位，并创造一项世界纪录、30次亚洲纪录和96次亚运会纪录。

9月27日 在第11届亚运会自行车比赛中，周玲美以1分13.899秒的成绩创造了自行车1公里计时赛新的世界纪录，成为中国这一自行车大国41年来第一位打破自行车世界纪录的人。

11月10日 国务院、国家体委公布废止1949—1989年的体

育法规目录，共废止体育法规、规章 119 件。

12 月 9 日 中国化工体育协会成立大会在天津举行。

1991 年

1 月 3—13 日 第 6 届世界游泳锦标赛在澳大利亚佩斯举行。中国代表团共获 8 枚金牌，其中游泳 4 枚，跳水 4 枚。这是中国运动员首次获得游泳世界冠军。

2 月 26 日 中国奥委会全体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决定中国向国际奥委会申请在北京举办 2000 年第 27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3 月 18 日 国务院批准成立北京 2000 年第 27 届奥运会申办委员会。

3 月 22—24 日 世界短道速度滑冰锦标赛在澳大利亚举行。中国选手获 1 枚金牌和 3 枚铜牌，破一项世界纪录。

4 月 24 日—5 月 6 日 第 4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千叶举行。中国队获 3 枚金牌、两枚银牌和 1 枚铜牌。

4 月 25 日 中国体育舞蹈运动协会在北京成立。

4 月 30 日—5 月 12 日 第 7 届羽毛球世界锦标赛暨第 2 届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赛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中国选手获 3 枚金牌和 3 枚铜牌。

5 月 9—12 日 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表彰会议在北京召开。农业部、国家体委、中国农民体协为全国 122 个先进乡（镇）颁发了奖牌。

5 月 20—25 日 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国体育发展与改革纲要》《体育事业十年改革规划和“八五”计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3 个草案。

7 月 8 日 国家体委、国家教委联合下发《体育运动学校办校暂行规定》《三年制中等体育学校教学计划》和《体育运动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

8月12日　国务院批准同意第7届全国运动会由北京市举办，四川省协办。举办经费采取补助包干的办法，国家不再为两地安排基建投资。

8月23日　国家体委下发《全国省（区、市）群众体育工作评定办法实施细则》。

9月14—17日　全国第2次职工体育工作会议在青岛召开。会议讨论修改了《全国企业、事业、机关单位职工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研究确定了“八五”和今后10年职工体育工作的任务和目标。

10月12日　首届世界武术锦标赛在北京举行。

11月10—17日　第4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在广西南宁举行。设9个比赛项目和120个表演项目，广西队获9枚金牌，名列榜首。

12月1日　北京承办2000年奥运会申请书递交仪式在北京举行。

12月29日　谢军成为我国第一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

1992年

2月8—23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法国阿尔贝维尔举行的第16届冬季奥运会，获得银牌3枚，取得了奖牌“零”的突破。

2月18日　中国登山协会主席扩大会议和全国登山管理工作会议在北京怀柔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外国人来华登山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和登山事业的发展问题，并调整增选了领导机构成员和修改了协会章程。

2月27日　国家体委、国家教委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下发《关于在全国幼儿园施行幼儿广播体操》的通知。

5月6—17日　第17届世界羽毛球男子团体锦标赛（汤姆斯杯）和第14届世界羽毛球女子团体锦标赛（尤伯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中国女队获得冠军，男队并列第三名。

5月16—25日 第6届世界女子举重锦标赛和第18届世界男子青年举重锦标赛在保加利亚瓦尔纳举行，41个国家和地区的123名女选手和86名男选手参赛。中国女队获26枚金牌和团体总分第一名，男队获5枚金牌、5枚银牌、3枚铜牌和团体总分第三名。

6月22—27日 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国足球工作报告及中国足协与地方足协实体化方案等问题。

7月8日 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7月25日—8月9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25届奥运会，共获金牌16枚、银牌22枚、铜牌16枚，金牌总数列172个参赛代表团的第4位。

8月23日 亚洲龙舟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10月4日 国际军体理事会军事五项赛的颁奖仪式在瑞士布莱姆卡顿举行，中国男女选手获得本届男女团体、个人全部4项冠军，创造了我国参加国际军事五项锦标赛12年来最辉煌的成绩，同时也是该锦标赛历史上第一支包揽全部冠军的队伍。

10月10—18日 第2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在湖北孝感举行，全国31个省（区、市）4000余人参加。比赛共设9个项目。

11月11—17日 全国体委主任座谈会在广东中山召开。会议确认了“以足球改革为突破口”，探索竞技体育改革的道路。这次会议在体育战线的改革发展过程中有着转折性、历史性的意义，会后被称为“中山会议”。

主要参考文献

[1] 伍绍祖.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综合卷）.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

[2] 袁伟民，李志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地方卷）.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

[3] 郝勤. 体育史.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 体育法规汇编（1949—1988）.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

[5] 国家体委. 中国体育年鉴.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4—1992.

[6] 任海. 奥林匹克运动. 第2版.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7] 孙葆丽. 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

[8] 崔乐泉，邱剑荣. 二十世纪中国·体育卫生卷.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后 记

《中国体育通史》第六卷由成都体育学院郝勤教授主编，南京体育学院、河北体育学院、鲁东大学体育学院和成都体育学院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撰写工作。编写之前，先由主编依据全书宗旨和写作体例拟定了具体的编写细目。在撰写过程中，作者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参阅了前人的有关研究成果，并访问了一些老一辈体育工作者，力求完整全面地反映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体育发展的概貌，为读者提供翔实的参阅史料。

本卷参编者有：郝勤（成都体育学院教授，绪论、第一章）、邱凌云（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讲师，第一章）、史国生（南京体育学院教授，第二章）、韩志芳（河北体育学院副教授，第三、四章）、唐永干（南京体育学院副教授，第五章）、田标（南京体育学院副教授，第六章），最后由郝勤教授进行修订统编。鲁东大学体育学院傅砚农教授参与了第五、六章的修订工作。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潘华副教授和崔莉讲师参与了本卷修订及史料查阅收集工作。

在此，特别地感谢我们参阅过的文献资料的作者和访问过的老一辈体育工作者，是他们帮助我们完成了本卷的编写工作。只是限于我们的写作水平，如有差错或不妥，诚望读者批评指正，帮助我们进一步提高此书质量。